中大五十年

上冊

中大五十年 上

中大五十年（上冊）

出版：	中大五十年編輯委員會	
編輯：	王邦華	陳嘉銘
	何敬熹	湯映彤
	吳嘉倫	楊穎仁
	李敏剛	劉子僑
	杜振豪	鄧權偉
	洪曉嫻	羅奕媚
	陳秉鳳	譚焜
作者：	王靖婷	張雋熙
	吉秋爽	陳日東
	吳倩婷	陳平原
	吳銘基	陳正恒
	李峻嶸	陸明敏
	周松齡	彭梽棚
	阿三	劉偉琪
	胡雪婷	戴遠雄
	胡蘇	簡浩德
	馬嶽	譚棨禧
	區諾軒	
插圖及設計：	陳素珊	湯映彤
承印：	星達製版印刷有限公司	
日期：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	
ISBN：	978-988-14266-0-4	
網頁：	http://www.cuhk50.org/	

目錄

序 / 陳嘉銘 xi
鳴謝 xiv

卷一

五十年鉤沉

前言 / 李敏剛 2
中文學院聯合會對皮理思教授專論的分析與評論 / 凌道揚、錢穆、蔣法賢 5
含糊曖昧的中大理念、朝三暮四的大學體制 / 王邦華 11
中文之為大學理想 / 李敏剛 28
使用中文是中大的使命 / 孫述宇 44
廢墟中大：中大認同的（後）殖民解讀 / 安徒 53
追憶中大的似水年華 / 李歐梵 58
回憶大學老師之一、三、七、八、十 / 雷競璇 62

卷二

國際化事件

不只守護傳統，不只接軌國際——國際化事件大論爭 / 杜振豪 70
國際化事件時序表 78

異議

哭中大——致中大師生的公開信 / 中大學生會及捍衛中大理想小組 82
關於香港中文大學招收非本地生和教學語言的一些誤解和事實 / 香港中文大學教務處 88
我們並沒有誤解校方政策——回應中大校方的澄清 / 中大學生會及捍衛中大理想小組 91
校長新春家書 / 劉遵義 93
要國際化　除了英語　還要開誠和尊重 / 不想沉默的中大教師 98
“I feel really sorry for you.”——一次校友評議會記事 / 胡浩堂 100

學術

說英文的中文大學 / 梁文道 102
國際視野？望向哪裡？ / 葉蔭聰 105

國際化與語文政策 / 馬國明 108
全球化，遺忘所有非英語文化？ / 陳光興、錢永祥 113

方言

An open letter to the students of CUHK / Eliza W. Y. Lee 116
粵語霸權及後殖民香港狀況 / 鄧小樺 122
笑中大——講方言的中文大學 / 幾位支持中大「國際化」策略的學生、校友 124
笑過了，多看點書罷 / 一個人 128

政策

中大語文政策的未來 / 馬傑偉 132
對《雙語政策委員會報告書諮詢稿》的回應 / 蔡寶瓊 136
雙語政策報告書沒有說甚麼 / 杜振豪 140
貨不對辦的大學語委會 / 杜振豪 142

保樹立人

校園運動的一場小勝——「保樹立人」運動 / 羅奕媚 146
池旁路擴路工程「公開事件」時間表 / 朱凱迪 148
齊來保護我們的山城（聯署） / 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校園環境關注小組 150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保樹立人」行動及聲明 / 一群中大校友 153
中大保樹之校方「屎上抹胭脂」公關簡報會（節錄） / 朱凱迪 154
中大校園發展處處長林泗維先生訪問 / Pat 156
報喜！中大設立斬樹審查委員會　池旁路老樹（可能）有救（節錄） / 朱凱迪 160
校園發展監察聯盟意見書第一號 / 校園發展監察聯盟 163
飯氣劇場# Special：咩野樹 / 江記 166
校園發展監察聯盟就校方諮詢的聲明 / 校園發展監察聯盟 168
願那校園能容下貓和樹 / 熊一豆 170
愛樹的人都難免掉眼淚，兼發泄與許敬文副校長面談後的感受 / 朱凱迪 172

情色版事件

從校園掀起的文化戰爭 / 杜振豪 176
情色版事件時序表 182

情色版欄目選讀

太子戲院食屎食著豆，或相反 / 弟 184

Stephy信箱（2006年12月號） 184

淫穢繪本 / 鄧萃芹 185

非性非非性，我們的巴士在哪裡？ / Dion Dublin大波蓮 185

滿足 / AGS 186

Stephy信箱（2007年1月號） 187

情色版意見問卷調查回應 188

聲明及事件紀錄

無懼污名　重尋真性 / 中大學生報 190

堅決反對校方不義裁決聲明 / 中大學生報 192

衝破禁忌　重建道德　要求影視處判決中大學生報無罪聯署聲明 / 中大學生報等 193

情色版事件之法庭篇 / 吳嘉倫 196

師生校友迴響

無關道德 / 鄭巧玲 198

學生報，你的描寫怎麼這麼低俗下流？ / 波仔 200

國王的裸體 / 黃慧貞 203

愛在漫天風雨時——再評中大學生報事件 / 蔡子強 205

天星・皇后・情色 / 馬嶽 209

冷言冷語論情色（中） / 曾瑞明 211

社會批評及爭議

學習哈佛 / 梁文道 214

回應《中大學生報》的歪理 / 郭鴻標 217

文化戰爭與道德聖戰 / 安徒 220

We don't want to talk about it / 林奕華 224

烽火台事件

校園民主之難——烽火台事件 / 陳秉鳳 228

圖書館擴建迎四年制　烽火台保留不損半分 / 程伯中 231

中大學生會反對拆卸烽火台聲明 / 中大學生會 233

中大人，請一起運用理性吧！

——就烽火台將被移開一事作補充，來自一位圖書館小組成員 / 李浩輝 235

我所知的拆烽火台計劃來龍去脈 / 朱凱迪 238
反拆烽火台300人出席論壇
——大學輔導長何培斌：「我泥聽意見。（我唔會回應）」 / eg9515 243
站在豐厚歷史的前端 / 陳秉鳳 248
烽火歷史小輯 250
烽火台上起烽火 / 鄭依依 252
致劉校長的話：明月清風本無事——談朱銘的《門》及其他 / 梁寶山 255
成功保衛烽火台繼續要求落實逸夫圖書館及公開資料 /
中大學生會　中大學生報　烽煙四起聯席 258
93%支持建逸夫圖書館
——逸夫同學設施需求調查報告（節錄） / 中大學生報　烽煙四起聯席 260
唔係咩都要質矖嘛本部
——中大圖書館擴建計劃問卷調查報告（節錄）/ 中大學生報　烽煙四起聯席 261

民主女神像事件

從對峙到凋零——記民主女神像事件 / 陳嘉銘 264
中大堅守政治中立的原則 / 中大新聞稿 267
中大學生會記招　籲市民師生明晚護民主女神像進校 / Vicky 268
地獄之火將留給面對道德危機時仍宣稱中立的人——聲討中大校方禁止擺放
民主女神聯署聲明 / 中大學生會　中大學生報　劉遵義施政監察 270
強烈譴責中大行政及規劃委員會 越權不允許中大學生會
提請在校內放置新民主女神像 / 陸耀文 272
「當仁不讓於師」之「哭中大」 / 安徒 274
如果中文大學真的政治中立，則⋯⋯ / 曾瑞明 277
大學價值崩壞的制度根源 / 李敏剛 279
恐懼的政治——香港中文大學對待「新民主女神像」 / 龔立人 281
要擺民主女神，但不是這個 / 何慶基 283
民主規劃只限於學生自治區？ / 秦晞輝 286
以民主為名，行專制之實——反對中大學生會獨行獨斷聯署聲明 288
重拾中大使命，推動校園民主：為永久安置新民主女神像建言 / 中大學生會 290
民主女神像事件時序表 296

序

◆ 陳嘉銘

2011年的年底，幾個學生會的前幹事和學生報的前編輯開始籌備《中大五十年》的編委會。到現在出版，已相隔四年。或許我就由籌備編委會的過程說起。

起初，其中一個甚為重要的討論，是圍繞編輯團隊的代表性。編委會的籌組成員只有幾個學生會和報社的老鬼，究竟有甚麼資格代表中大人出版一本《中大五十年》的校史？因著這個問題，我們曾熾熱地討論一番，繼而試過找身邊非學生會系統的中大人幫手，但終歸沒有朋友願意加入編輯團隊，始終編輯工作需要花極多的時間和心力。不過為了解決這個限制，我們找了不少中大人做訪問，而好幾位朋友亦有為這本校史提供相片，以及做後期的校對工作。在此，我們衷心向他們致謝。

回到代表性的問題上，編委會基本的共識是，我們只反映一部份中大人的聲音，無法完全代表中大所有的學生、校友、職工和校方的管理層。當然，官方的校史也面對著相同的問題。如果我們翻查校方五十周年校慶的網頁，就不難發現他們所寫的校史，主要是關於三間舊書院合併成中大、校長的更替、新學院和新書院的成立，而且都是直白式的簡要描述。這種對中大歷史的呈現，表面上是「客觀中立」，但實際上卻抹平了這五十年來在中大所發生的政治角力，亦不能剖析中大如何受社會及經濟因素所影響。另一方面，校方的史觀同時掩藏了很多內部矛盾和反對校方的聲音。這些事情，校方不願或無意面對和記錄，但我們卻認為至關重要，因而它們就成為《中大五十年》的焦點。故此，若然有人指我們所敍述的歷史是跟官方的校史抗衡，我想這說法絕不為過。

除了討論代表性的問題外，在籌備的過程中，我們又邀請了《中大三十年》和《中大四十年》的編輯，叫他們分享出版的經驗，以及提點我們製作《中大五十年》要留意的地方。在編輯的過程中，我們吸納了不少他們的寶貴意見。另一方面，我們編委會亦嘗試檢討兩本校史的不足之處。換句話說，當我們在制定這部校史的框架時，某種度上是建基於前兩部校史的框架。就《中大三

十年》而言，它是以中大的人、事、地為主軸，書中的議題都是學生組織長期關注的。這種思路的好處是，書的主軸清晰，有一個明確的敍事方向。可是，這種學生組織本位的想法卻抹殺了不少校園的重要議題，諸如校園勞工、性別議題、校園的空間規劃等等。此外，它亦難免忽視了校園以外所發生的事情，諸如中大在過渡期所扮演的位置、以至當時的社會思潮。至於《中大四十年》則顯然是填補了這個漏洞，不再是學生組織本位。相反，編輯透過數十個不同的主題去梳理中大的歷史，題材豐富之餘，亦更好地呈現出中大與社會的緊密關係。不過，這麼多主題卻使得校史枝葉繁茂，難以令讀者把握這十年發生的重要事件。在制定《中大五十年》的框架時，我們是在這兩個框架之中取其優秀之處。一邊廂，我們在編輯方向上是較為接近《中大三十年》，嘗試建構一個相對整體的史觀，編輯的觀點較為一元。另一邊廂，我們在題材上則仿效《中大四十年》，融入更多學生組織傳統上相對少關心的議題。是故，《中大五十年》需要一個更細緻的分類方式。的而且確，我們在出版的過程中，由於人手和時間的限制，刪減了一部份主題，但基本上這本書的大格局和原初設計的，並沒有太大差別。

在制定框架的時候，我們的想法是，既要勾勒到這五十年來中大的變遷，又要涵蓋這十年的大事。於是我們將《中大五十年》劃分了三卷書。卷一是五十年的史部，這裡除了輯錄老校友和老教授談中大的文章之外，我們編委會的成員又寫了兩篇文章，論述中大成立的源起以及中大秉持的理想。一篇是王邦華的〈含糊曖昧的中大理念、朝三暮四的大學體制〉，縷述中大理念——書院制和學年制——出現的歷史條件及其體制的發展。另一篇是李敏剛的〈中文之為大學理想〉，分析中文在中大的位置，以及中文這個理想如何引發一輪又一輪的學運和社運。之所以花兩篇過萬字的文章來梳理中大的理想，其實正正是要抗衡上述校方的「偽中立」而且過度簡化的歷史敍述。

至於十年的歷史，我們細分了兩卷書，主要原因是有些事情可以用主題來包攬，有些則不能。無法用主題概括的爭議，是指這十年在中大校園所發生的重要抗爭。故此，卷二主要是回溯和剖析這些抗爭事件，當中包括保樹立人事件、國際化事件、情色版事件、烽火台事件、民主女神像事件。我們選擇事件的標準，主要是基於它們在校園引起重大的反響、在公共領域有熾熱的討論、以及至今仍有廣泛參考價值。卷二固然以輯錄和整理當時的資料為主。但與此同時，我們編輯亦撰寫了較為後設的評論，點出當時運動的起伏，並嘗試對當時的抗爭作出分析和總結。

卷三會以九個主題分類，包括「理想．傳統」、「社會．教育」、「中國．香港」、「教學．師生」、「道德．身份」、「運動．角力」、「校園．日常」、「地方．規劃」和「人像．群

體」。從這九個主題來看，讀者大概可以想像卷三會以不同的角度切入中大近十年的種種，在不同的脈絡下梳理中大在這十年間的發展。本部分將涉及較多編輯自行整理的資料和自撰的文章，亦會輯錄部分舊文章及約稿。

最後，我們編委會也得承認在製作《中大五十年》的一些限制。除了人手不足和代表性的問題之外，編委會成員的背景亦構成某種局限。我們大部份來自人文學科而且全都曾擔任過學生組織的工作，好處是較了解校園內的抗爭，並且熟悉校園內的勞工和性別議題。但這同時又成為缺點：即使我們用了不少篇幅去處理這十年來中大制度的變革，但我們卻仍然覺得有不少漏洞。因為當我們在任學生組織的時侯，投放在向校方「套料」的時間實在不多。但無可否定，資料不足更重要的原因是，不少資料來源只能在官僚決策機構中獲取，而校方卻礙於我們的身份，絕大部份時間都將我們拒諸門外。這自然是校方與中大人權力不平等的反映。

執筆之際，中大已邁向成立五十二周年，編委會對於延遲出版《中大五十年》深表抱歉，亦想特此鳴謝幫忙過出版的朋友，以及捐助出版的中大人和單位（包括學生事務處、中大代表會、多位師生校友）。事實上，這十年中大的確發生太多重要的事，編委會在選取文章和撰文都花了不少時間，務求令此書臻善臻美。另一方面，編委會的成員大多為已畢業的校友，難以全情投入編輯的工作。再加上不少編委在公民社會肩負某些崗位，面對這兩三在香港發生的諸多大事——碼頭罷工、新界東北規劃、雨傘運動——我們也不得不暫時擱下出版。當然，這些原因都難以成為遲出版的藉口。不過，編輯所投身的運動多多少少反映了不少中大人持守的價值，就是希望我們身處的地方變得更民主和平等，而編寫《中大五十年》也是貫徹這個理念。誠然，三卷書很多篇幅都牽涉中大人的抗爭歷史，我們祈望中大人透過閱讀這些歷史，不單理解到中大的抗爭傳統，亦同時可以利用自己的力量將這個傳統延續下去。

鳴謝

Angela
Billy Yip
Francine
henryporter
Kitty Siu
Lau Kin Bor
Lau Wan Yee, Joseph
S
sundance
Winnie K.W. So
X
一個人
小明
不想沉默的中大教師
中大女工同心合作社
中大性別平等關注組
中大物業管理處園藝組
中大職工
中文大學校友關注大學發展小組
尹翠琪
文灼非
方永平
方旻英
方富潤
王平安
王青雲
王海平
王翎琪
王麗紅
左治強
安徒
朱凱迪
何志華
何佩然
何紅纓
何慶基
利穎珊
吳倩婷
吳基培
吳曉真
吳樹培
呂大樂
宋志明
李兆棠
李宇森
李昆澤
李雨夢
李俊峰
李浩輝
李智良
李詠怡
李歐梵
李麗芳
李耀基
沈祖堯
辛世文
周俊熙
周保松
周思中
周劉麗芝
林奕華
林建家
林紀善
林朝暉
侯嘉林
施城威
活化廳
玲姐
胡金榮
胡浩堂
范長豐
香港工程師學會
香港中文大學生命科學院
香港中文大學員工總會
香港中文大學傳訊及公關處
香港中文大學經濟學系
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
香港中文大學藥劑學系
香港中文大學護理系
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
香港律師會
香港獨立媒體網
香港護士管理局
孫賢亮
校園規劃及可持續發展處
校園發展監察聯盟
秦晞輝
馬國明
馬傑偉
馬嶽
區華欣
張彧暋
張善怡

張浚軒
張素貞
梁文道
梁月琴
梁兆昌
梁美儀
梁啟智
梁皓朝
梁靜友
梁寶山
梁寶真
馮家強
莊耀洸
莫碧琪
許敬文
郭鴻標
陳文樂
陳日東
陳玉峰
陳光興
陳活彝
陳倩瑩
陳健民
陳清僑
陳竟明
陸耀文
麥福達
彭叔
曾偉昇
曾瑞明
華雲生

覃俊基
黃乃正
黃力信
黃永志
黃妙賢
黃奕倫
黃嘉靈
黃漢彤
黃慧貞
黃潔慧
楊佩珊
楊政賢
萬松
葉宇堃
葉浩麟
葉蔭聰
雷競璇
熊一豆
趙永佳
劉志翔
劉建華
劉笑敢
劉紹麟
劉嘉華
劉遵義施政監察
樊善標
潘偉賢
蔡子強
蔡寶瓊
鄧小樺
鄧逸軒

鄭巧玲
鄭玉昆
鄭依依
鄭宗義
鄭家榮
鄭淑珍
鄭斌彬
鄭智浩
鄭詠甄
盧偉明
盧遠昌
錢永祥
霍子謙
戴捷輝
戴遠雄
繆熾宏
謝欣然
謝馥盈
鍾宇杰
鍾耀華
顏龍
關仲然
蘇鑰機
龔立人
幾位支持中大「國際化」策略的學生、校友

特別鳴謝「香港中文大學五十周年學生活動基金」贊助八萬七千元，協助本書出版。

卷一

五十年鉤沉

前言

◆ 李敏剛

中文大學成立五十周年，大學官方慶典隆重其事，當然少不了說一個官方版本的「中大五十年」的故事。校方說故事的方式多樣。校方既架設了網站，重排了一個簡略的五十年的大事時間表，也在圖書館設立了展覽館，舖陳了五十年來的「發展歷程」和「成就」。在這些官方版本的故事中，中大的發展彷彿一片祥和、欣欣向榮：學生成為了社會賢達，研究則逐步達到了世界級水平，書院則愈開愈多媲美牛津劍橋，在晉身所謂的國際級大學的軌跡上穩步爬升。

我們認為這樣的歷史敍事，帶來的是一個片面的，甚至是扭曲的中大印象；而更重要的是，這樣的一套歷史印象，其實恰恰掩蓋了中大最值得珍視、發揚的精神和價值。因此，在這個《中大五十年》的五十年史部，我們嘗試重新書寫那些被官方版本的故事忽略了的歷史，希望能重新勾勒出另一種中大五十年的歷史圖像，並以此重新論說那些，在官方故事中被消音的中大精神與價值。

本部分的首篇文章〈中文學院聯合會對皮理思教授專論的分析與評論〉，為凌道揚、錢穆、蔣法賢——即當時的崇基、新亞、聯合三所中文學院的院長——聯名於 1957 年發表。當時三所學院正爭取成立中文大學，殖民政府內部有不少反對呼聲。這篇文章即用以反駁當時香港大學教育系教授皮理思對中文作為大學教育語言的抨擊。之所以收錄這篇文章，是因為這篇原文為英文、在南華早報發表的長文，其實相當清晰的勾勒了成立中文大學背後的理念和使命。而這樣的一篇文章，卻一直為中大官方所忽略。我們認為，這篇文章既有重要的歷史意義，亦是一個相當合適的起點，讓我們用一個和官方故事不同的切入點，去理解中大的歷史。

接著第二篇王邦華的文章〈含糊曖昧的中大理念、朝三暮四的大學體制〉，則為中文學院聯合會的這篇文章補回了歷史背景，並延伸論及中大多年來就書院制和學制的爭議，以及這些爭議與政治和社會抗爭的糾結。中大理想的形成，其實不斷受政治和社會變遷所模塑。中大的發展也不是如校方的故事那樣波瀾不驚。反之，中大今日的制度其實全都是過去各方勢力的政治考慮和衝突之下

的妥協產物。從王邦華的文章，我們可以見到，中大的制度演變、乃至理念和制度之間的衝突，其實有廣闊和複雜的社會與政治脈絡。這些重要的脈絡，恰恰是中大的官方故事所忽略的。

本部分的第三篇文章，李敏剛的〈中文之為大學理想〉，則是透過追溯「中文教學」這一中大的核心理念的歷史，去重新理解「中文」作為大學理想對我們的意義。同樣以中文學院爭取成立中大的歷史為起點，這篇文章重新勾勒了中大師生在兩次中文運動的參與，以及在 2005 年的「哭中大」抗爭。中文教育作為教學理想，於香港其實一直有著重要的抗爭意義，背後蘊含的是對不公義與霸權的挑戰，而這一切都和中文大學歷代的師生息息相關。

本部份第四篇文章，孫述宇教授的〈使用中文是中大的使命〉，則可視為對這段中文理想史的補充，但文章本身其實也相當有歷史份量。孫教授的這篇文章寫於 1977 年，本來是為當年正籌備出版的《中大十五年》而寫，後來出版計劃擱置，文章於同年刊登於明報月刊。在 2005 年的「哭中大」事件中，這篇文章被重新發現，其中對中文教學的辯護、對中大官方重英輕中欠缺文化承擔的批判，即使過了三十年，卻彷彿仍然切中當時中大的問題。今天，中大官方對中大的「中文」理念論述依然單薄，甚至完全缺席，孫教授的這一篇文章則可說是對這一理念最為完整也最為深刻的闡釋。

安徒的〈廢墟中大：中大認同的（後）殖民解讀〉，則為前面四篇文章所帶出的中大敍事，引入了異議和商榷的向度。如果僅僅閱讀前四篇文章，我們很容易會得出這個印象：中大的成立和發展背後有著複雜的政治角力和計算，大學高層都是大學理想的背叛者，但卻有一班理想主義的青年學生和老師傳承了當初批判精神，是正義使者，於是他們才應該是我們的精神祖先，我們應該傳承他們的精神。安徒的文章卻指出了這印象的虛妄：中大打從成立開始就是建制的一部份，是同樣身為社會精英的一群「高等華人」倡議，最終得到殖民者正式支持的產物。那些彷彿理想主義的青年學生之外，有更多學生期望藉著中大進入既定的社會階梯爬升，得到社會主流認同，甚至不少「理想主義者」其實轉個臉就投入了這個他們批判過的制度遊戲之中。安徒文章開首提及的「AO 事件」在當年中大引起牽然大波，正是一例。其實就是那些批判的「理想」本身，都有不少值得質疑之處，如民族主義和文化大革命的影響，並不一一可被視為進步，尤其在時移勢易的今天。而中大那個彷彿批判而有理想的文化身份想像，恰恰可以輕易轉化成被社會精英消費的文化符號，掩蓋那些在歷史背後從來沒有被質疑和動搖過的社會結構本身。我們重說歷史、考掘價值、抗衡今日大學官方的主流論述和歷史解讀之際，會否恰好反過來為當權者提供了用來掩蓋早已成一片「廢墟」的中大的漂亮口號？安徒文章寫於十年前，原刊於《中大四十年》，對照今日，卻仍未過時。

最後，我們另外收入了李歐梵教授寫於2013年的〈追憶中大的似水年華〉，以及雷競旋先生五篇刊於《信報》回憶昔日中大人和事的文章。李教授曾於1970年代在中大任教，雷先生則於七零年入學，曾任中大學生會會長。本輯一併收錄，供讀者追想當年中大的風貌，也為本部份的那些「大歷史」補上當時的人追憶的細節。

我們希望，本部份這些作者筆下的中大歷史片段和風貌，可以為讀者提供一個和官方故事不同的中大印象，並作為我們反思中大的傳統、價值和精神的起點。在歌功頌德、粉飾太平以外，我們認為，這些才是中大五十年需要重視的歷史與思考。

中文學院聯合會
對皮理思教授專論之分析及評論

凌道揚、錢穆、蔣法賢

原刊於《香港高等教育問題之商榷》，1958年


凌道揚


錢穆


蔣法賢

皮理思教授最近發表之「香港高等教育問題之商榷」一系列專論，當為自戰後即從事本港中上教育者所詳細研讀。但以其所討論之問題如此複雜，自難望所有有關人士一致贊同其分析，或接受其全部之建議。皮理思教授關於在華人社會中，一間大學之性質及其功能所作之基本假定，其中一部分係吾人大多數有關人士持有異議者。更有若干其他基本問題，皮教授在專文中未有提及，或僅加以部份解答。關於香港高等教育問題之商榷，若忽略此等問題或未予詳細檢討，且不聽取相反方面之意見，而遽下定論，此在吾人誠覺其不幸。尤有進者，此等問題又非單純學術性問題，而是涉及整個社會前途之問題，皮教授之將此問題提出，喚起公眾之注意，且其意見顯係曾下一番謹密之研究功夫者，似此種種，實深植我人之感謝。因此，吾人基於同樣之精神，謹以嚴肅討論之方式，而非爭辯之方式，提出下列之評論。

吾人現所面臨者，全係一新系列的問題。自香港大學設立以來，香港已完全改變。香港大學雖有其自由，有其財產，但仍未能追上時代之變遷而為社會作適

合之服務。無論如何，目前之需要，唯有另一種形式之中上教育機構始能適應。當前問題乃此種教育機構正在進行之工作，是否能獲致官方之正式承認，以及是否能獲得公眾之支持？又或者此等學院之發展，是否將永久因經費支絀而受阻滯，而其畢業生之資格是否將僅囿限於介乎中文中學畢業生與大學文學士之間。

香港之變遷，不祇限於人口激增一端，而在經濟、政治及文化等方面，變化亦甚鉅大。香港不再能希望大陸中國政府或教會團體分擔本港居民之教育重任。而且香港亦不再僅是英帝國外圍之一個小小的舊式據點，祇對銀行業務及貿易始感興趣。倘若香港仍如過去一樣，則一間殖民地大學而具有高超水準者應已超過當地之需要。

但香港今日究已經歷何種變遷？是否托管制之現代觀念，正取殖民地主義而代之？香港是否事實上已形成中國文化與教育之主要中心，正予整個東南亞以文學、技術、教育等等之服務以及其他方式之領導？單就崇基學院而論，來自東南亞各地之學生已達五十名以上；新亞書院之學生且有遠來自韓國與印尼者。中國高等教育之需要，已遍及此一廣泛地區，而香港不過是一個中心。香港大學之存在，倘僅為香港本地服務，則本港之中文專上學校之存在，乃際此緊急需要期間，可為整個東南亞服務者。吾人深信香港在歷史上已負起一全新的重要責任，是即發展與增強中文大學之教育。

以何種語文教授之問題

至於以中文為傳授工具之問題，吾人相信皮教授對此一問題事件之重大，有估計過低之處。其主要癥結所在，乃皮教授所欲在英國高等教育制度下予以合併之各專上學院，本身盡屬中文學院。吾人願更進一步說明此點，蓋所有此等學院純係中國學校，其中無一為美國學校，且七間之中，又祇有兩間為教會基金所支持者。真正問題之所在，乃香港是否應另設立一有權頒發學位之機構——姑無論其為一間中文大學或由各院聯合而性質相類者。

英國並不需要在香港設立一所以上之大學，皮教授之此一論點自屬人皆謂然者；但若認為任何英國大學均能希望適合絕大部份以中文為基本語言之社會的需要，則縱使此等英國大學水準極高，恐亦難以令人入信。惟此說並非意謂目前之香港大學應予停辦，有如停閉海軍船塢然。一間殖民地大學本身，自有其重要而有用之任務在，例如特為少數說英語者之專業訓練，又如訓練政府官員及其他技術人才，彼等可以有助於減輕殖民地行政之人才與經費問題；再如使香港社會保留西方之楷模，而使得中外學者能從事文化之交流（但仍以有一與港大性質相似之中文大學存在為限）。事實上即在香港大學內，此種文化交流亦未見顯著，因該校一切工作似均以西方典型為依歸，而港大與中國各地大學以往之關係，現已告終結。

至於中文是否可作高等教育傳授之媒

介？在決定此一問題之前，吾人僅先請問皮教授知否過去五十年來，中國大學畢業生之程度究竟如何？皮教授本身之中文程度及中國歷史與文化之知識，是否充份足以遽下判斷？事實上，此種估價是否應由精通中、英兩種文字之人士加以衡定，又是否應先詳閱中國學者之原著及中國科學家、工程師之國際性成就，始能加以判斷？應注意者，獲得1957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學金之兩位中國科學家，均為戰時之西南聯合大學畢業生，而該大學亦是一所戰時避難性之教育機構，實驗室及其他各種設備，自極不合理想，更且科學課程之傳授亦以中文為主。但該校竟能訓練出諾貝爾獎金獲獎人，此更足以表示判斷一個教育制度或學校之價值，實甚困難。

程度之比較

倘欲將中、英兩國最佳之大學作一比較，是否有客觀之標準可作根據？尤其是要將一般文學院作一比較；當更覺困難。以往香港大學之畢業生，在南京參加各種考試，或擬轉入中國國內大學，是否亦有落第者？皮教授又焉能將清華、北大、燕京或聖約翰等大學之文學院畢業生與港大文學院畢業生作一比較？究竟何人程度較差兩年？又在某一科目較為落後？在1948年以前，香港最優秀之學生，選擇大學教育時又何去何從？而其中大部份目前又在何地求學？有等優秀中國學生，未能進入香港大學者，是否因港大之程度過高，抑或因費用過昂及必須以英語為唯一教授工具所致？又香港中學畢業生之最優秀者（中文中學會考獲得優異者）何以並不擬向港大申請入學，而向外地尋求機會，藉以獲取為中國人而設、並以中文為傳授工具之教育？此種香港最優秀之青年，在香港受中文教育時已所費不貲，何以竟令香港社會失去此等人才？

中國有其本身之教育理論與傳統，在任何方面足與西方教育之理論與傳統相比擬。台灣及中國大陸所出版之西方科學文學基本教科書譯本，均可為本港專上學校採用。本港既處於中立地位，在中文教育方面，自得採用任何國家之最佳教材。

吾人強調中文之可作為，且已被用為大學教育之工具，並非否認需有英文閱讀之能力；而在某些科目中，英文閱讀能力更較其他科目為重要。但英文閱讀能力，有異於規定學生在考試時須以英文作答；亦有異於在授課時全部用英語為媒介而要求學生徹底了解。同人等所代表之各專上學校，均有規定英語為必修科，而且每年入學之新生及畢業生之英文程度均有進步。

語文與領袖人才

但語文與領導能力二者之間，確有重要關聯。學生之能冀其精通中、英兩種文字者為數極少。所謂精通兩種文字，即深切了解中英兩國古典文學之謂。倘大學之目的係屬訓練某種社會之領袖人才，則必須先決定應訓練此等人才以何種語言為思想之工具。中國大學之畢業生或許不能閱讀綽塞（Chaucer）之作，

但當能閱讀本國之偉大古典作品。英國科學或專業機構所主辦以英文為工具的考試，彼等如參加或不能及格，但彼等能將其所學所知，在以中文為基本語言之社會中加以應用與發揮。

本港華資自辦之工業、銀行及貿易公司，現正蓬勃發展，而香港之必須依賴此等發展者也日趨顯明。是否曾受中文訓練之領袖人才，比較僅以英文為思維與工作媒介之人才，對其本國人士能作更有用之貢獻？

設使原則上承認，高水準之中文大學教育，有在香港實現之可能，則該項教育之目標及內容，與英國及西方大學傳統形式之異同程度，仍有待於決定。似此的香港教育結構之一個新構成份子，將如何併入現有之學校及中學以上教育金字塔內，亦有待於決定。此將引起極多有關教育政策及行政之技術困難問題，在此無法予以討論。吾人僅籲請承認，在此項計劃內，可能有較皮教授所似乎願意承認者更多之一般教育範疇。

香港之需要

「過早專門化」之提倡者與繼續強調在大學實施「普通教育」者之間的爭辯，甚至在英國亦仍為一未結束之論題。在香港，或可辯稱，生活在無根的及太過商業化環境中之中國青年，中學以上之普通文化教育，仍然為一較大之需要。即僅就使彼等獲得社會的責任感而言，此種普通文化教育已屬必要者。尤有進者，此蓋符合中國向來之高等教育傳統以及「讀書人」的理想。

各中文學院無須與港大競爭訓練青年從事各種特殊事業。例如，並無任何中文學院擬設立醫學院。但各該學院，又能補充現有港大之工作，擴充現時所強調之普通文化教育，為本港訓練中國社會領袖人才。

各中文學院之文化重點，應與如香港工業專門學校等校實施之中學以上專業訓練有所分別。

中文學院文學士學位之承認，並不真正與工專或商業學院畢業生之資格相等或同其範疇。然而，應予指出者，各中文學院能開辦港大所無之各種訓練；例如中國歷史及文學，會計、建築工程、社會福利工作等等。吾人又注意到，皮教授並未談及官立文商書院夜校及兩間官立師範學院。此等官立之中學以上之學院，與本港現正迅速發展中之私立中學以上學院，究當如何比較乎？設使同樣之工作，可由各中文學院之教師擔任，且費用遠為低廉，則動用納稅人公帑之官立文商夜校尚須繼續開辦乎？

飛速之發展

本港七間私立中文學院，現有學生人數及質素究竟如何？皮教授引述去年春間報告之統計數字，揭示學生共 2,313 人，日校及夜校學生人數約略相等。現在各院學生總數已增至 3,197 人，不及一年增加百分之三十八。七校學生均告增加，各校報告本學期人數較上學期增加

百分之十五至六十七不等。此誠為一驚人的發展速率，顯示吾人亟需決定各該學院及畢業生之前途。而況不僅學生人數激增，申請入校學生之質素亦有顯著之進步。

皮教授謂不獲升入港大之優秀學生，並非全部申請進入本港之中文學院，此語誠屬正確。彼等頗多前往共黨中國大陸或赴台灣，或其他外國，此因彼等若在港繼續求學，並無取得學位之希望。但皮教授又謂各中文學院無資格頒發學位，部份原因係由於據說最優秀學生不升入此等學院。話雖如此，今日各學院之畢業生為數雖少，但其紀錄甚為良好。甚至如工程系之畢業生亦全部獲得職業。其他亦有升入美國、加拿大、澳洲、西班牙、西德等國大學，攻讀學士以上學位，且已有在海外獲得高級學位者。

學生家長對此等學院所提供之高等教育機會之反應，指出對此學院之需要頗殷。現有之港大不可能希望在將來收容每年適齡學生百分之一，而皮教授竟承認最低限度應有百分之十五的學生有資格繼續受高等教育。彼主張中文中學每年畢業生最低限度有三十人應被港大容納，但當然有資格升入港大者又豈止三十人！

其他問題

尚有其他若干問題，吾人願在此提出者。例如，是否人皆盡知此等中文學院，為粵藉青年服務多於為來自北方之難民者？各該學院自六至八年前建立基礎，以至 1954 年崇基學院聯合調查委員會報告書發表以來，在此方面，一如在其他方面，經已改變。各該學院現有當地粵籍學生之比率，約等於港大粵籍學生所佔之比率。

各該學院如何聘請資格優良之教師，又因何有如許多「鐘點計數」之教師？教師薪金果真低微而必須予以提高，但若謂教授之品質可從其薪額觀之則屬大謬不然矣。各該學院之專任教職員多數為中國難民知識分子，具有長久之在大學任教或從職之經驗，多數有西方大學之學士以上之學位，其事業受到戰爭及流亡之打擊，彼等幾乎每月均有一人有新書或論文發表。彼等之中亦曾被邀赴亞洲各著名大學講學，或參加歐洲之漢學家或史學家會議者。「新亞學報」為半年出版一次之中文研究性刊物，已引起國際之注意及尊重。每一中文學院之每一系均有不少「鐘點」教師，但彼等多數係專家，兼任數學學院之課程。因此實際上彼等係以全部時間獻身於大學級之訓導及研究；故彼等雖分任各學院課程，事實上等於在一間大學工作。

目前主要之點是香港中文高等教育之發展，不能與本港面對之其他教育發展問題比擬。這是不必瞻望太遙遠的；雖然最新的中文大學教育尚為初次嘗試，因為大專學院已由一群教授創立起來，他們多年來已造就了無數可獲學位的學生，奠定了一個基礎。

學位問題

皮教授也曾提及「低廉學位」之危險，但學費太昂貴不也是同等危險嗎？拿港大與中文學院每年每個學生的費用作一比較，是極有意思的。港大學生每年每人要花費一萬二千元，大部份是由納稅人負擔的。反過來看，新亞書院每年每學生只需費用一千元左右，一點沒有挪用公欵。

此等中文學院業已成為香港及東南亞的模範。因為它們都是在毫無倚靠下成長起來的，且已具有許多科系。正因它們沒有足夠的保證支持，便在不平衡與不同的標準下發展。這些弱點是這些學院自己所承認的，就為了解決此一問題，纔在去年開始有中文學院聯合會之組織。所有入會的學院均為不牟利者，同時每一院校又各有其董事會，正在研究中的是如何使這些院校具有統一的措施與長遠的計劃。

顧問委員會

中文學院聯合會同意皮教授之建議，設立一個高等教育顧問員委員會，向政府提出有關高等教育之各項建議。吾人又希望一個中上教育權威機構，由政府、港大、各院校代表及若干關心教育之事業界人士所共同組織，似此當能充分代表社會之各階層斷面。此一機構將監督和促進各有關學院之水準，並作最後頒發學位之準備。

中文學院聯合會主張發展之第一步，由該會進行辦理統一之入學試，全體會員學院均應參加；另一方面辦理統一之畢業考試，組織一考試委員會負責辦理，包括校外之考試委員，認可之教授及有關機構，至於主要之管理及控制則仍歸中文學院聯合會負責，以保證學生達到一定之水準。這絕不是大量製造廉價學位，而是製造一些懂得中國學識與文化的學位。

最後，此等學院歡迎皮教授之寶貴意見，同時希望香港大學及所有本港人士的協助。

含糊曖昧的中大理念
朝三暮四的大學體制

王邦華

前言

談中大理想和體制，經常會墜入兩種窠臼。一種是中大理想和體制是一直「進步」、向前發展的看法。這種看法普遍見於官方史，認為中大一直隨著社會變化而改良自己的制度，拋棄不合時宜的舊制，令中大可以在日新月異的社會中繼續發揚其教育理念。張德勝在官方史《邁進中的大學》中即形容中大改行三年制後的「彈性學分制」是「適應現實環境的結果，也是羽翼長成，漸具信心的表現」[1]。另一種看法是中大理想和體制是一直「退步」、不斷失落。這種看法則出於學生組織、教員和舊生之口。他們認為中大自創校以來，就逐漸淪為為殖民地政府（現在是特區政府）權貴們服務的大學，失卻了前輩們抱持的理想，校方高層只汲汲於追求資助和國際排名。一部中大史，就是中大理想不斷墜落的歷史。李歐梵就曾痛批中大空有「中文大學」之名，而毫無推廣中文的志向[2]；張駿謙亦指出新亞自從加入中大後就屢遭打壓，最終錢穆、唐君毅等集體辭職，從此之後新亞書院只是徒具外殼，失卻其創校精神[3]；1983 年時羅永生（當時的中大學生會會長）亦感嘆：「我們愈來愈難在中大校園聽到老師同學激情地談論中大理想，輔導營亦不以此為主題，學生報上愈來愈少見有關中大理想的文章，而要找老師開講座來說這些題目的話，愈來愈少老師可供選擇邀請」[4]。

在這兩種論述早已司空見慣的情況下，今天再講中大理想和體制，難免有老生常談的感覺。然而，這兩種論述卻是各有缺點。前者素有粉飾太平之譏，忽略了中大歷史上種種權力鬥爭、掛羊頭賣狗肉之舉。但後者也容易墜入「一蟹不如一蟹」的老套說法，為了批評眼前的校方而過於美化當年的中大。舉例說，李歐梵批評中大在 1970 年中文法定運動中袖手旁觀，沒有和其他人一起爭取中文成為政府法定語文，有負推廣中國文化的大學精神。然而，這個大學精神究竟從何而來？為甚麼中大一開始會以「傳揚中國文化」（李卓敏語）為教育理念？[5] 如果這個理念本身就是政治計算的結果，校方一開始就沒有對這個理念抱持真切的興趣，那就不難理解校方為甚麼沒有在中文法定運動中挺身而出了。又例如九十年代初中大由四年制改

新亞書院，成立於 1949 年。

崇基學院，成立於 1951 年。

為三年制，真的只是因為殖民地政府偏愛港大，而為了遷就港大的三年制而迫中大「由四轉三」？

凡此種種，都暗示我們可以用一種較歷史性、甚至是系譜學（Genealogy）的進路去看中大理想及體制的發展。在各方勢力各自建構自己的「中大理想」論述時，我們可以思考：一開始這些理想和體制為甚麼會出現？當這些理想和體制有所變更時，是基於甚麼原因和壓力變更？我們現在看到的中大理想和體制，是在甚麼歷史條件下產生？探討中大理想和制度的發展，也有助我們理解一所大學和社會、政府之間的互動關係。在種種政治和社會壓力下，一所大學的理想如何變化和適應？這些變化是與時並進之策？還是數典忘祖之舉？還是這一切都是在香港這個社會脈絡下難以逃避的宿命？

本文分為三部分。先講中大及其理想為何出現的歷史條件，再論書院制的變化，三論中大在四年制和三年制之間的遊移。選擇書院制和學年制為中大體制的代表，是因為這兩者都是核心制度之餘，也是和中大教育理想關係最緊密的兩個制度。中大校方在大學年報、升學刊物中經常提及書院制，它一直是中大引以自豪、「彌足珍貴的優良傳統」（劉遵義語）[6]。而中大當年由四年制轉為三年制，引起中大史上數一數二的學運，許多老師和學生一起抗議政府傷害中大理想。甚至香港近年由三年制改回四年制，也被中大校方拿來說成是政府迷途知返、終於明白中大當年主張才是正確[7]。審視書院制和學年制，正好幫助我們理解中大理想在歷史中的影響。

教育理想背後的政治計算

中文大學自創校以來，就強調自己有發揚中國文化的使命，志在成為中國和西方兩個文化之間溝通的橋樑。李卓敏開宗明義說：「中文大學自始就把促進中西學術文化傳統的交流與融合，定為特殊的目標，它要求每一個學生深刻了解自己的中國文化傳統，並精通西方的實證方法和科學。」[8] 其後幾任校長都屢屢提及這個教育理想，馬臨[9]、高錕[10]、金耀基[11]、沈祖堯[12]等都認為中大有別於其他香港的大學，有發揚中國文化的獨特使命。甚至連因為推行「國際化」

聯合書院，成立於 1956 年。

而惡名昭彰的劉遵義，在為自己的國際化政策辯護時，也以「真正有助於促進中西文化的交流和融合」為理由，解釋自己並沒有背叛中大先賢的理想。[13] 傳揚中國文化、將中西文化融會貫通這個理想，似乎成為中大神聖不可侵犯的牌匾。

這個中大理想的由來，和崇基、新亞和聯合三書院的背景脫不了關係。中大建校時由此三書院組成。崇基於 1951 年由南逃至香港的十三間基督教大學合併而成，創校時頗有基督精神與中國文化並重的傾向 [14]。然而崇基創校後多受教會組織資助，因此其學風逐漸偏向教會大學的傳統。舉例說，崇基早期的「人生哲學」通識課程，主要是講基督教義，再講一點古代西方哲學。除了中文系外，就完全沒有中國文化和哲學方面的特設課程 [15]。聯合則由五所由廣州南遷來港的地方性院校組成，雖云有一個「促進中外文化之交流」的目的，但亦明顯偏向教授西方文化和學科。以早期的「通才教育」課程為例，六科課程都沒有涉及中國文化和學術 [16]。

和崇基及聯合不同，新亞學風有濃厚的傳統主義和民族主義色彩。傳統主義，指學風有一種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強烈欽慕，甚至令他們不甚著重研究現代文化；民族主義，即書院教育以中華民族為中心，強調學生有振興中華文化的使命 [17]。新亞的教育宗旨雖有「溝通世界中西文化」一項 [18]，但明顯偏向中國文化。創辦新亞書院的錢穆和唐君毅等幾位學者，為了逃避共產黨統治而遠走香港。他們認為在大陸全境已陷入共產黨之手、中華民國只能孤懸台灣的情況下，中國文化已經陷入「花果飄零」的危機。為了避免中國文化滅絕，他們決定在香港借辦學推廣中國文化，目標是培養出能夠在新時代把中國文化發揚光大的學生。大體而言，聯合和崇基的學風偏向西方文化，而新亞則偏向中國文化。

理解到三書院的背景，就不難明白中大創校時的教學理想，可說是三書院理想的結合，而當中新亞的影響又較大。三書院辦學皆有會通中西文化的理想這個共識，故由三書院組成的中大取用此共識亦屬自然。而且以會通中西文化為中

大理想，亦剛好為偏西方的崇基及聯合和偏中國的新亞提供一個妥協的中間點。然而，雖說中大理想是三書院理想結合而成，但論影響力新亞始終比崇基和聯合較大。這可從中大創校初期的發展方向看出。中大甫創校即表明自己會以中國歷史文化研究為重點強項[19]，圖書館擴充方針也以收藏更多有關中國文化研究的材料和文獻為最優先[20]。而新亞諸賢當時的辦學理念，也直接影響中大諸校長對教學理想的論述。錢穆在 1949 年新亞書院開幕典禮中就言明，他們目標在培養學生「具備中國文化的知識，同時也要了解世界各種文化。要發揚中國文化，也要溝通中西不同文化。」[21] 這幾乎和歷任校長幾十年來講教學理想的說法同出一轍。當然他們對何謂中國文化和如何傳揚中國文化有不同的理解（舉例說，錢穆和劉遵義、李國章的理解可說是天壤之別），但粗略點說，中大校方五十年來對理想的論述，其修辭都深受新亞諸賢影響。

但如果把中大看成三書院理想開花結果的成果，以為殖民地政府受這個文化理想感動而批准中文大學創校，而日後諸位校長亦受這個文化理想感召薪火相傳地努力經營，那未免大大美化當時的歷史事實[22]。事實上，1959 年殖民地政府批准三書院聯合成為中大時，有關中國文化的考慮可說是佔小部分。政府那時批准建立中大，大部分是建基於冷戰時期的戰略考慮。50 年代香港專上教育出現中文中學「塞車」的情況。那時香港有英文中學和中文中學兩種中學，然而只有一間大學，就是以英文收生和教學的香港大學。在這情況下，絕大部分能入讀港大的都是英中的學生，大部分中中學生都被拒諸門外[23]。本來從殖民地政府以英文為尊的角度看，這情況沒有甚麼問題，但那時冷戰的特殊情況令政府不能放任這些中中學生自生自滅。

當時大量的中中學生因為無望入讀港大，遂湧向內地或台灣的大學升學。中共亦明白大學的戰略重要性，遂大力資助大學，吸引大量本來逃難來港的學生重新北上就讀。周愛靈在《花果飄零》中曾指出，對當時的中中學生來說，內地大學有三個優點：他們以中文為教學語言，同聲同氣；內地大學有政府資助，學費遠低於港大；而且內地大學能提供和中國文化有關課程，「對於想研究中國語言文化的學生來說，香港大學的課程在質素和權威性方面，不及內地大學好」[24]。在這情況下，就不難理解為甚麼當時到內地讀大學的人數，可能更多於港大的學生人數總和[25]。另一方面，逃難到台灣的國民政府，也沒有忽略拉攏香港的龐大學生群體。50 年代初開始台灣就特別預留一些學位給香港學生，而數量也穩定增加[26]，甚至直接在香港舉辦聯合考試招募學生入大學[27]。 50 年代香港的一群前途徬徨的中中學生，竟成為兩岸國共政府戰略博奕下的重要棋子。

然而，對殖民地政府而言，境內學生被兩岸政府大量拉攏離港讀書，會大大增加管治困難。中共以大學為手段吸引香

港學生北上，潛在目的就是要灌輸他們共產主義思想，令這班本來是逃難來港的學生愛國愛黨。台灣國民政府也有差不多的目的，希望把學生培養成同情國民黨的右派。如果政府繼續袖手旁觀人才外流，那十幾年後許多出色的中中學生將會為兩岸政府所用，香港或會出現人才枯竭的問題。再者，即使這些外流學生回歸香港，他們經歷過思想教育，就會回來香港傳播共產思想或鼓吹回歸國民黨，令更多香港人不滿政府而傾左或傾右。殖民地政府在冷戰時期的管治大方針就是保持中立，當時的總督葛量洪指出："The strength of our position in Hong Kong depends largely upon non-involvement in political issues. This can be achieved only by maintaining strictly legality and impartiality in any issues with a political tinge." [28] 政府一方面不希望香港社會左傾，因此和美國、台灣一樣反對共產黨的意識形態，但政府另一方面也不希望香港社會向右轉，因為如果香港成為反共基地，就可能刺激中共反彈，以武力奪回香港。因此政府那時努力維持一個政治平衡，既要避免市民被中共吸引過去，又要避免國民黨勢力介入香港社會。學生的外流問題對政府形成間接的政治威脅，如果再這樣任由香港學生外流被國共兩黨思想教育，那政府努力經營的中立環境就會變得不堪一擊。例如說，1956 年 10 月，國共兩派人士之間的對立因為一次掛旗事件而釀成流血暴動，60 人死亡 [29]。不難理解政府因此想把香港建構成一個意識形態中立的空間。



香港中文大學成立典禮
（1967 年 10 月 17 日）
來源：大學展覽廳網頁

因此，那時政府需要建立另一間大學。這間大學需要有足夠吸引力去吸納本地的中中學生，而政治立場不能偏向國共任何一邊，用以幫助香港社會保持意識形態中立。在這情況下，新亞、崇基和聯合三書院在 1950 年代後期提出擴充中文高等教育的要求，正好切合政府的戰略考慮。三書院當時已經頗具名聲和規模，課程質素有所保證。政府權衡輕重下，最後決定支持這三間書院組成一間新大學。1958 年教育司高詩雅就明言：「我不想要第二所大學，但覺得……建立第二所頒發學位的院校可能是惟一可行的解決方法。」[30]

但政府卻花費了不少心思去淡化三書院的意識形態，為此政府和三書院爆發不少衝突。舉例說，新亞在文化上奉國民政府為正朔。但 1959 年政府甫一宣佈資助三書院組成大學，就嘗試插手切斷新亞和國民政府的聯繫，淡化新亞的親右立場。該年 11 月政府要求新亞不再



新亞書院位於深水埗桂林街的舊校舍遺址。
來源：維基百科，Wrightbus

懸掛中華民國國旗。新亞高層們大為震怒，因為掛國旗是新亞的悠久傳統。唐君毅甚至認為，如果政府不容許新亞掛旗，新亞就應該停止加入當時正在籌組的中大[31]。但政府依然寸步不讓，最後院長錢穆決定讓步，不再掛旗，也把校慶從雙十節改成孔子誕。

儘管在籌辦中大時政府和三書院之間在許多層面上都衝突不斷，政府卻樂於以會通中西文化這個三書院共識為新大學的教學理念，並和新亞一樣高舉弘揚中華文化的大旗。這個具有傳統主義和民族主義的理想令中大可以在意識形態上獨樹一幟，不太偏向國共任何一方（國民政府雖然不像共產黨般敵視中華文化，但要在 1966 年發起「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後才把自己和中華文化傳統緊緊連繫起來），令香港的中中學生可以在一個中立於國共雙方的學府繼續讀書，也吸引了許多學者來這個中立地區研究[32]。而且，新大學那尊重中國文化的形象，也合乎殖民地政府的文化敏感（culture-sensitive）教育政策。在當時解殖的浪潮下，英國開始盡量尊重殖民地本土文化，避免殖民地人民反感。創立中大，並強調它的中國文化背景，可以安撫當時香港愈趨龐大的民族主義，借此顯出殖民地政府無意貶低中華文化，有利政府管治。

這並不是說政治計算是政府當年支持建立中大和決定其教育理念的惟一理由。政府決定成立中大也許亦有文化上的考慮，難以一概論之。無論如何，中大的出現，是一個偶然的政治環境中，各方勢力各取所需才出現的產物：中中學生需要在本地升學，政府需要管治穩定，三書院需要資源和地位。然而，在政府和三書院合作組建中大的背後，我們不能忽略雙方其實有巨大的文化差異。舉例說，雖然政府和新亞都同意新大學有弘揚中國文化和成為中西文化橋樑的理想，但雙方對此理想的詮釋卻是大異其趣。政府和李卓敏為首的大學校方深受西方學界影響，認為大學應該以西方學界的方法論研究中國文化，但新亞諸賢多是出身於傳統中國文化的學人，更重視的是以傳統的書院教育去存續中國文化。雙方雖然合作，但卻缺乏深厚的文化共識。中大理想，一開始就是一個空泛含糊、不同勢力各有詮釋的概念。在空泛的教育理念背後，是尖銳的文化衝突。而這個文化衝突最後引致的結果，就是書院改制。

因文化衝突而起的書院改制

中大創校五十年，而書院制一直以來都

被視為中大的傳統制度。當然這個制度的內容已經變更了不少，由創校初期的書院大權在握、主管教學，到今天中央集權、書院只是負責照顧學生生活和開辦通識課程。一些偏好舊制的人甚至會宣稱，書院制早已名存實亡、徒具空殼。然而，若果我們回溯當時書院制何以由分權到集權，就不難明白當年新舊書院制之爭，可說是兩種文化對教育模式的不同理解所衍生出來的鬥爭。政府因為政治危機強行把兩群信奉不同教育模式的人放在同一所大學中，這兩群人之間就教育理念有所衝突是在所難免，書院制不過是一條導火線而已。

中大於 1963 年創立時，以崇基、新亞和聯合三書院為基礎，為一所聯邦式的大學。其時教學和研究大權掌握在書院手中，每個書院有自己的學系，例如崇基有自己的哲學系，新亞也有自己的哲學系。大學中央只負責基本的協調和監察，令三書院的運作達致政府規定的要求。然而自創校起，中大內部就不斷出現聯邦制好還是統一制好的爭議。1976 年政府委任富爾敦研究改革中大體制。富爾敦為首的委員會其後提交報告，建議中大把教學責任分為「學科為本」和「學生為本」。前者由大學中央負責，後者由書院負責。大學中央收歸所有研究和教學大權，各個書院學系整合為一，再歸大學中央管理。聘請教員、開辦課程、研究開支等，全部由大學中央決定[33]。三書院對改制的反應不一，聯合歡迎改制（甚至有資料顯示聯合是首先倡議改制[34]），崇基先反對後被拉攏，而新亞則幾乎全部高層都對新制大加撻伐。但政府置之不理，把法案提交立法局。法案最後通過之日，唐君毅和錢穆等九位新亞校董集體辭職，以示抗議[35]。改制後書院只限於在專科課程外管理學生食宿和提供一些通識課程，權力大減。1984 年大學檢討通識教育結構，委任大學通識教育主任，令大學和書院各有自己的通識課程，更進一步邊緣化書院的教學責任。書院淪為學生福利組織之類的機構，甚至被大學校方用作吸引捐款而隨便設立（例如劉遵義任內就一口氣設立五間新書院）。

書院改制的歷史評價向來褒貶不一。有人認為新制令中大更有效運用資源，省回更多行政費用[36]。舊制素有架床疊屋之譏。70 年代初中大的行政費用遠超港大（中大行政費佔總支出 14.1%，港大只有 6.9%），被政府大加批評。政府甚至懲罰性地把撥予中大的預算減去四分一，迫使中大改革書院制，取消功能重疊的單位。也有人從權力鬥爭的角度詮釋書院改制，認為這是一次政府和大學中央聯手向書院奪權的陰謀[37]。政府先是以資源利誘三書院合組中大，再許諾除非書院同意、否則不會改動其結構[38]，但最後卻無視新亞的反對意見強行改制。目的正是收編幾個突出的中文學院，令政府在專上教育界有更大控制權。

這兩種解釋都有其道理在，但我們也可以把書院改制視為兩個文化之間的衝突。新亞和政府及大學校方各自對教育

有不同理解，從而導致他們對大學教育制度有不同期許。政府和大學校方深受西方學術文化影響。19 世紀的歐洲出現知識專業化和科學化的風潮，許多學者奉科學標準為圭臬，嘗試用科學的範式研究人文和社會問題，建構新學科的規範（社會學、經濟學、歷史學等）[39]。而這種科學化、專業化的風潮也影響對大學的理解。大學不再像中古時期般以文學為中心、以培養紳士為目標，而改為以研究科學化的專科學問、傳授專業知識為己任。大學教育最大的目的，就是要訓練學生成為專科人才，在某一門學問中深入鑽研[40]。這並不是說政府和大學校方只視中大為研究專科學問的象牙塔、認為中大對培養學生品德毫無責任，但他們大體認為學習知識和培養品德是可以割裂的。前者由大學中央主管，大學中央負責聘請教員和提供課程，確保學生得到高質素、專業化的教育。後者則由書院負責，提供一個文化環境，薰陶學生的氣質品性。前者重專業知識，後者重博雅教育。這個品德和知識二分的教育模型，正是大學校方和政府改革背後的教育理念[41]。

唐君毅等新亞高層們卻深受中國宋明時代的書院式教育影響，在知識和大學責任上和政府與大學校方都有很大的分歧。他們認為追求學問和磨練品德是同一事。這可以從他們寫的〈新亞學規〉中看到：「做人的最高基礎在求學，求學的最高旨趣在做人」、「你須使日常生活與課業打成一片，內心修養於學問打成一片」[42]。而學習知識和品德，就是靠密切地追隨老師一起生活。「不要僅僅注意一門門的課程，應該先注意一個個的師長」[43]。老師不單是在學術層面上予以指導，也在品德層面上以身作則，引導學生成為一個完善的人。正是因為這個統一性的教育思想，令新亞一開始就反對政府和大學校方的知識和品德二分的模型[44]。 唐君毅等人認為把知識和品格的教育割裂，會令教學的人不能因才施教，不理解學生真正的困惑，而書院和學生之間的距離也變得疏遠，令書院鞭長莫及，對培養學生品格無能為力。

再者，雙方對教學水平的理解都受各自的文化影響。雖然雙方都同意中大有發揚中國文化的理想，但政府和大學校方心目中有關中國文化的教學是科學化、合乎西方學界標準的，正如李卓敏強調「思想、學術等各方面進展一定要與國際看齊」[45]。所以李卓敏上任後，就開始依據西方大學的標準改革書院課程，並資助教員往海外深造[46]。相反，新亞一開始就對西方學界的標準抱持一個質疑的態度。他們認為中國文化自有其學術標準，要評核他們的教學質素，就應先對中國文化有深刻的了解，而不應把西方的一套學術標準強加在他們身上[47]。

因此，書院改制其實可以視為兩個文化所衍生出來的教育哲學之間的衝突。政府和大學校方堅持改制，並不單單是出於效率和省錢的考慮。對政府來說，大學教育水平是否達標是更重要的考慮。早於中大創立時，教育司高詩雅就提

出：「大學必須是一個強壯的整體組織，而不應只是一羣鬆散的聯邦高校；只有一所如此具有一切權力的大學，才有機會能夠制定和維護（學術的）標準。」[48] 另一方面，也不應該單單用奪權和陰謀論去詮釋書院改制。事實上，政府委任的富爾敦委員會就提到，要以「節約」或「行政效率」為名取消書院制，根本輕而易舉，但富爾敦認為這樣會扼殺大學的多元文化[49]。

而且奪權論也不能輕易解釋為甚麼許多新亞嫡系的教員（如余英時、劉述先等）會支持書院改制。其時余是新亞書院院長、劉是哲學系主任，二人都被視為唐君毅之後下一代的新儒家傳人，但二人都支持書院改制，被唐君毅等新亞高層口誅筆伐[50]。然而，單純把二人視作為權勢所誘的叛徒也是不合事實。書院改制不久後二人就離開中大返美，有甚麼權勢可以享受到了？余劉和唐君毅等的分歧，更應該視作兩套教育哲學之間的衝突。二人都在美國求學和任教一段長時間，受西方學術界影響甚深。余英時當然同意要推廣中國文化，但他認為在新制下書院已經足夠擔當此重任，不必特地在專科課程中傳揚[51]。劉述先也認為新亞不再需要培養反共、繼承中國文化的學生，執掌哲學系時也傾向「無為而治」，不像唐君毅般有意識去在課堂上傳揚中國文化、培養儒家式的君子[52]。因此二人雖然學術淵源和新亞相近，但在教育哲學上的理解卻反而更接近政府和大學校方。

如果我們從這個文化衝突的角度出發，那書院改制一事就不能輕易視作一次「進步」或「退步」。它未必是「進步」，因為新亞精神本身就和「知德合一」的教學模式不可分割，放棄了原本「知德合一」的教學模式，單憑興趣班般的書院通識，毫無疑問不能培養出新亞精神中希望培養出來的理想學生，繼承中國文化的理想傳統。日後新亞精神屢屢被譏為「已死」，亦非無理。但它也未必是「退步」，維持新亞本身的教學模式就一定是好事了嗎？許多批評當年書院改制的人都有美化早年新亞書院的傾向。但其實舊制的新亞教學模式也有不少問題。例如新亞以中國文化為專，打擊左派學生，干預新亞學生報出版等[53]；書院學系運作模式不透明，聘請教員時會私相授受[54]。對當時的學生來說，書院制未必是甚麼神聖而不可侵犯的制度[55]。考查當時的資料，也沒有很多學生走出來討論富爾敦報告、反對書院改制[56]。改制似乎是難以避免的事。它可視為一次文化衝突的體現，兩群人有不同的教育哲學，最後有資源和權力的一方強行壓倒另一方而已。新制下的大學和書院最為人詬病的，大概是明明已經轉向信奉另一套教育哲學，卻屢屢利用舊制累積下來的名聲去宣傳自己，把自己打造成一脈相承的傳人。這不免給人掛羊頭賣狗肉的感覺。

我們應該更進一步問的是，為甚麼中大創校短短十幾年就爆發這麼大的文化衝突？一所大學內教員有不同教學理念，並非奇事。但大學剛創校就有兩群

人各有管理權力而又有針鋒相對的教學理念，卻是少見。這可以歸咎於政府一開始缺乏深思熟慮、只希望快快成立一所大學吸納中中學生，因為政府主要考慮政治和戰略層面，結果在政府和書院成員之間缺乏文化共識下就強行組建了中大。即使有擔心，也只是擔心新大學不符合英國學術水平，而不是擔心和三書院能不能達成各種文化和教育上的共識。在中大組建期間時，政府官員和三間書院已經有不少衝突，包括創校目標、課程內容、職位聘請等[57]。這些衝突最後雖然沒有導致中大創校計劃觸礁，但直到創校一刻三書院和政府都缺乏統一的共識。聘請李卓敏也是政府和三書院之間妥協的結果。然而作為中間人的李卓敏，也迴避和書院們討論理念問題[58]，有爭執亦多以「多數勝少數」的方式強行通過[59]。因此，政府、大學校方和三書院雖然合作創立中大，但他們共享的共識不過是「溝通中西文化」等空泛理想。如果詳細談及理想的內容、實踐這些理想的方法，那他們往往有差天共地的理解。

中大創校後的十幾年，雖然高懸各種理想，但其實一直處於這種文化對立的緊張關係中。書院改制，不過是這個緊張關係最後爆發的結果。最後政府和大學校方大獲全勝，但也負上「扼殺書院精神」等罵名。歸根究底，也是因為政府一開始因循苟且，在沒有共識之下就強行創建中大，最後只能犧牲書院理想去統一大學的教育模式。

改三改四的學年制

在書院改制和各大因素影響下，中大理想在八十年代出現空泛化的趨勢。本來中大創校時，以書院教育和會通中西文化為教學理想。前者自從各書院權力大為削弱後，便給人名不符實的感覺，各書院的獨特文化也愈來愈淡薄。後者在校園也逐漸淡化。本來它在創校時已經是一個較空泛的理念，八十年代更開始乏人問津。原因一來是因為校方愈來愈少提這個文化使命，也沒有特地在有關中國文化的社運中挺身而出[60]；二來是因為七十年代時，火紅年代的許多學生左傾而擁護共產黨，批判傳統中國文化[61]，令會通中西文化這個文化理想在中大學生間也漸漸失去支持。取書院教育和會通中西文化而代之的，是四年制和通識教育。正如當時的中大學生會會長羅永生指出，愈來愈多人把中大理想寄託在四年制和通識教育等制度。羅永生慨嘆，學生不再講中國文化理想，轉而視某些教育形式為中大理想核心，是一種「重大倒退」、「流向形式主義」[62]。然而，諷刺的是，正是因為中大理想空泛化，才令八十年代的四改三運動有這麼多背景各異的學生一起參與，甚至連校方也支持抗爭。

中大四改三事件在官方史已經有詳細論述[63]，在此只簡述一下。香港教育制度很多時間都行雙軌制。中中學生跟從中國模式，讀六年中學後再升讀四年制的中大；英中學生跟從英國模式，讀七年中學再升讀三年大學。但這個雙軌制卻在 70 年代末期失去平衡。原因是中中

學生持續下降，令中大開始收英中學生。導致英中學生要考三個公開試：中五的中學會考、中六的高等程度會考（中大入學試）和中七的高級程度會考（港大入學試）。三年三試的問題，導致許多人提倡廢除雙軌制而改成同一制度。1976年書院改制後不久，政府於1977年正式要求中大改為三年制，中大師生群起抗議，甚至許多高層都明言反對。最後政府在中大的堅持下妥協。然而醫學院事件令學年制再一次成為爭論焦點。1980年中大醫學院成立，而政府要求醫學院需要符合英國標準，行五年制，招收中七學生和以英文授課。中大許多師生認為應繼續招收中六生並行六年制，近千師生靜坐抗議。最後醫學院決定行五年制並以兩條途徑收生，既收中七生，亦收中六生為「暫取生」，只要第一年成績理想即可成為正式醫科生。中大其後擴而充之，1982年在整個中大實行暫取計劃，令一些英中學生不用三年三試，考完中五會考就可以報讀中大。

暫取生制度令中大暫緩改制壓力，然而教統會於1988年發表《第三號報告書》，提出七年中學、三年大學的劃一體制，把中大的改制壓力推向高峰。在這次改制之爭中，學生組織和大學校方站在一線，舉行多次集會抗議，包括中大歷史上人數最多（約四千人）、坐滿百萬大道的12月3日集會。然而政府漠視中大許多師生的意願，1989年宣佈接納報告書，命令所有受資助的大專院校統一在中七招生。中大若是堅持繼續收中六生，將受UPGC（大學及理工教育資助委員會）的經濟制裁。權衡利害下，中大只能推出彈性學分制為過渡政策，最後成為三年制大學。

四改三運動在中大歷史有幾個相當重要的意義。首先，它是中大史上歷時最長、學生參與人數最高的一次學運。然而，它能夠吸引這麼多學生參加，並不是因為某些教育理想成功在中大校園茁壯成長，而是因為「四年制」這個符號夠空泛，可以吸引各有不同考慮的學生。四改三運動和書院改制及其他學運（例如中文法定運動、保衛釣魚台運動等）不同。舉例說，新亞院方所捍衛的書院自主，其實預設了一種衍生自中國傳統文化的教育哲學，而那時學生主流思想左傾，喜歡以馬列主義批評中國傳統文化，並稱新亞被「蔣幫」所把持[64]，所以許多學生那時沒有加入參與捍衛書院舊制。然而四年制的合理性不需要預設某些意識形態，不同人可以由不同角度出發找出他們支持四年制的原因。閱讀當時的記錄，就可以知道學生反對四改三的原因五花八門，「有人從民族感情出發，有人從個人不滿的感受出發，有些是中大本位主義（以對中大處境的利弊為原則）」[65]。許多學生的意識形態雖然大大不同，但在反四年制的議題上卻取得共識。

四改三同時也是是校方第一次非常活躍地和學生參與各種集會、並且明確地和學生站在同一陣線。七、八十年代中大學生是許多學運的中堅份子，甚至為中

大搏來「反殖大學」的名稱。然而在這許多學運中，大學校方的態度通常是不置可否，多數是「你有你參加、我有我袖手」[66]。四改三運動卻不同，在 78 年和 88 年的抗爭中，許多校方高層都走出來捍衛四年制[67]，其中更不乏素來立場保守的高層。這在其他學運中是無法想像的情景。在其他學運都保持中立、甚至於親政府的大學校方，在「四改三」改革中卻和政府決裂，轉而和學生們連成一線。中大校方堅持四年制的原因有兩個。首先是資源問題，在三年制下中大獲得的資源會比四年制時少，這也能解釋為甚麼中大抗議時差不多所有院系都有教員出來抗議。其次，中大也希望堅持其通識教育特色，和港大分庭抗禮。自從書院改制後，中大就改為主力宣傳通識教育為他們的教學特色[68]。四改三後學生能夠讀通識課程的時間會大為減少，也令中大不能再以「全人教育」作宣傳。姑勿論大學校方的考慮是否過於現實，他們的參與代表校方不一定是保守派，某些情況下他們也會站起來和學生一起反抗。

然而，如果我們把這兩個相當具鼓舞性的意義，結合四改三運動最後的失敗結果一起看，就會得出一個很悲觀的結論：即使整個中大幾乎總動員走出來抗議，即使校方和學生一起開啟輿論機器打輿論戰，在政府和 UPGC 的力量下依然是不值一提。如果書院改制一事反映出區區書院不足以對抗政府壓力以維持其教育理想，那八十年代的四改三事件更進一步反映出，即使反抗勢力換成整間大學，在政府的巨大壓力前依然是螳臂擋車。透過四改三運動，任何人都可以輕易看出真正的權力核心在哪裡，和「大學自主」是何其脆弱。對政府來說，中大教育理想不過是太倉一粟的考慮。政府要考慮的，只是要解決困擾已久的雙軌制，一勞永逸地統一中學和大學的學年制。

或許有人會問，既然要統一學制，為甚麼不遷就中大、把港大改成四年制呢？這也是有趣的問題，尤其港大內部那時也有聲音希望改為四年制[69]。但為甚麼最後政府卻是強行壓下港大改革之聲、轉為脅迫中大呢？首先，那時政府一直以來的教育大方針是提升大學學額數目和提高大學研究經費[70]。和四年制相比，三年制學位課程平均耗費較少[71]，令政府可以用同一筆錢製造更多大學學位。其次，政府那時也銳意增加大學數目，把本來是學院的理工、城市和浸會提升為大學，如果這些學院都行四年制，將大大增加政府資助的負擔，因此政府必須在這些學院升格成大學前統一所有大學學制成三年制。三者，政府偏好三年制，也有其政治利害考慮。當時香港回歸在即，英國希望維持它在前殖民地的文化影響力，其中一個方法就是統一香港學年制。世界許多國家的大學都行四年制（例如美國、加拿大、台灣、大陸），而英國卻是行三年制。在香港全面推行三年制，令香港和英國兩地學制接軌，將會大大提高香港學生前往英國升學的誘因。這猜想當時已經大行其道，馬臨在 97 年初就曾指出：「政府

當年為甚麼要強迫中大改制……目的就是為了延續英國在香港的影響。」[72]明白這許多考慮，就應該理解為甚麼政府寧願被人罵違反四年制的國際潮流[73]，也要強推三年制。在省錢和文化霸權等種種考慮面前，中大區區一間大學的教育理想在殖民地政府眼中不過是不值一提。

在整個「四改三改四」的改革中，我們看到的是政府和大學完全不對等的權力關係。中大能夠做的，只是在政府做完決策後，做些小修小補的塗脂抹粉（例如以彈性學分制之名掩蓋中大不能堅持四年制的事實）。美其名曰令中大教育理想與時並進，實際上中大根本沒有權力自主地決定自己的學制和發展方向。

然而，政府那時冒干預大學自主的大不韙把中大改為三年制，成功把節省下來的資源用作大大擴展大學學額，但又疏於提升中學和大學教育質素。表面上大學生數目增加，香港向知識型經濟發展，實際上卻是大學生平均質素下降[74]，而且過於偏向專才而缺乏通識的眼光。回歸後八大大專院校校長甚至高調地希望大學改回四年制[75]，令政府最終走回頭路。教統局於2004年提出教育改革的諮詢，把中學改回六年制，而大學也配合改為四年制。除了提升大學生質素和配合中學制度的考慮，政府希望和英國學制脫鈎，減低英國的文化影響力。而且學年制改為和大陸一樣的六年中學、四年大學，也能夠吸引香港學生北上升學。諷刺的是，政府在檢討報告中使用的理據（與國際教育的銜接、通識教育的重要）[76]，正是中大師生二十幾年前高呼的口號[77]。對政府來說，甚麼教育理想不過是口號，用以掩飾行政效率和政治利害的計算。而在一個政府掌握最終權力的教育制度下，中大又有甚麼空間去實踐教育理想呢？

結語：縛手縛腳的理想之路

五十年何其漫長，本文不過是稍稍回顧中大五十年來的教育理想及體制變遷史。中國文化、書院制、四年制等教育理想，直到今天仍然不斷被人引用，視之為中大理想的傳統。但當我們回顧這五十年捍衛中大理想的歷史，就不由得感到悲哀——它幾乎是充滿挫折和失敗，實在難以稱為一段「進步」、向前發展的歷史。會通中西文化的使命愈來愈少人提，校方即使提到，也只是強調自己有甚麼研究成績、研究中心有多大、關於中國文化的講座有多少[78]。書院教育自從改制後就屢屢被抨擊虛有其表，根本沒有權力實踐書院原有的理想。而四年制更是令人覺得無奈，即使中大師生全校動員也無力阻止自己的學制被硬生生改變。這些理想或許沒有被消滅，正如中大現在仍經常提到書院制和中國文化，但它們只是空蕩蕩的口號而缺乏實質內容。這五十年中我們看不到與時並進，反而見到中大在外部壓力下每每妥協而修改自己的理念，令所謂的中大理想逐漸空泛化。

然而，也不能輕易說這五十年是一段「退步」、不斷失落的歷史。當校方多

次妥協時，我們卻見到許多校友、老師和學生走出來抗爭，捍衛那些被遺棄的理想。政府施壓迫令大學改制，在各大學的歷史中並不罕見，但像中大這樣有許多學生、老師集會抗爭，關心理想傳承，卻是珍稀。中大理想或許是政治計算的產物——以會通中西文化為己任，是因為中大要建立一個中立於國共雙方意識形態的學府；書院制是因為成立中大時三書院都已經有穩固基礎；四年制是因為那時要吸納那批剛讀完六年中學的中中學生。但這不代表這些理想沒有可貴之處。新亞書院背後的宋明教育傳統、四年制背後的通識教育理想，都吸引一代又一代的學生和老師加入中大，理解並捍衛這些理想。他們也許一直是少數，但他們的那種理想主義似乎已經成為中大學生的特色。在體制中不斷失落的理想傳統，卻由校友、老師和學生等中大人傳承。

但何以堅持中大理想的老是缺乏實權的校友、老師和學生？校方呢？許多人把校方對中大理想的輕視歸因於高層們缺乏教育理想，只是專注追名（大學排名）逐利（經費）。然而，宏觀來說，中大本身的結構限制才是更重要的原因。政府可以隨時透過撥款干預大學，令大學根本沒有充分自主權去實踐教育理想。政府決策往往考慮許多因素，例如學術水平、行政費用、政治戰略利害、其他大專院校等，中大不過是許多棋子之一。在這樣的權力結構下，當政府決策和一些中大理想相左時，政府往往以削減撥款為武器強迫中大屈服，而中大只有退讓的份兒（UGC 最喜歡說的是，他們不會強迫大學，雖然不服從 UGC 的後果是路人皆見）[79]。書院何以要改制正是因為政府削減四分一撥款，而四改三最後中大為何屈服也是因為透過削減撥款來要脅中大。當三書院決定接受政府資助成立中大時，就已經註定中大不能獨立於政府壓力去堅持其理想和體制，而只能跟著政府的方針朝三暮四。

這是否代表大學應該一開始就拒政府於門外呢？在香港的社會環境下，這似乎也是太理想化的選項。香港的社會規模遠比美國小，私立大學難以靠學費和捐款自力更生。大學如果要發展到一定規模，依賴政府似乎是無可避免[80]。樹仁大學是一個可供比較的例子。1978 年政府強迫香港諸大專院校改為三年制，浸會、嶺南等屈服，惟獨樹仁堅持四年制，結果政府從此就沒有資助樹仁過一分一毫，也拒絕把樹仁升格為大學。樹仁發展大受制約，既缺錢興建良好設施和聘請一流教員，亦缺乏名聲吸引學生入讀，令樹仁有「避難所學校」、「二流學校」的惡名。要到回歸後政府重回四年制，樹仁才重新得到政府資助，並正名成為大學。如果當年新亞沒有加入中大、或是當年中大堅持四年制而和政府對著幹，難保不會變成另一間樹仁。

這樣的掙扎由創校到今天都一直困擾著中大。當年新亞和政府合作組建中大時，因為文化差異爆發不少衝突。那時新亞一些高層就擔心如果加入中大，新亞將失去自主性，無法再堅持其教學理

想[81]。然而院長錢穆最後還是決定接受政府資助、加入中大，其中很大的原因是加入中大後，新亞就不用擔心資源緊絀，有足夠資源去弘揚中國文化。另一個原因則是新亞升格大學後，對學生畢業後的前途有很大幫助[82]，新亞也可以吸引更多學生就讀。然而錢穆大概意想不到的是，加入中大要做的妥協，遠比他想像的多，導致最後他也心灰意冷、黯然辭職。錢穆選錯了嗎？我不知道。新亞如果沒有加入中大，就沒有這麼多資源和名氣去吸引許多學者和學生、資助研究、舉辦講座、發揚中國文化。只是錢穆心目中的中國文化教育，一定不只是 123 分學分中的 6 分通識。

大學排名節節上升、著名學者相繼加盟、校園設施愈見華麗，這些都是大學校方在回顧中大五十年歷史時不斷拿來吹噓的成績。然而，在這些成績背後，中大究竟付出了甚麼？在今天的權力結構下，中大還有甚麼空間談教學理想？另一方面，當我們指責中大校方只汲汲於追求資源而漠視理想時，我們又能不能接受放棄資源的結果？這是過往五十年每個思考教育理想的中大人無法避免的兩難。

1 張德勝，〈制度的沿革〉，收於吳倫霓霞編，《邁進中的大學》（中文大學出版社，1993），頁82。
2 李歐梵，〈我對中文大學的觀感〉，收於《中大三十年》。
3 張駿謙，《新亞書院創立之經過—回憶創辦人創校之理想》，見http://www.pkucn.com/thread-27349-1-1.html
4 羅永生，〈時代巨輪下的「中大理想」〉，收於《中大二十年》，頁128。
5 《中文大學校刊》（中文大學出版社，1978年冬），頁7。
6 《香港中文大學年報2004-2005》（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5），頁6。
7 劉遵義，〈校長家書—大學四年制有利國際化〉，見：http://www.alumni.cuhk.edu.hk/magazine/200412/html/p21.html
8 《中文大學校刊》（中文大學出版社，1977年冬），頁14。
9 《中文大學校刊》（中文大學出版社，1977年冬），頁19。
10 〈中大面面觀—高錕校長訪問記〉，收於《中大三十年》。
11 《中大二十年》，頁80。
12 〈沈祖堯掌香港中文大學暢談新官上任幾把火〉，《星島日報》，2010年7月3日。
13 〈劉遵義家書反駁國際化誤解〉，《明報》，2005年2月17日。
14 這可由崇基校歌中的「神州學術，源遠流長，數典不忘祖」和校訓的「止於至善」看出來。
15 勞思光，〈中國文化研究與整合〉，收於吳倫霓霞編，《邁進中的大學》，頁88。
16 同上，頁89。
17 這兩種傾向，可由新亞創辦人之一趙冰對新亞校歌「千斤擔子兩肩挑」一詞的解釋可以看到：「我們的擔子，一頭挑的民族思想，一頭挑的傳統文化。這才是我們的真正的桂林街精神呢。」見張丕介，〈紀念故友趙冰先生〉，收於《誠明古道照顏色—新亞書院55周年紀念文集》（新亞書院，2006），頁138。
18 新亞的教育宗旨為「上溯宋明書院講學精神，旁採西歐大學導師制度，以人文主義之教育宗旨，溝通世界中西文化，為人類和平社會幸福謀前途。」
19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69),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General Reports, Vol. 1: The First Six Years, 1963-1969*.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 同上。

21 錢穆，《新亞雜憶》（東大圖書公司，1989），頁1-2。

22 諷刺的是，這正是錢穆本來的理想，見錢穆，《新亞遺鐸》，頁256-258。

23 Keswick Committee on Higher Education,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Higher Education in Hong Kong* (Government Printer, 1952), p. 17.

24 周愛靈，《花果飄零》（商務印書館，2010），頁122。

25 Keswick Committee on Higher Education,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Higher Education in Hong Kong* (Government Printer, 1952), p. 5.

26 〈政府積極爭取海外青年〉，《工商日報》，1954年4月22日。

27 周愛靈，《花果飄零》，頁136。

28 Steve Tsang, *A Strategy for Survival: The Cold War and Hong Kong's Policy towards Kuomintang and Chinese Communist Activities in the 1950's*, 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 25 (2) (May, 1997): 300.

29 http://zh. wikipedia. org/wiki/雙十暴動

30 周愛靈，《花果飄零》，頁154。

31 周愛靈，《花果飄零》，頁182。

32 其中一例可見劉述先，〈我對中大的期望〉，收於《中大十年》，頁128。

33 1991年校長高錕有鑑於行政權力太集中大學中央，做成效率遲緩，遂下放部分權力予各學院和學系，學院和學系能夠自行修改課程、增減科目、附加入學條件等。然而新制下各書院權力仍然無太大變化，因此本文不予討論。

34 〈改制大事表（撮要）〉，《中大學生報》，1977年4月

35 值得一提的是，據錢穆妻子胡美琦所說，錢穆那時已經退出新亞校務，沒有參與新亞高層們在書院改制時的抗爭。新亞九校董辭職時，錢穆其實並不知情，要到記者來訪才得知自己「被辭職」。見錢胡美琦，〈針對錢穆先生辭職後一些事實之澄清〉，http://tw. myblog. yahoo. com/jw!JsfEMFmXHRrEcM6KBDbB/article?mid=257&prev=261&next=255。然而有些人（例如金耀基和曾榮光）把錢穆在新亞加入中大後就辭任新亞校長一事詮釋成錢穆待新亞有基礎後就飄然而去，否定錢穆有對政府抗議的意思，也是不合事實的詮釋。錢穆在一封給予雅禮協會的私人信件中就明言新亞雖然加入中大，得到資助，但「目標卻不斷受到挫折……辭退校長一職是一種我的痛的表達」。見周愛靈，《花果飄零》，頁239。

36 張德勝，〈制度的沿革〉，頁61。

37 例子可見萍，〈中大發展史—政府奪權的手法〉，見《中大學生報》，1977年8月。

38 1971年香港中文大學修正條例中，載有「凡規程足以改變書院之組織者，除非事前經過該書院之同意，不得訂立」一條。

39 華勒斯坦等，《開放社會科學》（牛津大學出版社，1996）。

40 Clark Kerr, *The Uses of the University*(Harper Torchbooks, 1963).

41 關於這教育理想的闡述，可見改制派中堅分子金耀基所寫的〈大學之理念、性格及其問題〉，收於氏著《大學之理念》（牛津大學出版社，2000）。金耀基以劍橋為理想模型，解釋大學和書院如何分工合作。

42 錢穆，〈新亞學規〉，《新亞遺鐸》，頁2-5。

43 同上。

44 〈新亞書院董事會上香港總督麥理浩爵士書〉，見《新亞書院董事會對富爾敦報告書》，1976年9月25日。

45 〈訪問李卓敏校長〉，收於《中大學生報》，1972年1月15日。

46 劉創楚，〈中西結合，與時並進〉，收於吳倫霓霞編，《邁進中的大學》，頁115。

47 相關論據可參考錢穆、凌道揚和蔣法賢，〈中文學院聯合會對皮理思教授專論之分析及評論〉，收於皮理思，《香港高等教育問題之商榷》（香港大學出版社，1958）。

48 周愛靈，《花果飄零》，頁197。

49 香港中文大學調查委員會，《香港中文大學調查委員會報告書》（香港，1976），段104-105。

50 那時余英時被罵大叛徒，而劉述先被罵小叛徒，見劉述先，〈香港中文哲學系與我〉，收於劉國英，張燦輝編，《修遠之路：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六十周年系慶論文集同演卷》（中文大學出版社，2009）。

51 余英時甚少談及自己對書院改制的想法，以上想法見周愛靈對余英時的訪問。周愛靈，《花果飄零》，頁263-264。

52 劉述先和唐君毅都曾執掌哲學系，二人風格之不同，見勞思光，〈從崇基宗哲系到中大哲學系：勞思光教授訪談錄〉，收於劉國英，張燦輝編，《修遠之路：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六十周年系慶論文集同演卷》（中文大學出版社，2009）。

53 〈吃人的「新亞精神」，去死吧！〉，收於《中大三十年》，頁85。

54 吳汝鈞，〈勞、牟、唐三先生的啟發與教導〉，收於吳汝鈞，《苦痛現象學》（學生書局，2002），頁109-110。

55 學生對書院的批評，可見華君靖，〈一所殖民地大學的十年〉，收於《中大十年》

56 〈中大廿年—歷史回顧與評論〉，收於《中大二十年》，頁132。亦可見吳文光，〈主流？末流？也談學運〉，收於《中大二十年》，頁27。

57 大部分可見周愛靈，《花果飄零》，頁194-202。

58 「中文大學校長李卓敏自行決定院系教授的聘任，並且迴避與錢穆討論中文大學的辦學宗旨，李卓敏這些表現使錢穆感到憤慨。」，見文兆堅，〈錢穆、新亞書院與香港當代史學〉，《史學家誌》第11期，2012年9月，http://www.hkep.com/history_education/vol_011_master_01_3.htm

59 錢穆，〈新亞書院創辦簡史〉，收於《誠明古道照顏色—新亞書院55周年紀念文集》（新亞書院，2006），頁23。

60 例如七十年代的中文運動，中大學生雖說積極參與，但卻完全不見校方身影。

61 例子見吳汝鈞，〈佛學：生命的學問〉，收於吳汝鈞，《苦痛現象學》（學生書局，2002），頁124-125。

62 羅永生，〈時代巨輪下的「中大理想」〉，收於《中大二十年》，頁128。

63 張德勝，〈制度的沿革〉，收於吳倫霓霞編，《邁進中的大學》，頁67-82。

64 文彩鳳，〈必須從問題實質著眼〉，收於《中大十年》，頁7。

65 伍可祥，〈我們何去何從，中大何去何從〉，收於《中大二十年》，頁112。

66 前聯合書院院長鄭棟材的一次訪問可說是充分表現出大學校方高層這種態度，見〈訪問鄭棟材先生〉，收於《中大十年》，頁27。

67 共有三任校長（李卓敏、馬臨、高錕）、副校長鄭棟材、崇基院長譚尚渭、新亞院長金耀基、聯合院長薛壽生、各大學院院長和系主任等。

68 〈中大學制〉，《開放日特刊》，1980年。

69 張德勝，〈制度的沿革〉，頁79。

70 例子可見教育局，《高中及專上教育發展綠皮書》（政府印務局，1977年11月），第10.5項。

71 教育統籌委員會，《第三號報告書》，3.53段。

72 何景安，〈香港教育概況〉，收於香港教師中心教育研究小組，《1998香港、武漢教育交流合作研討會論文集》（政府印務局，1999），頁18。

73 張五常當時曾指出：「舉世都是向十二、四那方向發展，而香港所選的是十一、二、三，是幾個選擇中最劣的了。」，見張五常，〈捨四取三的謬誤〉，收於張五常，《三岸情懷》（遠流出版社，1990），頁191。

74 王卓祺，〈香港大學生出了甚麼問題？〉，《文匯報》，2001年7月12日。

75 香港教師中心編委會，《教師中心傳真》第29期（香港教師中心，1998）。

76 教育統籌委員會，《高中學制檢討報告》，2003年5月，頁4。見http://www.e-c.edu.hk/tc/reform/rasih.html

77 張德勝，〈制度的沿革〉，收於吳倫霓霞編，《邁進中的大學》，頁71。

78 劉遵義，〈中大家書〉，2005年2月17日，見http://www.inmediahk.net/node/15094

79 關於政府如何透過UGC控制大學，可見王俞，〈中文大學的本質〉，收於《中大十年》。文章雖寫於1973年，分析卻依然有參考價值，某程度上也反映社會發展何其緩慢，和港府即使回歸後本質也沒有改變。

80 事實上，即使是美國著名的私立大學，也有接受政府的大量補助。

81 錢穆，〈新亞書院創辦簡史〉，頁19。

82 周愛靈，《花果飄零》，頁237。

中文之為大學理想

李敏剛

中大堅守創校校長李卓敏博士提倡的「結合傳統與現代，融會中國與西方」的精神，珍惜並重視中英雙語的優良傳統。

——香港中文大學《雙語政策委員會報告書》（2007）

在各個學科領域，全面綜合地進行教學與研究，提供公共服務，致力於保存、創造、應用及傳播知識，以滿足香港、全中國，以至世界各地人民的需要，並為人類的福祉作出貢獻。

——《香港中文大學概況2012–2013》〈我們的使命〉

香港中文大學是以新亞書院（1949年創立）、崇基學院（1951年創立）及聯合書院（1956年創立）三所專上學院為基礎而建立。該三所院校之早期師生多來自內地。1957年，三所院校為爭取政府承認彼等為為香港學生提供高等教育的努力，聯合組成「中文專上學校協會」。1959年，富爾敦先生（Mr. John Fulton，其後獲封為富爾敦勳爵）應邀就三書院的發展提供意見。1960年，政府通過《專上學校條例》及有關規則，資助三院，藉以提高其水準。1961年，「大學籌備委員會」成立，由關祖堯爵士擔任主席，初步籌劃大學校址、建設，以及一切有關大學成立之事宜。同年，一個包括英美學人的顧問團，就如何把三院文、理、商、社各科課程提高至大學水準，提供寶貴意見。根據顧問團建議，政府於1962年委任以富爾敦先生為主席的委員會專責考慮應否成立一所中文大學，並建議成立之法。1963年4月，《富爾敦報告書》公佈，建議設立香港中文大學。政府隨即宣佈原則上接納該報告書。同年六月，「臨時校董會成立；九月，大學條例及規程完成立法程序十月十七日，香港中文大學宣告成立。

——〈簡史〉《香港中文大學概況2012–2013》（全文）（2012）

前言

在這幾段大學官方的簡史和使命之中，有一個相當明顯的縫隙：中文大學為何稱之為中文大學？「中文」之於中大的意義是甚麼？如果只是讀中大校方自己寫的「使命」，我們實在分不出中大和香港乃至中國的其他大學，到底有甚麼分別。這些使命放在任何一所大學的官方網頁中，都不會有違和的感覺。中大由三書院爭取成立，可是官方的歷史論述之中，有的卻只是政府如何提高書院至英美大學的水平、大學如何立法成立；至於中文大學以「中文」為名的意義、三書院如何爭取，卻被忽略掉[1]。在中大校方的自我理解之中，似乎最為挨近「中文」的意義的，就只有那句「結合傳統與現代，融會中國與西方」了。「中文」之於中文大學的意義，在官方的論述中，竟至如此曖昧不明。

但「中文」其實是中大理想之所寄：在香港用中文授課、用中文做學術、捍衛以及提高中文的社會地位文化地位——這些一方面是校方不斷放棄的承擔，一方面卻是多年以來中大師生所努力實踐和爭取的理想。如果我們一一把這些看似平常的理念，放回香港當代歷史、尤其是社會抗爭史的脈絡之中，便會發現，這些都可以說是劃時代的觀念和堅持，滋長了一代又一代的理想主義者，還有一波又一波的學生和社會運動，形塑了香港的社會和政治生態的變遷。因此這段被忽略的中大理想史，甚至對我們了解當代香港，也有歷史性的意義。在中大成立五十年的今天，我們有必要回望這一段被消音的，中大的「中文」理想史。

中文專上教育的爭鋒：民族 ・ 本土 ・ 反殖[2]

要追溯中文之於中大、於香港的重要性，我們便得回到中大成立之前，回到作為中大成立基礎的三書院的草創時期，回到那個大陸和香港都動蕩不安的時代。

四十年代末國共內戰，帶來了大群的難民湧向香港，剛於二戰後在香港重新立穩腳跟的港英政府，一時亦未知可以如何吸納這個龐大的新增人口。教育方面

的形勢就更複雜：當時的英文中學數目既不足夠，也提供不了這群新增人口所希望接受的中文教育，而中文中學的畢業生，則例不能考進以英文授課的香港大學。但同一時間，中共卻以免費提供大學教育，向逃避戰亂散落外地的年青華人招手。港英既不願意年青人才流失往敵對陣營之中，更怕這些受了共產黨教育的青年人回流到香港，會引發社會動亂，挑戰殖民政府。

新亞書院和崇基學院等民間書院，正是在這樣的複雜局面中，由一班南來學者創辦的民辦專上學府，招收難民學生和香港學生，用中文授課，為這群年青人提供中文的專上教育。這些學者如錢穆、唐君毅、李應林、凌道揚等。他們流落香港，一方面是不認同內地的共產黨政權，同時也不希望追隨遷台的國民黨政權，香港這個英國殖民地，遂成了他們「花果飄零」的容身之所。

雖然港英政府對這些民間書院未加干涉，辦學相對自由，但這些民間學院頒授的學歷都不為政府承認，資金亦無保障。到了五十年代中，重返大陸的希望已愈來愈渺茫，這樣畢竟不是長久之計，得到殖民地政府某種形式的承認已是唯一出路。

中大官方簡史沒有說錯的是，在1957年當時規模較大的中文學院——崇基學院、新亞書院和聯合書院，組成了中文學院聯合會，希望向港英政府爭取承認；但官方史沒有說的是，三所書院不僅追求港英的承認，更是進一步追求港英承認它們以中文辦專上教育，應得到和香港大學同等的大學地位。而這正是三所書院和殖民政府的尖鋭衝突所在。

對港英政府來說，這些中文學院吸納了大量的青年難民，舒緩了當時的教育壓力，本應支持。但港英政府卻極不願意承認它們的地位，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認為中文教育不可能達到高等教育的水平，至於中文中學的畢業生，他們更覺得根本沒有達到高等教育的程度。港英甚至設想過於香港大學擴大收生數目、開辦中文課程，以吸納這批移民學生，但都是被當時的香港大學以「中文不可能辦有水平的大學教育」為由拒絕。

最能表現這種對中文教育的歧視態度的，是1957年底香港大學教育系主任皮理思教授在報章發表的一系列檢討香港高等教育的文章。皮理思在文章批評中文並不適合大學教育，他指出，由於欠缺有水平的中文教科書，中文學界的水平亦不足，一些如物理學或經濟學的學科，根本不適合用中文教授，最多只能用中文教授這些學科的入門課程。他進而認為，既然這些學科已經有充份的英文文獻，何不直接用英文學習？發展中文高等教育只會拖低香港學界水平。中文學院最多只能作為入讀香港大學的預備班，卻不夠資格提供大學教育 。

中文學院聯合會對皮理思的文章極為反感，並立即在報端撰文反擊。他們質疑

皮理思漠視了中國半個世紀以來傑出學人輩出，編寫了高質素的教材，即使如自然科學、工程學等課程亦如是：「1957年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金之兩位中國科學家，均為戰時之西南聯合大學畢業生［……］科學課程的傳授亦以中文為主」。更重要的是，他們質疑皮理思根本就沒有足夠知識判斷中國數千年的文化傳統。他們認為，中、英各有自身的文化學術傳統，「倘欲將中、英兩國最佳之大學作一比較，是否有客觀之標準可作根據？［……］中國有其本身之教育理論與傳統，在任何方面足與西方教育之理論與傳統相比擬」。

聯合會的文章進一步把論調上升到民族文化的層次：他們批評，香港大學根本就是一所為殖民地政府訓練專業人員和公務員的殖民地大學，不能照顧本土的教育需要，因為「該校一切工作均以西方典型為依歸」。而只有一所由華人所辦的中文大學，才能滿足到香港的華人社群乃至整個東南亞的華人民眾的文化和知識追求：

「［……］（香港）事實上已形成中國文化與教育之主要中心，正予以整個東南亞以文學、技術、教育等等之服務以及其他方式之領導［……］本港之中文專上學校之存在，乃際此緊急需要期間，可為整個東南亞服務者。吾人深信香港在歷史上已負起全新的重要責任，是即發展與增強中文大學之教育。」

這篇抗議文章所表現的文化和民族自豪感，在社會引起的廣泛支持，遠超港英政府的估計。教育司高詩雅遂不得不在翌年回應：「我不想要第二所大學，但覺得［……］建立第二所頒發學位的院校可能是唯一可行的解決方案。」港督柏立基也在給倫敦的報告指出，「為避免冒社會嚴重抗議的風險，已經不能不讓它們（指中文學院）得到某程度的承認」，成立一所中文大學是唯一可行的方法。在1959年，港英政府宣佈決定成立中文大學，並邀請聯合會的三所中文學院參與。

中文學院聯合會反駁皮理思的文章，最終迫使港英政府承認中文高等教育的地位和重要性，把成立中文大學放上政策議程。成立中文大學因此其實是民間反殖抗爭的一次勝利，也是戰後香港首次成功的民間抗爭。這樣的一篇和中文大學的成立息息相關、闡明中大立校理想的文章，竟然為中大官方所完全忽略，令人扼腕。[3]

這創校歷程也部分解釋了，為何中文大學打從成立開始，便是社會抗爭的一大搖籃：用中文授課的大學得以在英國殖民地香港成立，突顯出來的正是殖民地政府對華人的歧視和壓迫，本身就充滿了民族、本土和民意伸張的意味；而中大所吸納的，則是在殖民地社會受盡歧視和不公平對待的中中學生，同時吸引對中文教育有承擔的教師（譬如李歐梵）[4]。我們當然不必浪漫化那些學生：當年的中大畢竟是大學，和今天一樣，相信不少可以進大學的學生，都只是希

望為求職業上有更好的出路，未必有反抗不公義的理想主義的背負，可是，中文大學是追求反抗不義社會、追求社會理想的青年的有利土壤，則是無疑。

果不其然，中大成立十年不到，到了1967年，中大生就成為了第一次中文運動的大旗手。

民族、反殖與改良的糾纏：第一次中文運動

所謂的第一次中文運動，是指1967年起一連串由學生發動的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的「抗爭」。說是抗爭，其實有點誇張，因為第一次的中文運動，就本質上而言，只是一場（溫和的）輿論戰，對港英政府的所謂施壓，都是見諸報端的文章與宣言，最多也不過是派傳單；但如果放到當時的社會與政治脈絡，這樣其實是一次戰戰兢兢的嘗試。

香港的六十年代的是一個動盪的時代，1966和1967年更是戰後香港最為動蕩的兩年：1967年，青年蘇守忠在中環愛丁堡廣場碼頭絕食，抗議天星小輪以及當時一系列的公共服務加價，被警察拘捕，引發一連串的示威，及後演變成騷亂，爆發警民衝突，港督戴麟祉宣布在九龍實施宵禁，最後有一名青年在衝突中喪生，四百多人被捕。但更大的衝突還在後頭：1967年五月，新蒲崗人造花廠發生工潮，在港的親共組織如工聯會迅速介入，並得到內地紅衛兵及至中共的正式支持，行動不斷升級，最後演變成暴動。港九各處都有群眾集會和警民衝突，左派發動大罷工、大罷市，進行「反英抗暴」，反抗殖民地統治，以土製炸彈和燃燒彈攻擊港英的政經機構。這次暴亂的規模比1967年的更大，港英政府全力鎮壓，港督再次宣佈宵禁，查封左派機構，甚至出動直升機進攻左派的機構和據點，直至九月初，大規模的騷動才告平息。

這兩次的警民衝突，歷史上都被稱為「暴動」，但卻並不能單單以暴力／暴民破壞公共秩序和安寧的恐怖行動來理解：六十年代中的香港，工資低、勞工保障嚴重不足、住屋環境惡劣、百物騰貴、公共服務加價，升斗市民生活艱苦，加上殖民地政治封閉，貪污腐敗嚴重，港英政府不體恤民間疾苦，這些民怨累積都是暴動的土壤。[5] 事實上，六六年的反加價暴亂、甚至六七暴動早期，輿論和大多數市民多保持中立，甚至同情。只有到了後來六七年的工人抗爭滲入了文革影響，暴力行動升級，炸彈襲擊波及平民，民情才轉向支持港英政府，這也反映了當時的殖民地管治如何敗壞和失民心。1967年的香港，是一個撕裂動盪失序的社會。

就在當年九月尾，新界鄉議局提議請政府將中文列為官方語言——也許是為了安撫香港華人。中大學生迅即接過話頭，在當年十月十七日的《崇基、新亞、聯合學生報聯刊》（即《中大學生報》前身）第一期中，社論即題為〈中文必須盡早被列為官方語文〉，同期並刊出

了「列中文為官方語文」專題，訪問了幾位中大的老師、文化人、市政局議員，都一面倒支持將中文列為官方語文。學生們提出將中文列為官方語文的理由，是希望促進「政府與民眾彼此間的溝通和了解」，同時可以「加強住在香港的中國人對政府的親切感」。[6] 相比起兩次暴動直接衝擊殖民管治，中大學生原初提出的建議，完全沒有觸及殖民地英國人和華人之間巨大的政治、社會、和經濟的不平等，可謂極為溫和，政治色彩亦不濃。

這些文章隨即引來了不少輿論回響。殖民政府自然不會重視這些學生意見，但學生批評的調子卻逐步升級。1967 年十二月的《崇基學生報》，便繼續以大篇幅探討列中文為法定語文的問題，這次不少文章已把矛頭直指港英政府「殖民地政策」的政治封閉性和對華人的歧視，批評港英政府是「集權政治」、議會沒有華人民選代表參政，指港英不接納中文為法定語文，乃係「一個民族輕視另一個民族」的殖民地政策的一環。[7]

到了 1968 年 1 月，崇基學生會舉辦「中文列為官方語文」大型研討會，新亞、聯合書院的學生會、港大學生會、香港工業學院（理工大學前身）學生會，羅富國師範學院（教育學院前身之一）學生會等亦有代表出席，研討會並邀請了當時力爭中文為法定語文的市政局議員胡鴻烈和黃夢花，甚至當時的副輔政司黎敦義出席，崇基學院校長容啟東主持開幕禮，出席旁聽者近百人。[8] 會後研討會發表聯合公報，主張依然溫和：公報強調列中文為法定語言促進殖民政府和民間溝通，同時亦能令中國人受到應有的尊重，為以中文為母語的本地人才提供更多承認和出路，得以發揮才能，這指涉的即為當時為數眾多的中中學生以及中大學生自身。公報的民族意識溫和，發揚中國文化亦不被視為重要理由。[9]

但在「後暴動」的1968年，這樣的一場大型研討會和公報已經引起了港英政府的警惕，南華早報在研討會後隨即報導研討會鼓吹民族主義、有政治目的，並指聯合公報「並不是學生的意見」（Not the opinions of students），受別有用心的人操縱。這立即引來反彈：崇基學生迅即否認指控，指整個研討會都是學生主導，表達的是學生意見，並進一步明白提出中文運動「是為關心社會問題而發的，是為維護中國文化而發的」，「中國人對自己優厚的文化傳統，焉能不存在感情？」，表露出前所未見的對中國民族和文化的優越感。[10]

之後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的運動，便開始由學院擴及社會，並和其他社會團體結連。到了 1970 年，「香港各界促進中文成為法定語文運動工作委員會」（各界工委會）、由學生團體主導的「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運動委員會」（中聯會）相繼成立。而在中大三書院的推動下，港大學生也加入運動，學聯成立了行動委員會。三者聯合發起簽名運動，中聯會並在工廠、碼頭派發文宣，呼籲市民支持。[11] 港英政府的反應先是敷衍，稱不知何謂「法定語文」，辯稱

從來沒有歧視中文。後來發現不能把運動打發掉，便認真下手，宣佈各界工委和中聯會為非法組織，揚言會制止簽名運動；然後宣佈成立「公事上使用中文問題研究委員會」，把抗爭訴求吸納到建制運作之中，消弭運動進一步發酵，引向民族主義的機會。該委員會在 1971 年正式建議港府使用中英文為法定語文，得到採納。[12] 後來到 1974 年，中文正式成為法定語文。當時作為運動主力的各大專院校學生會的關注亦轉向了保釣運動，第一次中文運動就此結束，沒有進一步演變成群眾運動。

這次中文運動之於香港的意義，並不在於港英政府最終讓步這「成果」，這次讓步妥協其實符合港英在暴動後安撫港人的策略、鞏固管治的利益，運動也在升級至挑戰殖民地統治前瓦解。真正重要的反而是，第一代在香港成長的社會精英開啟了和平社會運動的模式和意識型態，同時中文運動也是他們本土意識和民族意識的覺醒。

如果細看這場運動的論述的話，我們會發覺這班香港新一代精英的本土認同是和民族自覺共生的。最切身的本土利益，就是在殖民地框架之下維護華人的生活條件和文化尊嚴，英語則是外來封閉政權壓迫和無視本土人民的象徵。以今日的眼光回望，他們的論述自然粗糙，更說不上激進，但真正值得注意的，則是尊重中文、維護中國文化、維護民族尊嚴這些理念，是如何因為運動而在公共論述中慢慢滋長。

而中文運動也是暴動之後第一次大型社會運動。暴動以暴力衝擊殖民管治失敗，大部分港人都在最後關頭選擇支持港英政府，也就是支持安定和秩序。這樣的話，社會抗爭應該走甚麼方向？應該如何面對殖民政府這個高壓的外來政權？是革命還是改良，是暴力還是和平？

中文運動之中，學生明顯就兩個問題都選擇了後者。這未必是自覺的選擇：當年的大學生作為社會的精英、未來的既得利益者，其實並不太了解民情，也有精英主義高高在上的氣息，如自許「知識份子永遠領導社會」，認為華人甘於被殖民管治是「華民缺乏團結力，一盤散沙」，得由知識份子「正確聯絡起來」；與兩次暴動保持距離，亦沒有深究暴動的社會因素。[13] 走和平社會運動的道路，也許有港英高壓在前這個時勢所限的因素，但也不見得是深思熟慮的策略選擇，似乎更像是受制於自身經驗和社會地位。然而，無論如何，以民間連結、簽名運動、和平抗爭等等運動方式，走政策倡議和社會改良的道路，這些往後社會運動的做法，都自中文運動始。

中文作為教育理想：第二次中文運動

第一次中文運動向來和保釣運動一同被視為當代本土社會運動的先聲，在大學生精英圈子之中，因第一次中文運動覺醒了的民族意識，經保釣運動而發揚光

大——學生運動自此走進了所謂的「認識祖國，關心社會」的時代。大學生組織旅行團回大陸觀光，學聯辦「中國周」，迅速受到內地文化大革命的極左思潮所吸引。港大、中大的學生組織都逐漸傾向認同共產中國、認同文化大革命，這即所謂的「國粹派」全盛的時期。這個時期的學生運動都是以「認識祖國」、配合共產中國的所謂革命發展為主調，開始脫離指向本土社會改革的民間抗爭，認為政策上的修補改良並不足以改善香港的根本問題。

但到了 1976 年，文革結束，當年學生組織圈子間對共產中國和文革的狂熱認同亦隨之崩潰。學生組織的關注開始重新回到本地的民間、基層抗爭之中。[14] 由 1977 至 1980 年，學生組織都投入進到了一系列的本土社會抗爭之中，如金禧事件、油麻地艇戶事件、安樂村事件、反巴士公司加價等。第二次的中文運動正是這一浪回到社會回到基層的脈絡下的一場文化運動——相比第一次中文運動，第二次中文運動抗爭色彩大減，但卻更有「運動」的色彩，面向的不止政府政策，還有社會大眾。和第一次中文運動一樣，這次中文運動的旗手，也是中大的學生。

第一次中文運動追求的是確立中文的社會地位，重點在於殖民地政府對中文作為社會大多數人使用的語言的正式承認。但中文成為了法定語文，社會上重英輕中的意識卻愈來愈強，尤其令人擔憂的，就是即使是本土以中文作為日常語言的中國人，都對英文推崇備至，希望把子女送進英中、學英文、然後進洋行、或入政府當公務員。英文在殖民地社會代表著的，是金錢和地位。在這樣的社會條件之下，崇英抑中自然難免。

第二次中文運動的導火線，是港英政府當年公佈的公開考試規定。1978 年，考試局宣佈將接辦香港大學和中文大學的入學試，分別稱為香港高級程度會考及香港高等程度會考，並公佈香港高等程度會考（即中文大學入學試）的參加資格，是中學會考英文以及任何一科其他語文（即可以是中文，也可是其他語文）合格。[15] 這立即引起中大學生的反彈，中大學生會首先發表聲明，要求參加資格必須英文及中文都同時合格，不能矮化中文的地位。當年十一月，中大學生會主辦了一場「中文教學公開論壇」，並發起了「重視中文教育地位」全校師生簽名運動，要求加入中學會考必須中文合格為高等程度會考投考資格、檢討香港的語文教育政策、提高學生母語水平等。所謂的第二次中文運動於焉開展。[16]

及後，中大學生會聯同社會上三十四個文教、學生和工人團體，組成「中文運動聯合委員會」（聯委會），由當時的教協會長司徒華出任主席，訂立了中文運動的三大綱領：促使當局進一步提高中文的社會地位、中學推行母語教學、以及全面改進中學中文教學的質素。之後聯委會便舉辦了一系列的行動，如展覽、演講、文宣、組織中學生出版面向

中學生的中文運動刊物《中鳴》等；然而，除了港英政府在1978年年底，將高等程度會考的投考資格改為需要中英文同時合格外，中大師生和聯委會的其他訴求都未有被理會，也沒有引起社會上的大迴響。運動到了1982年年初，已經近乎停頓，由中大師生成立的中文運動小組雖然繼續運作組織宣傳，但亦已無大影響力。[17]學生會的關注亦逐漸轉到其他議題，如轟動一時的醫學院學制事件，以及稍後一點的中英就香港前途的談判之上。[18]

第二次中文運動值得注意的，除了中大入學試的投考資格外（運動最終也令港英政府加入中學會考中文必須合格的要求，這畢竟也是在一定程度上維護了中文在香港的社會地位。不久之後，香港高級程度會考也加入同樣要求，升學需要公開試中英文合格，遂成定制，至今不變），更重要的是提出了中學應推行母語教學的訴求，這是香港首次有呼聲提倡母語教學。譬如說當時的中大師生就提出了較多的深入論述，強調以英文進行基礎中、小學教育，學生得用一種陌生的語言來掌握知識，根本是事倍功半，既妨礙學生學習知識和技能，也減低了學生學習英文的效率和興趣。[19]

另一方面，運動也強調希望做到「移風易俗」的效果，令市民「關懷、重視和愛護自己的語言」。[20]這是一個有趣的轉折。言下之意，就是當時的香港人崇英抑中的風氣已愈見熾熱，正漸漸忽視中文。如果和中大成立之時的形勢比較，轉變更見明顯。中文大學的成立，正是因為當年有大量的中文中學學生，構成中文專上教育的迫切需要。到了八十年代以後，則到了大學（師生）得反過來向中小學和社會推廣「母語教學」的好處，中文中學漸被邊緣化，而這突顯的正是整個中文教育正逐漸受到邊緣化。第二次中文運動無疾而終，和運動逆逐漸崇英的民情而作文化倡議，吃力而不討好，不無關係。

呼應著這個轉變，中文運動的焦點，也由早年在社會和政治上爭取民族尊嚴，強調殖民地中華人的主體性，轉移到人們意識上的「解殖」、保育自身的文化和身份認同，因此「母語教學」也就成為了第二次中文運動的核心理念。

這個轉折突顯了八十年代的民情，已和五六十年代不可同日而語，這不但在於市民對港英殖民地的政經秩序已愈來愈認同，也在於隨著二戰後慢慢開展的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全球化新秩序漸漸形成，英語成為了全世界最為強勢的語言。香港作為當時日漸重要的面向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工商城市，即使人口是以華人為主體，中文和中國文化的社會重要性，也不再是不證自明。

香港的主權由英國移交到中國之手，然後母語教學正式被特區政府用為官方政策，但這都並沒有扭轉這個「崇英抑中」的趨勢。二十年過去，終於到了中文大學自身的中文教育傳統受到嚴厲挑戰，中文反過來變成了大學官方急著要拋棄

的包袱。這次，則是打著「國際化」的名堂。

捍衛與深化中文理想：「哭中大」

2005 年 1 月，中大校方要求所有準備收取外地學生的學系，必修課必須要開設英文班，只有當必修課多於一班時，才能在至少開一班英文班的條件之下，開設其他語文（不必然是中文或粵語）的班別。這樣的一個安排，不但未諮詢全中大師生和公眾，甚至是學系也都只是接獲短時間的通知。根據當時新上任的校長劉遵義的說法，這不過是中大進一步面向國際化的一環，而所謂的國際化，則是中大自創校以來一直的追求，具體表現則為雙語（即英文和中文）教學的傳統，這個新的政策，不過是貫徹這個國際化的大方向的其中一步，令中大有更好的條件招收外地學生，加強中大和國際的交流。[21]

這裡校方的論述沒有挑明的是，「國際化」程度，也就是招收外地生的數量，是近年時興的大學國際排名的一個重要指標。[22] 英文作為已經全球通行的世界語言，標榜自己是英文教學，自然比標榜自己用中文、乃至廣東話教學更易吸引外地生，尤其是內地學生——至少校方是如此盤算。另一方面，研究和學術成果也是排名的重要指標，而量度的方式，則主要是計算一所大學的學者刊登在國際期刊的論文數目。所謂的「國際期刊」其實大多是英美學術界的期刊，論文自然以英文發表，相應之下中文的論著則不為承認。這樣一來，「中文」對希望爭取國際聲譽和地位的中大校方而言，自然是個需要急急拋棄的負累。這是劉遵義和當時中大的領導層推動這個政策轉變的背景。

中大校方對學系的要求曝光以後，立即引起師生校友的譁然。當年一月底，中大學生會即發表了長篇公開信〈哭中大〉，並邀請各方聯署。公開信抨擊校方這項政策將是中大建校以來「最根本最徹底的轉變」，「中文大學將不再是『中文』大學！」在這樣的政策之下，各學系出於資源考慮，只會逐漸在必修課開辦英文班，變相令中文大學不再以中文作為教學語言，也就是拋棄中文大學創校以來主張中文教育的理想。更重要的是，轉用英文教學，將是同時拋棄大學之為大學為社會傳播和深化知識的使命，公開信指出：「用母語教學，是吸收知識最有效的方法［……］因此，用廣東話上課，對大多數同學來說，對理解學科知識、積極參與討論，以及培養我們的批判思考能力，都是最自然最舒服最有效的方式」。[23]

公開信並進一步抨擊校方所謂的「國際化」，不過是因為政府大幅削減大專教育經費，大學於是透過「大量招收非本地的自費學生，幫補大學的財政」，這樣不啻是為了「搶錢」而放棄中大的理想和傳統。公開信進而評擊這是對英語霸權的屈服，值得詳引：

「在香港這樣一個後殖民地社會，英文實在不是一個簡簡單單的溝通傳意的工

具而已。在長長的殖民地歷史中，英文背後所代表的階級權力和社會地位，深深的刻在每個香港人的深層意識之中［……］沒有人不知道香港的商人和政治精英是如何崇拜英文貶低中文。只有學好英文，才可以出人頭地，才可以向上爬，才可以擁有各種各樣的市場競爭優勢。在由英美強勢主導的政治格局中，英文在可見的將來，在全球化的推動下，會更加凌厲地支配入侵以致摧毀其他大大小小的非英語文化，進一步削弱我們對自身獨特的語言文化的認同。」

「中文大學，一所曾經在殖民地時期勇敢地以『中文』來確認自己身分的大學，一所曾經在七十年代勇敢地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的大學，一所曾經以支持母語教育和提倡中國文化為己任的大學，在回歸後的今天，竟然自動地不加任何批判地集體放棄自己最引以為傲的傳統，為的不是甚麼教育理想，為的只是在『國際化』包裝下的經濟利益，徹底向教育商品化投降，怎不令人痛心，怎不令人捶首頓足？」

公開信因此呼籲要求中大校方收回政策，容許教師自行選擇授課語言，尊重粵語為大多數教師的母語，以及他們以之授課的權利。除此之外，信中強調並不反對真正的國際化，但面對外地學生，要做的應為增撥資源為外地生提供良好的中文教育，因為這正正是幫他們了解香港和中國的語言文化的最佳方法。[24]

公開信發表之後不到一個月，即有逾千中大學生、老師、校友，甚至校外的知名文化人和學者參與聯署，學生會並在中大文化廣場掛起「哭中大」橫額。〈哭中大〉引起的社會迴響，令校方大為震動。校方立即發表聲明澄清指無意在中大取消中文教學，並指雙語教學是中大一向以來的傳統，〈哭中大〉一信為誤解。但中大學生會隨即發表聲明反駁，之後雙方兩度來回發表聲明回應指控。到了當年二月，陸續有中大的教師和校友在報章發表文章，質疑校方的國際化政策，支持中大堅持中文教學。其中，關子尹教授的文章〈語文作育，國之大事〉，回顧了當代德語的歷史，指出堅持在教育、學術和文藝使用母語對發揚本土文化的重要性。校友梁文道的文章〈說英文的中文大學〉亦博引意大利、日本、法國的高等教育為例，指出世上有質素的學府，都是用母語而不用外來語言來授課和做學問，批評校方不應盲目使用英語。[25]

校方迫於壓力，於二月底宣佈成立「雙語政策委員會」，檢討中大的教學語言問題。2006年9月，委員會發表報告諮詢稿，主張「普世性科目如自然科學、生命科學及工程科學等課程，原則上用英語授課」，只有涉及中國文化、歷史、社會等學科才用中文，而涉及香港社會文化的，則可用粵語。這份諮詢稿再引來另一波論戰，中大學生會的「捍衛中大理想小組」質疑這樣的原則事實上等同放棄中文教育的理想，表現的依然是「崇英抑中」的心態，是有意識地摒棄中大和新亞書院諸賢的傳統；[26] 雙語政





2005 年 2 月，校長劉遵義會見同學。

策委員會委員曾榮光教授則為文反駁，認為那是曲解新亞和中大歷史，中大向來都以雙語教學為傳統，並不必然得用中文授課。[27] 另外，哲學系全體教師亦發表聲明回應諮詢，申明用中文授課對哲學教育的重要，亦指哲學系負有將外語哲學概念向國人引介的責任，因此將堅持以中文為主要授課語言，又指國際化不應該只是英語化，強調哲學系一直有從不同渠道保持和國際學術界的交流。[28]

最後，校方在報告書定稿中堅持此一原則。中大學生（亦為學生會幹事）李耀基隨即提出司法覆核，質疑報告書有違《中文大學條例》弁言中，「其主要授課語言為中文」的要求。2009 年，法院判決李耀基敗訴，理據為前言並沒有約束力，只是法例賦予大學的權力及自主的一部份，大學亦已對以中文作授課語言有充份考慮。至此，雙語政策亦在中大正式落實，除了少數文學院和社會科學院的科系（如哲學系和政政系）堅持核心課程中英雙語均開班以外，其他學系多半亦只有用英文授課的英文班。有關中大教學語言之爭，亦告一段落。

事實上，早在哭中大以前，因為迫於面向「國際」，多收外地生的壓力（又或者是學系本身的意願），理學院、醫學院、工程學院和商學院的大多數科目，其實已經用英文授課。「崇英抑中」的風氣早已蔓延到中大之內。校方的政策改變，其實只不過是將原有的現象正式定為官方政策。公平的說，校方的雙語政策，不過是反映當時整個社會乃至學界輕視中文的意識。

但正是這次由「哭中大」引起的論戰，引起了社會對大專院校教學語言的關注，多多少少扭轉了社會輕視、漠視中文的風氣。浸會大學在 2011 年底要求將浸會大學改為全英語授課的大學，即引起師生的強烈反彈。[29] 在 2010 年新上任的中大校長沈祖堯，亦在 2012 年發表了〈珍惜我們自己的語言〉一文，承認保育中文的重要，也反對大學排名以在英文學術期刊來衡量學術成就，認為要

重視中文學術著作，雖然未有挑戰雙語政策報告書中的原則，但也部分認同了「哭中大」之中抗爭師生校友的理念。[30] 因此，「哭中大」透過提高社會對中文教學的關注，提出相對嚴整的論述為作育中文教學、中文學術而辯護，雖然不能推倒政策、更不能推倒大部分學系行之已久的以英語為主要授課語言的慣性，但也畢竟在文化上為大學英語化增加了阻力。

另一點值得注意的是，這次捍衛中文教育的抗爭，和前兩次的中文運動的論述，既有繼承之處，亦有分別之處，而這正突顯了時代和抗爭意識的轉變。〈哭中大〉中論述母語教學的重要性，與第二次中文運動強調用母語能更有效學習相似；但在前兩次中文運動、乃至成立中大之爭時更為重要的反殖、民族主義底色，在〈哭中大〉以及往後抗爭者的論述之中，已無重要位置，取而代之的則是對英語霸權、英語全球化之下令本土文化和認同難以生存的警惕和批判。

此外，〈哭中大〉中主張尊重教師以粵語授課的權利，立足本土文化認同來捍衛中文教學，這也是前兩次中文運動所未有意識到的。第二次中文運動中更有論者主張最終應以普通話教中文。[31] 而「哭中大」運動中的不少抗爭者則同時警惕普通話對本土文化／方言的強勢和壓迫的位置。抗爭者主張的是一種多元的、混雜的、不定於一尊的、尊重本地語言運用現實和應用需要的教育語言觀，並不排斥使用英語教材或普通話，這是一種比前兩次中文運動、乃至創校理想更為複雜細緻，也更為對權力和霸權敏感的論述和立場。[32] 在這個意義下，「哭中大」事件某程度上也是近年興起的本土意識和本土運動的先聲。

更重要的是，「哭中大」指出大學放棄中文理想是唯利是圖，為了爭取更多資源輕易放棄教學理想和自身文化傳統，甚至放棄教學的質素和對本土文化、社會發展的關係，這亦是把堅持中文教育的理想，扣連到自九十年代末開始，學生組織對大學教育市場化的反思與批判之上。「國際化」後來成為中大校方一系列改革的旗幟。對「國際化」背後的大學教育市場化邏輯的批判，亦是近十年來學生組織（不論是中大還是其他大專院校）的主調，「哭中大」無疑是強化這種抗爭意識的一次重要運動。

由圍繞「哭中大」的論戰催生出來的有關教學語言的辯論，堪稱是近年來華人社會有關（大學）教學語言與社會文化的一次最為深刻的反思，其中不少討論已經逸出了技術性的教學效能的範疇，而由本土社會、英語霸權、大學教育市場化等不同的視角檢視問題所在。這些散見在報章的文章，由周錫輝、雷競璇、繆熾宏、林道群等幾位校友輯錄成書，就是本文前面不斷引用的《令大學頭痛的中文》。事實上，這幾位校友都積極參與「哭中大」運動，他們除了有的為文參與論戰、又把文章輯錄起來以外，在李耀基的司法覆核官司中，他們亦一直給予支持。「哭中大」事件過後，

他們成立了「中大校友關注大學發展小組」（簡稱校友關注組），繼續參與校政討論，在後來的新書院事件、情色版事件、校董會教務會改組、以至民主女神像進入中大，都向校方據理力爭，扮演了關鍵的角色。[33]

中文之為大學理想：批判意識與理想主義的搖籃

至此，我們不難看到，隨著時代的變遷、社會形勢的轉變，中大的中文教育理想都被一次又一次地賦予不同的含義。在香港提倡中文教育，過去曾經是反殖、民族意識、本土意識覺醒的象徵；到了近年，中大的這個傳統則成為了反對英美文化霸權、反對大學教育市場化、維護本土文化身份認同的旗幟。但這並不意味著，「中文」之為理想，不過是一個幌子。如果我們細看五十年來有關「中文」理想的論述變遷，就會發覺，貫穿這些時代和觀念轉變的，是一個共通的批判精神：立足於本土民間、關心社會弱勢，向當權者和霸權提出挑戰和批判，並指向更公義的社會改革的理想。每一次為著中文的抗爭，儘管有著不同的論述，但都有這個共同的立足點，並由這個立足點來提出論述，申明



中文於香港社會的重要性。「中文」因此並不是一個幌子，反而是一個令中大人對香港存在的霸權和壓迫敏感的參照點，這和香港的殖民地／後殖民地的社會狀態分不開。

我們由此可以見到，如果不談中文，我們便無以知中文大學應有的社會意義；而不把作育中文、中文教學、中文學術、提高中文社會地位的訴求放回香港史的脈絡，我們則難以理解「中文」何以是一大學乃至社會理想。

五十年來的中大歷史，何其複雜，這篇文章自然不能一一觸及。中大人的批判精神，當然並不僅僅來自中文理想，我們亦要小心以偏概全：過去這些圍繞中文教育、中文社會地位的校園內外的抗爭，不是全體師生都有份參與，並不是所有的中大人，都會為中文理想背後的批判精神和理想主義所感召。而五十多年以來，亦有很多中大師生，默默地為用中文教學、用中文做學問而經營而努力，他們未必是運動的積極參與者，卻也一樣是在推動和實踐中大的中文理想。本文之所以把焦點放在抗爭事件之上，不過是希望透過重新書寫這些歷史，突顯中文理想在香港社會脈絡之下的重要意義，而這一切，恰恰是急於迴避「中文」的中大校方，所掏空了的至為關鍵的中大歷史意義所在。

1 譬如說中大為五十年校慶架設的網站中，「里程碑」一版所制作的中大年表，亦沒有提到中文大學之所以以「中文」命名、「中文」之於中大意義的種種。事實上，整個網站都跳過了「中文」對中大的意義的論述。見：http://www.50.cuhk.edu.hk/zh_tw/milestones

2 本節的內容，節取自筆者的一篇於《評台》網站發表的書評〈中大前世，香港今生：讀周愛靈《花果飄零：冷戰時期殖民地的新亞書院》〉。這一節有關早年三書院歷史的書寫，也都是本於周著；為了方便閱讀起見，這裡不一一注明引用之處；詳細的對周著的注明和引述，可參閱該篇書評，連結為：http://tinyurl.com/l9krj8o

3 諷刺倒是皮理思後來把自己的文章集結成書，收錄了這篇文章作為附錄，見凌道揚、錢穆、蔣法賢，〈中文學院聯合會對皮理思教授專論之分析與評論〉，收於皮理思著，蔣炎午譯，《香港高等教育問題之商榷》（香港大學出版社，1958），頁35-42。本書亦有轉載，為中大相關的出版物首次輯錄這篇文章。

4 李歐梵，〈我對中文大學的觀感〉，收於《中大三十年》。

5 左翼21，〈「六七、傳統左派和工人」的思考〉，連結為：http://left21.hk/wp/2010/10/

6 《崇基、新亞、聯會學生報聯刊》，第一期，1967年10月17日。

7 潘牧，〈殖民地的法定語文〉；學術部，〈「中文」與「官方語言」座談會〉，皆見於《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生雙週報》，第111期，1967年12月8日。

8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生雙週報》，第112期，1968年1月26日。

9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生雙週報》，第113期，1968年2月23日。

10 同上。

11 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編，《香港學生運動回顧》，（香港專上學生聯會，1983），頁13。

12 《中大學生報聯刊》，1971年2月15日。

13 穆秋，〈趕快動員起來〉，《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生雙週報》，第111期，1967年12月8日。另外，崇基、新亞、聯合三書院的學生會，也曾在1967年五月跟隨學聯發表聯合聲明，譴責暴動，聲明全文見《香港學生運動回顧》，頁28。

14 〈七七年後香港學生運動的形態〉，《香港學生運動回顧》，頁187-189。

15 〈「中文」大學〉，〈星島日報師長版〉，2005年2月28日，連結見：http://crycu.blogspot.hk/2005/02/blog-post_110970841197788951.html

16 《香港學生運動回顧》，頁172-173。

17 郭少棠，〈第二次中文運動失敗背景初探〉，收於《香港學生運動回顧》，頁174-175。

18 有關醫學院事件，可見本部分王邦華的文章〈含糊曖昧的中大理念、朝三暮四的大學體制〉。中大學生會在香港前途談判，以及緊接著的中國民主運動，都有關鍵的角色——中大學生會是最早支持回歸，提出「民主回歸」論述的社會團體；在其後的香港民主運動、支援中國民主運動、八九民運，中大學生都扮演了極關鍵的角色。讀者如有興趣這段歷史，可參考蔡子強、黃昕然、蔡耀昌、莊耀洸編，《同途殊歸：前途談判以來的香港學運》，香港人文科學出版社，1998。

19 〈訪問常宗豪老師——中運、語文教育〉、〈與楊鍾基談中運〉，《中大學生報》，第85期，1979年3月12日。

20 〈中運死了！？〉，《中大學生報》，第85期，1979年3月12日。

21 〈校長新春家書〉，收於《拉扯在中英文之間——中大國際化特刊》，（中大學生報編出被委員會，2005年）。

22 詳見本書卷三「社會．教育」，吳嘉倫，〈追求卓越？大學排名評分初探〉。

23 詳見本書卷二「國際化事件」，〈哭中大——致中大師生的公開信〉。

24 同上。

25 兩篇文章均原刊於《明報》，現在收錄於《令大學頭痛的中文》，中文大學校友關注大學發展小組編，2007。

26 中大學生會捍衛中大理想小組，〈我們是中大人——以歷史眼光審視語言政策〉，原文刊於《明報》，2006年10月10日，亦收錄於《令大學頭痛的中文》中。

27 曾榮光，〈重認中大的歷史與教育理念〉，《明報》，2006年11月6、7日，亦收錄於《令大學頭痛的中文》。

28 關子尹，〈別在語言迷官裡迷路〉，明報，世紀版，2003年11月13日，亦收錄於《令大學頭痛的中文》之中。

29 參見香港浸會大學學生會第四十四屆編輯委員會聲明，《浸大教學語言轉為全英——學術自主蕩然無存，校園民主形同虛設》，連結見：http://itextchannel.blogspot.hk/2011/11/blog-post.html

30 沈祖堯，〈珍惜我們自己的語言〉，《校長網誌》，連結為：http://www.vco.cuhk.edu.hk/js_blog/index.php?option=com_jaggyblog&task=viewpost&id=37&lang=zh-TW

31 〈訪問常宗豪老師一中運、語文教育〉，《中大學生報》，第85期，1979年3月12日。

32 參見鄧小樺，〈粵語霸權／後殖民香港狀況／有效學習〉；路尋__中大校友，〈迷失香港　迷失中大：本土語言在「國際化」下的萎縮〉，兩文均收在《拉扯在中英文之間—中大國際化特刊》；亦見杜振豪，〈中大教學語文政策的縫隙〉，原刊

於《明報》，2006年8月25日。亦可參看本書第二卷「國際化事件」，「方言」一節。

33 校友關注組的參與，以及這幾次抗爭，本刊均有其他專文論述，有關校友關注組對校政的參與；可見諸他們的網頁：http://www.cuhkalumniconcern.com

為了撰寫這篇文章，筆者曾訪問雷競璇先生和繆熾宏先生，他們都為我們提供了寶貴的資料和意見。

使用中文是中大的使命

◆ 孫述宇

原刊於《明報月刊》，1978 年

一）中大的使命

中文大學是為甚麼目的而創立的呢？中大有甚麼使命呢？這些問題我們今天很需要重新問一下。

中文大學之創立，並不僅僅是籠統地給本港中學畢業生受大學的機會，而更是給他們受到以中文來傳授與學習的大學教育的機會。這一點我們要記得很清楚。假使當初只是為了使本港中學生多一些入大學的機會，根本不必創辦中文大學，只須把香港大學擴充，或者在九龍新界設立港大分校，就可以解決問題。中文大學之所以叫做香港中文大學，而不叫做港大沙田分校或甚麼別的大學，就是因為這學校所要提供的不僅是高等教育，而且是中文教育。中大創立之前，社會上已有很具代表性的輿論，要求辦一所大學，使本港的中文中學生能受到合適的高等教育；香港政府接納了這要求，於是辦了中大。本港中文中學的聯會一向都有派代表參加中大與成員學院的若干研究與決策機構，如董事會、入學試委員會等。

要辦中大教育，自然要用中文，可是中大在這十多年來卻常常不用中文。校內教職員的各種會議，十九是用英語發言，用英文紀錄的；校方致教職員的文件也是以英文為主，有時附中譯文，有時不附。教育方面，學校當局並不強調要用中文，因為教員可以自由使用任何語言來上課，而且學校在招聘教員時，也不規定應徵人須能以中文授課。今天，中大名字上的「中文」二字，並沒有多少意義的。

二）英文教育的現象與成因

讓我們先檢討一下中大在教學上使英文的現象，看看問題出在甚麼地方。

中大校內大多數的學系，都相當廣泛地使用英語。英文系固然是全部英語，西洋音樂、宗教等學系恐怕也很少中文。其他學系裡，外國教師用英語自是不在話下，中國教師對著中國學生也往往用英語授課。讀物方面更不用說，不僅參考資料是英文的多，主要的教本也常常是英文的。我們禁不住要問：中大與港大還有甚麼分別呢？港大雖說是英文教學，但中國的文史哲各科也還用中文；反之，中大雖云中文教學，卻也不要求

教師用中文，只是由於中大教師之中華人比率較高，於是英文教學的情形未及港大普遍而已。東京大學用日文，巴黎大學用法文，柏林大學用德文，莫斯科大學用俄文。每一家有名望的大學都用自己學生的母語，甚至研究外國文學時亦然，但我們中大，校名上明擺著「中文」兩字，卻在講授、習作、考試、閱讀各方面經常不用學生的母語。然而很多中大同事與同學覺得，這是可以理解而且可以原諒的。他們指出，造成校內廣泛使用英語的現象，有許多原因。第一個是歷史原因：除了中國文史哲的研究在中國有傳統，因而歷來都用中文之外，其他學科差不多都是近百年來從西方移植過來的，在中國沒有基礎，因此不但沒有足夠的中文書本與其他資料，連中文的專門詞彙也不夠作學術研究與討論之用。

其次，又有社會原因。贊成多用英語的人指出，英語是今天國際通用的語文：同學們畢業後，如要深造，十九會到說英語的國家去；如要就業，能講寫流利英語在香港社會上也大佔便宜—比方港大的學生比我們佔便宜不正是由於他們的英文比較好嗎？他們又指出，當初成立中大，原以為錄取的學生會以中文中學畢業為主，孰料十多年來本港中文中學教育日漸衰微，今天中大的學生大多數已是來自英文中學的了，這樣的學生，接受偏重英語的大學教育，比較更適宜。

第三個原因，是本校的特殊情況：中大有不少外國教員。英文系的同事是洋人為多；音樂系專任教員中，洋人的比率更高。其他許多學系都有些永久性質或訪問性質的外籍教師，這些教師雖佔少數，但對中文教育的阻碍很大，因為他們本身固然不能用中文講授，而由於中大考試中的多人閱卷制度，他們要參與評閱他人科目的考卷，於是往往要勉強那些考生用英文作答。

這些原因既然存在，即使大學當局明天就下令一切使用中文，也沒法執行的，因為我們不可能在旦夕之間弄出足夠的教材與參考書，甚至不可能有夠用的中文專用詞彙。因此，有些人說，本校廣泛使用英文，是無可厚非的。

但這樣的想法，完全錯了。馬上在中大禁用英文是行不通的，不錯；但使用英文用得這麼廣泛而不知錯，便是忘記了中文教育的目標與使命，與中大創辦的旨趣背道而馳，這怎能說未可厚非？

在香港辦中文的高等教育，當然會遭遇到困難；辦學的人也應從一開始就了解到這些困難存在。我們要討論的是，這些困難是否不可克服？怎樣克服？而我們中大的當局與師生，又作了些甚麼努力？

三）歷史原因

先說歷史原因所造成的困難吧。上節已說過，除了中國的文史哲幾科，大學的其他學科差不多都是最近百年間從西方移植過來的，這些「西學」在「中土」

沒有根，我們沒有足夠的中文教本與參考書，甚至沒有齊全的中文詞彙。這是事實。

面對這些困難，可走的路不外兩條：一條是培植這些西學在中土生根。這條路要譯製出齊全的中文專門詞彙，寫出或譯出中文教本與參考書，用中文講授、討論、練習，使這些西學終於歸化中國。另一條路是我們甘心用英文來學習這些西學，以後也用英文來作深入研究，不移植這些學問到中土，而叫中國人世世代代用英文作學術語文。

很明顯，第一條路並不好走，要遭遇不少的困難，要做許多基礎工作；但是第二條路是不能想像的。即使我們不走第一條路，我們的後代早晚也要走的，但這樣的話中國的學術就遲了起步，我們的後代要罵我們。一個民族要拿他族的語文來做學術工作，這民族的學術成績早受了先天的限制。語文是思考的工具，一個民族如果有語文而長期使用外語作學術語文，那是很吃虧的，因為一方面，外語始終是外語，有母語的人無法使用得十足純熟，老是拿一件不利之器，怎能善其事？另一方面，長期用外文為學，母語又沒有機會成為學術語文。我們中國人如果想使英語純熟流利得像英、美、加、澳人一樣，除非是把我們的母語中文完全棄置不用，把中文完全忘記。但我們能不能做到？願不願去做？

這個道理，香港人比較難聽信。香港人吃的虧，說不定是英文太好了。有些人從幼稚園開始就學英文，習用語法純熟得很，口音也正確——正確得會去嘲笑印度人與馬來人的英語。以第二語言的標準看，他們的英語在某方面確實了不起，可是為這成績也付出了很大的代價：他們沒有機會培養自己的第一語言成為可以思考、辯論、創作的語言。而第二語言始終是第二語言，他們若與英美加澳受過同等教育的人相比，詞彙不夠豐富，表達方法不夠多，思想起來也不夠深刻周詳。他們能在雞尾酒會上模仿洋人，但真正要用智力思考時，他們的第二語言沒法讓他們天賦的聰明充份發揮，這時自覺不如洋人，民族自卑感就油然而生。這種感覺他們也許要否認，因為近年來高等華人已往往不肯自認不如洋人，不過他們蔑視其他華人總是遠過洋人的，這便是民族自卑感的鐵證。這種人對中文教育，一點興趣也沒有。

世界各地的先進國家，今天都用母語做學問。中古時代歐洲通行的學術語文是拉丁，各國共同一種語文，對於學術溝通本也有其方便之處，但文藝復興時大家都改用民族語文，以利教育與學術的發展。有個早期的德國哲學家說：「我要教導哲學說德國話！」我們也應該教導近代學術說中國話。

中國從前也曾教過佛學說中文。那時佛教初傳入中國，西域的僧人了解到若要中國人信佛，教義必須用中文來傳播，於是動手譯佛經；後來中國人想研究這種宗教，也到西域印度去留學，回國後

亦譯經。經過了玄奘（唐三藏）等了不起的留學生做了翻譯移植的工作，佛學在中國便生了根，以後就開花結果。到了清代，西學東漸，中國人又開始做翻譯工作移植這些新學問。中大今天應該繼承這傳統，做這種工作。

任由教員用中文或英文教學是不夠的。要辦中文教育，須規定用中文教學，而且鼓勵教員翻譯專門詞彙與書籍，並用中文寫作。

四）社會原因

次論社會原因。第二節提到，香港社會崇尚英語，中學生多趨向英文教育，今日英文中學的學生數目遠超過了中文中學的學生，而中大的學生也大多數來自英文中學。

這是事實，但中文是否因此就要轉而辦英文教育呢？如果要，學校當局應當向社會交待一下。

其實，儘管學生來自英文中學，中文的大學教育還是可以辦的。學生的母語究竟還是中文，而且在中學裡也還讀過中文來——否則他們也通不過入學試中的中文卷，中文母語既有相當基礎，只要在大學裡多做些練習，沒有理由不能用中文來讀書研究的。反之，英文究竟是他們的第二語文，他們可以應付到某一程度，但大多數人都很難再進步的，而這個大家都達到的程度，還遠不是能夠深入思考問題的程度。這是我在中大十年觀察的結論。

香港中文大學教育走下坡，這是很令人痛心的事。中學是語文訓練的重要階段，因為中學生開始學思考，這時沒有把母語能力提高到可以充分思維與表達的程度，可說是終身的不幸。面對香港中文中學的衰落，中大做了些甚麼？當然，社會形勢是巨大的政治經濟與心理力量造成的，要想扭轉真是談何容易。但社會人士曾對中大寄予熱望，他們有權問：「中大想過辦法、出過力沒有？」中大是本港兩間官辦大學之一，不是毫無影響力的。

我們又聽見說，英文是非常有用的語文，同學們學好了，他日留學深造，或者在本港政府部門與工商界求職，都極其有利。

這些話也不錯，但也不是不辦中文教育的理由。沒有人主張不學英文；英文是當今國際上最有用的語文，同學們當然應該把英文學好；我們只是主張把中文作我們的主要學術語文，做我們思維、學習、研究的工具。拉丁文從前是歐洲最有用的學術語文，為甚麼後來歐洲各國都改用自己的母語做學問？還有，難道中文學好了，英語就學不好的嗎？

我們沒有理由相信中文學好了，英文就不能閱讀、不能寫、不能說。無數的歐洲人能用英語，然而他們思考治事的語文是母語；也有很多中國人用中文為主，但亦能讀、寫、說英文。也許中國學生完全拋棄了中文而把精力時間全放在英文上，英文可以流利不少，但付出的代

價是極其慘重的，因為人的聰明才智用第二語文是發揮不盡的。

不論出洋留學，或在港求職於工商界與政府部門，某程度的英語能力肯定是需要的，但這程度一旦達到，英語是否漂亮，就遠不如有沒有頭腦重要了。到研究院去固然要有頭腦，到工商界又何嘗不要？而培養思考能力，肯定是用母語有利。

五） 外國教員

我們現在談中大的外國教員問題。前面第二節說過，這些外國教員是中文教育的障礙之一，因為他們不會中文，不能以中文講授與討論，也不能閱中文習作與試卷。

但中大的師生中，了解到外國教員為害本校教育的，似乎少得很。許多中國同事眼見本地與外地教員待遇不同，覺得外國人佔盡便宜，很不公道，但也沒有認為外國教員於本校教育還有別的害處。似乎大家都認為，有些學系的性質，自然是應該請外國教員來任教的；比方英文系，應該以英美教員為主，甚至沒有中國教員也沒所謂；至於一般的學系，也可以請些外國教員，因為當今有國際地位的學府，例有別處來的學人訪問的。

這兩點見解都錯了。先談第一點吧，那就是，英文系是否應當以英美教師為主，以英語授課，以英文做習作及考試。我自己從前對這一點也毫不懷疑。猶記得頭一趟遇見一個學漢學的美國學生，當他說到美國大學裡是用英文講中國文學之時，我便頗有優越之感，因為覺得他們的中國文學程度，比不上我們中國學生的英國文學程度了。後來我到了美國，看見他們學德國與法國文學的研究生，都可以自由選擇用英文或德法文來寫論文，我才開始啟疑，因為這些研究生——在耶魯、柏克萊、哈佛唸書的——的德文法文造詣，肯定是不比我們中國大學生的英文差。再後我在美國大學裡頭教中國文學，學生當然都是用英文討論與寫論文，我發現他們的知識並不很廣，但往往很能議論，比我們學英國文學的同學強得多。我恍然大悟：他們在用他們的母語，那是一種經過十多年訓練、能夠思考與表達的純熟工具啊！

這點道理，我若不是有殖民地子民的心理作崇，早就該了悟的。我在大學裡唸英國文學時，所用的英國文學史就是兩位法國教授 Legouis 和 Cazamien 合著，而由英國人譯成英文的。歐洲的著名學府向來都用自己的母語來研究英國文學，大學者如Taine, Cazamien, Digeon, Schlegel, Ten Brink, Siever, Praz等人，寫討論英國文學的書，用的都是法文、德文、意文。我們可以相信，這些學者所以有成，與使用母語大有關係。

日本人懂得這道理。他們用日文做學問；他們大抵能讀外文，（不能也不要緊，他們的翻譯工作做得很快），但不作興用外文寫作。前年美國的約翰遜學會收

到一本日文的集子，學會秘書初時莫名其妙，後來請教懂日文的人，才知這是一群日本學者給一位專治約翰遜博士的老先生祝壽的集子，集內文章都是討論英國十八世紀文學。日本人說英語，一般都不大流利，香港人常會嘲笑這些「喋佬」的口音。據說物理學大家湯川秀樹的英語就很蹩脚。但是他們外語不流利的背面，正是他們學術的獨立。等到我們像他們那麼樣，能自己在本地培養出湯川這種諾貝爾獎級的學者之時我們再自豪吧。

為甚麼研究外國文學也要用自己的母語呢？理由是，文學的探討，須有極其有效力的語文工具。研究外國文學，一方面需要相當的外文基礎，否則外文作品都看不通透；但到整理自己的感受時，就需要母語。我們閱讀之時，內心的感受與反應，是非常複雜的，矇矓隱晦，糾纏不清，自己都很難弄明白是怎麼回事；要把這些混沌一團的反應弄出條理，必需有很靈敏而且貼切的語言才有希望，深刻精微的文學，活動在人的心裡，在情感的源頭、靈魂的深處，在這兒，外文也許偶然會閃過，但經常出現的語言，怎會不是母語。

中大的學生既然都是中國人，中大的英文系自然應當用中文來討論、練習、與考試。因此，英文系也應當以中國教員為主。中國教員一方面能使用中文教學，另一方面又能在討論英美作品時引入中國人的感受性。文學的內容不是作者的作品，便是讀者的閱讀。以莎翁的戲劇為例，他那時代的人有一種看法，日後的英國人又有一種看法，而今日的英人、美人、歐洲各國的人、亞洲各國的人，看法亦可不同。今日的英人如何欣賞莎翁，不必視為標準；甚至當年莎翁的儕輩如何欣賞，也不是唯一的法門。莎翁儕輩的看法，當然很值得研究；但對於我們中國人而言，最要緊的是莎翁對今天的我們還有沒有意義，以及我們帶着中國人的歷史文化經驗、感受與眼光，能不能在莎翁作品裡嚐出味道、找到價值。這問題是要我們中國人才解答得了的。外國文學的欣賞與研究，多多少少總要採一個比較文學的途徑，才可能有成績與貢獻；倘若我們只懂得很奴順地模仿今日外國人的感受來閱讀，我們不可能像外國人得到那麼多，而自己又沒有特有的所得，怎能出人頭地？

即使在外文系裡教外語，也未必應當以外國人為主。在香港有個很普遍的見解，以為我們學英語的最終目標，是要說起來像英美人士，寫也寫得像英美人士，因此，英語教員當然以英美人士為上選。持這見解的人，沒有了解到，我們學英語是學一種外國語，一種第二語文，我們很難——而且也不必——期望講得寫得與受過良好教育的英美人士一樣好。而英美人士教別國人英語，也未必很理想，因為英語是他們的母語，他們不懂得學習英語作為第二語文的種種問題。最近十多年有些英美的大學開始研究「英語作為第二語文」的問題，也開了些「作為第二語文的英語教學法」（TESL）的課程供學生選修，情形或稍

有改善。但一種萬應的 TESL 教學法也很難入信，因為把英語教給許多不同母語的人，應當用許多各自不同的方法才對。語言教學法再進一步時，教中人英語的方法，一定會聯繫中文，而運用許多比較與變換的方法。這種教法，恐怕還要中國教才能應付，因為英美人士懂中文的很少。今天的英語教學法其實很原始，那些英美教員不論到的是非洲、中東，或香港，都用那套教學法，而實際上是把英語當作母語來教，求學生把它當母語來學（「校內不得說本地土話」、「用英語來思想，不要在心裡翻譯」）學生的思考能力反正不是他們的責任。這種教學法早晚要淘汰的，但希望香港不是最遲淘汰的地方。

當今有國際地位的學府，都會有別處的學者來訪問、研究，與教學，這是真的。但這事實不能引為理由，以支持中大聘請外國教員的風。

六 國際性的學府

我們拿中大的外國教員與真正具有國際地位的學府——如柏克萊加州大學——的外國學者一比較，馬上會見到一個巨大的根本性分別，那就是：柏克萊的外國學者使用美學生母語教學，中大的卻不用中國學生母語。到柏克萊的外國學者，如果不能用英語講授與閱卷，就會覺得很抱歉。

英美的學者，如果去到巴黎或莫斯科大學，除了很特殊的情形，通常斷不會用英語教學。他們絕對不會在教授會議中要求大家都改說英語來將就他們。那一種學校不要求教員使用當地母語來教的？答案是誰都知道的：那是過去殖民地的學校。

「殖民地」一詞是要引發強烈情緒的，我們無意拿它來刺激人。我們的外國同事之中，開明的也不少，有舊式殖民者心態的大概並不多。他們應徵前來教書，校方既沒有要求他們用中文，他們之中可能有些人確實沒有想到應該用學生母語來教學。我們吃過種族主義的虧，並不提倡種族主義或排外主義。假使有一位外國外國同事，看了這篇東西，同意這種議論，於是辭了中大的職，回國、失業、挨窮，我們也會很難過。痛苦是沒有種族國籍的界限的，不過，剝奪學生用母語學習的機會，就是剝奪他心智成長的權利，這句話，我們不能不說。

七）大學當局的責任

推行中文的大學教育，是中文大學的任務。這個艱巨的責任，不僅學校行政當局要負起，全體師生也應共同努力。但解決問題的政策，是要由大學當局制定的，因為只有當局才有統籌辦事的能力。中大成立將近十五年，有人會說成績已是「有目共睹」了，但我們共睹的是甚麼成績呢？一座座樓館建起來了，校園的花木種出來了，學位頒獎了。這些當然是成績，但算不算難能可貴？拿樓館來說吧，建築款項主要是由政府撥付的，少部分是由社會人士捐助，這些社會人士，出於愛護中文教育之心，或

者是希望服務社會而與政府保持良好關係，捐起錢來踴躍得很，有時不待學校當局請求就自動捐了。所以，樓館建起來，不是學校當局的大功績。一所學校裡，往往是那些不能直接看見的東西，才是要緊的，比如學風、士風都是。假設中大能面對重大的困難而執行一項堅定的中文教育政策，使畢業生都能用中文思考、治學、處事，並使中文中小學教育的頹勢得以改良，那才是偉大的成就。

大學當局辦事並不缺乏魄力。改制也未嘗不遇阻力，但當局經過周詳計劃一往無前地完成了。再如所謂「雙語教育」、學校大旗大鼓而行，開了多少會，作了多少計劃、調整、調動？這些雙語教學的辦法，也許將來會證明大部分是行不通的，但目前雷厲風行的做法，表現出當局的決心。這種魄力拿了來推行中文教育，十五年來應當很有成績的。

中大如果決定要推行中文教育了，應當採取些甚麼步驟呢？答案當然不必由這篇文章提出。當局應當也委出個研究會，由了解各學院和書院實況的人共同研究，提出建議。但本文可以在反方面，提出一些要戒除的陋習。

頭一件陋習是凡事以英文為主。目前中大的文告與其他的通訊，致學生時還會以中文，致同事時則以英文為主，有時附有中文譯文，有時不附。許多同事都有個印象，以為與校方通訊必須用英文，於是有些不諳英文的同事就要請人代筆。校方也許會解釋道，這是由於本校行政人員暢通英文的較多，打字的秘書也是能打英文的多。但這當然是過去招請職員時太偏重英文的結果；而且，現在要糾正這錯誤，也不是不可能吧？校內通訊雖不是教育的一部份，但是一所提倡中文教育的學府在行政系統中使用英文為主，給人的觀感很不好。

我們的同事常常說，在中大，中國教員是二等人，洋教員才是一等的。這一等二等之分，不僅見之於「海外待遇」與「本地待遇」的差別，更見之於語言之上：當中英文面對之時，中文例要退讓，有時退三舍還不止。中大的教職員會議是最好的例子，與會的英美人士總是少數，但會議一定用英文；只要有一位洋人在座，那伯其他九位或十九位都是中國人，也要說英語。中國教員一言不發坐完整個會議的情形相當的普遍，因為中國教員完全不懂英文的也許很少，但英語說不流利的不少。學者往往是內向的人未必長於說外語，即使留過學也如此。中大用英語開會，是給予外國教師發言權，而剝奪數目更多的中國教師的發言權。中大的會議所收集到的，是外國教師與一些英語流利的中國教師的意見，收集不到其他中國教師的意見——收集不到真正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意見。

另一件要糾正的錯誤，是徵聘教員時，不要求應徵人能講能閱中文。我們雖不主張種族主義，但若要辦中文教育，不能不在語文上劃界。能使用中文的外國教員——如Deeney等，我們當然歡迎。倘使有學

術界頂尖人物來訪，即使不懂中文，也可以偶然破例。但如果到來的洋人，學術成就平平，甚至在外國根本沒資格教大學的，而到中大來永久性地任教，卻又不學中文……

中大廣泛使用英語，有個心理原因的，那就是在香港華人之間很普遍的語言自卑感。香港人很多都以能用英語為榮，而不以不能用中文為恥；我們中大的行政人員與師生中，不能寫中文的為數不少，但人家批評他們中文寫不好之時，他們往往毫不介意，遠不如被人批評英文不漂亮時那麼不高興。有時中國教員對著中國學生上課，也用英語，理由是師生所用的方言不同。其實中國教員若不是在外國長大的，用英語授課必不如用中文發揮得盡致，而學生學聽國語雖會遭遇一些初時的困難，但長期來說，一定比用外語來學習上算；但師生都肯用英語，大抵總是由於雙方都不願承認自己的英語未夠好。再如校內用英語開會，同事們任由中家剝奪自己全部或部份發言權，也不抗議，恐怕也與此有些關係。這種心理不變，我們大學的前途很黯淡。

中文大學的成立，是香港政府決定的。香港政府事前一定向殖民部提出，得到殖民大臣的同意。這即是說，英國的殖民官吏，也承認殖民地人民有使用母語來受教育的權利。這是世界大勢所趨，世界各地都理解到母語的重要，理解到這是思考能力與獨立人格發展的所繫，是人權的一部份。要是我們中大繼續以英文為主，我們可以想像，英國的殖民官吏會聳起肩膀說：「這不干我們的事啦，這是他們中國人不要中文，要學我們說話」，而世界各地的人都會瞧我們不起，說我們比英國殖民官吏猶不如，說我們俯伏慣不肯站起來。

廢墟中大：
中大認同的（後）殖民解讀

◆ 安徒

原刊於《中大四十年》

2003年4月，明報一項調查指，中大、港大學生對自己所屬院校的評價，遜於規模遠小的嶺大。中大一名教授受訪回應上述結果，他說「五星級酒店」豪客的要求，與「一星級酒店」客人對「客棧」要求不同，難直接比較跨院校評分。嶺大有部份同學，對於自己的院校被謔稱為「客棧大學」憤憤不平，更電郵該教授投訴。

這件事令我想起我在中大求學的年代，曾在校園傳誦一時的所謂「AO事件」。事緣建校初期的某年，中大學生無一人能考進政府當AO（政務官），為報章廣泛報導。當時中大同學還未長出那種「豪客」意識，對報章挖出這個瘡疤深深不忿，除了質疑中大是否只具二流大學的地位，也抱怨殖民政府有意將中大邊緣化，維護港大精英的壟斷。時光流轉，筆者成長於這所昔日的「二流大學」，今日又聞它已榮列「五星級大學」之榜，撫今追昔，對於嶺大同學的反應，可謂別有一番滋味。

舊中國素有「讀書做官」的傳統，大學畢業當不上官，有如上京赴考落弟，可謂奇恥大辱。中大當年的AO事件，雖與今日流行的大學排名遊戲不全一樣，但從中反映的價值觀，即以大學作為求取俸祿之階梯，實在無分今昔。無論舊日科舉封建，還是近世殖民外治，轉變其實不大。香港大學籌設於晚清的斜陽急景，立於民國元年，它是在大英帝國派赴中非印度的老練討蠻大將盧押（Lugard），與本地華人買辦領袖何啟，相互協力下籌備建成。其如意算盤乃是在中國土地上，合力落實「間接統治」（indirect rule）的「後滿清」殖民大計，它所看準的正就是華人學子根深蒂固的讀書利祿情結，有奶便是娘的德性。及後民國政治長期混亂，使港大「為『治理』中國人而立」的大計夭折，港大遂變為香港本土殖民政權接班人的培訓所，行半世紀而不改。

晚殖民的教育管治工程

中文大學立於六十年代中葉，是時香港實行了超過一世紀的舊式英殖民者與華人精英共享的「間接管治」架構，開始不適用於從商貿販運轉變過來的新工業現代秩序。傳統受英人吸納的「高等華人」團體，無法駕馭日趨複雜的香港

社會，殖民政府有必要更廣泛的介入社會生活各領域的管治，所以，要在專為培養舊式專業及政治管治人才的港大英中教育系統之外另立機構，培植社會管治人才。為了開展這項晚殖民（late-colonial）教育管治工程（pedagogical governmentality），殖民政府銳意收編私辦大專的力量，統一各零散書院，成立一所新的大學。戰後因「文化冷戰」需要而為美國所訓練的新一代回國華人學者，就成為這個管治工程的重要構成部份。

高教精英站在維護殖民政府管治的立場，無分中港大，這點可從中港兩大學生同聲譴責由親共左派策動之六七暴動，可知一二。但中大的成立，畢竟亦動搖了過去英殖民者和「高等華人」階層之間，共同分享利益的既有機制。躍躍欲試的新精英對中大學位的「利祿等值」期望欣欣，AO事件的發生，猶如打翻了五味架，顯見新舊系統的交接協調，並不一帆風順。其實由殖民政府來設計及駕馭一個全新的現代管治架構，要在本土世家大族的高等華人之外，平衡新進的精英利益，又談何容易。中大原初採用的聯邦架構成份複雜，社會上華文中小學教育，亦素為左右派政治意識形態的分歧對立所偏擺，各式其他辦學團體，亦陷各自為政的局面。中大的出現，不但未能及時安撫這些不同的利益，卻更突顯出既有權力體制中華洋有別的矛盾。抱怨英人歧視和壓制華人教育的觀念，主導了很多關於中大的人事及制度爭論：大學年制、授課語言、書院架構……所有都成為大學文化政治角力的新引爆點，雖然這些教育管理問題，未必全跟華洋有別的問題有關，但不管怎樣，過去殖民統治所成功掩蓋的差異和矛盾，漸次被上綱為文化壓制，溯源到殖民權力。

其中最突出的，莫如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運動，這運動原由一班殖民政府所吸納的「高等華人」精英所提出，目的只為方便政府對華人社會的管治，自己則贏取身為華人領袖的威信。但是星火燎原，一發不可收拾，運動引領各方勢力介入，終成為史無前例，成份駁雜的民間連線，一致以「中文」此一文化象徵，宣洩對政府之不滿。因著中文地位而激起的民族主義意識，反超越了左／右派舊式的政治忠誠，突破了香港社會「非政治化」的禁忌，成為一面新的旗幟，要求分享殖民體制的管治權力。中文運動亦突顯了中港兩大矛盾，其中一次中文運動的聯席會議在崇基舉行，港大學生會以害怕有人到場以民族主義煽動，突然退出。中港兩大學生互罵，走上分途。斯時，本來碰巧以「中文」為大學校名的中大，就陰差陽錯地從殖民現代化大計的設置，變成一個非殖或甚至反殖意識發展的（想像）空間。

這種以中大作為反殖的想像空間的取態，主導了不少繼後有關中大的歷史陳述，AO事件被逐漸遺忘及邊緣化。它所顯露的那種中大人的殖民地臣民心結、含混情緒被逐漸淡忘，中文大學

如何本是脫胎自殖民政府自我調適的計劃，亦一一開始被擱開。在線性歷史記敍底下，港大、中大被整裝為兩個不同的對立系統，被想像成體現不同價值，兩所大學的校風差異，亦被不斷標識為源於不同的文化。以後殖民心理分析的語言去說明，我們可以說「港大」已成「中大」的他者（other），既是競爭的對手，也是欽羨和嫉妒的對象。中大對自身認同的確認，亦在於自詡為港大的另類選擇（alternative）。

民族主義：飄泊・陽剛・功利

當時日漸澎湃的「殖民主義vs民族主義」論述主導思考，中港兩大的分別也隨之而不斷誇大，中大本質在不知不覺間易容改裝。中大根基中的「中國性」（尤指新亞書院復興中國文化的自我定位），被不斷從那種反共的飄泊中華認同（diasporic Chinese identity）置換為親共的紅色中國擁抱。中大人匆匆抹去草創時期中大自身在殖民政權面前的含混反覆，自憐自卑，拼盡一切去打造一個「火紅年代」。在所謂學運高潮的時刻，傳聞中大一名國粹派同學曾寄豪言，要「將紅旗插遍中大」。

紅色中國的出場，對孤懸「海外」，常問鄉關何處的飄泊社群來說，猶如從家鄉傳來消息，謂那裡爆發了一場原教旨主義革命。革命的爐火令人迷惑，卻足可讓那些在異地的失落心靈一洗烏氣。它除迷醉了部份急欲還鄉者，更使如我這類土生土長的英中／港大系統的逃兵與失敗者動容。在新興起的民族主義陽剛面貌底下，中大相互矛盾的歷史回憶及文化政治想像，又那怕被一再混同、互換？部份創校諸君或有南來倦客那股移置的悲情，過客的焦慮，這些落寞心境對新一代土生學子來說，本不必然會產生共鳴。然而在七十年代，在二等心結彌漫的中大，「手空空，無一物」的淒楚迷離，很快就會接上了「開了山，闢了地」的昂然奮進，雖然前一句來自反共冷戰時期的憂感徬徨，後一句卻是國粹派革命浪漫主義的濫觴。「打倒牛鬼蛇神」的囂狂，迅速將「花果飄零」的憂患情結，轉化為回歸綺夢。謎樣的中國想像，既可以是落難心境的投射，誰又能說那其實不是人類理想的烏托邦？

七十年代，未大肆擴建前的中大，山清水秀，遺世獨立，具有詩謎氣質的校園，最易讓人萌發那種強說愁情式的故國情懷，以填補那份香港知識份子固有的空虛，以故作孤高的自我形象，給予自己藉口以忘卻在急劇變動中的現實香港。於是，雖然世局紛紛擾擾，但中大人的另類象牙塔心態，反更易將熱情心智投射於千里之外的「祖國」，使中大成為所謂「國粹派」的溫床。歸國朝聖，作「革命」的觀光客，回來後以取得真經，讀懂人民日報中央指示之道而炫耀人前。縱非個個能真的做到「胸懷祖國、放眼世界」，這些偉大口號也至少可以洗滌少年境遇不濟的霉氣。

雖然當時大學校園的國粹派並非中大特

有，然而國粹派那種盲從一統，以至派性和霸氣，中大都是首屈一指，而且歷久不衰。雖然這種「火紅年代」的浮躁激進主義，在七十年代末已經潰散，但關於中大的這一系列情緒、慾望、價值及理念的投射，卻以神話化的方式縈繞不散。八十年代初關於「中大理想」的話語，雖以民主信念盡量洗滌國粹派傳統之偏執浮誇，仍逃不出將中大孤懸於水晶化的民族想像，在時代交替的關節口上，不但未能收拾理想主義解體後的價值衰頹殘局，更淪為日後回歸過渡期靠攏轉軚的功利民族主義者作嫁衣裳。

浪漫化的民族主義，使得中大人在回歸問題上恐居人後，義不容辭地一馬當先，帶頭打倒「不平等條約」。但中大人民族主義的迅速徹底質變，出現在八十年代回歸過渡期一窩蜂的「朝北望」。一方面，在日子倒數著的殖民地，自號秉承傳揚國家民族文化的大業，發揚中國文化，領世界之先；另一方面，卻以歐風美雨作為中大人的文化資本，磨拳擦掌，準備投入開放中國這個無限的市場。於是，中大的認同和歸屬，迅速揚棄其殘餘的理想主義色彩，轉變成一種獨特的社會關係和人脈網絡。中國關係，特別是前國粹派的中國關係，立即兌現為開拓個人政商前途的敲門磚。

八九十年代之交，因著六四的衝擊，以及中國徹底市場化的巨大動力，一切環繞中大的理想主義頓然崩析，四改三的最終實現，標誌著一個關於教育另類選擇的神話鬼話已徹底破滅。在回歸在即的歲月，大學體制卻給貼服地整編在如殘陽晚照的英式殖民系統中，更可謂晚節不保，亦深刻地反映出中大上下依附殖民權力體制的本質，根本與香港其他院校毫無區別。其「朝四暮三」之變，亦正好反映後過渡期香港那種缺乏政治風骨和知識分子遠見的「朝秦暮楚」。於今回歸後六年，恢復四年制之議又沸沸揚揚。是歷史開了中大的玩笑？還是中大開了歷史的玩笑？

廢墟中的中大認同

Bill Readings 在〈廢墟大學〉[1]說，大學是現代性體制的一部份，文化是從屬於民族國家的，大學的天生使命就是權充民族國家的公共空間，在其中文化得以維護發展、價值得以保衛堅持。可是，Readings悲觀地斷言，以文化商品化為特徵的全球化，正根本地動搖民族身份的相關性，大學作為民族國家文化發展和傳承基地的功能，日漸被制度化的實利主義（institutionalized pragmatism）所淘空，大學亦因此喪失作為民族社群的公共空間的資格。

可是，中大成長於一個殖民地，原本就不具備一個甚麼偉大的民族國家文化使命，我們亦大可不必重複Readings所述說的那個大學的民族文化功能日漸失落的線性敍事神話，因為從追索香港殖民末期的文化政治糾葛的逆向閱讀中，我們知道的是，它在振興國家民族文化的角色被認同之日，恰好就是它的一

些創辦者從飄泊到定居之時，而那亦正是文化理想轉化為文化資本的時刻。可是，在全球化所帶動的文化商品化大潮底下，本難真箇有落地生根、安身立命的定居，有的只是不斷的拓殖和墾伐。中大人咀巴愛說卻又虛應故事的「文化使命」（cultural mission），細說亦得從這個內在於墾殖者邏輯的「文明開化使命」（civilizing mission）談起。它是否是一種殖民主義，或是怎麼樣的一種殖民主義，就是一個有待細辯及見仁見智的問題。

但無論如何，作為一種潛意識的展露，上文所述那位中大教授以「五星級酒店」及「客棧」的對比來談論今日的大學排名，正是一種新殖民的全球化時代癥候，說明中大（以及其他院校）今日如何已是文化理想之廢墟，大學除了提供customer services 之外，已別無甚麼大不了的功用。不過，將大學比擬為廢墟，並不是說它們一無所有，因為廢墟尚非沙漠，它只是一片頹垣斷壁、碎瓦殘樑，但仍可供人一再憑弔、紀念、述說——或者建酒店。

中大作為一個特大的廢墟，可以被回憶、述說、拜祭、招魂的亡靈特多（本文也只能算是這些喋喋不休的招魂咒語的一部份）。無論是中大的「鬼故」還是神話，說起來也還是特別聳然動聽。事實上，這些傳聞故事、片刻回憶、剎那激動，不斷在耳語相傳，流通轉述，偶爾也會傳來一兩聲孤弦黯嘆，低迴半首安魂悲調。然而，不也正就是這些，還在不斷建構延續一種「中大人」的特殊身份認同，使中大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想像社群？——上文述說的調查，亦謂中大同學對中大的「歸屬感」在所有大學中最強。只是，這個客死殖民異地，急欲還鄉安葬的僵屍社群，從未有回歸一個故土，而是自始至今，仍然飄泊流散在權力、商品、慾望、激情、夢幻的全球網絡——「廢墟中大」上已經建成的，與其說像酒店客棧，不如說更像提供給這些離魂過客寄居的「義莊」。

然而，鬼影幢幢的又何只中大？如果說今日仍然希望，大學是一些可以用作交流學問、啟發識見、煥發精神意志的公共空間，我們也須明白，這些空間大都已給各類文化掮客所僭奪盤據，各建山頭。他們一身名銜，手挽各式貼滿全球機場及航空公司標記的行李箱，昂首闊步的面朝北方，準備大展拳腳，在一片片新開發的經濟文化屯墾區上開山闢地，完成英國人還未完成的工作。不過，無論是在尋利的商品大海中弄潮，還是在追逐權力的波濤中滑浪，標誌「中大人」不可磨滅的身份認同的仍是，他們雖絕非手空空、無一物，但依然會在五星級酒店，唸唸有詞的哼起中大學生會歌：「我們的神聖工作是拓荒！」

1 Readings, Bill (1996) *The University in Ruin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追憶中大的似水年華

◆ 李歐梵

原刊於《蘋果日報》，2013 年 5 月 19 日

1970年夏，我初抵中文大學任教，職位是歷史系講師。我剛剛拿到博士學位，在美國達慕斯學院（Dartmouth College）任講師，並把哈佛的博士論文完成，因為簽證問題必須離開美國。恰好此時有一個「哈佛燕京學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撥款設在中大的講師職位從缺，於是我輕易的申請到了，1970年夏，我輕裝就道，先在歐洲遨遊，中大秋季快開學前，才抵達香港。

在此之前，我從未來過香港。記得當時有一位台大外文系的老同學葉維廉在中大客座，竟然在他的一本文集中公開呼籲我離開美國回到華人地區的香港來共同為中國文化的前途效力。這一個「海妖的呼喚」（Siren′s call）對我的確有點魔力，機會難得，也從未想到香港還是英國的殖民地，大多數人說的是陌生的廣東話，就那麼來了。對於這個號稱「東方之珠」的國際大都會我一無所知，只認得兩個老同學：劉紹銘和戴天（本名戴成義），紹銘時在中大英文系任教，已經成家立業，為我這個海外浪子提供一個暫時的「家」，給我一種安全感。

記得第一天到了中大校園（當時只有崇基和范克廉樓），放下行李，就隨紹銘和宗教系的同事沈宣仁教授驅車從馬料水直落尖沙咀，到香港酒店去飲下午茶。途經窩打老道，看到這個街牌，英文名是Waterloo Road，中文名變成了「窩打道」，幾乎笑出聲來——怎麼會譯成這個不倫不類的名字？從車窗望去，路邊一排排的的洋房和店鋪頗有點「異國情調」，不禁心曠神怡，就在那一瞬間，我愛上了香港，這一個華洋雜處，充滿矛盾的小島正合我的口味。

旅美浸淫西潮多年，心中似有「回頭是岸」的感覺，因此我把剛出版的第一本雜文集定名為《西潮的彼岸》。然而思想依然西化，甚至有點左傾，略帶反殖民的情緒，我熱烈支持「中文法定運動」，認為這是一件天經地義的原則，覺得在帝國主義的殖民地為中華文化而奮鬥，更有意義。香港對我而言就是一片自由樂土，既無國民黨的「白色恐怖」，又在共產黨的「鐵幕」之外，還有哪一個華人地區比香港更自由？於是，我變成了一個徹頭徹尾的「自由主

義」者，在統治者的眼中我當然不是良民，但又不是一個顛覆社會安定的「革命分子」，雖然一度有此嫌疑，因為我後來寫了一篇批評中大制度不公平的文章，竟然引起軒然巨波，鬧得滿校風雨。

思想自由是我堅信不疑的基本價值，在學院裡更應如此。於是，在我講授的中國近代史課上，我故意使用三本觀點毫不相同的教科書：一是我在哈佛的老師費正清（John K. Fairbank）寫的，一是台灣學者（記得是李守孔）寫的，一是中共的著名歷史學家范文瀾的著作；三本書的政治立場各異，我讓學生展開辯論，不亦樂乎。我講課時當然用國語（當時在香港尚無「普通話」這個名詞），學生給我一個綽號：「北京猿人」——「北京」指的當然是我的標準北京官話，「猿人」呢？我自認是恭維的名詞，因為我軀體雄偉，比一般學生——特別是女學生——高得多。

因為年歲相差無幾（我剛過三十歲），在課堂上我和學生打成一片，毫無隔閡。講課時看他們的表情，彷彿似懂非懂，也可能是膽怯，於是我進一步誇下海口說：「三個月內我要學會用廣東話講課，但你們也必須學會用國語參加討論！」這場賭注我險勝：三個月後，我竟然用蹩腳的粵語公開演講，題目是關於知識分子和現代化的問題，我的觀點完全出自金耀基先生剛出版的一本同名的書。我一口氣用廣東話講了二十多分鐘，最後在學生一片笑聲中還是改用國語講完。但是在課堂上，學生依然故我，本來會講國語的發言比較踴躍。

記得當時學生可以隨意跨系選課，所以我班上也有哲學系和中文系的學生，我因此有幸教到幾位高足：本系的二年級本科生洪長泰思想成熟，在《崇基學生報》上寫長文評點美國各著名大學的漢學研究，絕對是可造之才，畢業後順理成章進入哈佛攻讀研究院，卓然有成，現在是香港科技大學的名教授。關子尹是哲學系勞思光教授的得意門生，也來選我的課，又是一個天生的深思型學者，如今是中大哲學系教授，剛卸任系主任職位。另一位新亞的學生郭少棠選過我的「俄國近代史」的課，他旅美學成歸國後回母校任教，曾被選為文學院的院長，現已退休。現任院長梁元生也是我當年學生中的佼佼者，我剛開課不久，他就以學生會長的身份邀請我公開演講魯迅，後來我把講稿寫成長文在《明報月刊》發表，就此走向魯迅研究的不歸路。

現在回想起來，我自己的學問其實並不扎實，但教學熱情，思想較為新穎，所以頗得學生愛戴。記得我第一年教的是中國近代史，第二年教的是中西交通史。文史哲不分家，我不自覺地用了不少文學資料，更偏重思想史和文化史。崇基歷史系的老師不多，大家相處無間，系主任是羅球慶教授，人極熱情，對我這個後生小子十分照顧；還有一位來自美國Temple大學的Lorentas教授，

我私下叫他「獨眼龍」，因為他一隻眼戴了黑眼罩。另一位屬於聯合書院的王德昭教授更是一位謙謙君子，我有時會向他請教。新亞的中文系和歷史系則大師如雲，我只有在三院歷史教授聯席會議上見過面，談不上深交。在會上我的工作是口頭傳譯，最難纏的反而是一位不學無術但熱衷權力的美國老教授（姑隱其名），他老是在會上問我：“What did they say?” 生怕這幾位新亞的史學大師發言對他不利，其實他們何嘗把他看在眼裡？

當時中大正處於整合的時期：崇基、新亞、聯合三院合併為一間大學。我個人反對全盤整合，認為各院應該獨立，但可以聯合成像牛津和劍橋形式的大學；然而大勢所趨，我這種自由主義的教育模式當然和中大受命成立的構想大相逕庭。我最敬仰的是新亞的傳統和精神，也覺得崇基背後的基督教教育理念有其歷史傳統，可以追溯到清華和燕京。現在反思，這是一種徹頭徹尾的理想主義，而且基於我對中國教育傳統的理解：既然名叫「中文大學」，就應該和殖民主義的香港大學模式截然不同。我在課堂上和課外與學生交談時，都是討論大問題，例如中國文化的前途，在香港作為現代知識分子的責任等等。外在的政治環境當然有影響，但當時香港的左右派的文化角力是公開的，我和雙方都保持友誼關係。然而學院內自成一個「社區」（community），和外界保持距離，至少我自己在教導學生時，鼓勵他們超越目前的政治局限，現在依然如此。理想主義的壞處是不切實際，但也有好處，就是可以高瞻遠矚，尋求將來的願景。校園是一個最「理想式」的社區，是一群甘願犧牲物質享受和名利而熱心教育的「知識人」組成的。這一套思想本身也是一種教育的理想主義，然而我至今堅信不移。只不過面對當今功利為上的「官僚主義」操作模式，顯得不「與時並進」了，然而沒有理想和願景的教育制度，到底其辦學的目的又何在？

當年的中大，就是建立在一種理想上，每個人對理想或有不同見解和爭論，然而那畢竟還是一個理想的年代。追憶昔時的似水年華，當然不免把過去也理想化了，但是具體的說，當年的中大校園生活還是值得懷念的。七十年代初的新界正在發展，但還保持鄉村的純樸風貌。我的廣東話就是有時到附近鄉村買菜購日用品時和村婦交談學來的；在大學火車站買車票時也順便學兩句；清掃我們辦公的大樓（早已不存在）的工友更是我的朋友。我住在崇基教職員宿舍的一棟小公寓（現在依然「健在」），和女友可以到吐露港划船，向敬仰的老同事如勞思光先生請教時，則到山頂的一家西餐廳「雍雅山房」喝咖啡。總之，對我來說這一個「中大」就是一個「樂園」，我在此如魚得水，樂不思蜀，根本不想再回美國任教。然而偏偏有一天收到普林斯頓大學一位教授的一封信，請我到該校任教。我不想走，反而幾位老友勸我走，我被說動了，1972年初，還剩下一學期就匆匆

離港，「中西交通史」未完的課程，由三位老友代課：胡菊人、戴天、胡金銓，可謂是「頂尖明星陣容」，校方竟然不聞不問，這種自由尺度，在今日中大難以想像。我至今對崇基校長容啟東先生心存感激，他對我的容忍態度來自何處？基督徒的寬恕心？當年北大校長蔡元培的榜樣？我不得而知。當然不少中大高層人士聽說我要走了，可能也暗自高興。

這一段個人回憶，只能算是我個人的心路歷程的一小部份。因為今年（2013）適逢中大建校五十周年紀念。中文系向我約稿，遂成此篇。

回憶大學老師・一
入學記

◆ 雷競璇

原刊於《信報》，2013 年 8 月 10 日

1970 年我進入中文大學，成了新亞歷史系學生，這事說來有點偶然。

中大成立時實行聯邦制，三間學院獨立性很強，各有自己的一套，校舍在不同地點，教職員、學生之間相互往來很少。這種情況一直維持到馬料水的校園啟用，李卓敏校長強力推行中央集權，才發生根本變化，是七十年代中後期的事情。

我中學讀的是中文中學，畢業時別無選擇，只能投考中大，拿到入學試成績後，要分別向三間學院申請。我是中文、歷史、地理等科都考得不錯，入讀中大沒有問題，但還要盤算一下，報讀哪一間書院和哪一個學科呢？

中學時有一位中文科老師對我青睞有加，他是聯合書院中文系的畢業生，之後和任教聯合中文系的教授李棪有來往，李棪是前清探花李文田的公子。這位老師看到我中大入學試中文科考得 A 等，很高興，鼓勵我到聯合讀中文，還熱心地和李棪說了。我很感激他這樣厚待，但心裡不大願意，聯合書院座落香港島，我到中學畢業為止渡海到港島也沒有幾次，感到陌生，聯合校舍又細小，不怎樣吸引。於是唯唯諾諾，準備最後別無選擇，才到聯合吧。聯合搬遷到馬料水之後，原來的校舍變作一間小學，當時大學之大，可見一斑。

報讀中大，要經過面試，面試次序按照成績的高低，因為僧多粥少，各書院和各學系一般在第一天的面試就收足了學生，後來的沒有機會了。我按照考得的成績，分別申報了崇基地理系、新亞歷史系和聯合中文系，都得到在第一天早上面試的機會。我決定先去崇基地理系面試，一來崇基的校舍吸引，有個大運動場，當時我熱衷運動，在田徑方面有點成績，二來覺得地理學有現代感，不像歷史、中文那樣子熟口熟面。誰知面試時見到的教授是洋人，我小學中學學英文都是紙上談兵，口語說來結結巴巴，這位洋教授也厚道，見我其他科目成績不錯，勸諭我趕緊到其他書院面試。我也就馬上乘火車從馬料水跑到土瓜灣，在新亞歷史系面試，主持面試的是孫國棟老師，說廣東話，這好辦得多，信心也恢復過來，當時越戰正打得激烈，我記得孫師問了我對這場戰爭的看法，我根據閱報所得，依樣葫蘆說了一通，得到取錄，成了新亞歷史系的學生，不必渡海到聯合中文系再謀出路了。後來我在法國時竟然讀了非洲政治，是更大的偶然，情節記載在《窮風流》這本小書裡。

回憶大學老師・三
李卓敏校長

◆ 雷競璇

原刊於《信報》，2013 年 8 月 9 日

李卓敏是中大首任校長，1978 年退休，我在學時和他的接觸相當多。事緣我擔任過中大學生會的副會長和會長，不時因事到他的辦公室見面。

不過，和李校長的關係，恰當的形容詞是「緊張」。當時大學生反殖意識濃烈，1972 年 3 月，香港大學學生刊物《學苑》刊登馮可強的文章，通過歷史考察，說明港大是為英帝國利益服務的大學，同月，《中大學生報》也刊載一篇題為〈中文大學的本質〉的長文，從中大成立的背景、校董會的結構到政府的資助和控制，說明中大也是一間殖民地大學。於是，在我的腦海裡，李校長屬於殖民地大學政策的執行人，站在我們的對立面，對他也就沒有甚麼好感。衝突最嚴重的一次，是 1973 年年底的宿舍事件，當時保釣已經結束，反貪污捉葛柏運動也無以為繼，學生活躍分子的精力要另找出路發洩，不知怎的轉移到學生宿舍不足的問題，以此為題向校方發難。某次晚上集會結束後群情仍然激烈，要操上校園馬路對面山崗上的校長住宅，找李校長理論。我作為學生會會長，帶領隊伍前往，李校長穿著睡袍出來和我們見面，擾攘一番之後，學生才離去。過了三數天，李校長請我到他辦公室，說花了很大力氣，從駐港英軍處找來一批材料，在校園內構建幾個軍營式的建築物，作為臨時學生宿舍。我聽他說完，冷淡地回應了一下，沒有說「多謝」。

不過，另一次對話我卻記憶深刻。當時宋淇是校長的特別助理，他說受李校長囑託，請我到他辦公室談談。他對我說，李校長讀了學生報批評中大是殖民地大學的文章，感到很痛心，在英國人管治下辦中文大學很不容易，他希望我們理解他的一片苦心。宋淇還婉轉地說，很多中大學生中國文化修養薄弱，國語不會說，中文也沒有寫好，卻恣意批評校方為殖民主義服務，意思是希望我們能夠反省。我聽宋淇說話時，不以為然，但後來隨著年歲和經歷的增長，對這番話的體會不一樣了。

1976 或 1977 年時，李校長到法國波爾多大學訪問，我當時正在那裡讀書，但和他沒有見面。另一位也在波爾多大學讀書的張姓中大校友見到李校長，告訴他我也在當地，他回答說：「歷屆學生會會長畢業後和他都有聯擊，唯一例外是這位姓雷的學生。」

1991 年李校長在美國逝世，當時我已回到香港工作。中大舉行追悼會，我參加了。

回憶大學老師・七
牟宗三上課（上）

◆ 雷競璇

原刊於《信報》，2013 年 8 月 30 日

在農圃道新亞老校舍就讀過的學生，對牟宗三應該印象甚深。當時校園細小，不時遇上牟先生。他住在附近，回來校園很方便，連他的兒子也流連新亞，跟著比他高大得多的學生一起打籃球。牟先生長得瘦削，蓄短髮，顴骨高，架著眼鏡，很容易辨認，尤其夏天時他常常穿白色的長衫，手指夾著香煙，腳步緩慢，一派飄渺優游的味道。

牟先生喜歡下圍棋，而且棋癮很大，不時在圓亭底層石凳上和學生對弈，或者遇到有人在那裡下棋，他駐足旁觀，直至終局。余英時是牟先生的棋友，牟 1995 年仙逝後，余為文追憶，說牟的棋力其實不高，但深好此道，真能做到「勝固欣然，敗亦可喜」，只是說「可喜」的時候多，說「欣然」的機會少。至於新亞圓亭，連同旁邊草地上的一株鳳凰木，都是六七十年代新亞學生記憶中長留的風景。

我是大學最後一年選修牟先生的「歷史哲學」課的，但之前和他有過一些接觸，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找他簽名，事緣當時因為不知甚麼運動有學生被檢控，大家發起簽名抗議，我拿著抗議聲明和簽名表格在圓亭旁的通道上見到牟先生，向他說明並請他簽名，他聽了之後帶著微笑慢吞吞地說：事情已經到了法院，本來不應該干擾的，要尊重司法獨立，但學生的行動出於正義感，也應該支持，他還說：這種聲明發出去其實沒有誰真會留意，然後就簽上了名。當時願意支持學生這類抗議聲明的老師很少，這件小事也就令我記憶深刻。他也說得對，七十年代時傳媒報章將我們這種帶頭抗議的大學生稱為「搞事分子」，發出去的聲明泥牛入海，不外就是為自己壯壯膽而已，這和如今報章對大小抗爭都報道唯恐不及，真有天壤之別。

牟先生當時擔任新亞哲學系的系主任，但我印象中他和行政工作好像拉不上關係，沒有聽說過他是甚麼委員會成員之類，反而在一些校政會議上我遇見過也是屬於哲學系的唐君毅先生，但唐先生的口音極重，我聽不明白他的說話，四年大學始終沒有選讀他的課，這是原因之一。哲學系當時還有徐復觀先生，我一年級時糊裡糊塗上了他的課，他那湖南音濃重的國語我聽不懂，只能將他寫在黑板上的內容抄到自己的筆記本上。至於牟先生的國語，幾乎全聽明白，這和他從前在北大讀書可能有關，因為同樣是北大學生的王德昭，他的國語我們聽來也沒有問題。

回憶大學老師．八
牟宗三上課（下）

◆ 雷競璇

原刊於《信報》，2013 年 8 月 31 日

昨日談牟先生，只是前言，今天入題，說說當年他上課的情況。

我主修歷史，副修哲學，我自問讀歷史還可以，因為記性不差，但讀哲學完全不是合適材料，對於抽象問題總是「老鼠拉龜」。大四時看到牟先生有一科「歷史哲學」，有「歷史」兩字兼且他還出版了一本同名的書，就報讀了，於是上了他一整年的課。

過了這麼多時間，當時究竟讀過甚麼，都忘掉了，只記得楚狂接輿之類的小故事，反而牟先生上課的情景，倒有不少記憶，恐怕這種風格現在很難找到了。

除了棋癮大，牟先生的煙癮也大，他到達課堂，先坐下來，拿出香煙，點火抽上一根，吞雲吐霧讓情緒沉靜下來，有時還將煙盒遞向我們，示意我們也抽，當時大學生為了表示自己有性格，抽煙的不在少數，但這樣子在課堂上當著老師，還是不敢接過來抽。煙抽了好幾口，牟先生才開始講課。這樣子理所當然地抽煙的，我後來在法國還常常見到，在波爾多大學指導我論文的老師 Lavroff 尤其身手不凡，他在講台上口叨著煙，雙手將一張紙摺成方形，作裝載煙灰之用，摺得工整美觀。現在香港所有大學都禁煙，而且禁得嚴厲，我覺得未免太清教徒，失去不少樂趣。

牟先生說話緩慢，上課不帶書本或講義，相當天馬行空，這是整年的課，悠長兩個學期，也不必焦急。因為時間充裕，牟先生不時發點題外議論，雖然點到即止，但不少卻在我的記憶中留存下來。例如當時中蘇關係緊張，他有一次不知怎地談到中國未來，說一定要和日本、蘇聯兩個強鄰打一場，方能分出高低，日本我們打敗過了，還欠蘇聯，是免不了的。又有一次談論到復興中華文化，他說古人的「射人先射馬」很對，這「馬」不是別的，是馬克思，不射倒他，無法復興。又有一次說到他認為一個人三十歲之前不當共產黨沒希望，三十歲之後還當共產黨也是沒希望，我們當時激進左傾，聽到他這樣說，表示只同意他前面的一句，他笑著回答：等你們過了三十歲再說吧。教這一科時，牟先生六十四歲，再過一年，他退休離任了。

這一科我考得的成績很好，下學期開課時牟先生發還上學期考試的卷子，我看到得甲等，滿心歡喜。接著牟先生慢吞吞地說：現在的大學生，中文寫得愈來愈糟糕，寫得好一點的，已得甲等。於是心裡苦笑，知道我其實是靠中文寫得暢順蒙混過關的。

回憶大學老師・十
余英時在新亞（下）

◆ 雷競璇

原刊於《信報》，2013 年 9 月 6 日

余師當新亞院長的兩年，遇上重大變化，進退維谷。因緣際會，我也躬逢其事。

中大1963年成立後，行聯邦制，三間書院相當獨立，各有體系，教員招聘、課程開辦等都在學院權力範圍之內。但這種架構未免疊床架屋，而學院之上有大學，政府的資助是撥發給大學的，於是，大學和書院之間滋生矛盾，也就無可避免。1973年時新亞、聯合都已遷到馬料水，三院集中，而中大成立亦已十年，李卓敏校長正式著手處理這個行政架構問題，剛巧我在這一年擔任中大學生會會長，李校長一再和我談及他有關 pooling of resources 的想法，在談話中夾雜點英文，是李校長的習慣。這一年，余師也到任，他之前是否知曉中大正處於轉折點上，我不清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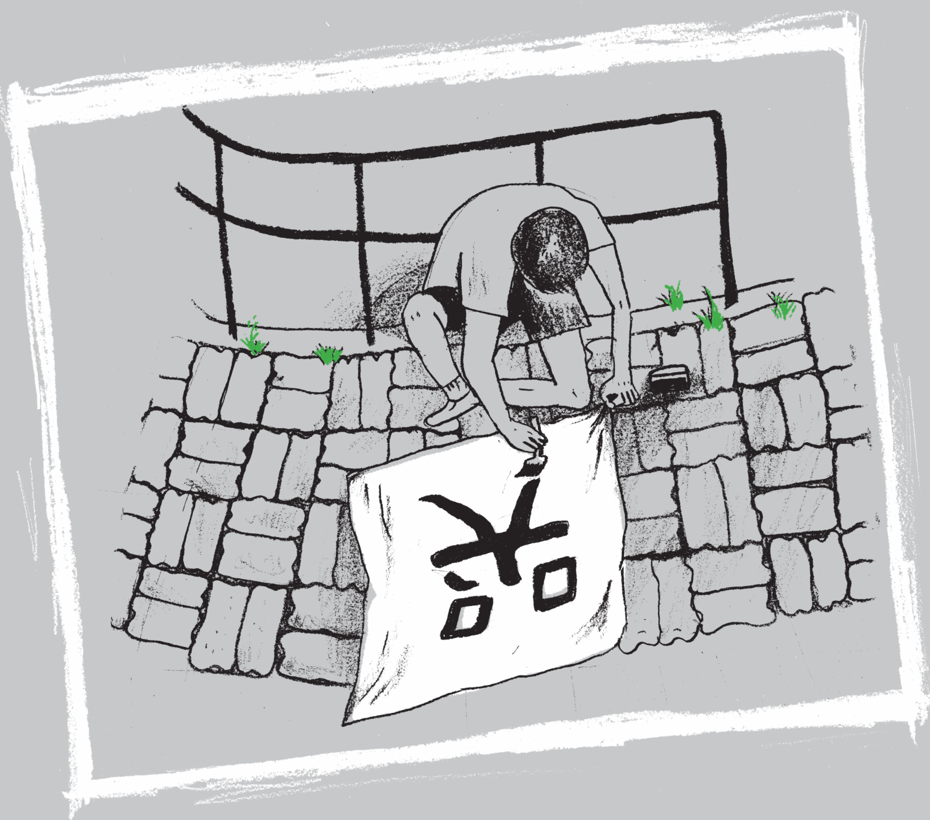
1973年底，李校長成立了一個委員會，研究中大行政架構問題，主席是鄭棟材，當時是副校長兼聯合院長，余師當然也是委員，我因為是學生會會長，成了委員之一，開始時是委員會內唯一的學生，到1974年初齊禧慶接任學生會，才多了他作為學生委員。對於大學行政架構問題，我雖然知道茲事體大，但自己既沒有看法，也不感興趣，而委員會的文件很多，幾乎全是英文，讀得我很苦，加上快將畢業，開始為前途惆悵，所以，在委員會內，我只是旁觀，沒有發言，拖到1974年5、6月，我就以畢業離校為藉口，辭去委員職位。當時中大校方覺得我有始無終，甚不高興。至於余師，記憶中他在會上發言不多，對中大情況看來還不熟悉，只偶然提供美國大學的情況讓大家參考，會議進程，都由鄭棟材操持。不過，我這裡說的，只是首半年個人所見情況，往後如何，非我所知。

委員會後來發出報告書，大學據之提請政府修改中大條例，1976年在立法局通過，書院的學術行政權從此轉移中大本部，聯邦制結束。因應這個變化，新亞高層激烈反對，校董會集體辭職以示抗議。余師1975年離開新亞時，正值這場角力的高潮期。昨日提到余師的《論戴震與章學誠》，書中有一篇自序，寫於1975年九月，其中的一段話，可作為上述歷史的見證，如下：「現在回想起來，我當時每晚撰寫此稿其實並無要從事甚麼嚴肅的著述工作，我不過是藉文字工作來忘掉白天行政雜務的煩惱，以保持內心的寧靜而已。過去這一年也許要算是我生平最多紛擾的一段歲月，而此稿的撰述適與之相終始。」

卷二

國際化事件
保樹立人事件
情色版事件
烽火台事件
民主女神像事件

國際化事件



前言

不只守護傳統，不只接軌國際
——國際化事件大論爭

◆ 杜振豪

背景

2004年7月劉遵義上任為中大校長，「國際化事件」在2004年底爆發。一般媒體均會將此理解為劉遵義校長的新政，但事件其實涉及香港整個高等教育政策的改變。2003年12月，特首董建華出席中大四十周年校慶晚宴時，首次公開提出希望香港能成為「亞洲教育樞紐」。2004年1月，教資會發表《共展所長　與時俱進》報告書，明確提出香港應該扮演「區內教育樞紐」，推動本港經濟及社會發展，其中預計「各院校的非本地生人數將顯著增加，其中大部分將是從內地來港的學生。」由此可見，「國際化事件」的出現，除了符合劉遵義追求大學排名的競爭思維，同時也是迎合高等教育產業化及大幅增加非本地生的政策。

事件經過

2005年1月，中大學生會從非正式渠道，得悉校方要求所有收取非本地生的學系，必修科必須提供英語授課。基於資源所限，學系未必能做到中英分班，校方要求如同指示必修科改為英語授課。事關重大，學生卻蒙在鼓裡。於是，中大學生會連同學生及校友組成「捍衛中大理想小組」，在文化廣場懸掛白底黑字的「哭中大」布幡，貼上大字報，公開邀請師生校友聯署「哭中大」聲明[1]。

「捍衛中大理想小組」的行動一石擊起千重浪，校方立即以電郵向師生解釋非本地生及教學語言的政策，但無改異議聲音的擴大。不到兩星期，「哭中大」聲明已收集得八百人聯署。令人注目的是，除了學生、校友、兩岸三地學者，「哭中大」聲明更得到不少在任教授聯署支持。其後校方再次回應，廣發電郵指批評聲音為「誤解」[2]，同日中大學生會迅速撰文反駁[3]，形成校園罕見的輿論戰，同時逐漸擴散至主流媒體。

兩日後，校長劉遵義發表〈校長新春家書〉[4]，繼續回應各方質疑。翌日，明報刊登〈要國際化，除了英語，還要開誠和尊重〉[5]，作者署名「不想沉默的中大教師」，批評校方假諮詢。文章見報後，校方輿論形勢全面向下，諮詢不足成為反對聲音的最大公約數。

2月24日，校長劉遵義出席「校長會見同學」論壇，首次現身回應國際化事件的質疑。文化廣場逾200名師生校友出席，在場絕大部份出席者均炮轟校方假諮詢，唯一表態支持校方的台下發言者王維基（時為中大校董），則認為新政不會影響雙語政策，批評學生為何不信任校方。劉遵義回應時強調，新政策只會影響3–4%課程，拒絕暫緩計劃。劉又指，校方將成立雙語政策委員會，委任前校長金耀基為主席，諮詢師生校友意見，半年後提交報告。

這次論壇以後，爭議暫時告一段落，但仍偶發餘震。同年3月，文化廣場的壁報板忽然張貼了一篇名為〈笑中大〉的文章，署名為「幾位支持『國際化』策略的學生、校友」[6]，批評中大學生報的號外使用廣東話。翌日，范克廉樓地下出現一大疊〈笑中大〉印刷本，並指文章已發表於bbs.oal.cuhk.edu.hk《人間仙境》論壇[7]。同年4月，中大校友評議會舉行論壇討論「國際化事件」，學生會代表胡浩堂等人要求進入會場解釋學生會立場，但遭校友評議會常委嚴詞拒絕，期間被校友彭玉榮威嚇"I will use all my power not to employ you!"[8]。

2月24日論壇以後，媒體關注消退，一方面是因為劉遵義公佈成立雙語政策委員會，似乎是重新諮詢師生校友意見，一方面是劉遵義聲稱新政策只會影響3-4%課程，令人認為反對聲音是小題大做。不過，在當日論壇後，《中大學生報》訪問時任中大教務長的蘇基朗教授，他卻以各學系還未決定下學年授課語言為由，拒絕提供資料。不只「3-4%」的推斷根據一直成謎，新政策也沒有停下來。只要招收非本地生，便須提供足夠畢業的英語授課課程（儘管六成以上的非本地生均為內地生）[9]，這種規定一直沿用至今。

至於雙語政策委員會，最後則遠遠超出預定的半年諮詢時間。直至2006年9月7日，才正式公佈雙語政策諮詢稿，諮詢期為兩個月。然後，再花了大半年時間修訂，2007年9月12日才正式將雙語政策報告書提交予中大教務會[10]。報告書提出授課語言由學系系務會按不同因素決定，但特別強調課室講課語言應按學科性質而決定：一、凡是普世性高，學術載體以英文為主的科目，宜用英語講課；二、凡是較多強調文化特殊性，而學術載體以中文為主的科目，宜用中文（粵語或普通話）講課；三、凡涉及香港社會、政治、文化等科目，宜用粵語講課。

報告書的三層原則被不少論者垢病[11]，但得到馬傑偉教授推崇。他讚揚報告書「把粵語作為學術語言視之，給它一個不亢不卑的位置」，是「有勇氣」之舉，「保存了中大多年以來重視本土的傳統」[12]。與此同時，報告書也建議了一些「保育中文」的措施，並建議在教務會下設立「優化雙語教育委員會」，負責督導及監察中大雙語政策。可是，根據我們在2013年的訪問，優化雙語教育委員會的工作恐怕是名過其實[13]。

中大教務會接納雙語政策報告書的建議後，中大學生李耀基在校友關注組的協助下，於2008年1月正式入稟高等法院，申請司法覆核《香港中文大學條例》。司法覆核的主要理據為，中大於2007年10月通過的雙語教學政策，違反《香港中文大學條例》有關「中文為主要授課語言」的規定。根據校友關注組列出的〈中大各科目中英授課比例簡表〉，3,008個院系科目中，僅以中文為授課佔634（21.08%），僅以英語授課佔1,548（51.16%），中英並用佔461（15.33%）。訴訟纏擾了兩三年，最後高等法院上訴庭判決指出：「教務會獲授權制定中大的語言政策，不受以中文為主要授課語言的限制；換言之，教務會有決定一種或多於一種主要授課語言的權力。」2011年9月28日，李耀基一方放棄上訴，司法覆核案正式結束。從2005年開展的中大教學語言論爭，也正式劃上了句號。

校方：與國際接軌

國際化事件歷時數年，爭辯論題殊多，後來者要把握來龍去脈並不容易。雖然本輯命名為「國際化事件」，但當年的反對聲音通常批評校方政策為「偽國際化」，或稱為「英語化」。不同的命名方式，自然突顯了不同的側重點。校方強調轉換英語授課的政策，是中大走向國際化的必要措施。因此，增加英語授課究竟是有利「國際化」，抑或純屬「偽國際化」，無疑是整場辯論中最重要的焦點。

劉遵義在〈校長新春家書〉中強調中大要與國際接軌，這種「接軌」有三層意思：一、中大要為香港培育「中英雙語俱佳」的人才，否則香港將「失去競爭優勢，被急速冒起的內地城市取代」；二、英語是國際學術交流的主要媒介，欠缺英語便「難以吸引優秀的學者和頂尖的學生」，「沒有足夠的條件去創造新知，服務社會」；三、增加交換生名額及招收非本地生，便須提供英語授課。

「接軌」的第一層意思，與特區政府宣揚的發展論述絲絲入扣。香港須配合中國發展，作為中國面向國際社會的窗口，同時也要與內地城市競爭，避免「被邊緣化」——這些說話，香港人當然耳熟能詳。自反高鐵運動以降，近幾年香港社會的政治矛盾愈來愈嚴重，針對發展主義的反省也開始普及。一方面，我們開始思考，這種強調不斷與人競爭的經濟發展，是否有利於香港？如果有利，是哪些人得益？退一步說，假如香港相對於內地城市有甚麼競爭優勢，只怕也是資訊流通的環境與相對健全的法制，而非中英兼擅的人才。

「接軌」的第二層意思，本輯多篇文章均有討論。葉蔭聰的質疑簡單直接：「讓學生靠近，或所謂接軌國際知識生產中心，是否大學教育的目的？[……] 究竟香港有多少學生有機會進入國際知識生產中心？更重要的問題是，學術實踐就是要向那英語世界的知識生產中心靠攏？」[14]陳光興及錢永祥進一步指出，台灣高等教育加強學術評鑑機制（如SSCI及A&HCI）與資源分配的連

結，包括國際化、英語化等要求，應該放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脈絡來理解。冷戰結束後，以美國為主導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動力，推動學術生產方式發生巨變。全球競爭的市場導向成為支配的力量，學術生產方式也走向私有化及市場化，結果導致後進國家成為美國學術生產中心的附庸。兩位學者提醒：「我們到底是活在一個單一的、英語的新殖民世界，還是在多元文化、承認異質的後殖民世界？全球化是否只是意味著美國化，剷除、遺忘所有非英語的文化？」[15]

「接軌」的第三層意思，也是校方推銷英語化政策時朗朗上口的理由：學系要招收非本地生，便須提供足夠的英語課堂讓他們順利畢業，否則便是不負責任。招生政策本為事件爭議的關鍵，但反對聲音較少論及。招生政策的細節和權限，及其與資源分配的關係，不同學系可能略有差別，一般學生和校友不甚了了，少數知悉內情的教授則礙於身份不便公開。校方往往強調，是否招收非本地生由學系決定，「學系自決」於是成為校方的擋箭牌。不過，系務會的決策機制是否民主，權力關係是否平等，卻是一個很大的問號。學系招收非本地生，會額外得到多少資源？這些資源對學系運作有多大影響？這些外人難以得知的情況，都是懸而未解的問題。此外，招收非本地生與英語授課的必然關係，也值得仔細考究。中國語言及文學系收取內地生的條件，是提供普通話課堂而非英語課堂。然則，校方是否允許其他學系以相同條件招收內地生？進一步而言，如果學系明確提出非本地生的入學資格為熟諳粵語，並須通過特定考試，校方是否允許學系招收非本地生而不必提供大量英語課堂？

反對聲音：守護中大傳統

至於反對聲音的論述，基本上可以〈哭中大〉聯署聲明為代表。〈哭中大〉訴諸師生校友對中文教育傳統的認同，痛斥「國際化」政策的真正目的為賺錢，並且強調母語教育的教學效益，提醒英語霸權對非英語文化的侵蝕。在運動策略上，〈哭中大〉劃定的論述戰場相當漂亮，大部份關於「國際化」事件的討論均是由此延伸。尤其是背棄中文教育傳統，這種「拆招牌」的舉措牽動了不少老校友反感。校方顯然也相當顧忌，極力將中大創校的中文教育使命，重新打造為「雙語教育傳統」。其後，「捍衛中大理想小組」及立場親近校方的曾榮光教授，甚至撰文辯論錢穆與唐君毅對中大理想的真正立場[16]。

相對於考究中大創校傳統是「中文教育」抑或「雙語教育」，傳統能否適應時勢可能是更重要的問題。立場親近校方的馬傑偉教授，指出中大創校時強調中文教育，是「回應當年大學教育對中文的壓抑」，也認同這是「回應殖民英語霸權的措舉」。然而，他認為九七後歷史條件不再，「香港面對中國化與全球化的挑戰，不得不對英語、普通話、廣東話作深刻的反思與再定位」[17]。言下之意，便是認為中大傳統需要迎合時勢而調整——或者用校方最愛的修辭：「優化」。

馬傑偉認為，九七後香港「應與全國的中國人作有效和直接的交流」，因此廣東話無法再「穩坐語言霸權的位置而自絕於全國以普通話為主的語言環境」。廣普之爭姑且不論，不得不英語化的「歷史條件」又何以解釋？如果說港英殖民政府面對全球化及中共政權的挑戰，尚且存在維持中文高等教育的歷史條件；香港「回歸」中國後，反而歷史條件不再，需要大幅削減中文高等教育的生存空間，豈不是歷史的吊詭？

無論如何，如果我們必須堅持傳統，理由絕不應該因為它是傳統，而是因為這個傳統本身對今天社會依然饒富意義。我們沒理由反對檢視傳統是否適用於今天形勢。問題在於，以中文為主的高等教育，是否已無存在價值？除了母語教學的教學效益外，梁文道指出了「知識循環」的重要性：「服務社會還包括要把大學裡面開發出來的知識和觀念，透過一代又一代的學子和教師們的演說寫作，流播向社會各界。」學術語言與日常語言的割裂，將會在學院與社會之間，造成知識互相循環的嚴重障礙。若要「把外來知識轉化成本土資源」，中大便須肩負「中文國際化」的使命[18]。

馬國明贊同梁文道的思路，嘗試鋪陳事例補充「中文國際化」的迫切性：「在英語的語境裡除了用 country，nation，kingdom 這些字眼來表達國的意念之外，更有state這個同時表示境界或狀況的字眼。『國』字頂多只有 country 和 kingdom 的意思，完全沒有state或境界的意義。[……]中文的語境硬將國和家兩種不同的領域扯在一起，才會出現『沒有國、哪有家』這種望文生義的見解。」[19]現代政治哲學的概念源自西方，漢語往往沒有相應的概念，因此華文社會理解這些概念容易出現不同程度的偏差。坊間經常流傳「中文不夠準確」的論調，正是源自於此。然而，問題並非漢語在本質上無法準確把握概念，而是現代學術的概念大多發軔於西方，轉譯成漢語自然份外困難。以漢語為母語的全球人口，遠遠多於英語。只有積極實行「中文國際化」，才有可能破除「中文不夠準確」的詛咒，擺脫跟隨西方學術尾巴的局面。

普通話 vs 廣東話

在「國際化事件」的論戰中，是否贊同英語化一直是運動的主要矛盾。雖然錄取內地生是推行政策背後的重要原因，但校方無意大幅加重普通話授課的比例。[20]因此，普通話與廣東話的取捨，在論爭中遠遠不如英文與中文的對立來得尖銳。然而，由於反對聲音不時援引民族主義色彩的中大傳統，同時又強調母語教學的教學效能，於是兩者之間的論述縫隙，常被傾向校方的論者質疑。

例如批評學生會「獨尊廣東話」的 Eliza W. Y. Lee 便指出，創立中大的成員書院，並非推崇廣東話文化，而是要宏揚中華文化。廣東話的強盛地位是殖民主義的結果：港英政府忽視普通話教育，導致香港人無法與大多數中國人口直接溝通。因此，假如站在反殖的立場，

應該大幅加重普通話作為授課語言的比例。同時，她也提醒廣東話霸權地位的形成過程，壓抑了其他中國方言的生存空間，暴力程度不弱於英國殖民主義。所以，她提出「如果解殖的邏輯是指，完全拒絕強加在我們文化的東西，那麼我們不是應該完全採用普通話以重尋『中國性』，便是應該正視所有語言社群的權利和傳統，重尋多元文化的根本。無論如何，廣東話霸權的合法性都應該被質疑。[21]」

〈笑中大〉作者的部份觀點與 Eliza W. Y. Lee 接近，但表述方式較粗糙。文章嘲笑中大學生報號外以口語直接引述同學提問，並批評中大學生會曾指內地學生更「看不起自己的語言」[22]，認為反對聲音只是捍衛一種「區域性語言」，而非「代表中國文化」的中文：並且認為授課語言只是「教學形式」問題，與是否「弘揚中華文化」無關。論者「一個人」則批評，這種論調高舉「規範、純淨」的語言觀，不可能達致「多元文化、開放視野」的理想；同時強烈批評，「假若你們對待香港本地文化是持蔑視態度，欲以某種自命正統的規範取而代之[……]你們就已扮演了殖民者的角色。」

鄧小樺援引學者周蕾回應Eliza W. Y. Lee：如果香港的處境介乎於「殖民者與殖民者之間」，解殖運動的語言便應屬建構港人身份認同的粵語，而非代表中國官方正統的普通話。作者同意應該警惕粵語霸權的問題，但同時提出愈來愈多中學採用普通話教中文，「滅粵」行動已悄悄展開。雖然粵語在香港相對於其他方言佔據霸權位置，但在「中國－香港」的政治圖景下，普通話相對於粵語依然非常強勢。

十年過去，「普教中」情況已愈來愈普遍，並且正式成為教育局的政策目標[23]。近年香港的本土主義興起，語言政治被提上議程，港人對繁簡之爭及粵普之爭愈來愈敏感。假如「國際化事件」發生在2015年，輿論焦點很可能從中英之辯，轉為內地生招收政策及普通話授課語言比例。〈笑中大〉一文，也會因其否定粵語地位的論調及挑釁姿態，被媒體大造文章。當廣州也出現數千人上街的撐粵語運動，2005年的粵普小論戰可能已落後形勢。令人遺憾的是，當年粵普辯論的出現，基本上是為了回應英語霸權的質疑；今天粵普之爭遠為激烈，英語霸權的問題反而隱沒不見。

結語

「國際化事件」可能是過去十年中大最重要的校政爭議，它不僅為劉遵義與師生校友六年角力揭開了序幕，也不僅是中大理想的爭奪戰，更是香港社會罕見針對英語霸權的大辯論。事件論爭範圍廣闊，文章眾多，篇幅所限，難免有遺珠之憾。本書試圖呈現當年的事件發展及主要論辯內容，但不少地方包括非本地生經驗[24]、母語教學、司法覆核理據，均未能顧及。此外，由於中大校友關注組已為事件出版專書《令大學頭痛的中文》，本書也嘗試輯錄更多未出

版文章，以供後人參照。至於「國際化事件」前的語言論爭，請參考本書卷一「中大五十年鉤沉」李敏剛的文章。我們深切寄望「國際化事件」帶出的反思，能為香港社會的盤根錯節的後殖民處境留下註腳，並在不久的將來貢獻步履蹣跚的解殖運動。

---

1 見本部份文章：捍衛中大理想小組，〈哭中大——致中大師生的公開信〉。

2 見本部份文章：中大教務處，〈關於香港中文大學招收非本地生和教學語言的一些誤解和事實〉。

3 見本部份文章：中大學生會，〈我們並沒有誤解校方政策〉。

4 見本部份文章：劉遵義，〈校長新春家書〉。

5 見本部份文章：不想沉默的中大教師，〈要國際化，除了英語，還要開誠和尊重〉。

6 見本部份文章：幾位支持中大「國際化」策略的學生、校友，〈笑中大——講方言的中文大學〉。

7 《人間仙境》為當時中大內地生留連的網上論壇。

8 見本部份文章：胡浩堂，〈I feel really sorry for you——一次校友評議會記事〉。

9 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可能是唯一例外。當年校方准許，只要中文系提供足夠普通話課程，便可錄取內地生。其後，絕大部份中文系主修的課程，授課語言均訂明為普通話。當時校方強調：「准許中文系以普通話收取內地生屬個別例子。」參見〈中大允憑普通話收內地生〉，《大公報》，2005年2月15日。

10 雙語政策委員會的角色和討論範圍，可參見本部份文章：杜振豪，〈雙語政策報告書沒有說甚麼〉。

11 見本部份文章：蔡寶瓊，〈對《雙語政策委員會報告書諮詢稿》的回應〉。

12 馬傑偉為雙語政策委員會成員，並與另外三人負責修改報告書草稿。見本部份文章：馬傑偉，〈中大語文政策的未來〉。

13 見本部份文章：杜振豪，〈貨不對辦的大學語委會〉。

14 見本部份文章：葉蔭聰，〈破解殖民語言想像〉。

15 見本部份文章：陳光興、錢永祥，〈全球化，遺忘所有非英語文化？〉。

16 兩者的辯論，本部份文章李敏剛，〈中文之為大學理想〉稍有論及。

17 見本部份文章：馬傑偉，〈中大語文政策的未來〉。

18 見本部份文章：梁文道，〈說英文的中文大學〉。

19 見本部份文章：馬國明，〈國際化與語文政策〉。

20 根據中大學生會的資料，當時楊綱凱副校長給各學系的信件（2005年1月4日），認為內地生來港讀大學的主要理由，是出於英語學術環境："This non-local quota caters for both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nd students from the mainland. It is noted that most of the latter do not speak Cantonese and indicates that an English-speaking academic environment is one of the main reasons for choosing a university in Hong Kong over those on the mainland."

21 見本部份文章：Eliza W. Y. Lee: An open letter to the students of CUHK.

22 〈哭中大〉聲明原文有一句指：「很不幸也很諷刺地，我們的大陸同胞，比香港人更看不起自己的語言，只會選那些以英文教學的香港的大學來讀。」其後，因內地同學表示不滿，中大學生會承認表達不當，刪去此句並致歉。

23 2015年，教育局引用2003年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的建議，忽然指「普教中」是中文科的「遠程目標」。另外，教育局局長吳克儉表示：「截至12/13學年有70%小學在個別班級或全校推行普教中，較2009年多四分一；同期有37%中學也推行普教中，增加六分一。」〈教局忽指普教中是遠程目標〉，《蘋果日報》，2015年4月14日。

24 非本地生對中大雙語政策的經驗，可參考本書第三卷「教學・師生」中的〈外地生點睇中大國際化？〉。

國際化事件時序表

2003年

12月6日	特首董建華出席中大四十周年校慶晚宴，提出希望香港能成為「亞洲教育樞紐」。
1月30日	教資會發表《共展所長　與時俱進》報告書，明確提出香港應該扮演「區內教育樞紐」，推動本港經濟及社會發展。報告書提出來年將削減10%撥款，並界定了8所院校的角色，其中預計「各院校的非本地生人數將顯著增加，其中大部分將是從內地來港的學生。」

2004年

11月	校方要求各學系或課程表明能否於下學年，提供足夠數量的英語授課課程，以收取非本地生。中大44個學系（醫學院除外）只有7個拒絕，包括中文系、文化研究課程、哲學系、宗教研究課程、語文教育課程、體育及運動科學課程、中醫學院，其餘近八成學系均順從校方要求。

2005年

1月4日	校方再要求那些答應提供英語課程以收取非本地生的學系遵守四個條件：一、必修科須以英語授課，如該科設有數班，則最少一班必須為英語授課；二、學系須提供足夠英語授課的課堂，令非本地生可以修讀足夠的本科學分畢業；三、至少一節導修課（tutorial）、實驗（laboratory section）及練習課堂（exercise）須以英語授課；四、所有英語授課的課程須有英文試卷。
1月26日	中大學生會從非正式渠道，獲得了一封由副校長楊綱凱向學系系主任發出有關教學語言的信函。學生會當晚立刻向各學系系會發出緊急電郵，同時在新聞組上公佈。
1月27日	中大學生報出版《必修科將全用英語》號外，報導此事。
1月31日	中大學生會及捍衛中大理想小組，在中大文化廣場掛出「哭中大」橫額及大字報，同時將〈哭中大〉聯署聲明電郵予同學，並於校園收集同學簽名。

2月1日 校方電郵《電子快訊》予全中大師生，解釋中文大學招收非本地生和教學語言的問題。

2月2日 中大學生會及捍衛中大理想小組，透過電郵及新聞組，發佈〈多元化是假，歧視中文為實 —— 對中大校方回應的回應〉。同日晚上，學生會舉辦「中大國際化研討會」，邀請蔡寶瓊、梁文道、陳健民、陸德泉討論事件，座無虛席。

2月4日 校方於崇基信和樓舉行記者招待會，介紹下年度海外招生計劃、人數等事宜，學生會同學聞訊到場質詢校方國際化的問題。同日，中大校方發表新聞稿，指新學年將首次參與「全國普通高校統一招生計劃」，讓內地13省及4市的高中畢業生，按志願申請入讀中大。校方指新學年將取錄280名非本地生，其中250個名額為內地生，其餘30個是海外生。與此同時，非本地生學費將由6萬增至8萬港幣。

2月12日 〈哭中大〉聲明聯署人數超過800人。

2月14日 校方公佈〈關於香港中文大學招收非本地生和教學語言的一些誤解和事實〉，並電郵至全中大師生。同日，學生會撰寫〈我們並沒有誤解校方政策 —— 回應中大校方的澄清〉，反駁校方論點並重申要求，希望校方正面回應。

2月16日 校長劉遵義透過電郵發表〈校長新春家書〉，嘗試回應國際化事件面對的質疑。

2月17日 明報刊登〈要國際化，除了英語，還要開誠和尊重〉，作者署名「不想沉默的中大教師」，批評校方假諮詢。
校長劉遵義發信予全中大老師，交代校方對既有語文政策的調整，並示意學系有兩星期時間覆議2004年11月參與招收非本地生計劃的決定。

2月20日 中大學生會及捍衛中大理想小組召開記者招待會，向傳媒交代反偽國際化的最新發展，要求校方立即停止改變授課語言政策，並全面公開諮詢師生的意見。

2月24日　中大學生報出版《拉扯在中英文之間 —— 中大國際化特刊》，輯錄了師生校友討論國際化事件的文章。

「校長會見同學」於文化廣場舉行，劉遵義首次現身回應關於偽國際化的質疑，逾200名師生校友出席。在場絕大部份出席者均炮轟校方假諮詢，唯一表態支持校方的台下發言者王維基（時為中大校董），則認為新政不會影響雙語政策。劉遵義回應時強調，新政策只會影響3-4%課程，拒絕暫緩計劃。劉又指，校方將成立雙語政策委員會，委任前校長金耀基為主席，諮詢師生校友意見，半年後提交報告。

3月7日　文化廣場的壁報板忽然張貼了一篇名為〈笑中大〉的文章，署名為「幾位支持『國際化』策略的學生、校友」，批評中大學生報的號外使用廣東話。

3月8日　范克廉樓地下出現一大疊〈笑中大〉印刷本，並指文章已發表於bbs.oal.cuhk.edu.hk《人間仙境》論壇。同日下午，3篇回應〈笑中大〉的文章張貼於另一塊壁報板，其中一篇名為〈笑過了，多看點書罷〉。

4月30日　中大校友評議會舉行論壇討論「國際化事件」，學生會代表胡浩堂等人要求進入會場解釋學生會立場，但遭校友評議會常委嚴詞拒絕。學生會代表爭取不果，最後被數名校友挾著離開。期間校友彭玉榮向胡浩堂大聲喝罵："I will use all my power not to employ you!"，並表明「*Next Magazine* 裡面既黑名單係真的！」。彭追問胡的名字，並聲言「我鍾意擇你名就擇你名！」彭的言論引來坊間極大反感，數日後彭在壓力下以書面方式向學生道歉。

5月27日　教育統籌局發出題為《港輸出高等教育潛力獲肯定》的新聞稿，指出貿易發展局的研究，肯定香港學生國際化的教育效益，以及本港輸出高等教育服務的龐大潛力。

2006年

9月7日　雙語政策委員會發表雙語政策報告書諮詢稿，諮詢期為9月7日至11月15日。

2007年

1月　中文大學校友關注小組出版《令大學頭痛的中文》。

9月12日　校方公佈《雙語政策報告書》定稿。

10月9日　教務會接納雙語政策委員會的建議，各學系可根據教學目標、科目性質及其他考慮，自行為每一科目和每一教學活動選擇最合適之授課語言。

10月10日 特首曾蔭權發表施政報告，其中建議由2008學年起，大學非本地生上限由10%增至20%。與此同時，放寬非本地生畢業後的逗留安排，容許他們在港逗留一年尋找工作。

2008年

1月18日 中大學生李耀基正式入稟高等法院，申請司法覆核《香港中文大學條例》，指中大於2007年10月通過的雙語教學政策，違反《香港中文大學條例》有關「中文為主要授課語言」的規定。根據校友關注組列出的〈中大各科目中英授課比例簡表〉，3,008個院系科目中，僅以中文授課佔634（21.08%），僅以英語授課佔1,548（51.16%），中英並用佔461（15.33%）。

2009年

2月9日 中大教學語言司法覆核案宣判，高等法院張舉能法官裁定校方勝訴。判詞指出中大在法律上不必以中文為主要授課語言，中大可以自行選擇。根據判決，即使中大創校時有中文授課的理想而現在決定放棄，也不屬違法，法庭不會出手干預。

10月14日 特首曾蔭權發表施政報告，提出教育為香港六大產業，其中「發展教育產業的目標是鞏固香港的區域教育樞紐地位，提升香港的競爭力，配合國家的未來發展。」

12月23日 中大宣佈來年增收非本地生約360人，但內地生人數仍維持約250人。與此同時，非本地生學費將由8萬加至10萬港幣。

2010年

7月23日 高等法院上訴法庭宣判中大教學語言司法覆核案，結果駁回李耀基的上訴。上訴庭判決指出：「教務會獲授權制定中大的語言政策，不受以中文為主要授課語言的限制；換言之，教務會有決定一種或多於一種主要授課語言的權力。」

12月13日 中大教學語言司法覆核案獲准上訴至終審法院。

2011年

9月28日 終審法院聆訊中大教學語言司法覆核案，期間李耀基一方主動撤回上訴，終院依程序判李耀基敗訴。案件正式結束。

2012年

12月21日 中大宣佈來年計劃招收500名非本地生，其中300名為內地生，同時非本地生學費將由10萬加至12萬港幣。

哭中大
——致中大師生的公開信

◆ 中大學生會及捍衛中大理想小組

原為兩組織於2005年1月31日發給中大全體學生之電郵及於網上設立之聯署

尊敬的老師和親愛的同學：

這兩天，我們從《中大學生報》得悉中大從下學年開始，將正式展開其「國際化」大計的第一步，大幅度增收非本地自費學生，並要求中大每個學系逐一表態，是否同意將每個學系所有的核心課程全面轉為英語授課。令人震驚的是，整個中大幾乎所有學系，在完全沒有諮詢同學的情況下，「欣然」地毫無保留地接受了中大校方的建議，並從下學年開始，將所有核心課程強制性地轉用全英文授課。

校方似乎要用快刀斬亂麻的方法，造成米已成炊之局，將這個明知充滿爭議性以及影響極為深遠的政策，粗暴地強加在中大師生身上。

從過去幾年校方的言論以及劉遵義校長上任短短半年以來的舉措，我們絕對有理由相信，這只是中大「國際化」的第一步。接著下來的，極可能是要求選修課、導修課以至通識課，通通轉為英文。因為按照校方的邏輯，只有全面英語化，我們才夠格稱為一所國際一流大學！

中大將不再是中大

從下學年開始，中文大學將不再是「中文」大學！

中大將經歷建校四十年以來，最根本最徹底的轉變！因為從下學年開始，中文大學將不再以自己為香港唯一一所重視中文，重視雙語教育的大學為榮，亦不再視此為大學的理想和目標！劉遵義校長上任以後，中文大學未來的方向，說得白一點，便是如何盡快擺脫過去四十年「中文」的「不光彩」歷史，以最快的速度英語化。

作為一群關心中大，對中大有強烈歸屬感，並衷心認同中大建校的教育理想的學生，我們震驚、傷心、憤怒！

震驚，是因為這個深遠地影響中大未來發展以及每個同學學業的重大決策，我們竟然完全被蒙在鼓裡，校方和學系可以完全不諮詢同學一聲便強制推行。在香港這個愈來愈強調民主化透明化的社會，這種粗暴的態度，竟然發生在我們的大學，實在令人難以置信。更令人吃驚的，是主其事的楊綱凱副校長竟然將

責任推得一乾二淨，聲稱諮詢工作應該由學系來做。但明眼人都應看到，這個英語化的政策，顯然是劉校長上台後匆匆推出的「傑作」，由高層用種種不同方式，自上而下的強加在各學系身上。我們實在不明白，校方怎可以如此霸道，怎可以如此兒戲，怎可以連聽一聽同學意見的機會都不給我們。

傷心，是因為我們尊敬的中大師長，在這件事上，竟然連一點異議的聲音都沒有，竟然如此輕易地便棄守中大過往最引以為傲最值得珍惜的傳統，竟然可以讓校方用「各學系自由選擇非本地生」之名，為中大全面英語化開了這道關鍵的缺口。在沒有充分討論的情況下，各位老師真的毫無保留地認同校方的「國際化」的「雄圖大業」？你們真的看不到這樣的發展方向，可能會將中大推向萬劫不復之地？還是我們尊敬的老師，作為一個知識群體，在高度官僚化的大學體系之中，已經集體喪失了道德判斷和道德承擔的勇氣？但這是我們的大學啊！我們實在不明白，中大曾經有過如此輝煌的為大學理念而抗爭的傳統，怎麼今天的校園，會如此沉默！

憤怒，是因為校方竟然可以如此顛倒是非，用種種堂皇美麗的理由，將一個完全違反大學教育理念的政策，強加在我們和我們的大學身上。

「國際化」的真正目的是賺錢

我們的憤怒，是有理由的。

校方說，英語化的目的，是要推行「國際化」。「國際化」的目的，是為了提升教育質素，令每一位中大同學得益。校方聲稱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我們好。但這真的是為了我們好，還是為了其他目的，從而犧牲了中大大多數同學的利益，犧牲了中大最可貴的傳統？

我們有沒有想過，香港各大專院校近年爭先恐後的推行所謂「國際化」，到底所為何事？我們認為，它最主要的目的，其實是在政府大幅削減大專教育經費的情況下，大學開源的一種方式。簡單點說，「國際化」便是容許各大學在現有的學額之外，大量增收非本地的自費生，幫補各大學的財政。基於同樣道理，政府一方面大幅削減對碩士學位的資助，另一方面卻鼓勵大學開辦林林總總的自負盈虧的碩士課程，令大學變成名副其實的學店：搶錢第一，學術第二。

但我們知道，所謂的非本地生，其實絕大部份是來自國內（例如下年度有250位來自國內，三十位來自其他地方）。而從下學年開始，聽說國內學生每年的學費更會大幅增加到六萬元以上，並取消給予國內學生的獎學金。換言之，這是一個赤裸裸的搶錢遊戲。在金錢引誘下，各學系自然一窩蜂的搶著迎合校方的要求。但大家試想想，這樣的「國際化」，說穿了，不就是為了錢嗎？不就是為了趕著在內地這個教育大市場中爭得一杯羹嗎？

既然如此，何必那麼虛偽的說是為了我

們好，為了甚麼大學多元化呢？為甚麼不回過頭想想，為了那三十個外地學生（大陸來的同學要讀四年，第一年是要必修廣東話的，因此語言方面不是問題），便要強行將中大絕大部份學系的核心課程轉為全英文，這樣做值得嗎？校方有沒有認真考慮過，這樣對我們的教學質素有多大的負面影響？又有沒有考慮過，不同學系不同課程有各自的特色，一刀切的英語化，會對中大的長遠學術發展有甚麼危害？在沒有任何討論任何諮詢的情況下，強行將這個政策加諸我們身上，又是負責任的大學行政者的所為嗎？

或許有人說，有錢為甚麼不賺呢？但我們是否該先停下來問一問，作為一所大學，是否為了錢，便應該放棄一切？當然不。有人馬上會說，只有愈多錢，我們才可以愈「國際化」，才可以在世界林林總總的排名遊戲中，跳得前一點，才可以證明我們存在的價值。

中大危機重重

是嗎？真的是這樣嗎？讓我們全體中大師生好好停下來想一想，中大今天到底是怎樣的境況。今天的中大，無疑是愈來愈豪華，愈來愈浪費，醜陋無比的建築物愈建愈多，但我們的學術風氣卻是愈來愈差，同學愈來愈功利愈來愈無心向學，教學質素愈來愈差，教職員的士氣愈來愈低落，大家對大學愈來愈沒有歸屬感，還有那愈來愈多無奇不有的以搶錢為目標的課程，以及那令人煩厭不堪的排名遊戲。

各位老師，各位同學，大家捫心自問，我們難道不便是處在這樣的境況嗎？這樣的境況，不正正在告訴我們，我們的中大正處在危機中嗎？我們還要一起玩「皇帝的新衣」的遊戲玩到甚麼時候？更值得我們思考的是，這樣的危機，真的是透過拼命掙得更多錢可以解決的嗎？校方提出的英語化，是將危機推向更深，還是中大未來的出路？這樣的「國際化」，真的可以提升大學教育的質素？

母語教育的優點

我們自身的學習經驗，以及很多國家無數的教學實踐表明，用母語學習，是吸收知識最有效的方法。英文不是我們的母語，我們在日常生活中，也不是使用英語。因此，用廣東話上課，對大多數同學來說，對理解學科的知識、積極參與討論，以及培養我們的批判性思考能力，都是最自然最舒服最有效的方式。這對老師來說亦一樣。這是一個很顯淺的事實。我們不覺得，這有甚麼不對以及有甚麼值得慚愧羞恥的地方。全世界有多少個國家的人民，不是用她們的母語來學習的？有多少偉大的學術著作，不是用她們的母語來撰寫的？這不是甚麼大道理，這是常識！

校方或同學馬上會說，既然有外地的同學來中大讀書，而他們又不懂廣東話，所以我們一定要遷就他們。但我們有沒有想過，為甚麼一定要這樣？難道我們去法國讀書，不用學法文？去日本讀書，不用學日文？而倒過來要法國人日

本人遷就我們？如果有外地學生來中大讀書，為甚麼他們不可以先努力學好廣東話學好國語，並主動了解我們的生活我們的文化？為甚麼一定要絕大多數生於斯長於斯的同學，遷就極少數說英語的同學？是因為我們過度好客，還是因為我們骨子裡根本便瞧不起自己的母語，覺得廣東話低人一等？如果我們對自己的語言和文化一丁點的自信都沒有，我們拿甚麼去和外地學生交流？我們談甚麼溝通中西文化？

反對全面英文化≠不學好英文

看到這裡，或許很多人已大搖其頭，說我們懶惰故步自封欠缺國際視野不懂自我增值以至盲目的文化保守主義等等。是嗎？真的是這樣嗎？那請各位老師同學，給多一點點的耐性，容我們解釋。

首先，反對核心科目全面英語化，不等於我們便不歡迎大學招收多些外地學生和交換生（理由自然不是為了賺錢）。這兩者並不是必然有衝突的。校方大可以增撥多些資源，為外地生提供良好的中文語言教育；亦可以專門為交換生開設一些他們特別感興趣的科目。就我們所觀察，很多大陸來的同學，半年後便可以用廣東話上課；很多外國的交換生，亦都主動修讀國語和廣東話。而他們很多來香港求學的目的，正正是希望藉此多些了解香港和中國的語言文化。

其次，反對核心科目全面英語化，絕不表示我們要抗拒英文。我們自然了解，英語是學術世界中的主要語言。要更好的掌握各種不同的知識，要更好的從事學術研究，學好英文是必要的。但這絕不表示，只有用英文作為授課語言，才是最有效的學習和吸收知識的途徑。在我們的實際學習經驗中，一方面閱讀英文文獻，運用英文撰寫論文，一方面以母語作溝通討論，是完全可以並行不悖甚至更為有效的。強行全面英語化，更可能的，是放棄了我們靈活的學習方法，減低了我們的學習動機，削弱了我們對知識的理解。有些老師對傳媒說，反對英語化是因為同學懶惰。怎麼可以這樣說呢？難道這些老師看不到，有更多更多的同學，是每天積極主動的學習英文和其他語言，努力的在吸收各種知識嗎？中大無數今天事業有成的校友，難道不是母語教育之下的成果嗎？

英文背後的權力含意

但更值得我們留意的，是在香港這樣一個後殖民地社會，英文實在不是一個簡簡單單的溝通傳意的工具而已。在長長的殖民地歷史中，英文背後所代表的階級權力和社會地位，深深的刻在每個香港人的深層意識之中，以至直到今天，母語教育在香港仍然舉步維艱。沒有香港人不了解學好英文背後的那種種權力含意，沒有人不知道香港的商人和政治精英是如何崇拜英文貶低中文。只有學好英文，才可以出人頭地，才可以向上爬，才可以擁有各種各樣的市場競爭優勢。這些，我們怎會不知道呢？我們更加知道，在由英美強勢主導的政治格局中，英文在可見的將來，在全球化的推動下，會更加凌厲地支配入侵以致摧毀

其他大大小小的非英語文化，進一步削弱我們對自身獨特的語言文化的認同。

中文大學的使命

中文大學，一所曾經在殖民地時期勇敢地以「中文」來確認自己身分的大學，一所曾經在七十年代勇敢地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的大學，一所曾經以支持母語教育和提倡中國文化為己任的大學，在回歸後的今天，竟然自動地不加任何批判地集體放棄自己最引以為傲的傳統，為的不是甚麼教育理想，為的只是在「國際化」包裝下的經濟利益，徹底向教育商品化投降，怎不令人痛心，怎不令人捶首頓足？我們又可以如何面對我們的創校先賢以及一代又一代中大人所付出的努力？

尊敬的老師和親愛的同學，我們千萬千萬不要以為，教育語言的轉變，是一件小事，是一件只關乎個人利益及個人投資的事。它關涉的，不僅是整個中大的未來，也和香港的未來息息相關。我們都知道，香港正在一步步走向民主化。而在走向民主化的過程中，我們最需要的，是一批又一批對本土社會和文化有認識有承擔有批判性的公民。要培養這樣的公民，首要的，是對自己的歷史語言文化有最基本的認同和肯定。中大，作為香港其中一所最具人文及社會關懷的大學，在這個歷史的關鍵時刻，實在理應視培養這樣的公民為時代賦予自己的使命。最最令人意料不到的，是中大校方竟然在沒有任何外來壓力下，甘心放棄自己的使命，甘心放棄這個難得的歷史契機，這怎不令學生扼腕嘆息！

反對不民主的家長治校

我們不反對學好英文；我們不反對中大變得真正的多元化；我們甚至不反對為了招收多些非本地學生，我們申請入住宿舍的機會少一些，又或住得狹窄一些。

我們反對的，是中大校方這種絕不民主的自上而下的粗暴的家長制的治校方式；我們反對的，是校方漠視我們的權益，剝奪我們用母語學習核心課程的機會；我們反對的，是中大校方在剛剛慶祝完四十年校慶不久，便將中大艱苦經營且已所剩無幾的寶貴傳統一手否定！

我們不甘心，中大從此不談理念只談利益！我們不甘心，這個屬於我們每個人的校園，從此會以說中文為恥！我們更不甘心，在所謂的「國際化」口號下，那許許多多值得中大師生一起認真探索討論的「中大往何處去」的問題被掩蓋被扭曲被壓制！

我們真的不甘心！

我們若沉默，中大將沉淪

尊敬的老師們，學生言論或許有所偏頗，考慮或許有欠周詳，但這確確是我們的肺腑之言。你們從我們第一天進入中大起，便教導我們要慎思明辨，要擇善固執，要不平則鳴！今天，面對中大這樣影響深遠的轉變，學生實在不明白，你們怎麼會像校方所說的「自由選

擇」了這樣的「國際化」？學生實在不相信，以你們多年在中大教學的經驗，以你們豐富的對教育的理解，你們會看不到學生所看到的一切。我們倒寧願相信，你們有這樣那樣不得已的苦衷。但每想及此，學生便有更深一層的悲哀：大大的中大，是甚麼令我們變得如此沉默？是甚麼令得昔日自由開放師生無間的校園，變得如一灘死水！

我們並不奢望有老師站出來支持我們，但我們是如此誠懇的盼望，你們可以嘗試聽聽我們的聲音，不要視我們是一群偏激無知懶惰不懂與時並進的頑劣學生。我們和你們一樣，對中大的過去現在與未來，有著深深的關切；我們也有著同樣的願望，希望中大繼續堅持它創校以來的人文關懷和教育理想，立足本土，放眼世界，以不亢不卑的態度面對自己的語言文化，以開放謙虛的態度去學習西方文化。

親愛的同學們，我們和你們一樣，每天忙忙碌碌，關心自己的學業和前途。我們也知道很多同學，對於校方的政策有不同的意見和想法。這是健康且可喜的。因為這是我們的大學。我們在這裡，以誠懇的態度，提出我們的觀點，表達我們的擔憂，也是因為我們不視自己為大學的顧客，而是中大的一份子。我們可以做的，或者不多。但我們若繼續沉默，代價便可能是中大更深的沉淪！我們因此懇切的呼籲大家，用你們不同的方式，將你們的意見反映給你們的老師聽，反映給你們的同學聽。只有大家一起關心中大，一起以開放理性的態度去思考去抗爭，中大才有上升的可能！

作為中大人，我們不得不發聲——無論我們的聲音是如何的微弱！

作為中大人，我們不得不為中大放聲一哭——儘管我們絕不輕言放棄！

關於香港中文大學招收非本地生和教學語言的一些誤解和事實

◆ 香港中文大學教務處

原為香港中文大學教務處於2005年2月14日向中大校友發出的電郵

自2005年1月以來，中文大學招收非本地生和教學語言的問題，引起了很多師生、校友和社會人士的關注。尤其是關於教學語言一點，愛護中大的人士迴響不少。他們每一個人的看法，中大都非常重視。

然而，大學發覺最近有部分的看法，可能出於對事情的誤解。雖然中大已將有關政策通過書面通知各單位或人士，但仍有很多不必要的誤解廣泛流傳，引起了部分中大友人和社會人士的憂慮，中大對此深表關注。我們把近日聽聞的一些誤解分列於下，並再作出澄清。

教學語言問題

誤解1：中大將改為全部英語授課。

事實：中大堅持雙語政策。中大是全香港唯一堅守這個原則的院校。不可能轉為全部英語授課。

誤解2：全部必修科改為英語授課。

事實：中大堅持雙語政策。由各學系按課程需要及本系發展策略而自由選擇是否招收非本地生。選擇了取錄非本地學生的課程或學系，將需要提供足夠的必修及選修科目，以英語授課，使他們能夠畢業。其他科目使用粵語、普通話或英語授課，繼續由各學系自定。相信大學有不少科目仍將會繼續以中文授課。

誤解3：中大八成科目將轉用英語授課。

事實：八成學系或課程在一月時表示選擇招收非本地生。這並不代表他們的科目全部轉為英語授課。他們只須提供一部分科目以英語授課，包括必修科及足夠的選修科，能讓非本地生有足夠科目完成課程，不須將全部科目轉為英語。

誤解4：即使在文史哲等學系，與中國文化相關的必修科目，也將全部改為英語授課。

事實：與其他學系無異，文史哲三系有關中國文化必修科的教學語言，均由各學系按課程需要及本系發展策略而自由選擇。三系在招收非本地生方面的決定如下：中文系要求所有非本地生具有良好中文水平，該系所有科目繼續使用中文講授。哲學系不招收非本地生。歷史系將開設足夠科目，讓同學可以自由修讀以中文講授或英文講授的科目而滿足主修的要求。不論本地生或非本地生，三系學生均可繼續以中文修讀必修科。

招收非本地生問題

誤解5：各學系必須招收非本地生。

事實：各學系情況不同，是否選擇招收非本地生，大學完全尊重學系的自由決定。例如哲學系經深入討論，決定不招收非本地生，大學亦尊重其決定。

誤解6：不招收非本地生的學系，資源將被削減。

事實：不招收非本地生的學系，其本地生名額不變，資源亦不變。

誤解7：招收非本地生的學系，資源將大幅增加。

事實：資源只會因學生人數增加而帶來的適量調整，以應付增添的教學負荷。

誤解8：非本地生學費較高（八萬元），所以招收非本地生是為了爭取資源。

事實：非本地生並無政府資助，學費只足應付較低的邊際成本。大學還需籌募獎學金，幫助部分非本地同學支付費用。

誤解9：大學一兩年後便要招收25%的非本地生。

事實：校長所提的25%數字，是一個中長期願景，估計要十年以上才有機會實現。2004/05年只達8%，在可見的未來數年，非本地生亦不會超過總收生人數的10%（即280人）。除了大學本身的配套策劃必須循序漸進外，政府對本地大學收取非本地生人數亦設有上限，大學不可能超越。

誤解10：招收非本地生將減少本地生入學的機會。

事實：政府指定，新增收的非本地生均在名額以外，不影響本地生入學機會。

誤解11：招收非本地生對本地生沒有好處。

事實：招收非本地生（和交換生）是為了提供一個更豐富的校園學習環境，使所有學生（尤其是本地生）能夠欣賞及適應多元文化，為將來投身本地、內地或全球社會的生活和工作做好準備。

諮詢及溝通問題

誤解12：大學沒有諮詢。

事實：大學去年十月底已通過各學院諮詢各學系和課程，邀請他們自由選擇，是否按前述開課條件（見「誤解2」的「事實」說明），招收非本地學生。八成以上學系及課程，十二月時已知會大學將會招收非本地生。今年一月，大學再請有關學系及課程確定，是否有足夠英語授課科目，供下學年入學的非本地學生就讀，以開展內地及海外招生程序。各學系或系務會其後提供有關資料，入學及學生資助處經已集結上網。大學亦一直通過通函及電子通訊方式，申明大學的有關政策。一月以來，部分教授、同學及校友對此事累積了一些誤解，大學正循各種途徑與有關學系溝通商議，協助他們處理問題，並澄清大學的雙語政策，以消除不必要的疑慮。

誤解13：大學給予學系的時間不足，或傳說謂某些學系只得一天作出決定。

事實：一月下旬大學收集學系上述有關開設科目的具體資料時，個別學系逾期未交，或有細節欠明，故此大學曾敦請這些個別學系在一兩天內提供所欠缺的小量補充資料。但學系對有關的決定，不應該是一兩天內作出的。目前大學仍在不斷與有關學系進行溝通了解，以便提供協助，解決實施時可能碰到的問題。

中大國際化問題

誤解14：中大可以選擇不走向國際化。

事實：目前中國內地各大城市及院校均迅速發展，邁向國際。如果香港不加強與國際接軌，香港將會失去競爭優勢。如果中大不邁向國際，不能為香港培養出對本地和內地都有深切了解，同時具有國際視野，能欣賞中國及國際多元文化的人才的話，中大也不免被邊緣化。這不是廣大的中大老師、同學和校友們所希望見到的局面，也不符合中大的創校理想。同樣地，亦不會是香港社會對中大的期望。

誤解15：中大國際化是一項新政策。

事實：創校校長李卓敏博士早已提出，中大要「結合傳統與現代，融會中國與西方」。中大自創校以來，既以弘揚中國文化為己任，亦同時強調中西交流，面向國際。今天我們面對著全球性的社會經濟變局，加上中國日益對外開放，國際化議題雖非新政策，但自有更切合時代的特殊意義。

誤解16：在中大國際化與中華文化不能並存。

事實：中文大學的重任，是在國際化的過程中，同時更堅定的加強弘揚中華文化。這兩個目標不單並行不悖，而且可以相輔相成。成敗關鍵在於中大人是否可以團結一致，共同為實踐這個理想而努力。

香港中文大學教務處

2005年2月14日

我們並沒有誤解校方政策
——回應中大校方的澄清

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及捍衛中大理想小組

原為兩組織於2005年2月14日的網上回應

教學語言問題

校方的澄清：八成學系或課程在一月時表示選擇招收非本地生。這些學系若能招收海外（包括內地）學生，須最少有一組的必修科及足夠數目的選修科以英語授課。其他科目使用粵語、普通話或英語授課，繼續由各學系自定。相信大學有不少科目仍將會繼續以中文授課。中大會堅持雙語授課的傳統。

事實：校方的政策表面上是可以繼續雙語並行。不過大部分的學系礙於資源所限，只能開辦一組的必修科及選修科。因此有關政策實際上是要求大部分的學系的核心課程將會以英語授課。如校方所言，部分學系的小部分科目仍可以中文授課。這不啻是拋棄中大原來中英雙語並重的傳統，改為英語主導，中文為副。

招收非本地生的問題

校方的澄清：各學系情況不同，是否選擇招收非本地生，大學完全尊重學系的自由決定。學系的決定亦不會影響他們的資源。

事實：校方的確沒有表示強迫學系接受新政，亦沒有提及不招非本地生就會削資。但在財政資源全掌握在校方手上，這種明顯的權力不平衡底下，很多時我們都被迫「自我修正」：就等如老闆叫員工加班，員工就算有多不願意，並不敢說「不」一樣，即使老闆並無說明「唔加班就會炒你魷魚！」。在劉校長高調要求「國際化」底下，我們真的能將這次學系的選擇理解為「自由決定」嗎？有幾位老師都向我們表示，校方高層的說法，表面上是可以商量，但言下之意卻是勢在必行。

校方的澄清：招收非本地生（和交換生）是為了提供一個更豐富的校園學習環境，使所有學生（尤其是本地生）能夠欣賞及適應多元文化，為將來投身本地、內地或全球社會的生活和工作做好準備。

我們的立場：我們歡迎大學文化變得多元國際，多招收非本地生和交換生。但這些政策應該以堅持中大創校的理想和傳統，堅持自己的語言和本土知識發展為基礎作考慮。

諮詢及溝通問題

校方的澄清：大學自十月起已積極在校進行諮詢和溝通，包括在十月向各學系發出諮詢文件。大學亦一直通過通函及電子通訊方式，申明大學的有關政策。

事實：校方的確在十月已發信要求各系作出決定。然而，校方一直沒有進行任何公開大型的諮詢和討論。同學和校友一直被蒙在鼓裡，直到一月二十日在偶然的場合下，方得知校方已悄悄通過有關計劃。校方所謂一直以通函及電子通訊，解釋政策，亦是要到部分校友及同學發起「哭中大」的聯署信，方發出「解釋」。由此可知，校方根本沒有任何誠意諮詢同學及校友的意見。我們從數位來自不同學系的教授口中得知部分學系亦沒有公開討論有關決定。他們亦是到後期方得知有關決定。

中大國際化問題

校方的澄清：中大國際化，是要為香港培養出對本地和內地都有深切了解，同時具有國際視野，能欣賞中國及國際多元文化的人才。中文大學的重任，是在國際化的過程中，同時更堅定的加強弘揚中華文化。

我們的立場：我們也深願中大能延續她創校的傳統和理想，立足香港，面向世界，溝通中西。但「國際化」並不等於好似現時的計劃般盲目地進行英語化，放棄自己的教學質素和文化承傳。理想的「國際化」，更應顧及本地文化，將西方學術理論帶進本土生活之中，加強本土文化的活力。過份偏重英語，將會增加由第二語言造成的理論與生活間的割裂，這對豐富自身文化起了很大的負面作用。當我們不能肩負上豐富自身文化的責任時，拿甚麼去做國際交流？如何加強弘揚中華文化？

我們的訴求

校方多次指我們誤解事實，那麼校方應積極地全面地公開所有有關計劃的資料，並直接與同學公開討論，以消弭所謂的「誤解」。但校方到目前為止，從未表示會公開諮詢同學，只以公關技巧，向外發放消息。作為一間「國際一流」大學的知識分子高層，校方面對一個對中大影響深遠的變革，竟不肯正面回應同學訴求，迴避自由、開放的討論，只是不停重複一些空泛的論據，誤導群眾。

就此，我們有以下三個要求，並希望校方能積極回應，不再採取連日來迴避閃縮的態度：

（一）立即停止現計劃內的改變授課語言政策，並就授課語言向師生進行廣泛而公開的諮詢；

（二）切實執行真正的「雙語教學」政策，並公開數據，說明計劃前後所有課堂的中文／英語授課比例；

（三）公開大學「國際化」背後的所有實質政策，讓師生有足夠時間及資料作出討論及修改。

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及捍衛中大理想小組

2005年2月14日

校長新春家書

◆ 劉遵義

原為劉遵義於於2005年2月16日向中大師生校友發出之電郵

親愛的同事、同學和校友：

雞年伊始，我在這裡祝大家身體健康，萬事如意。這是我第一次向各位拜年，希望日後可以繼續透過《中大家書》與各位分享我在中大的經驗和感受。

回顧與前瞻

中大在猴年經歷了不少挑戰，但都一一克服了，而且取得很好的成績。教資會於2005/2008年度撥予我們的整體撥款，是八大院校之冠，又滿意我們的角色和表現，所以撥給我們額外的款項作獎勵。本地首千名成績最好的聯招新生之中，有過半選擇入讀中大。我們的同學在多項學術比賽和課外活動有極優秀的表現；中大的教研人員也在不同的學術範疇成績卓越，多項發明和創見都贏得本地和國際的稱讚，這都是我們值得自豪的成就。

最令人感到高興的，是經過多年的期待，我們終於有望於2011年回復四年本科學制。中大一向擁護四年大學的制度，又特別重視通識教育，如今兩者在新一輪的教改建議中得到社會的支持，中大人都會感到欣慰。大學要為回復四年制做很多準備工夫，我們已開始積極籌劃課程，增聘師資，並已向政府申請撥款，興建新的學生宿舍和教學大樓。

經過與教統局多番討論，大專院校的下一個三年撥款方案已轉為0-0-X。以香港的經濟發展趨勢，我有信心在2006年中檢討後，這將再轉為0-0-0方案。相信大學無須推出新的節流措施。

我所認識的中大

我上任已有七個多月，想在這裡與大家分享我對中大的看法。我在香港長大和接受中小學教育，對香港有深厚的感情。最近十多年來，我主要的研究領域是中國和東亞經濟；因為個人學術興趣和工作上的需要，我時常來往中國內地、香港和台灣，也不斷思考傳統與現代中國的關係，兩岸三地的互動影響，以及國家在國際舞台上的新角色。出任校長之前，我曾多次訪問中大，也曾探究中大的歷史和宗旨，對大學所秉持的教育理念十分清楚，也極之認同。

當中最令我佩服的，是中大先賢如錢穆

和唐君毅諸位的強大文化使命感和教育理想。他們的主張多年來是中大精神之所繫，也造就了中大的獨特性格。中大是由中國學者創立的大學，為香港青年而設，肩負弘揚傳統文化、溝通中西學術、建造中國新文明的重任。而創校校長李卓敏博士，則以過人的魄力，為大學定下整體發展的方向。他倡議「結合傳統與現代，融會中國與西方」，強調中大的「國際性格」，確立了雙語並重、教研並重、通識與專業並重的教育方針。這些都是歷任校長的工作目標。我接受中大校長這個任命，是因為我認同中大的教育宗旨，並希望能夠為實現她的創校理想盡一己之力。

富有國際性的學府

李校長最先於1964年4月的一篇演辭提出有關中大的國際性格的論述，指出這是他對「中文大學整個組織的基本哲學觀」。這不但指大學的學術水平要達到國際標準，或是師生要覺得自己是國際學術社會的一員；更重要的，是中大要憑藉國際間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去加速發展，以求「在短期間內，躋身於世界大學之林」。在同年9月的就職演辭中，他進一步闡釋，由於當時香港的國際地位極其重要，所以中大自創校開始即吸引到國際間的興趣和注意。李校長認為中大必須不斷加強和擴大對外的聯繫，但這並非表示要將中大完全西化，因為中大有她的特殊使命，亦即是他後來所說的「促進中西學術文化傳統的交流與融合」。

可見中大的國際化並非始自今天。四十年前中大希望藉著國際化去追求持續發展和達成教育目標。四十年後的今天，我們也堅持這個目標。

致力加強國際化

比起四十年前，香港今天的國際地位有過之而無不及，更是她賴以生存之道。在今天全球性的社會和經濟變局裡，香港如果不繼續加強與國際接軌，繼續鞏固和增強她的國際性格，將會失去競爭優勢，被急速冒起的內地城市取代。同樣地，作為香港重要的大學，如果中大不繼續以其國際性格為自己定位，不能為香港培育出中英雙語俱佳，視野廣闊，兼能欣賞本地、全中國，以及世界多元文化的人才，則肯定不能繼續吸引國際社會的興趣和注意。這意味著人力、物力和財力，都會轉移到其他地方去，中大將面臨被邊緣化的危機；屆時我們憑藉甚麼力量去騰飛精進，日新又新呢？我們固然可以崖岸自高，但這能真正有助於促進中西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嗎？我們真的可以為香港、為中國文化、為世界作貢獻嗎？

重視國際交流的語言

英語是現今國際學術交流的主要媒介；大學要國際化就不能不重視英語。也許若干年後，中文會隨著中國國力的增強而變成國際交流語言，正如中國歷史上的大唐盛世。國際交流媒介是會轉變的；二次大戰之前，學科學的都要懂德文，英美學者要習德文。今天，德國科學家反過來要學英文。放眼世界，無論

是亞洲國家如日本和南韓，歐洲國家如法國和德國，或是國內的大學，都紛紛增強國際聯繫，加強英語教學，這是大勢所趨。馬來西亞大學曾有一段時間完全轉用馬來語進行教研活動，最終認為這不是長久之計，於是近年又重新採用英語授課。很明顯地，欠缺了與國際交流的語言媒介，就難以吸引優秀的學者和頂尖的學生，或是取得國際認同，也就沒有足夠的條件去創造新知，服務社會。

與各地大學對等交換學生

每年很多大學都送他們的學生到來中大進修，也會接納我們的同學前往學習。透過交換協議，中大同學享有很多機會外出體驗不同文化。按過去幾年的經驗，這類交換計劃極受我們的同學歡迎。外出交流的本地生不但大幅增加（去年參加全年或短期交流的就有1,600人），而且申請情況極其踴躍，名額供不應求。我們會繼續努力拓展國際聯繫，與世界各地的大學簽訂交換協議，為同學爭取更多外出交流的機會。要知道，世界一流大學如哈佛和耶魯等，也開始要求本科生在就讀期間，到外地交流一段日子。

再看看在中大校園的交換生，他們操不同語言，來自不同地區，令我們的校園更加多姿多采。他們為中大同學帶來新鮮的觀點，多種多樣的成長和學習經驗，足令本地同學開闊眼界和心胸，學會怎樣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溝通和相處。大家無須放洋外國即可體驗一個多元化的學習環境。所以我們歡迎更多的交換生前來，也要為他們提供足夠的，用英語授課的課程讓他們修讀。我們越能吸引不同地區的學生，就越能為中大的同學製造對等交換的機會。

招收非本地生

至於前來就讀本科課程的非本地生，會在中大度過四年的時間，與本地的同學一起生活，一起學習，砥礪切磋，容易培養出對中大以至香港的歸屬感。這些同學畢業後會願意回饋母校，為中大的長遠發展作貢獻。他們選擇留下來工作，固然可以充實香港的人才寶庫；即使他們返回原地，也是中大和香港的忠實朋友和親善大使，使我們的海外網絡更形牢固。

招收非本地學生是一個發展的大方向，我們以總收生人數的25%作為長期願景，循序漸進，估計需時十年以上才能完全實現，目標與香港其他院校大致相同。我們充滿信心，可以做好各樣準備，適時增添所需設施。未來幾年因為種種策劃上和政府的規限，非本地學生人數不會超過總收生人數（包括本地生及非本地生）的10%，即約280人，比去年只多出30多人。新增收的非本地學生，均在名額以外，絕對不會影響本地生入學機會。

對中大傳統的執著

但就在農曆新年前不久，校園出現了大字報，對中大的雙語教學傳統提出了一些看法。我細讀之下，覺得文章感情澎湃，字裡行間是作者對雙語教學的堅持和對中大傳統的執著。不過這些堅持和

執著似乎是基於對大學招收非本地生政策的理解不足。文章引起了部分師生校友的關注和討論，也有本地報章全文刊登。校方發佈了幾次澄清，我希望大家看到，對整件事有較全面的了解。

我對這次大字報事件，憂喜參半，喜的是見到中大人對中大事充滿熱誠和積極參與，以及對大學理念的認同和關心；這其實是中大不斷發展，不斷精進的重要動力。憂的是未曾能夠把這種力量引導到我們要推動的計劃上去，反而引起了部分師生校友的憂慮和擔心。我們顯然有加強校內校外溝通的必要。我希望這封《中大家書》，有助於釋除誤會，讓所有中大人認同我們同屬一家，願意肩並肩建設中大美好的未來。

那篇大字報的作者說，他們不抗拒英文，不反對中大變得真正的多元化，但反對全部課程用英語授課。我很高興同學和校友認同國際化的好處，也很高興他們了解為非本地生的到來而作的配合。但他們對教學語言的關注，正是我們數次澄清的要點。

堅持雙語教育

我不願意見到中大人對中大事有任何誤解，所以在這裡重申，國際化並不等於全盤英語化。大學無打算也絕不會全面轉用英語。四十年前中大要確立其國際性格時無此需要；四十年後我們要加強大學的國際性格時，也無此需要。因為創校先賢高瞻遠矚，為我們定下了雙語雙文化的教育政策。中英並重既可以維持我們的國際性，又讓我們得以秉承中國的教育傳統，發揚中華文化，朝著「融會中國與西方」的目標不斷邁進，實現中大獨特的教育理想。

去年十月大學開始諮詢各個學系，邀請他們選擇是否招收非本地學生。學系於是按本身的發展策略作出決定。那些選擇招收非本地生的課程和學系，有責任提供足夠以英語授課的必修和選修科目，讓這些同學能夠滿足課程的要求，順利畢業。我們並沒有要求所有的科目以英語授課；很多其他的科目，授課語言是粵語、普通話抑或英語，概由學系自定，這是大學一貫的做法。透過與學系不斷溝通了解，相互交流，我們希望可以靈活解決實施上的各種問題。

會不會有學系因為資源而影響招收外地生的決定呢？我深信學系所作的決定，都是從教育觀點出發，以學生的最終利益為依歸。那些不招收非本地生的學系，本地生名額完全不變，資源完全不變。至於那些招收非本地生的學系，由於學生人數多了，教學負荷重了，自然會在資源方面得到適量的調整。但非本地生並不享有特區政府的資助，學費只足以應付較低的邊際成本。

弘揚中國文化

在此之前，我曾一再強調，我們在推行國際化的同時，會全力弘揚中國文化。我們一向在世界各地延攬人才，最近就有好幾位從事中國研究的知名學者加盟中大；他們來自牛津、柏克萊、哈佛等

學術重鎮，各有專長，當可啟發校內更多研討和合作，增強我們在中國研究方面的國際影響力。我們將會繼續物色及邀請更多有分量的學人前來，參與全職或短期的教研工作，務求把中大建設成為國際中國研究重鎮。

我們更打算推出跨院系跨學科的中國研究課程，在國際層面推動中國研究，我們也會舉辦當代中國研討班，以及中國文化公開講座系列，邀請中外世界級的學人當嘉賓講者，積極鼓勵社會大眾的參與，旨在引起民間更多討論，讓更多人得以分享學術研究的成果和心得。我們又考慮綜合現有的科目，開辦中國研究的本科生及研究生課程。另外，有三十多年歷史的中國文化研究所將會擴建，以配合與日俱增的研究活動。新成立的法律學院也會提供包括中國法律的科目。

大家如果知道我們最近籌得逾千萬元的款項，以支持人文學科的研究工作，必定會感到十分興奮。這些資源將用以成立有關通識、中國哲學和文化的研究中心。另一項好消息，是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已決定在中大設立該會在亞太區唯一的漢學研究中心，另外兩個中心已分別設於美國東岸的哥倫比亞大學，和捷克布拉格的查爾斯大學。我們會繼續爭取海內外的支持，去推展人文學科各個領域的研究。對於中國研究，中大有不可推卸的時代使命。我們構思中的種種計劃，都是朝著這個方向開展。

中大立足香港，在推行國際化之餘，亦同時致力研究香港的歷史和傳統、城市發展、文化建設、經濟成長，以及政治社會制度。不少同事更積極參與政府各種政策的諮詢和制定，貢獻良多。我們必定繼續加強這幾方面的工作。

我們在邁向國際化的同時，致力弘揚中國文化，兩者相輔相成，並行不悖。最終的目標，正是溝通和融合中西學術，發展成為卓越的國際學府，讓一代又一代的中大人，都可以在中西文化之間擷取精華，終生受用，在香港、中國，以至全世界，都可以發揮影響力，作出重要的貢獻。

共建中大

我上任七個多月，已從中大人強烈的歸屬感、向心力和團隊精神，深深感受到中大人愛中大之精之誠。我很高興成為這個大家庭的一分子，亦會如各位一樣，為中大做到最好，讓她可以不斷追求卓越。我感謝你們給予我的支持，更希望在往後的日子裡，與你們建立起更親厚的關係，休戚與共。中大是一所上升中的大學，剛於前年慶祝成立四十周年。我們對她充滿信心，充滿期望。就讓我們以心連心，一起去實現我們共同的理想和願望，為中大創造再一個光輝燦爛的十年。

杜鵑和洋紫荊盛開的季節快到了，希望在萬紫千紅的校園裡碰見你，親自向你問好。

劉遵義

2005年2月16日

要國際化　除了英語　還要開誠和尊重

不想沉默的中大教師

原刊於《明報》，2005年2月18日

中文大學為了招收非本地學生的教學語言安排，在農曆年前引起了討論。學生寫了一篇名為「哭中大」的反對文章，學校也通過不同渠道作出反應。學生問及教師為何沒有聲音，而學校的立場是否就代表所有教師的意見呢？讓我作為大學教員的一分子，說說我的感想。

中文大學有一個特色，就是在瀰漫殖民地思想的香港，唯一堅持中文教學的大學，而同時她在國際上的地位，比其他自稱以英語授課的大學有過之而無不及。校友在國際或香港的成就，印證了中文大學畢業生的英語水平，也顯示出英語授課等於高水平的看法是多麼膚淺和無知的。

無論怎樣也稱不上諮詢

當然，過去的成就不可作為守舊或因循的藉口。中大學生的背景和大學的前景，40年來有了很大的轉變。從前學生的母語是單一的廣州話，現在遑論外來學生，本地學生中也有不少新移民，他們的母語是中國的其他方言。從前中文大學主要在殖民地別樹一幟，現在則要成為全中國出眾的大學。在新的時代，大學的中文特色和國際視野，也應有新一層的意義。可是，這是十分嚴肅的議題，牽涉到中文大學的定位，並非單單英語授課的問題。這樣的議題，通常不會有很簡單的結論；學生、教師和行政人員也一定有不同的看法，需要一定時日的溝通。作為知識分子，我實在不願意未經詳細考慮與討論，就站出來表態贊成或反對。但是，公開的沉默並不代表我對政策的絕對支持。可是，大學近來的公開回應，不斷製造教師已被充分諮詢並大多支持政策的形象，又使我感到繼續沉默有違良心。無論怎樣，我是絕對支持中文大學向國際邁向的選擇，學校也不必困在中文教學的牢籠裡，但卻不應把優秀學術水平等同英語校園。

中文大學新的教學語言政策，最沒有道理的是硬把取錄非本地學生與英語教學掛鈎起來，尤其大部分的外來學生其實是中國學生。按照這個政策，一個原本打算來這裡學中文的國際學生，只會發現中文系是不招收國際學生的，或者發現中文系是大量使用英語授課的。除了中文系，大學裡所有本土研究的學科，都面對同樣荒謬的情況。另外，像音樂、藝術、運動科學、自然科學這些本來可以較靈活使用教學語言的學科，教學空間卻因新政策而變得狹窄了。這樣的政策反映出主事人員的粗疏，沒有關顧各學科的獨特情形，只求一

個英語外殼。也許大學在訂立政策時，根本忘記了本身的中國文化立場和忽視了大批本地學生的學習需要。

新教學語言政策的目的，是為了保障非本地學生，不受語言限制地修讀學位。可是，這個保障卻奇怪地依賴於英語授課。如果某個學系所有的非本地學生都來自中國，為甚麼不能以普通話來授課呢？而實際上大部分學系的非本地學生都是說普通話的。新政策的副產品，是為本地學生提供更多元的文化環境。學生若要使用非母語來聽或講，自然能更深入地掌握另一個文化的內涵。目前英語文化在世界上舉足輕重，所以，我同意大學應努力創造英語環境。但是，這個聽和講的環境，是否在課堂裡最有效發揮呢？以我的經驗，好像在球場、餐廳及課外閱讀中獲益更大。事實上，要達到能提供理想的英語文化環境，校園內必須有足夠以英文為母語的學生。以香港當前的情況，我們只有來自中國不同地區的文化交流，英語明顯不是這種交流的媒介。由此，新政策本應鼓勵學系考慮多採用其他語言授課，而不必局限於英語，才能真正帶動校園的多語言環境。現在莫名其妙的獨尊英語，是否只反映大學領導的文化品味，而非中文大學的國際化路向？

其實大學的教師有多了解整個新教學語言政策的目的呢？我們又是否感到有被諮詢和有真正選擇呢？去年10月份下來的文件，只是要各學系決定取錄非本地學生而已，英語教學是附帶條件。學系從長遠發展來看，不能輕言拒絕外地學生。那時校園內道聽途說，也有質疑這英語教學的理據，但幾個月來不見得大學有體制內的討論。到1月份的文件，也只是要求各學系提交明年各科目的授課語言，也沒有討論政策的空間。有些學系，根本未經討論就把所有科目填上了英語。這樣的過程，無論怎樣也稱不上諮詢。今天大學還得多謝那些不乖乖照章執行的學系，才能自圓其說沒有大幅度改變為英語教學。大學對外界把這過程說成幾個月的諮詢，與真相有極大的出入。

大學裡的同事，很多都曾留學海外，深受文化交流與衝擊的好處，大部分能操流利的英語。因此都對國際化和使用英語抱開放的態度，也明白中文大學要審度形勢，不斷更新與重定方向。校友投入社會多年，也知道大學要適應社會的需要。在校園裡，學生也願意為少數不懂廣東話的學生，使用共同了解的英語為溝通媒介。大學若認真的探討教學語言的問題，就算要更改章程，放棄中文為主要教學語言也有可能。現在所推行的政策，一方面欠缺理據，另一方面又無視它對教學環境所產生的實質改變。遇到反對的時候，又取巧說已有足夠諮詢，玩弄數字來說仍然堅持雙語政策。欲蓋彌彰，無怪乎大學這新政策，被懷疑是為了偷換中英文地位的手段。在這樣的氣氛下，我更加不願意站出來，冒犯領導的意願。以我的觀察，教師對國際化差不多是一致的贊成，對英語教學則有贊成，有疑慮，也有反對，目前教師如此安靜，也是校方推動政策時的家長化手段所致。

要做國際化的大學，除了英語，還要開誠和尊重！

不想沉默的中大教師

2005年2月18日

"I feel really sorry for you."
——一次校友評議會記事

胡浩堂（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三年級生）

原刊於《中大學生報》，2005年6月號

昨天（4月30日），中大校友評議會就「國際化」舉行了論壇，就著早前的教學語言政策所引起的風波進行討論。有關注事件的校友告知我們，並鼓勵我們到場向校友講述學生會為甚麼反對該項政策，及校內的同學的一些討論意見等，以求令校友和同學能直接溝通。但是，實際的情形卻令我們大失所望。

我們一行六人到了中環某商業大廈二十一樓，我與另一位同學首先進入會場，就被查問為甚麼沒有姓名牌，而另外四名同學則仍在場外，不得其門而入。我們唯有表明自己是學生，校友事務處處長俞靄敏女士也就要求我離開會場，說這是校友活動。我們當然不從，因為我們認為不應只有大學高層才有資格向校友說話，學生的聲音也應該得到尊重，況且教育應以學生為本，學生才是這所大學的主體啊。（當然，這種想法確實有點天真可笑！）

其後，處長禮數周全地邀請我與另一名同學離場，謂我們離場後她會與常委會討論是否讓我們列席，如容許列席的話會再邀請同學們進場，我們拒絕了這要求。處長便請「常委」決定是否讓學生列席。我舉手要求發言，解釋我們到場的理由，是要向校友表達同學對「教學語言政策」的一些不同的疑問和意見，因當時亦有校方代表在場，故希望藉學生聲音以增加校友們討論的面向。怎料未及開口，即有一校友以訓斥的語氣怒呼：「你唔係校友！我地唔歡迎你！」

說真的，很久很久未試過被人用這種語氣「訓示」了，印象中很可能要算到中學時給老爸責罵的情境（現在老爸雖然也當我是細路，但也會以相對平等的語氣與我溝通，最多也只是薄責幾句）。我想不通的是，為何他們把「校友」和「學生」的界線劃得這麼清楚？我們不也是曾在同一地方度過了人生中最熱誠、最有抱負的歲月？年前不是有一套「中大人家」的話劇上映嗎？內容不是說中大校友、學生、老師就有如一家人？為何到現在學生要表達些少意見，便變成敵人了？教育政策的更改對同學的影響最大的，但竟然把同學關在門外？我們的楊綱凱教授和蘇基朗教授，就是那些負責推行語言政策的曾信誓旦旦會以開放的態度衷心諮詢和接受同

學意見的副校長和教務長，竟然無動於衷，悠悠然地閒坐！我很疑惑，這就是他們尊重同學意見的方式嗎？

接著有更多校友表態，大抵是說學生這次是「踩場」、「搞事」之類，亦有校友大聲質問我，叫我唸出牆上的字（上面寫著「校友評議會」，大抵是諷刺我不識抬舉，這不是屬於我的地方）。我自命「睇得開」，很多時對保守（或反動）勢力的攻擊都甚少動氣。但在那一刻，我確實感到委屈和憤怒。拒絕溝通、惡劣的會議氣氛我也見過不少，但令人難過的是她／他們都是中大的畢業生，都是我們的學長、學姊啊！

糾纏了十多分鐘，在極度失望的情況下，我和另一位同學被數名校友挾著離去。一出會場，「陪伴」我們一同離場的校友可能所受的群眾壓力較少，說話亦更趨尖酸起來，跟著十數分鐘的對話，相信亦將是我人生裡難得一回的經驗了。

話說，其中一位彭玉榮校友（據筆者於 google 搜尋所得，他是本港某大銀行執行董事兼副行政總裁）向我大聲喝："I will use all my power not to employ you!"，大抵是指我永遠都不要寄望到中環打工了。我聽到這些自以為會嚇倒我的說話時，也真的忍不住用英語——一種權力的象徵——回應他："I feel really sorry for you."、"I can talk to you in English if you really want to." 說完後，他臉上浮現出一副奇怪的表情。好像是錯愕，又好像是迷茫。我想可能他似乎預計不到這群身穿 T-shirt、波鞋、牛仔褲的低下學生竟也能操著一口流利的、屬於統治者與特權階級的語言，權力關係失去絕對優勢，一時反應不了。回過了神，他又再次回到打工的問題上，告訴我：「*Next Magazine* 裡面嘅黑名單係真的！[1]」接著，他又不斷追問我的名字，說話時更拿著由紙張卷成的「棍」，在我胸前不停地揮動著，活像警官審問疑犯似的。我反問他為何這樣問，他竟然說：「我鍾意擇你名就擇你名！」我真的是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實在不明白他憑甚麼能以這麼一種高高在上壓倒一切的姿態來質問我？有財有勢就自以為可以掌握別人的命運？還真是幼稚和野蠻得可以！據知這名校友亦擔任不少社會公職，這麼一個有成就有社會地位的校友，就是中大校方常掛在嘴邊要培養的「具國際視野」的世界人才？

另有一名馬紹良校友（據聞是教育署的高官），亦以一副不屑的語氣嘲弄我們這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黃毛小子：「等下啦，細路。」言下之意是，我們還未夠資格參加這些校友的「私人派對」，等畢業後再算吧。那一刻，我終於明白，原來學生真的沒有說話權。

1 二月份的其中一期《壹周刊》的〈中環人語〉專欄中，有指於中環工作的高層人士，由於不認同學生會反對「偽國際化」，要把中大學生會的當權派列入黑名單，永不錄用。

說英文的中文大學

◆ 梁文道

原刊於《明報》，2005年2月9日

英聯邦的秘書長 Sridath Ramphal 回憶他曾在1975年時拜訪斯里蘭卡總理 Sirimaro Bandaranaike，商談有甚麼是英聯邦可以效勞的事時，總理的回應是：「快多送些人來指導我們的老師教英語」。原來這位總理的丈夫二十年前從政的時候，正是斯里蘭卡依據民族主義原則建國的高潮，他大力推行民族語言政策的結果，就是二十年後，這枚昔日大英帝國的海上珍珠已經失去了英語。總理解釋說：「我們的農夫使用進口的設備和化學農藥，但他們看不懂上面的英文說明書」。

這段小故事不同的人看了會有不同的反應。有人會說這是香港的前車之鑑，還是趕快把母語教學丟到一邊去吧。也有人會說這是資本主義市場的力量把英語推成國際語言的另一例證。我自己看到的，卻是一種語言的斷裂。斯里蘭卡農民當年遇到的問題，是他們的母語無法處理日常生活所需，因為他們的農務工作必須使用一些先進的裝備，而與該等裝備相關的語言，是他們陌生的英語。也就是說，斯里蘭卡的官方語言 Sinhalese不足以幫助國民處理所有問題，他們的語言，在生活中的某些處境是空白的，在那些處境之中，他們必須使用另一種語言。我們可以繼續推想，就算他們看得懂進口農藥和肥料的說明書，他們又能不能把說明書上某些植物的學名，和他們習慣的作物俗稱聯繫起來呢？情況就像能夠說寫聽讀英語的人，卻不一定看得懂進口藥物的說明書。讀者們自己可以試試看，去藥房架子找一瓶治「風濕」或「生蛇」的進口軟膏。

這種語言的斷裂，我們香港人並不陌生。曾幾何時，就算一個識字但不懂英文的普通人，也要為了填寫一份官方表格費煞思量。一個老百姓站上法庭接受審訊，控辯雙方說的話都圍繞著他，他卻一個字都聽不懂。我們大學裡面的專業學科使用英文教材，以英語教學，訓練出來的學生，則在中文世界裡面生活和工作，用中文向病人解釋病情，用中文向客戶解釋案情。在這個環境底下，英文是一種專業語言，比起日常使用的中文高了一級，不會英文是值得自卑的，反過來不懂得用中文解釋專業知識時說一句「抱歉，我的中文不好」，不止不需慚愧，甚至可以彰顯出專業的身分。

錢穆的堅持切中殖民地要害

只有在這種背景底下，我們才可以理解當年錢穆堅持把中文大學叫做「中文大學」的苦心孤詣。一代宗師錢穆先生的這種堅持，不是無謂而狹隘的民族主義，而是切中殖民地社會要害的遠大企圖。大學的功能主要有三：一是教育學生，二是開發新知識，三是服務社會。所謂服務社會，指的不只是現在流行的學企合作，把科學研究和產業需求掛鉤起來。服務社會還包括要把大學裡面開發出來的知識和觀念，透過一代又一代的學子和教師們的演說寫作，流播向社會各界。聽起來很抽象，但只要看看我們報紙上的文章，甚至每日使用的語言，就會發現有多少養分材料源出學府。張五常津津樂道的「產權」，金耀基的「行政吸納政治」，甚至廣告上的「乏晰邏輯」和「納米科技」，無一不是學院提供給社會的觀念武器。倒過來看，社會的日常語言也為學術界（尤其是人文社會科學）供給了大量的基礎，讓學者們可以在其中涵泳提煉。這是一個有益的健康循環，使得學術不致於淪為小圈子的智力遊戲，也使得社會整體的智識水平不斷提升。

這個循環的前提之一，就是學院內外的語言沒有障礙。但是我們都知道學術的專門措辭，離日常生活本來就有一段距離，很難也不大可能完全填平。不過如果學院內的主要語言也是它所在社會的母語的話，這段距離就有望縮短。在各種國際大學綜合排名裡面，名列亞洲前茅的往往是東京大學，但它的教學語言是日文，事實上日文在日本學術界根本是最主要的語言。日本的岩波文庫以出版嚴肅著作著稱，但一直有不錯的銷量；日本社會的文化水平在亞洲區內也屬前列位置，這些現象之間的關係絕非偶然，正是學院內外良好互動的結果。

作為一個校友，知道母校香港中文大學正準備把教學語言改成英文，以期建立一間既國際化且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學府，我實在感到悲涼。看來新任校長劉遵義和校政當局，並不理解前人對香港對中國和對整個華文世界的偉大抱負，更沒辦法從近年香港母語教學的爭論中，認識到長期以來學術語言和日常語言割裂的痛苦後果。

請看日法德大學的經驗

我建議大家不要輕易墮入「英語=國際化」和「中文=本土化」簡單對立的陷阱，更不要輕易地把國際化和世界一流變成同義詞。某些英語世界的高等院校招收了大量香港學生，甚至出現了導修課用廣東話的情況。它們的確很國際化，但它們算得上世界一流嗎？相反地，東京大學上課用日文，巴黎大學和柏林自由大學也各以母語為教學語言，難道它們就是三流的地方學院嗎？決定一所大學國際化程度和水準的主要準則，恐怕不在教學語言是不是英文。

中文大學的獨特使命不在固守中文，而在中文本身的「國際化」。所謂中文的國際化，意思是不拒外來文化，反而要把它們吸收轉化成中文思考的新領域。

過去百多年來，經過許多知識分子和翻譯家的努力，大量的外來語為現代中文開拓了前所未有的新領域，而且又流向社會大眾，豐富了中國人的眼界和思考範圍。中文大學作為一家大學，當然要符合university的本意，以普世主義的精神泯除國際邊界；但坐落在香港和中國，又使得它必須肩負把外來知識轉化成本土資源，以及將學術研究的成果向社會開放的重任。因此，中文大學以中文為主，但卻一向實施雙語教學。

由於華文世界的學術規範和制度不夠嚴整，沒有足夠的刊物出版社名列A等，本地社科學者在近年的大學改革之中，為了爭取研究的出版機會，已經逐漸放棄香港研究，轉向國際學術界更加關注的其他領域。這種情況的吊詭之處，是我們以公帑聘用的學者，愈來愈有國際資格，但他們距離我們卻愈來愈遠。如今中文大學若連課堂上的語言都改成英語，那就只會把學院變成一個更國際化，但也更封閉的象牙塔。

國際視野？望向哪裡？（破解殖民語言想像之一）

◆ 葉蔭聰

原刊於《香港獨立媒體網》，2005年2月25日

在《黑皮膚，白面具》中，法農（Frantz Fanon）講了一個故事：一位法國殖民地馬提尼克（Martinique）島的男子，剛到了巴黎，便大步走進酒吧，大聲地學著法國人說話，學過法文的人都知道，法文的「r」音很難發，也是法文一大特點，這位男子於是特別把音拉得很長，說得很大聲，英譯者把這句話轉成：Waiterrr!! Bing me a beeya 。

他期望巴黎人稱讚他：「老兄，你的法文說得真『像』個白人！」

二十一世紀的中文大學高層期望美國人稱讚中大：「嘩！你們中大課室裡都說英語，真『像』國際化大學，倒不太像『中文』大學！」

這次中大教學語言的爭議，最值得高興的是，中大不少同學，敢於跟校方及老師辯論，但校方，以至一些同情學生的老師的回應，卻令人失望，這多少揭示出香港社會隱藏多年的殖民情結（colonial complex），從來沒有消散，反而我們在這些情結裡鬱鬱寡歡，時而黯然自卑，時而莫名亢奮。

殖民情結，是一個法農的用語，他說，這種情結令人相信，獲取（前）殖民者的語言，是獲取（前）殖民者權力的階梯；今天早已回歸的香港，對「殖民」左閃右避，倒是產了不少新的理論來延續殖民情結。

（以下評論的對象，部份是認識，也是我敬佩之人，希望我的批評不會導致個人恩怨。）

國際視野論

中大馬傑偉教授雖然反對校方，但是，他對「國際視野」還是相當迷戀的。

「大比例的科目轉以英語授課，如果能吸引較多的外國和內地學生，我由衷覺得有利校園的多元文化和學生的國際視野。」（馬傑偉，〈建立一間本土化國際化並重的中文大學〉，《明報》，2005年2月14日）

這其實不值一駁，如果英語授課，增多外國學生，就具有國際視野，我們那些港大（英語授課）畢業，兼到過英國或美國進修的高級AO，應該可以令我們的特區政

府很有國際視野；當然，不少人只好怪董特首，不幸的是，他也是在英國唸書，與不少外國人打過交道的。

當然，以英語作學習語言，與外地學生經常交流的，不少也很具有國際視野，正如用中文及廣東話學習的本地學生，也可以很具有國際視野，只是這些都不是必然的。

談視野，先要談想看甚麼？看到甚麼？坦白說，我在那些整天在談國際視野的人口中，聽不到他們看到甚麼，最多也只聽到多一點別人的文化經驗，但我聞到的，是對英語的迷信，英語是帶領我們通向國際視野，通向國際化之路，這樣，我們便升級，比較「像」那些英美的「國際化」大學。

我有一位學生，經常與美國交換生混在一起，英語說得很不錯，也交了一位美國女朋友，但他卻不想去英美，他打算要去墨西哥交流一年，他看到甚麼？他看到香港的（後）殖民狀況，關心教育問題，看到第三世界，當然也看到著名的 Zapatista；他告訴我，正打算學西班牙文，並一如以往的努力寫中文文章，用廣東話兼英語在寂寞的嶺南校園裡跟人抬揁。

今天的學生如果沒有所謂國際視野，不是因為他們都用中文及廣東話學習，而是不知要看甚麼，看香港以外的東西有甚麼意義；我唸大學時，同學之間很關心東歐發展，他們看的是國內著作，為甚麼他們有這種視野，因為那時正值八九年北京學生運動引發的民主浪潮，民主想像澎湃，才把大家的眼睛投往那些陌生的國度。

所以，在這場討論裡，梁文道還是值得尊敬的，他談學術語言與日常語言之間的斷裂，其實是（後）殖民的處境，不論他的籌謀是否完全正確，但他的確清楚提出，要連接這個斷裂，不能輕言減少運用本地語言在大學教育裡。

談甚麼國際視野，不如先談自己有甚麼籌謀（project），以至這個籌謀在跨地域（translocal）的處境中有甚麼意義，根本沒有一種現成的國際的視野。

奢談國際視野，往往其實看不到甚麼東西，只是一張殖民者留下來讓我們蓋著眼睛的黑布，我們都變成沒有盲人杖的盲人，跟著別人走。

「國際學術平台／中心論」？

國際視野外，另一個流行說法是「國際學術平台／中心論」。李詠怡說：

"More importantly, the use of English has allowed both the teachers and students of CUHK to have direct linkage with the centers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that predominantly reside in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Taking Political Science as an example, even China Studies today is a heavily English-dominated field of studies. The best centers of China Studies are physically located in the West.

The major international journals and writings on Chinese politics are published in English, not Chinese. Major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are conducted in English. In short, the use of English is pertinent to maintaining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of this university. （An open letter to the students of CUHK）”

讓學生靠近，或所謂接軌國際知識生產中心，是否大學教育的目的？這其實是十分令人可疑的。

作為一個老師，我會比較期望學生學好英語，跟印度人打交道，多於要他們擠身那些所謂國際知識生產中心，究竟香港有多少學生有機會進入國際知識生產中心？

更重要的問題是，學術實踐就是要向那英語世界的知識生產中心靠攏？恐怕那不過是我們仍然以西方的眼光看我們自身的結果，但在這種眼光裡，我們永遠不夠班，我們永遠距離那個中心很遠，我們很自大，覺得自己要跟哥倫比亞呀，哈佛呀，史丹福呀，一較長短，我們很自卑，我們覺得自己水平不夠，那不是殖民情結的翻版又是甚麼？

以西方為中心的學術體制，在美國以至本地大學高層吹噓之下，它不是一個中心這麼簡單，它是一個層級，一方面，它吸納了本地精英，另一方面，它貶抑及排斥專注本地或非中心的學術實踐；例如，做香港研究的學者，要打入這個中心的困難，是可想而知的，但大學卻偏偏越來越以那個中心作為衡量標準！

學術實踐與生產，不一定以西方中心為目標，台灣的陳光興等人搞了一本叫Inter-asian cultural studies的學術期刊，英文的，由外國最主流的學術出版社（Routledge）出版，但投稿人主要以亞洲學者為主，甚至翻譯不少亞洲地區的社會運動文章，他們要促進亞洲地區之間知識與社會實踐的互動。

他們有自己的籌謀，有自己的價值體系，對不對，好不好，我們可以再討論，但總比以脫離本地，脫離跨地網絡（華文的學術生產，其他亞洲地區與香港的互動等等）的西方學術中心，作為自己的價值體系要好得多。

香港回歸了，但殖民情結多的是，但學術界裡自己的另類籌謀，自己的另類價值體系卻嚴重缺乏！

下次再談這個「中心」前，請各位先看陳光興與錢永祥寫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之下的學術生產〉！然後再想一想，是哪個中心，是別人的中心？還是自己的中心？自己的主體在哪裡？

國際化與語文政策

馬國明

原刊於《令大學頭痛的中文》，中大校友關注組，2007年

中文大學兩、三年前提出國際化的口號，主張改變一向以來教師自行決定教學語文的政策，大幅增加英語授課的學科數目。此事引起校內的師生和校外的校友廣泛關注；學生、校友以至校方都曾在報章撰寫文章，闡釋立場。

中大創校已接近半個世紀，校方因應當今社會的情況作出變更，實在責無旁貸。問題是簡單的一句「國際化」是否足以回應半個世紀的急劇社會轉變。事實上，在過去兩年多的討論裡，便有梁文道校友指出，逼切需要國際化的不是中文大學，而是中文；中文大學作為一所以中文先行（起碼在名字上）的大學對中文國際化一事更是責無旁貸。梁校友的觀點極之有見地，但中大校方卻似是充耳不聞；即使是雙語政策委員會日前發表的諮詢文件亦迴避有關討論，令人遺憾。

中文國際化的迫切性

中大校方一方面提出國際化，另一方面對國際化的內涵卻簡單概括為英語授課，完全忽視中文國際化的迫切性；令人懷疑校方對於中大的使命，究竟有多大的承擔。中大的全名是「香港中文大學」，中大校方提出國際化之餘並沒有說要更改名稱，因此這篇短文旨在提醒中大校方何謂「香港中文大學」。

中大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初遷入今日的校園時，恰好是香港社會年輕一代，包括為數不少的中大校友，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的年代。雖然後來港英政府接納中文為官方語文之一，並規定所有政府公函都中英文並列，但法律條文和法庭用語一律用英文，商業上的書信往還亦以英文為主，客觀上中文頂多只是二等語文；更要命的是中文只能在現代社會的邊緣打轉，無法進入現代社會生活的核心。加上中國大陸經歷長達十年的文革浩劫，中文出版物除了中央政府的宣傳文件之外，便完全欠奉。這種情況直到1976年四人幫倒台後才有所改善，但社會科學學科的中文出版物仍是嚴重缺乏。影響所及，連一些簡單和基本的現代社會概念，用中文表達往往出現詞不達意的問題。

舉一個簡單的例子，香港刻下正進行多個市區重建項目，負責的機構名為「市區重建局」，英文名稱是 Urban Redevelopment Council。九七前後香港有一個民選成份

佔了頗大比例的市政局專責今日由食環署和康文署管轄的事務，英文名稱是Urban Council。究竟應怎樣用中文表達Urban一詞的意義？是市區還是市政？如果有人認為這樣的問題無關痛癢，留待翻譯專家解決，無須小題大做，那便無法掌握當前在全球範圍內出現的Urbanization。據聯合國的統計，全球超過一半的人口現在居住在城市裡，而且比例還急速增加，將會對全球的政治、文化和生態做成重大的影響。那麼，Urbanization是市區化、市政化還是索性用另一名稱如都市化？名稱上的混亂其實也是概念上的混亂或根本就一片模糊。

類似的例子俯拾皆是，像Identity寫成中文可以是身份證（Identity Card）的「身份」，更可以是民族認同（National Identity）的「認同」；究竟是身份還是認同？問題絕非無關痛癢，將 National Identity 寫成民族認同帶有強烈認祖歸宗的傳統意味，稍為偏離即變成大逆不道。寫成民族身份則完全切合現代社會的多元性，民族身份只不過是現代社會多元身份，如女性主義者、同性戀者、雙性戀者、無神論者、馬克思主義者、信徒、神職人員、社工、教師、學生、校友等等當中的一種，個人可以自行決定哪種身份才是最重要。不同的寫法立刻帶出截然不同的立場，絕非無關痛癢。

以「國家」一詞作為說明

事實上，中文只不過是游離於現代社會邊緣的二等語文，此一事實的後遺症正不斷折磨今日的香港社會。今日的香港社會正接受「心繫家國」之類的愛國教育，可是「國家」這個以中文表達的概念，從現代政治哲學的角度而言是混淆不清、不能成立的。在現代社會裡，「國」和「家」是兩種絕然不同的領域，家庭是純粹私人的領域，是個人情緒需要得到滿足的領域；國則是完全屬於公眾，在原則上要完全公開的領域。在英語的語境裡除了用 country, nation, kingdom 這些字眼來表達國的意念之外，更有 state 這個同時表示境界或狀況的字眼。「國」字頂多只有 country 和 kingdom 的意思，完全沒有state或境界的意義。或許這正是為何在中文的語境裡會硬將國和家兩種不同的領域扯在一起的因由，除了混淆視聽，更阻礙香港以致中國的發展，尤其是政治發展。

相信很多人仍記得2003年香港特區政府為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時，支持立法的政黨在街上拉起橫額，上面寫著「沒有國、哪有家」的字句。中文的語境硬將國和家兩種不同的領域扯在一起，才會出現「沒有國、哪有家」這種望文生義的見解。將這句說話譯成 No Country, No Family 仍勉強可以，但譯成 No State, No Family 則明顯不符實情。土耳其和伊拉克一帶的庫爾德族人、西班牙的巴斯克人、加拿大和澳洲的土著都沒有自己的State但卻有Family。2003年在香港的人應該謹記中文的貧乏可能引致嚴重的政治後果，甚至中國大陸政治上和法制上總是無法達到國際標準的事實，也是源於中文的語境無法表達現代社會裡「國」一字的全部意義。

很多人都知道現代社會講求行政、司法和

立法三權分立，其實現代社會更講求私人、公眾和半公半私的三重領域，各有所屬。家庭是純粹私人的領域，代表政府的人員如警察無權入屋搜查，個人在家庭的領域內追求的，是個人情緒需要的滿足，談不上甚麼家國大事。家庭以外尚有半公半私的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和完全公開、屬於公眾的 State。公民社會是一個半公半私的領域，因為它讓人們公開追求一己的利益，毋須偷偷摸摸。State則不然，這是一個完全不涉及私人利益的領域，是完全屬於公眾的。中國大陸連人家生多少孩子也要管，當然不會限制公安人員入屋搜查；概念上硬將家和國扯在一起，實質上也不會當家庭是一個純綷私人的領域。既然無法區分公和私的領域，也就不會有半公半私的公民社會讓人們公開追求一己的私益，這只能偷偷摸摸地進行，貪污腐敗之風當然熾烈。另一方面，State這個領域讓人們體會一種與家庭甚至公民社會完全不同的精神，因為完全不涉及私人利益；因此在黑格爾的哲學體系裡，State 雖然是人們道德發展得以達到最高境界的領域，黑格爾亦因而普遍被認為是 Statism 或國家主義的表表者，但起碼黑格爾提供了一個為何要愛國的理由，而且是一個個人自行選擇味道十足的理由，因為愛國無非是為了提升個人情操，而且愛國的先決條件是國真的是一種完全公開和完全屬於公眾的境界，一黨專政的局面是難以叫人愛國的。香港今日處處宣揚愛國主義，但卻將愛國作為不言而喻、自明的大道理；有時更將家和國混為一談，如「心繫家國」之類的宣傳，不外是賺人熱淚，完全未達到理念的層次。中國政局苦無突破，道理在此。

香港中文的獨特處境

中大校方要增加英語授課的學科，提出國際化的口號為理據未免流於空疏；中文的困境、中文語境未有進入現代社會生活的中心才是最好和最有說服力的理由。但中大校方既然不打算更改名字，仍然沿用「香港中文大學」的名稱，校友、師生以至廣大的社會人士便會有合理的期望，期望中大校方能為中文出點力，提升中文和現代社會接軌的水平，而香港是最有條件促成這項影響深遠的任務的地方。中文由數千個常用的方塊字組成，每一個方塊字又經過數千年的歷史文化雕琢，無論是賦上新意或是抽出新義都是難於登天。因此在中文的語境中要吸納新的意念一點也不容易，因為不能像字母拼音的語文那樣，索性拿人家的字詞來用便是了。香港位處中國南方的邊陲，遠離中原文化，又曾被英國人統治長達個半世紀，雖然香港人的口語其實是廣州話，但卻包含大量由英文音譯的字眼，如巴士、的士、士多、多士、沙文治、沙律、賓治等等，個別字眼更加以改良，如Fans的地道稱謂變成Fan屎，把代表眾數和本是輔音的s說成中文的「屎」。由於中文裡的每個方塊字都有自己的意思，將Fans說成和寫成Fan屎便也產生一種意外收穫，充份表達了現代社會的流行文化那種盲目追捧明星的心態底下，造成一方被捧得高高在上，另一方則不斷地自貶，甚至有如糞便般的不良現象。

香港人說的廣州話由於是口語，因此十分貼近生活，像「空調」香港人會說「冷氣」。空調跟英文 Air-conditioning 的意

思完全一致，空調可以把氣溫降低，亦可以調高。香港的冬天氣候溫和，氣溫降至攝氏十度以下的日子不多，很多人的家裡都沒有設置調高氣溫的裝置。但香港的夏天天氣炎熱，濕度又高，冷氣機幾乎家家必備。這種裝置只能調低氣溫，不能調高氣溫，英文 Air-Conditioner 的稱謂及不上冷氣機直接了當道出香港的實況。香港人的廣州話一方面大量將英文的字眼音譯後直接據為己用，另一方面緊貼實際的生活型態，隨著生活型態的改變而改變。具體的例子俯拾皆是，像男女之間的關係，在香港的廣州話裡由男方採取主動的「追女仔」演變為相方互動的「溝女」或「溝仔」，之後再演變為互相競逐的「界」（同音）。雙語政策委員會建議中大日後硬性規定內容涉及普世價值或範圍的科目以英語講授，個別牽涉本地研究的科目才採用本地的口語。但在香港生活一段日子的人都會聽過「環球金融、地方智慧」這宣傳語句，掌握「地方智慧」才能在全球化或國際化的大氣候底下立足；普世和地方二者雖然有不同的統攝，但亦有重疊之處。香港的口語緊貼現實生活，而香港又是現代大都會，與現代社會兼容的平台比任何一個中國大陸的城市都要廣闊，香港的口語除了表達本地的生活特色之外，亦包含普世的元素。硬性規定本地研究的科目才能用香港的口語授課，其實抹煞香港口語的普世性。

不過，香港常用口語的普世性，卻不是中大教學語言必須「保持不變」的最主要理據。在香港，每個學習書寫的小學生都會不斷被老師或父母提醒書面語有別口語，不能以口語書寫。胡適先生在五四新文學運動中提出「我手寫我口」作為更新中文、擺脫中文淪為八股文的囚徒的原則和方法。一個世紀之後的香港人書寫中文時，卻切忌「我手寫我口」，這種情況源自香港位處中國南方邊陲和歷史上是英國的殖民地；但香港的地理位置和獨特的歷史從來是香港優勢所在，「我手寫我口」的普世原則不適用於香港，也是香港人在語文上的優勢所在。每一個口講香港廣州話而又懂得書寫中文的人，心裡清楚明白自己一直「講一套、寫一套」，像「講一套、做一套」的情形一樣，講的比做的和寫的其實更動聽、更精彩。每一個口講香港廣州話而又懂得書寫中文的人，便也更明白中文在現代社會裡無時無刻呈現的張力。組成中文的每個方塊字都可謂千錘百煉，不能輕易改動；即使簡體字已推行多時，但不少文人雅士仍甚為抗拒，認為破壞了漢字和中文的完整性。其實簡體字的問題已清楚說明中文在現代社會的困境，有一派意見甚至認為要全面改革中文，像西方的語文一樣以拉丁字母取代方塊字，漢語拼音便是這一方向的第一步。在香港的人卻可以更進一步認識到中文除了在形式上須漸漸向字母拼音的語文靠攏之外，更須在內涵和理念上跟上現代社會的急劇轉變。很明顯，即使反對的聲音十分響亮，中文在形式上需要變革的議題已正式放在議程裡。在內涵上的變革則不然，文人雅士普遍沉醉在中文背後那悠長的歷史文化；香港的邊緣位置和不光榮的殖民歷史形成的社會條件卻足以令人從夢中醒來，這是一所以「香港中文大學」命名的學府需要重新認識和認真對待的。

中文和現代社會之間的張力

結束這篇文章之前，再舉一個發生在香港的簡單事例以作引申。有關「數碼港」的爭議至今仍聚訟不休，批評者認為項目名大於實，特區政府卻一口咬定項目是名副其實。其實最值得爭辯的問題在於項目的中文名字和英文原名的重大分別，「數碼港」的命名實在不倫不類；數碼是處理訊息和影像的新技術，作用是將某些現實或觀景再現，數碼技術尚未面世之前，只能倚賴模擬或類比的技術，而相機、電視一類能將現實再呈現的儀器在新的數碼技術面世之後，由於配備新的技術而變成數碼相機和數碼電視。但港口並非現實再現的儀器，「數碼港」的命名因而不倫不類。「數碼港」的英文原名Cyberport卻不存在這樣的問題。Cyperport的意念應源自Cyberspace，後者源自同名的科幻小說，可當是互聯網的別名，是由電子儀器打造出來的想像但又能被加以運用的空間。Cyberport因而清楚告訴人們這並非人們習慣見到的港口，而是一個想像但又能被確實運用的港口。中文的字詞怎樣也不能表達出這種既是想像又是確實的境況，唯有蒙混過關，以「數碼港」這個不倫不類的名稱頂替。在香港，只要對身邊發生的事不至視而不見，便會見到中文和英文背後的理念之間的巨大鴻溝。由於事例俯拾皆是，習以為常、見怪不怪是大多數人的反應，最後更變成視而不見。以香港的口語——本身已是充滿張力的語言——講授普世性的學科，中文和英文之間的差異和背後理念的張力必會表露無遺。

香港的殖民歷史奠定英文為先的情況，這種情況通常只表現為重英輕中的不良結果，但英文先行其實可以被轉化為檢視中文在現代社會裡的困境的台階，英文先行不應只是為了某所大學的國際化，更應是為了中文的國際化。為了達到後者，必須時刻緊記中文和現代社會之間的張力，抹煞本地口語的普世性，限定本地課題的科目才能用本地的口語教學是倒退的做法，因為這會忽視中文和現代社會之間的張力。

2006年9月28日

全球化，遺忘所有非英語文化？

陳光興（新加坡大學亞洲研究中心資深訪問研究員）
錢永祥（中研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

原刊於《聯合報》，2004年9月24日

近年來，政府及學界領導階層，積極加強學術評鑑的制度（包括升等及續聘、學術刊物的審查評等、大學評鑑等等），進而加上國際化、英語化等要求，並且將資源分配等辦法，與評鑑結果直接掛鉤。一時之間，整個高等教育界都在隨著評鑑這部大機器忙碌。

可是這些制度背後的動力何在、理據是甚麼？人文社會學科的性質會不會遭到扭曲？對於學者——尤其資淺的學者——是不是公平？在在都是迫切的議題，極需展開公共討論，讓學術工作者廣泛參與。這次，許多學術社團共同舉辦「高教評鑑研討會」，目的即在此。

不過，身為學術工作者，我們的視野不能侷限在法令規章等行政層次。學術評鑑不僅是學術行政問題，更是一個關於知識生產的政治經濟學問題。當前學術生產方式變動的動力和方向何在？這是我們反省的起點。我們認為，「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之下的學術生產」，是應該突出的基本脈絡。我們的回應，也不能脫離台灣的歷史脈絡。

1980年代末期，蘇聯東歐社會主義政權相繼瓦解，冷戰體系在歐美地區結束。以美國為主導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動力，快速形成主導性力量。在大環境的變化中，學術生產方式也發生巨變，全球競爭的市場導向成為支配的力量。九十年代以後的美國大學，開始出現前所未有的專業化現象，背後的基本邏輯，其實就是走向私有化及市場化。

以美國為核心的新自由主義市場化的走向，不但牽動後進國家，也成為後進國家模仿、跟進的標準。台灣、新加坡、南韓乃至於中國大陸等地，在彼此競爭的壓力下，紛紛把學術生產作成可以量化的指標，歸結到國家總體競爭力來計算，以量化得分多少來實施獎懲。下降到個別研究教學人員，應運而生極為簡化的量化記賬方式，即所謂的SSCI及AHCI、TSSCI等體制，更是評鑑機制的核心。

新自由主義的趨勢，就人文社會科學而言，很容易將「研發」及「政策」拱成主導的學術生產方向，阻絕人文社會學科的自主性及反思性，其間隱憂值得深究。而索引體制本身的眾多成見和扭

曲，尤其是移植到台灣之後的逾淮為枳現象，也極待梳理正視。

不過，當前台灣評鑑體制面對著一個關鍵的問題，極需先有所澄清：我們到底是活在一個單一的、英語的新殖民世界，還是在多元文化、承認異質的後殖民世界？全球化是否只是意味著美國化，剷除、遺忘所有非英語的文化？這不只是規範性問題，也是一個有關現實自我界定的分析性問題。

我們認為，台灣的學術生產，不可能脫離台灣的總體歷史與地理脈絡來思考，因此在提出台灣學術生產國際化的想像之前，有必要先釐清台灣所處的基本脈絡。相較於台灣中心論，台灣的主體位置可以視為一個結點（nodal point），也就是說台灣作為一個地理歷史空間的想像實體，基本上處於幾個相互重疊、作用的生活網絡交叉點上：

台灣主體 不能聚焦在中台對立

台灣在地：在近代史上，台灣從來沒有處於關閉性的孤立狀態。在不同歷史時期，幾個網絡的交織，構造了台灣主體的現代性。台灣的異質主體不能化約到省籍、族群來理解，或是僅聚焦在中台對立關係中來看待。

華語學界 不應受制於政經格局

兩岸關係：毋庸置疑，兩岸關係是當前台灣政治格局中的首要矛盾。但是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大陸已經如同磁場一般，世界各地都企圖與其發生關係，台灣的學界大概也很難背道而馳；華語學界應該獨立於政治經濟的勢力，不受制於既有的政治經濟格局，才能開啟更為寬廣的學術視野。

華文國際 不被台灣承認的事實

華文國際：台灣的主體意識，通常不承認華文是一種國際語言。其實，華文國際網絡遠遠大於台海兩岸或是三地的政治想像。中國大陸與台灣都必須正視全世界各地——港澳、東南亞、北美等——龐大華人社群或國家的獨特經驗，也必須正視非華人社會（例如南韓）重視華文的事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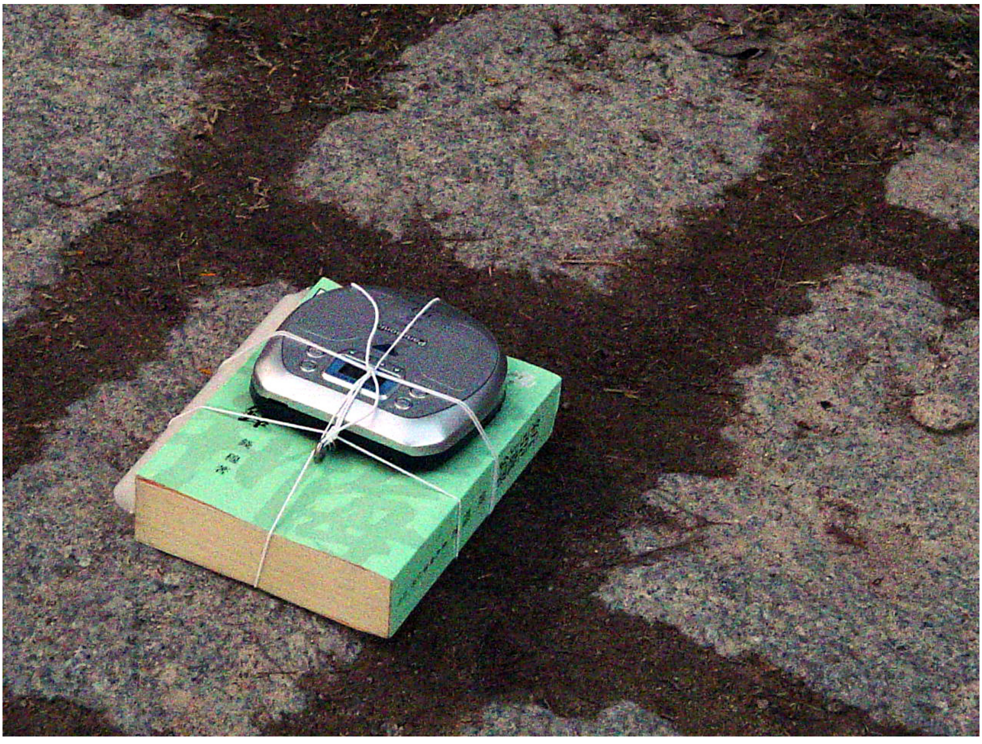
亞洲區域 必須面對的統合大勢

亞洲區域：在歷史及地緣的關係位置上，台灣並不外在於亞洲，反而是處於相當重要的結點，連結東北亞與東南亞。九十年代以後，亞洲更是無法迴避的生命狀態，所謂的外籍新娘、外勞、看護工，早已成為我們日常生活中的重要部分。區域性的統合乃是大勢，台灣必須面對。

全球場域 別自限美國學術附庸

全球場域：這裡所指的全球，當然不只是美國。上述的華文國際與亞洲區域，也都是全球化操作的場域。戰後的「脫亞入美」，表面上替台灣搭起了一條通往全球化的快速道路，但是由於只是單邊關係，沒有全球性多邊關係的開展，反而會在全球化運動中受限於美國學術的附庸身分，喪失了自主性。

台灣的主體性，既然處於這些客觀存在的網絡之間，台灣學術的國際化與全球化方向，乃至於學術評鑑以及知識生產的制度設計，便也應該本著這樣的視野去開展。兩岸關係、華文國際與亞洲區域，其實正是全球化所循的軌跡。



An Open Letter to the Students of CUHK

Eliza W.Y. Lee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原刊於中大內聯網新聞組 CU Forum

Dear Students,

I am writing this letter in English solely because I can type and write much faster in English than Chinese, and with the pressure of work I do not have time to translate this into Chinese. I also feel that writing in English will allow my ideas to reach our non-Chinese reading students and colleagues, thus fostering a more inclusive dialogue. I hope the English will not constitute an intellectual or psychological barrier between us while I try to get my message across.

Recently, I have been reading a lot of comments by students on the issue of language of instruction, including of course the letter written by the Students' Union. I am not here to defend the policy of the university, and in fact I believe there is much room for improvement regarding the policy formulation of "internationalizing the student mix" and the consultative process. The purpose of this letter is, however, to offer my response to the major arguments advanced in your comments.

The argument against the use of more English as the teaching language has so far been framed in terms of four themes: 1)nationalism and decolonization; 2) the mission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3) effective learning, which requires the need to be educated in one's mother tongue; 4) cultural rights and identity. I would like to explore whether these four themes should lead us to the conclusion that Cantonese should be used exclusively or predominantly as our language of instruction.

Nationalism and decolonization – Many of you argue that English is simply a language of the former colonizer that was imposed on us. Moreover, a relationship of domination and subordination between the colonizer and the colonized was established through culturally privileging English and belittling Chinese. Decolonization requires us to rediscover our Chinese roots, and thus Chinese should now replace English as the dominant language in all levels of communication. This argument

should have led us to reflect on the fact that the dominance of Cantonese in Hong Kong, as much as the dominance of English, is the result of colonialism. British colonialism have led to the negligence of Putunghua education and the raising of several generations of HK Chinese that are poor speakers of Putunghua, thus rendering them unable to communicate with the majority of the Chinese population and their fellow Chinese citizens. The recognition of this historical shame should have obligated us to greatly expand the use of Putunghua instead of Cantonese as the medium of instruction in CUHK and all levels of schooling.

At the same time, we should be critically aware of the fact that Cantonese is not even the indigenous language of Hong Kong, and that the dominance of Cantonese is the outcome of a historical process of hegemony and homogenization that is arguably no less violent than British colonialism. Just think of all the new migrants who even today are regarded as less "Hong Kong" and discriminated against by the majority of HK Chinese because they cannot speak accentless Cantonese. The original inhabitants of HK were the Tankas and the Hakkas, who each spoke their own dialect. The majority of the population here are migrants or their offsprings and descendants. Although Cantonese speaking people have constituted the majority of them, there have always been a significant number of migrants from various places in China, whose mother tongues are not Cantonese. In fact, as recently as the 1950s, Hong Kong was a multiethnic society consisting of multiple linguistic communities, such as Shanghaiese, Chiuchauese, Fujianese, Toisanese, Shantungese, Hunanese, Ningpoese, Hakkas, Tankas, and many more. On top of that, there are non-Chinese ethnic groups who have lived in Hong Kong for generations, and whose ancestors came from Britain, Portugal, Russia, Central Asia, India, Southeast Asia, among other places. If the logic of decolonization means a total rejection of what was culturally imposed on us, we should have rediscovered either our Chineseness by fully adopting Putunghua as the official spoken language, or our multicultural roots by giving due regard to the rights and heritages of all linguistic communities. Either way, the hegemony of Cantonese should be questioned and de-legitimized.

The mission of CUHK : It has long been the mission of this university to promote bilingualism (meaning Chinese and English) and biculturalism (especially bridging the Chinese and the Western culture). What the founders of the three colleges (that originally constituted CUHK) had in mind was definitely not promoting a Hong Kong-Cantonese culture (which did not even exist in the 1950s when the colleges were founded) , but the national Chinese culture. Ideally, to fulfill the mission of bilingualism and biculturalism, Puotunghua and English should be the major

language of instruction of CUHK, and Cantonese should not have a strong presence. Many of you have claimed that CUHK has always upheld teaching in mother tongue. This could be true to the extent that the University has supported the use of mother tongue in foundational education. But I am not aware that CUHK has a policy of teaching in mother tongue, as there has never been a recruitment policy that requires all teaching staff be fluent in Cantonese.

Effective learning: The third argument contends that mother tongue is always the most effective way of learning, and the use of any other second language will compromise the purpose of education. This argument on the right to be educated in one's mother tongue is somewhat at odds with the first two arguments which, according to my analysis, would have required that Cantonese not be used as the primary teaching language but be put back to its place as a dialect. Interestingly, given this assertion, the student union in their open letter felt that it was perfectly legitimate to demand Mainland Chinese students to study in Cantonese which is often their second, third or even fourth language (after their own local dialect and English). While upholding the sanctity of learning in one's mother tongue, they also conceded that they fully understood the importance of English but felt that its use should only be confined to "reading materials".

If the use of Cantonese were the sole factor constituting "effective learning", it would require that the teaching staff of our entire university be Cantonese-speaking people only. It would require that CUHK stop admitting students whose mother tongue is not Cantonese. It would require that the university stop running all international exchange programs, especially not to send our students to foreign universities because there is no way they can learn "effectively" in a non-Cantonese environment. It would even mean that we stop inviting distinguished international visitors to come in and give public lectures because, after all, how effectively can students learn from their English (or Puotunghua) presentations anyway?

Obviously, if we turn our university into a Cantonese-only campus, it will seriously impoverish the academic environment and lower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and will not be conducive to "effective learning". Conversely, if we admit that the use of English is important if not inevitable, then "effective learning" must be understood as a multidimensional concept. I believe there are multiple factors that contribute to "effective learning" in the context of our university. For one thing, the teaching staff of CUHK have long been an internationalized group, and this has directly contributed to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here. There is no evidence to show that Cantonese speaking teachers are always

more effective than their non-Cantonese speaking counterparts. Some of the recipients of the best teaching awards have been English speaking teachers. Many non-local teachers have performed extremely well in teaching evaluations. More importantly, the use of English has allowed both the teachers and students of CUHK to have direct linkage with the centers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that predominantly reside in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Taking Political Science as an example, even China Studies today is a heavily English-dominated field of studies. The best centers of China Studies are physically located in the West. The major international journals and writings on Chinese politics are published in English, not Chinese. Major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are conducted in English. In short, the use of English is pertinent to maintaining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of this university. Time and expertise do not allow me to comment on the situation of all those monolingual countries such as France, Germany and Japan that are teaching exclusively in their own mother tongue. (I do know that at least France and Germany are opening in recent years and some of their universities are offering programs and courses in English in order to attract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any event, I do not think Hong Kong's situation is comparable to theirs, and I do not see how our quality of education will not be seriously compromised if we insist on teaching exclusively or predominantly in Cantonese.

Thus none of the three arguments, naming, nationalism and decolonization, the mission of the university, and effective learning, makes a sufficient case for using Cantonese exclusively or predominantly in CUHK. Instead, they all seem to point to the need for students to master multiple languages. Even without the issue of "internationalizing" our student mix, I doubt that we have a strong case to uphold Cantonese as the major medium of learning.

Cultural rights and identity : In many of your comments, the argument has been advanced that the history of western colonialism and the current trend of globalization have brought about the hegemony of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and their cultures, and have threatened the survival of other languages and cultures. English has certainly become the de facto supranational language, not only in the academic community but also in many areas of social and cultural exchanges. We certainly need to be highly vigilant of any unhealthy trend toward global monolingualism. On the other hand, the way to combat this trend is not to withdraw ourselves from participating in the center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or other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For one thing, the participation of non-Western people in the academic discourse of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has actually helped subvert the hegemony of western-centered scholarship. The scholarships of cultural studies and postcolonial studies are examples

of such "subversive" knowledge brought about by English-speaking intellectuals such as Edward Said and Gayatri Spivak who are of Third World origins. As far as Chinese people are concerned, actively participating in international activities and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are not mutually exclusive. In fact, active learning from other cultures will serve as a major source of innovation to our Chinese culture, and active interac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other cultures will augment the impact and contribution of Chinese culture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In fact, quite many scholars have also pointed out that in the amidst of globalization and the spread of English as a global language, what we are witnessing is convergence not toward global monolingualism but rather multilingualism in which people will be expected to master a few languages. As the Students' Union has mentioned in its open letter, more and mor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re interested in coming to this part of the world to learn Chinese, and this by itself is already an indication of the multilingual trend. But then why should students of CUHK allow themselves to lag behind this multilingual trend by insisting on learning in Cantonese exclusively?

This brings us to the issue of Hong Kong's cultural identity and how it can contribute to China's development. Many of you have insisted that the predominance of Cantonese is crucial to the preservation of our cultural identity. I beg to disagree. Aside from what I have already pointed out as the need to rediscover the multilingual roots of Hong Kong, we should also recognize that English has a central place in our economic, cultural, social and political spheres. I do not wish to deny that such strong presence of English is a legacy of our colonial past. On the other hand, I would question whether it is in the best interest of Hong Kong or China as a whole to dismantle such infra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Hong Kong. For one thing, our common law system which has significantly contributed to the rule of law and the protection of our way of life is entirely based on English. What we think of as the "indigenous" cultural traits of Hong Kong are mostly "foreign" in origin. They are actually the product of the fusion of the cultures of the migrant population and the foreign cultures that we have actively imported over the course of a hundred and sixty years. In this sense, Hong Kong culture, as many cosmopolitan migrant culture, is a fusion culture. The very possibility of such fusion culture is the openness of this society to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 and this is what makes us unique and distinct from the rest of China. Those who argue for Cantonese as the foundation of our indigenous culture are merely asking Hong Kong to turn inward. Such closing of the Hong Kong mind will only suffocate the continuous rejuvenation of our indigenous culture and sow the seeds of our own demise. In the past century, the characteristic of Hong Kong as an open

society situated at the margins of the East and the West have contributed significantly to China's development. Postcolonial Hong Kong should continue to play such "linkage" role if we wish to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and the Chinese culture in the 21st century.

I do not claim to have answers to all the questions regarding the debate on the language of instruction, but I do hope that my views on these issues will offer some insights for you to rethink the issues of the mission of CUHK and our own cultural identity. I welcome your feedbacks to my comments.

粵語霸權及後殖民香港狀況

◆ 鄧小樺

原刊於《拉扯在中英文之間——中大國際化特刊》，2005年2月

編按：本文為作者回應Eliza W.Y. Lee的文章（前文）的第一部分。

無疑，不同方言、語言之間的權力關係是十分複雜的，而令情況更為複雜的是香港的狀況。我願意在此提起（當然Eliza也會很熟悉的）周蕾的論調：香港的後殖民情況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因為香港是處於「殖民者與殖民者之間」。雖然回歸了宗主國，卻沒有獲得真正意義上的自治權，而宗主國也著意延續殖民式的統治，因此雖然香港回歸了，但其解殖情況則仍令人滿腹狐疑。

我們不妨從這種脈絡理解，為何在香港的解殖運動中佔主要位置的是粵語而不是普通話。中國政府只是在經濟方面賦予香港獨特位置，而卻沒有給予香港獨特的文化以存在空間。在文學藝術方面的情況尤其證明了這點。中國大陸的「香港文學研究」之典型論述是：「在九七之前，香港同胞還會對自己的身份有所懷疑，但回歸之後，一切的身份疑問已經迎刃而解、冰消雪融」——於是九七之後的文學作品若對自己的身份流露出疑問，便會被評為「落後於形勢」、「昧於現實」。然而香港人對自身身份的疑問何嘗停止過？

在這個層次上，代表官方的普通話扮演著殖民者的角色。現在許多名牌中學是以普通話教授中文科的，「滅粵」的行動正在悄悄進行中。這種名牌中學的滅粵行動與另一些新界為照顧新移民學生而使用普通話授課不同，前者背靠的是一種「官方——普世」的思維。當然，正是受到殖民者的衝擊，被殖民者的身份認同便開始建立。粵語作為一種媒介，對香港身份認同的想像便起著比英語和普通話都更強烈的建構作用。

我承認在Eliza所解釋的脈絡中，解殖的語言應該是普通話而不是粵語。但我所提出的（堪稱「大路」的）脈絡，我認為你也應該考慮在內，因為「普通話——中國」這一聯繫，在「香港——中國」政治圖景上佔據壓倒性的權力位置。

另外是粵語對其他語言的霸權位置，包括對新移民的標籤作用。這實在是很重要的問題，必須不斷不斷地提醒香港人

反省：我們不能一邊扮演被壓迫者，另一邊同時壓迫另一些更弱者。不過，可能是我過於樂觀，我覺得粵語及香港文化的討論，仍可以為這些問題提供觸發點及反省空間，讓我們警戒到號稱「普世」的價值與霸權的鄰近性。周蕾說，因為香港文化的混雜性，令我們對一切強調「根源」、「純淨」的論述都抱有戒心；情形未必如此美好，但有時我覺得也有類似的曙光。一群香港文化的研究者，能夠出版《文化想像與意識型態》一書來批判當時香港對中國在商業經濟上的殖民行動，可能會是一個令人樂觀的例子。相反，在「支持普通話」的話語中，鮮見像你這樣對權力敏感的論述。現在校園裡一些內地生認為「愛母語就不該在說話時夾雜英語，這是對母語的玷污」，這種語言觀相信Eliza也不會同意。

其實在這次的反國際化事件中，有許多校友都對粵語的霸權有很深的警覺性，他們所發出的論述，也必須被引入校園來。以我觀察，學生會的同學尚未至於固步自封，他們是願意閱讀這些論述，並把它們引進校園來的。當然能夠吸取多少還是看各自修行。因此「獨尊粵語」是言之過早。

笑中大——講方言的中文大學

◆ 幾位支持中大「國際化」策略的學生、校友

原刊於《號外號外！》，2005年3月9日

「整program啲數字唔係1就係0……我地依家寫個program先，exclude 左professor金同department，個program就係咁嘅，如果中大教職員與萬幾個學生作出反對or存有疑問，then校長你既選擇係0繼續推行or 1 立刻暫停，唔知校長你會return個咩value呢，同埋呢個program有兩個限制，第一個係一句statement之內答到我地，同埋你time limit只係一分鐘。」《中大學生報號外：校長回應國際化，英語授課不推延》中所引用之現場提問。

——國際化的你，看懂了嗎？反對國際化的你，看懂了嗎？

香港中文大學在最近的傳媒上真是風光無限，曝光頻頻。校方主張「國際化」、「英語教學」的改革方案，學生會「捍衛中文大學為華語世界服務的創校精神」，見面會諮詢會接二連三。校方聲嘶力竭謹小慎微，部分學生臨表涕零群情激昂。雖說數千年歷史橫亙眼前，似乎每一步探索都是步履維艱，但這樣一個可能導致的進步舉措亦引起如此爭執紛擾，也不免讓人再次感嘆啊。喪幡式樣的「哭中大」條幅觸目驚心，年前年後的文化廣場一片索然，再看看這《號外》中這唯一的一段現場原文發言，卻不禁失笑一笑這十幾億華人裡倒至少有十億看不懂更聽不懂的「漢語」！問問那些哭泣的同學，你們捍衛的到底是傳承著上千年中華文明的中國文字與中國語言呢？還是在捍衛一種區域性的地方方言？

效顰古人三笑，不知是否能有同樣風姿令各位看官回眸：

一笑 Canto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當有些同學高舉「捍衛中大理想」，淚眼婆娑地對我們說，「中大將不再是中大！」的時候，我們同樣覺得震驚、覺得熱血沸騰。可轉念沉思，卻覺困惑：如果說教學語言用英語就會造成中文大學不再是「中文」大學，那麼一直採用廣東地區的一種區域性語言—廣府方言，就可以使中文大學真正的成為「中文」大學了嗎？如果真是這樣的話，不如索性改叫「香港廣東話大學（Canto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甚至英文縮寫都無需改變，多好！

校方的文件中曾經提及，內地學生更願意選擇由英語，而不是廣東話作為教學語言。學生會便以此攻擊校方意指內地學生更「看不起自己的語言」。在這裡，我想跟學生會的同學探討一下，所謂的「自己」是站在甚麼立場來說話的？「自己」是誰？如果「自己」只是華南部分地區操廣府方言的人群，我們無話可說；如果「自己」只是有著近七百萬人口的香港本土，我們也無話可說；如果「自己」只是學生會部分同學的自我認同，我更……我只能選擇沉默。

笑評之餘，我們冷靜思考，其實中文大學的「中文」其實是來自對中國文化的尊崇和傳承，而並非來自僅僅堅持某種語言媒介這樣的表象，況且這種地方語言並非能夠很好地代表中國文化。如果希望「中文大學」是一所具有完全地域特色的、純區域性的CUHK，反對「國際化」、堅持「廣東話教學」就無需這樣那樣的邏輯論證，僅僅聲明要求「區域化」就可以了。

其實何止是廣東「話」了，在今天的香港、今天的中大，甚至連書寫文字也在逐漸徹底「廣東話化」。語言與文字本是一體，堅持粵語反對英語，將來，香港學生寫出來的文字外國人看不懂、大部分中國人看不懂、只有香港人自己看得懂，豈不可悲？廣東話，這門曾在特殊時期對傳承及弘揚中文做出特殊貢獻的方言，卻將成為阻礙中文在香港進一步推廣的「新霸主」，成為香港社會與其他中文、外文社會溝通的攔路虎，豈不可悲？

又有同學在反對英文教學時提及「中大使命」。今時今日，「中大使命」到底應該是甚麼？仍是四十年前反抗港英殖民大學的使命說？是堅持廣東話在教學乃至重大事務中的「小霸王」地位，直至將「兩文三語」演化成「三文三語」的使命？還是逐步引導、推動香港社會在語言上與全世界的中文社會真正融合？如果完全枉顧歷史發展的生搬硬套，為反對而反對，恐怕那些首創「中大使命」的大師們，也只能哭笑不得吧——無論是錢穆還是余英時，他們雖然具有深厚的中國文化內蘊，然而又有哪個能夠讀得懂本文開篇引用的那段話呢？

二笑捨本逐末、體用不分

其實英文教學本是個簡單的教學形式問題，實在沒必要把它誇大、提高到了一個不該有的政治高度。對於大學而言，教學語言是否採取英文對「弘揚中華文化」與否本無直接聯繫。一所建築大學，即使全部採用中文教學，恐怕對中華文化的傳承與推廣也只能起到很有限的作用；反之，如果中大的學系通過英文授課，甚至是用英文講授中文類課程的形式吸引更多的留學生、並讓他們瞭解中國文化，對中華文化可能會起到更加宏大的推進作用。動輒扯上「殖民統治」、「強權意味」之類的用語不過

是聾人聽聞。試問，如果說英文在香港的流行源自於香港的殖民地歷史，難道普通話的普及就是「新殖民主義」的開端？難道香港人從此就守著這彈丸之地，建造個現代版的桃花源？那不可能，香港也不想。社會歷史表明，只說廣東話、不會普通話已成為香港的劣勢，語言的障礙使香港在與內地進行廣泛經濟、學術交流的過程中遇到障礙；較高的英文水準反而卻是香港的優勢，這使香港人容易與世界上其他國家進行更多的交流，對弘揚中華文化本身來說都會產生積極的影響。

而採用英語作為教學語言是否預示著對中文或是母語的有害衝擊？從大陸的例子來看，內地的許多城市如上海、成都、重慶、廣州，都存在有異於普通話的當地方言。大學、公司乃至政府機關採用普通話作為官方語言並未對當地方言造成實質性的衝擊。幾十年來，這些城市的方言依舊保留著各自原有的特色，依舊在當地居民的日常生活中廣泛使用。由此可見，採用非本地母語作為大學的教學語言並不會對母語造成傷害，卻能在學術交流、招收非本地學生等等各個方面起到本地母語所無法起到的積極作用，同時這也是一所志存高遠的大學躋身國際平臺，拓展發展空間的必然步驟。

當一名講國語或者普通話的非本地生面對幾所不同的香港高校，要在廣東話這門「聽不懂的中文」和英文這門「聽得懂的外文」中做一個選擇時，「中文大學用廣東話授課可以更快融入香港社會」這個考慮不應該成為其判斷的標準。負笈南下為知識而來，書生友誼乃生活所與，切勿本末倒置。有誰能證明港大科大的內地學生比中大的更難交到朋友、更難融入香港社會呢？教學與生活是不同的，不要隨便得出推動國際化，宣導英文教學就是撼動了現今校園生活的根基這樣危言聳聽的結論來，這樣雖然可以博得同情和支持，但是於事無補。

三笑危言聳聽唯金錢論

在《哭中大》中，作者指出：「謂的非本地生，其實絕大部分是來自國內……為了那三十幾個外地學生……這樣做值得嗎？」這裡多少有偷換概念的嫌疑。在此想整理的是：首先，擴招非本地生和英文教學不是直接因果關係，而是並行為國際化的舉措。其次，對非本地生的招收恐怕也不是單一財政問題，「搶錢第一、學術第二」真是不知語出何處。

許多從香港之外來的學生都有這樣一種感覺：中大目前的硬體設施、教學資源、師資力量等許多方面都遠在內地一些著名高校之上，甚至超過了英美的很多大學。然而，中大的一個很大劣勢是缺乏優秀的生源。內地的一流大學每年可以在全國七、八百萬高考考生中挑取最優秀的學生進入自己的學校，而香港的大學卻只可以在本地區有限的考生中選擇新生。教育以人為本，在如此顯著的生源差異下，中大要想強於內地一流高校都不容易，又談何與世界一流的國

際性大學試比高？

生源與大學發展息息相關，對大學品牌樹立尤為重要。而校方所推行的擴大非本地學生招收比例的計畫，正是在吸引非本地優秀生源的方向上邁出了重要的一步。而匯聚兩岸三地乃至海外華僑中的精英學子、使中大在「國際化」的路上首先成為大中華圈的領先大學，更是中大的「長治久安」之計。

大學與市場的互動，是現代大學發展的必然趨勢；充足的財政支持，也是大學追求的目標之一。但至於說因此得出「國際化的真正目的是賺錢」這樣狹隘又功利的結論，當真就是貽笑大方了！

仍舊讓歷史來說話，從中世紀到現當代，從象牙塔到平民化、市場化，大學的各個方面都發生了巨大變化。但在這些變化的背後，還是有一條主線貫穿其中，這就是大學的理念和精神，其理想和追求沒有改變。

博文約禮：誠明、明德新民、修德講學、止於至善，大學依然是我們的精神家園。

「哭中大，哀淚眼，
做秀歪風滿眼見。
不求今日同氣好，
昔時嶺南聲共勉。
君不見，哈佛耶魯與牛劍，
漢學研究走在前；
君不聞，四院諸律傳統重，
校格彰彰仍為鑒；
君不若，施夷夷語以國際，
港校改革吾輩先。
步驟操作有商榷，
固步自封難為變。
切忌自輕自大話方言，
還我中大一個笑團圓！
歪詩一首聊表意，
冀望母校拓新天！」

——幾位支持中大「國際化」策略的學生、校友

笑過了，多看點書罷

◆ 一個人

原刊於《中大學生報》，2005年

〈笑中大〉（下稱〈笑〉）一文所秉持的語言觀，明顯是相當樸素（naive）的，因此它的「笑」，也顯得「天真無邪」。無論如何，如果這是一篇由中大同學校友自發撰寫的文章，又不與任何政治勢力有所聯結，我們也該對之付上敬意。以下謹分析〈笑〉的語言觀。

1. 語言必須是規範、純淨的？

〈笑〉文主力攻擊中大反英語化運動「獨尊粵語」；〈笑〉認為，粵語是方言，而香港如此著重自己的方言，會導致它成為與中國及世界溝通的攔路虎。方言與規範的官方語言是相對的，由此可見，〈笑〉認為唯有全面緊貼規範，去除方言的雜質，我們才能溝通。然而，這種溝通圖象的簡單，是與世界學術思潮完全脫軌的。任何認真思考語言的哲學家、思想家、語言學家，都會指明要完整劃出「語言規範」是不可能的，遠可參見維根斯坦（Wittgenstein）等語言哲學的論述，近可參見台灣學者陳光興、錢永祥等，或香港學者如汪惠迪、大陸學者如戴錦華等等。而當代黑人女性主義理論家胡克斯（Bell Hooks）的說法更值得玩味。

胡克斯在學院教授英語及婦女研究。在教室裡，她鼓勵學生用母語（黑人方言）發言，然後將其翻譯，因為「這樣使得學生不必感覺到接受高等教育就一定要疏遠她／他們最熟稔的語言和文化」。而當學生們開始用各種不同的語言發言時，有些白人學生會感到不自在，而胡克斯則鼓勵他們把無法聽懂某人說話的時刻視為學習空間。胡克斯會在她自己的講座中使用各種方言，她說：

「我這樣是在暗示我們不必聽到和了解完整的講話，不必把敘事當作一個整體來『掌握』和征服，我們可以只了解一些片斷。我們可以從沉默的空間中學到東西，正如我們從言語的空間學習一樣。在我們耐心聆聽他種言語的時候，我們可以把那主張所有欲望都必須即時得到滿足的資本主義的狂熱和消費文化加以顛覆；或擾亂破壞那主張只有用標準英語講話的人才配傾聽的文化帝國主義。」

當然，我們面對中／英文、國／粵語時，都應持胡克斯所提倡的開放態度。

但問題是，中大校方將國際溝通等同於課程的劃一英語化（若非同學抗爭，校方不會提出各種微調措施如學系可規定非本地生須懂中文）；正如〈笑〉文，它所要求的是一種「規範」、「純淨」的語文，對自己聽不懂、看不懂的方言持敵視態度，正正與胡克斯所倡的開放態度背道而馳，也與真正的國族互融背道而馳。

2.「殖民」、「強權」聳人聽聞？

〈笑〉認為「殖民統治」、「強權意味」的說法是聳人聽聞。我以為只是〈笑〉的撰文者對「殖民」、「權力」這些字眼太過陌生，太過大驚小怪——〈笑〉的撰文者以為這些是很遙遠的東西。其實，在文化研究等等的學科中，「殖民」、「權力」都是非常普遍地使用的字眼，而這些事根本也和我們距離很近。麥當勞、肯德基、可口可樂便是活生生的（文化／經濟）殖民行動；而即使是親密如情侶關係，也可以有權力運作其中。「殖民」、「權力」這些詞語在世界學術界的廣泛運用，是對全球化狀況和無處不在的剝削與被剝削情況的警醒；這種對本土文化狀況的焦慮和關懷，不單只出現在香港，在大陸和世界各地的有關著作，都是汗牛充棟。唯有正視自己與他人的文化，正視生活中各種或隱或現的政治衝擊，我們才不致在國際化的洪流中淹沒自身。

我認為，〈笑〉的撰文者對「權力」這類字眼的抗拒，和對日常生活中權力關係的不敏感，與其「純淨」、「規範」的語文觀仍然有關。

中國翻譯學者孫歌曾批判當今中國大陸的外語教學，過於偏重語法和語音訓練，而忽略了語言背後的意識形態問題。他認為這種將語言視為透明的載體工具的教學，只能教會學生「識別」，而非「理解」，所以認為語言只與技術手段和生產工具有關。而當語言由背負著一套有待理解和發掘之關係的符號，簡化成純為「識別」指令的信號，那麼符號的可變性和可塑性，都會被規範的一致性所取代。孫歌一矢中的地指出：假若是建立在這種簡化基礎上，「外國研究」是完全沒有意義的。即是說，如果外語教學與研究不能審視所處的文化位置的複雜性，進而不能擁有單語文化視角所不具備的思想生產能力——那麼雙語教學與研究所憑借的立場，就僅僅是對母語文化立場（甚至僅僅是意識形態立場）或者是另一種文化立場的簡單複製。「而不言而喻，這兩種複製不僅不具有原創性，甚至就複製本身而言，它也往往有鸚鵡學舌的拙劣之嫌。」

也就是說，如果我們繼續秉持著語言必須是規範的、純淨的觀念，那麼就算引入了外語教學，或者保持雙語教學，而不能審視語言使用者的位置、語言與意識形態之深刻關聯、語言與語言之間的權力關係，那麼理想中的多元文化、開放視野，就依舊遙不可及。孫歌的批判如此深刻入骨：

「當今外語教學最易培養兩類型的學者：要麼是毫無頭腦鸚鵡學舌的文化買辦，要麼是極端而簡單的民族主義者，就是因為它不能解決這個問題：『我在何處？』」

3. 何謂殖民？

殖民關係不是以國籍、血緣來定義的，而是以其對被壓抑文化的態度來定義的。這是討論殖民關係的基本起點。

普通話作為「新殖民主義」的開端，這個說法其實並非天方夜譚，周蕾（Rey Chow）早已形容香港的情況是「在殖民者與殖民者之間」，因為在殖民時期，香港只被視為經濟生產的工具，其獨特的文化不受尊重，香港的前途無法自決，而在回歸後，這些情況並沒有得到怎樣的改善。我無意將普通話和粵語在所有場景裡的複雜關係都簡化為前者對後者的壓迫，我也反對粵音不正的新來港人士所可能遇到的歧視。但我想提醒「幾位支持中大國際化的同學和校友」（及其他人）：假若你們對待香港本地文化是持蔑視態度，欲以某種自命正統的規範取而代之，視香港為純粹經濟生產的工具，那麼無論你們是外國人、內地人還是香港人，你們就已扮演了殖民者的角色。

有人可能會說，我所引的理論也是英文作品嘛，可見英文多麼重要。我想說的是，就我所見反對是次的「英語化運動」中，「反對偽國際化者」從未說過要全面拒絕英語。中大一直如此：上課中英夾雜，日常普粵混用，不斷在各種語言之間出入。這種混雜的溝通過程並不保證永遠平等、開放、流動，但一旦追求徹底死硬的規範，就是真正的封閉、僵化、不平等。在學術上對英文無可避免的倚賴，當然有其危險存在，因此，我們在學習之時，更加要留意到各種各樣的權力關係。

就我自己的經驗來說，如果沒有今天香港這個在地抗爭的機會，我再讀一百本外國理論，也沒有機會把它用出來。而沒有真正運用過的知識並不是自己的知識。因此，我以為，最重要的是對所身處的土地之關懷和投入。

對他人文化的蔑視和禁制是撕裂族群的起點。「幾位支持中大國際化的同學和校友」，希望你們能夠尊重各種並不佔據中心位置的文化。

4. 國際化不是閉門造車

〈笑中大〉這篇文章有一個特點，就是好像對「中大英語化事件」眾多的討論充耳不聞，只咬住一點大加發揮，譬如「我們的大陸同胞比香港人更看不起自己的語言」。我初讀〈哭中大〉，對那句也頗不順眼，想起而以筆伐之。問題是，學生會已經道了歉，也修改了文章，在對外發言時也更著意於發表內地同學的意見，調和內地同學與本地同學之間的矛盾。再咬著不放，又不回應他人論點，就只會顯得封閉和意在挑撥。如果說，〈笑〉文的說法為何好像不曾浮上表面，我個人以為，乃是因為這

種認定「語言是純淨、透明的工具」的語言觀，在今日的學術界裡是站不住腳的。「幾位支持中大國際化策略的同學和校友」，希望你們在支持之餘，也要多閱讀和思考，（起碼讓自己真正地國際化一點），更瞭解現在世界上關於國際化、全球化的思潮正在討論甚麼。

引錄書籍

許寶強、袁偉選編：《語言與翻譯的政治》，牛津大學出版社，2000年。

中大語文政策的未來

◆ 馬傑偉（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雙語政策委員會成員之一）

原刊於《明報》，2006年8月14日

廣東話、普通話、英語，兩文三語，應用於教育，看似簡單，實際上是十分「動感情」的問題，其中牽涉本土與國家認同以及全球化挑戰，在回歸快10年的香港，更是檢討殖民歷史與前瞻文化轉型不可迴避的考驗。

2005年，中文大學提出國際化方案，英語教學成了激辯焦點，師生校友發起《哭中大》簽名運動，引起近年少見的語文大辯論。及後校方成立雙語政策委員會，由金耀基教授任主席，各學院推選老師代表參加，成員亦包括學生及校友代表，過去1年開會20次，撰寫報告書草稿的小組另開會多次，初步完成諮詢文稿，將於本月底發報讓全體師生校友討論。

我參加了委員會的工作，後期亦與張洪年、張雙慶、李行德幾位語文專家共同修改報告書草稿，深感兩文三語涉及文化問題的複雜性。在討論過程中，各成員坦誠交流，分享教學及研究心得。20多次大小會議，我從各同事的發言中深受啟發。教務行政的會議大多是付出精神花耗時間，但此項語文檢討工作罕有地有所學，有所得。

本文是我這年對大學語文政策的一些反思，純屬個人觀察，不代表委員會立場。

回顧中大的成立，有獨特的歷史背景，當年殖民地最高學府以英語授課，中文被視為次等，中大於1963年創立，申明中文是授課語言，此舉開創了高等教育新局面，亦是「中大人」引以自豪的歷史。中大強調中文，是回應當年大學教育對中文的壓抑。但翻查校史，中大一直有兩文三語的自由氣氛，操流利英語的教師以英語教學，來自五湖四海的教授使用各有鄉音的普通話，及後本地學者學成返中大任教，則多以廣東話講學授課。

我個人對中大這種獨特傳統是充滿浪漫情懷的。以廣東話夾雜英語，在課堂和生活作學術討論，並以書面中文撰寫文章。這種學術氣氛，讓青年學生與學者，由70年代到90年代，在中文大學這所出色的高等學府，上下尋索社會國家與人生終極；而文史哲以及社會科學的

知識，可以由學術殿堂自由流通日常生活，並滲透社會運動的前線。我想，將來史家若要撰寫香港本土知識生產與文化發展的歷史，中文大學兩文三語的學統，是其中一個不可或缺的環節。中大語文政策某程度而言，是回應殖民英語霸權的措舉。

在香港，廣東話由70到90年代能夠成為強勢的語言，是出於十分獨特的歷史條件。

香港文化與政治相對獨立於內地，現代性優於大陸，經濟上某些層面比殖民宗主英國更有活力。語文使用更為特異，當年英語雖是經濟與政治語言，卻並沒有在日常生活發揮統一與效忠的政治功能，普通話更被排斥於文化邊沿。在沒有強勢「官話」的語言環境下，廣東話在流行文化領域大放異彩，統一了其實夾雜多種方言的移民社群，並觸發強勁的文化生產與輸出，影響遍及東南亞，遠至英美電影，也偶以一兩句廣東話代表中國文化。在康奈爾大學任教的Edward Gunn最近撰寫專書*Rendering the Regional: Local Language in Contemporany ChineseMedia*（Hawaii, 2006），其中一章就詳細分析廣東話在香港透過流行媒體達至方言霸權的地位（文中整篇引述阿寬的《小男人周記》及麥兜漫畫，香港讀者份外親切）。

然而，97之後，當年的歷史條件不再，香港面對中國化與全球化的挑戰，不得不對英語、普通話、廣東話作深刻的反思與再定位。今天我們在課堂或公開研討的場合，以英文Powerpoint，用廣東話講解，遇到國內朋友的話，把廣東話「落少少西」，變成半淡不鹹的普通話⋯⋯如此這般的權宜之計，今時今日不得不調整。

回到中大的雙語政策檢討，其中一個重點討論的議題，就是在於兩文三語在新形勢之下的定位問題：1. 普世性的科目如自然科學，文化差異少，且國際慣用英語，採用英語教學，有直接、準確的好處；2. 涉及中國文化、社會、歷史的科目，多用中文，以普通話授課，一方面可溝通全國，亦可汲取中國文化數千年所累積的知識；3. 涉及本地文化色彩及本地社會政治的科目，可多用粵語，以促進本地民智與文化的發展（具體內容以月底正式發布的報告為準）。

這項原則性的建議一方面是面對香港回歸及全球的挑戰，另一方面亦確認中大作為宏揚中國文化的知識基地，而其中看似謙和其實是頗為大膽的提議，是把粵語作為學術語言視之，給它一個不亢不卑的位置。

以下我想分別討論這三層定位所帶來的一些問題。一、中大創校以來，校友對所謂的英語霸權十分敏感。這個概念，有其利亦有其害。

其利在於對非英語世界的尊重和肯定，並有解放、抗爭的力量。而其害亦在

於漠視了英語在近年的多樣性發展。在全球化浪潮下，豐厚的知識以英語作媒介累積，國際社會亦以英語主導日常操作，中大增加英語授課，而且集中於普世性強的科目，是取靈活之策，既有利接軌國際學潮，亦不壓抑本國與本地文化的承傳。有論者謂，英語化不等於國際化，不要像早年的中國愚民，以為把水龍頭安放在牆上就可以引出自來水；沒有國際思維，打開嘴巴說英語，也可能像狹隘愚民不知世事。然而，今天的英語已不單是沒有水管的水龍頭，它是通往國際人脈與英語知識庫的鑰匙。大學加強英語教學，多了不同地區的學生，活用國際語言，肯定有助大學師生面向全球化的挑戰。二、在加強英語的同時，亦應同樣重視中文。

在雙語委員會的會議上，主席金耀基教授多次強調中文知識體系深厚，也是身分及文化認同的基礎。部分委員亦深明英語霸權的論點與影響。在文、史、哲各個文化性強的範疇，大學對中國文化的保育與拓展，有著不可推卻的崇高責任。而強化中文寫作與普通話口語能力，在中國國力冒升的今天，是適切而必須。對香港學生而言，更是刻不容緩。香港的各所大學將來無可避免要全國招生，此趨勢能提升香港大學質素及多元性，而不是出於簡單的市場利益考慮。

有論者謂，中大減少廣東話而增加普通話授課，是屈從「普通話霸權」、削弱本土文化、犧牲本地學生利益。我不同意。請把今日的香港，放回今日的形勢而作出恰當的思考與回應。八九十年代，香港的廣東話強勢，是十分特殊的歷史條件所造成。97前類近於文化自主放任的城邦（City-state）意識，不可能在97後有效運作。我和呂大樂、Gordon Mathews 合著的 *Learning to Belong to a Nation: Hong Kong in China and the World*（Routledge, forthcoming），主要重點亦是描繪香港由一個不知有國家認同的城市，如何學習面對一個國家。香港人在文化、學術、經濟、政治各層面，都應與全國的中國人作有效和直接的交流。大學作為一個文化學術交流的重要平台，涉及全國性的文化、社會、歷史科目，多以普通話授課，宏觀來說實有利在香港的學者與大學生參與中國整體文化體系的互動、交流、批判與更新。三、這份雙語檢討報告，大膽把廣東話寫入大學教育政策之中，建議有地方色彩的科目，可用粵語授課。本地學生可能認為此舉實質上是把粵語規限於整體教學語言的邊緣。我不同意。

的確，面對加強英語及普通話教學的轉變，廣東話作為方言，不可能再如97前那個特殊歷史階段，穩坐語言霸權的位置而自絕於全國以普通話為主的語言環境。然而，正因為委員會內幾位語言專家是站在香港一國兩制有利的批判距離之內，他們能較清晰地定位方言的價值。我對李行德、張雙慶、張洪年3位教授是由衷佩服的。李行德教授更清晰指出，大學完全不用方言，是方言式微的因素。報告中，他們亦指出「普通

話不等於官話，官話也是一種方言」。而粵語作為南中國一個主要地方語言，蘊含深厚的歷史文化資源，與香港本土生活息息相關。中大有勇氣在政策文件中，肯定粵語的學術與文化價值，並予以適當定位，保存了中大多年以來重視本土的傳統，在有本土色彩的領域，讓本地學者與學生，自由以粵語貫通學術、社會與生活，此原則若發展得宜，將有利於中國文化的多元化與創造性，亦有助香港創意文化的發展，更將會是中文大學一大特色與專長。

諮詢報告發表在即，謹在此祈願中大師生校友以及關心大學教育的朋友，開心見誠，各抒己見，為中大語文政策開拓適切時代的新局面。

參考書目

1. Edward Gunn: *Rendering the Regional: Local Language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Medi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 Gordon Mathews, Eric Kit-wai Ma, Tai-Lok Lui (forth-coming□: *Learning to Belong to a Nation: Hong Kong in China and the World* . London : Routledge

對《雙語政策委員會報告書諮詢稿》的回應

◆ 蔡寶瓊（時為中大教育行政及政策系副教授、中大性別研究課程主任）

原刊於中文大學校友關注大學發展小組網頁，2006年12月1日

香港中文大學《雙語政策委員會報告書諮詢稿》的面世，是本校師生所樂見的。首先，八大院校之中，除了香港教育學院在課程安排上實行雙語教育外，中大是唯一明確地聲明在教學語言上要中英並重的院校。除了中大和香港教育學院外，其他大學都不問情由地只以英文為「官方」教學語言。中大這份諮詢稿肯定了中、英文，包括廣東話的學術地位，我覺得是令人鼓舞的。其次，大學校方成立雙語政策委員會，集合師生多番討論語文政策，並諮詢師生校友，一改以往只以行政手段試圖增加英語授課科目的策略，這種從善如流的做法，也是值得欣賞的。更重要的是，這份諮詢稿開展了關於大學教學語文和何謂「國際化」的討論，也肯定中文以至廣東話的學術地位，並嘗試澄清兩者的位置；相比社會上一般人盲目地尊崇英文，以及誤以為用英文就等於國際化這種膚淺見解及態度，中大今日由諮詢稿所引起的討論，就更加有其學術乃至社會的價值。

不過，這份諮詢稿仍有不少理念以至實踐上的漏洞。以下是我一些想法及建議，我會先從一些原則性的理念開始，然後引申到一些具體的建議。

大學的使命

（一）培育學生：我認為大學除了要培育學生掌握各種謀生技能之外，也是培育及發展高層次理論思維的地方。為了確保學生能真正掌握抽象的概念，深入思考學問，我認為大學應有一定比例的課程，包括主修課程採用學生的第一語言授課。因此，大學要監察學系能否維持這個比例。當然，個別專業學院（如醫學院、工學院或商學院某些課程）或要順應全球英語的強勢，讓畢業生能與國際專業團體接軌，於是要採取英語授課，則作別論。不過，即使是在這情況下，仍應該保留若干用第一語言授課的課程，以確保學生能用第一語言在其專業範疇內作較深刻的思考及理解相關問題。

（二）回饋社會：諮詢稿引述《香港中文大學條例》弁言中關於中大的使命，其中一項是「促進香港的民智與文化發展，藉以協力提高其經濟與社會福利」。我認為當年弁言中寫下了這一項，實是

高瞻遠矚、難能可貴。大學不應該是脫離社會的象牙塔，或只是讓青年人晉身「高尚階層」的階梯，也不應該像殖民地大學一樣，只作為導引接近統治階層的一個「俱樂部」。相反，大學應該與社會生活保持有機聯繫：一方面在學術研究上要面向社會，在面對社會現實及其種種挑戰中發掘研究課題及素材；另一方面，大學要將研究成果回饋社會，而其中最重要的任務，就是提升社會在各方面的分析思考水平及人文素質。要履行這項任務，大學就必然要用大多數社會人士能明白的語言來發表研究成果、引發社會討論。中大有其獨特的歷史優勢，更宜好好珍惜及利用。近日社會上有少數聲音，提出中大應肩負將中文「國際化」的使命[1]，我十分贊同。在香港的八所大學中，只有中大有較優厚的條件，與中國大陸及台灣的學界同儕一起拓展立足於華人社會的高等學問。具體而言，中大應該在本土大學中獨樹一幟，鼓勵中文學術寫作，並盡快在各科範疇中建立完善的學術期刊編輯及其他出版系統，使中文學術成果發表不致長居二流位置，導致仝人為通過個人學術評審，只得撰寫英文文章在國外期刊發表研究成果。這種做法，在今日大學削資及院校間惡性競爭下已蔚然成風，如此不獨學術研究成果不能回饋華人及本土社會，而學術研究「外向」，往往為迎合源於英語社會的課題或理念框架，難免脫離本土社會現實及華人文化背景，結果學術界難以產生深刻而獨特的洞見。這個弊端在人文及社會科學界尤其嚴重。

（三）學術拓展與國際化：由此，我們可見學術發展與社會連繫是互為表裡的。今天不論社會及大學都奢談「國際化」，以為有足夠數目的人懂英語、能與外國顧客或僱主用英語交談就名之曰「國際化」，於是社會資源即本著這個膚淺的邏輯投放。舉例而言，自1998年開始實行的所謂「母語教育」制度，其實是英語精英篩選制度，其目的不外是選擇少數精英（大概是三份一）小學畢業生，在中學課程中通過英語授課來使他們學習英語，而非讓他們接受全面的教育。其實，學術界真正的國際化應是立足本土社會現實及本國文化，一方面如上所述，提升公民的質素，尤其是其人文素養及思考水平，另一方面通過發掘及面對本土社會及本國文化的深層及現實問題，並進行研究，俾能與外國學術界交流，而非只附人驥尾而已。換言之，要能國際化，就必先要發展植根本土及本國文化的研究。要做到這點，就非要建立完善的中文學術語言不可。我認為中大在這方面有較好的歷史條件，今日我們要做的，不是盲從社會主流的有關國際化的膚淺之見，而是在既有的歷史條件上，進一步鞏固立足本土及本國文化的研究，從而進行真實而深刻的文化交流，扭轉大學界多年來源於殖民統治疏離社會的惡習。

如何制訂政策促進學術中外交流

（一）讓外籍教授學習中文：我認同諮詢稿所說，徵聘教授應全球延攬人才。這不獨符合選賢與能的準則，更是讓學生接觸外國學術思想、習慣使用外國學

術語言的有效方法。除此之外，大學亦應鼓勵及支援各學系舉辦外國訪問學人、國際學術會議及交流、外來教授給學生作學術輔導等等，尤其要鼓勵學生參加，甚或把這些活動納入常規的課程之內。諮詢稿有提到在聘請教授及作升遷評審時，應以學術成就、教學、研究及服務為主，而「不應因其不諳中文或英文而摒棄人才」。事實上，因種種歷史及政治原因，香港以至中國大陸的大學教授，沒有幾個是不諳外語（尤其是英語）的；相反，大部分外籍教授則以不諳中文居多。我認為要促進雙向而非單向的中外文化交流，大學應提供資源，讓不諳中文的教授能盡快學好中文，至於至何等程度，則視個別學科教學需要而定。語文不止是工具而已，更是了解文化的切入點。外籍教授能懂中文，則能更有效地與華裔學生溝通，提升教學效果。再者，既言溝通，自應雙向。外籍教授與華人學生之間的相互理解，對文化交流以至提升學術思考自起促進之用。至於外籍教授應學廣東話還是普通話，我想應先學好廣東話，方便與學生溝通，繼而學習簡單書寫語言，起碼達到應付日常生活需要的程度。

（二）諮詢稿建議授課語言由系務會決定，並提出一套參考原則。我想這套參考原則是諮詢稿最為人詬病的部分。簡言之，委員會提出一個三層架構，包括（1）所謂「普世性」的學科，建議用英文講授；（2）涉及中國文化、社會及歷史的學科，建議以中文講授，並要「適當地增加普通話講課的比例」；及（3）「與香港本土文化生活息息相關、帶本地文化色彩和涉及本地文化政治的科目，以及討論人生哲理的科目，原則上用粵語講課，以促進本地民智與文化的發展」。

這個三層架構有極大的理念漏洞。首先，在學理上說某些科目帶有「普世性」是說不通的。如果說自然科學和科技是普世性的，那是一個極常見但也是極錯誤的謬見。上世紀初的知識社會學乃至今天的女性主義、後結構主義學已清楚指出，人類知識本來就是特定社會文化以至權力脈絡下的產物，根本不存在超乎文化及權力結構的知識。更重要的，是授課語言的選擇，不應以學科性質來訂定。前文提及，一些專業培訓的學院要採用外語（英語）授課，這只是順應英語強勢的權宜之計而已，並非最理想的教與學乃至學術研究的選擇。相反，授課語言的選擇，應以教學效果、以及上述的大學使命為依歸。

（三）外地生、內地生及交換生：招收一定數目的外地生和國內生，對建立一個多文化校園大有裨益。但要達到學生間真正的交流，校方以至教資會就要承諾投入更多的資源，提升外來學生的粵語程度。短期的交流生，大學可提供簡單的粵語課程，使他們的粵語能力可達最低限度的生活應對程度。至於內地生則可以提供一個短期密集式的粵語課程，輔以長期（例如一至兩個學期）較寬鬆的補充課程。外籍生則要修習粵語和中文課程，達至簡單書寫（大概相

等於本地生中三程度）及說話程度；當然，大學也要投入額外資源，開辦足夠用英語教授的本科及通識課程，讓他們修讀。外來學生一旦能夠與本地學生在生活以至學術上開展雙向（而非單向的）的溝通，文化交流的目的就不難達到。

當然，有人會認為是否值得為此投入這麼多的額外資源。我的回應是肯定的。因為真正的文化交流和多元文化的建立，在今天全球英語強勢所造成的語言以至文化單一化的威脅底下，就算只是在香港的一小角——中大校園——進行，長遠而言，對中文以至粵語文化的鞏固和發展，乃至對人類的利益都是不可估量的。

結語

中大是本港唯一在政策上確認中英文雙語授課的大學，是在殖民地陰影及世界性英語霸權下仍保留第一語言授課的院校，因此最有條件履行上述大學應有的使命。我們作為中大的師生，實在應該珍惜及維護這個優良的傳統，而不應視之為「歷史包袱」。事實上，中大不少教授都是從本地或國內大學畢業，然後負笈外國，再回歸本校任教的。我們接受了外國學術思想薰陶及治學訓練，回來面對本地或華語學生，用我們的第一語言（粵語或普通話）講授，同時也在重英輕中的評審制度下勉力用中文著述，所經歷的是一個微妙而深刻的文化交流及溝通過程。原來用第一語言講授源於外國的學術思想及作學術研究，不單是在做「翻譯」工作而已，實際上是在藉自我省思進行文化交流，然後通過講課及出版將這種交流所得推廣至學生及社會。事實上，翻譯本身並不是一個機械的過程，因為語言並不只是單純的工具或載體而已；語言的使用是思考和創作的過程。我希望中大雙語政策委員會能慎重地思考中大的使命，提出一個更完善的教學語言政策。

1 馬國明，〈先要國際化的，不是中文大學，而是中文〉，《明報》，2006年10月25日；馬國明，〈英文先行就是為了中文的命運〉，《明報》，2006年10月26日。

雙語政策報告書沒有說甚麼

◆ 杜振豪（雙語政策委員會本科生代表）

原刊於《中大學生報》，2007年5月號

關於雙語政策，我們還能說些甚麼？雙語政策委員會已於四月中完成諮詢期後的最後審訂，報告書定稿不日出爐，隨後將轉呈校長與教務會，成為各學系決定教學語言方針的新指引。問題是，這份報告書對我們學生、老師以至中文大學的發展方向，會有甚麼影響？可能完全沒有，也可能大有干係。沒有是因為，校方高層要左右學系決策，其實從來不僅白紙黑字頒布指引一途——難道我們相信在委員會成立之前，各學系的教學語言不曾向英語靠攏嗎？大有干係是因為，報告書可能成為消解反對聲音和學系進一步英語化的資源。無論如何，在我們思考能說甚麼之前，也許應該先了解報告書其實說了甚麼，或更重要的，報告書沒有說甚麼。

對於雙語政策的長期關注者而言，不難發現報告書雖然在一再修訂下套入了不少「立足香港」或「保育本地文化」的修辭，但其總體上所表現的世界觀依然十分相近，就是我們需要回應全球化（最新修訂避開了「國際化」這個敏感字眼）形勢，調整教學語言。至於那種回應是怎樣的一種回應，其實幾乎從來沒有改變過。在討論的過程中，不少委員——尤以主席金耀基和秘書長梁少光最為經常——一方面強調向國內外大量收生是事實，我們需要配合，一方面強調委員會處理的只是收生帶來的語言問題，與大學收生的國際化政策是兩回事。前者表現出視討論前提為理所當然的傾向，認為不辯自明的客觀環境已決定了討論方式，後者將教學語言問題強行與收生政策分割，兩者都限制了雙語政策委員會的討論範圍及可處理的工作。雙語政策如何制訂，怎麼可能跟大學如何招生分割處理？不一樣的招生政策，明顯會產生不一樣的問題。例如中大若參與全國聯招，招來的學生便幾乎以不諳粵語為主，而且沒時間讓院校作面試和筆試；但若堅持獨立招生，雖然生源因此收窄，卻有更多時間作面試和筆試，可以保証收生的英文和粵語水平。然而，這種牽涉大學招生的政策討論，卻會被理解成雙語政策委員會無法處理的問題。因此，這種分割式的理解，其實並非真的可以分割了問題，而只是在肯定現時招生政策下，處理因收生的語言能力而帶來的教學語言問題。於是，在這樣的討論框架和議題設定

下，委員會可討論的方向被嚴重窄化，討論的細節亦流於技術層面，以至於瑣碎的修辭表達。

可以預料的是，秘書長梁少光看到上述一番說話，必然會立時回答：「學系可以選擇是否向國內外招生。」的確，不只收生與否，建議中的授課語言問題，報告書都預留了頗大詮釋空間予系務會，包括學科如何定性，原則如何運用。然而，系務會本身是否能夠確保其決策不偏向校方，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事實上，諮詢期收到的意見當中，便曾有聲音指出，職位較低的導師難以參與系務會的決策，更遑論學生。筆者記得秘書長梁少光便曾經就此回答，這是系務會的組成問題，不是雙語政策的問題。當然，儘管系務會的組成可能有問題，也沒理由要雙語政策委員會越俎代庖去處理，但要說雙語政策可以不必考慮系務會的組成問題，卻明顯更難自圓其說。看看早前校方以「下放權責」和「加強領導」之名硬銷院長委任制，再想想校長和院長皆為必然成員的系務會，當中權力關係的千絲萬縷—— 難道這些憂慮都是多餘嗎？

以上種種，自然不會見於報告書，因為更密切相關的，報告書也付之闕如。委員會其中一項工作為檢討雙語成效，但報告書卻未有任何仔細分析，沒有對兩文三語的教學反應作意見調查，甚至也沒有授課語言的具體分佈資料。報告書口口聲聲要避免英語過份主導，沒有中英授課語言的具體分佈資料，我們怎知道英語不是已經—— 或將快—— 過份主導？以第二語言教學會降低教學效率幾乎是常識，但委員會中仍然有意見認為，以英語教授理工科目（即諮詢稿中的「普世性科目」，新修訂已刪去）會更直接而準確。然則，報告書有沒有回應這個問題，有沒有嘗試研究中英文授課語言在理工科目的接受情況？另外，新修訂的建議中增加了「保育中文」的段落，當中又有沒有任何關於保育中文的具體建議或承諾？待報告書定稿正式公佈，各位不妨仔細留神，查找不足。報告書沒有說甚麼，比報告書說了甚麼，更為可圈可點。

以後教學語言問題日後再有爭端，校方大有可能祭出這份報告書，宣告教學語言政策已商議了兩年，歷經廿多次會議和十多次諮詢，其中有學生、教師、校友各方代表，整理了不同意見，仔細討論才得出當中建議—— 由是反對聲音便無法喚起大眾注意，繼而自動瓦解。筆者在此希望提出的是，有毛病的政策，即使開一千次會議一百場諮詢，也可以依然是有毛病的政策。作為委員會其中一名委員，也必須聲明報告書有不少地方，本人始終無法同意，有不少地方，是礙於會議形勢而作出的退讓和妥協。報告書的內容，包括檢討、理念、建議，都是協商遠多於一致認同，儘管部份委員可能未必同意，但這依然是本人希望一再強調的。

貨不對辦的大學語委會

◆ 杜振豪

編按：為了檢視「國際化事件」後成立之「優化雙語教育委員會」幾年來的工作，我們於2013年訪問了委員會主席、秘書及學生委員。

話說2005年春天，前校長劉遵義打算推行核心課程全面英語化，以配合其廣招非本地生的「國際化」大計。不料此舉引起激烈反對聲音，鬧出「哭中大」事件。當時為了平息爭議，劉遵義成立了「雙語政策委員會」，諮詢師生校友意見。兩年後，《雙語政策報告書》（下稱《報告書》）出爐，其中建議在教務會下設立「優化雙語教育委員會」（下稱「語委會」），按《報告書》建議跟進雙語政策的問題。

六年時間過去，語委會做了甚麼工作？有沒有做好監察及促進中大雙語政策的角色？能否回應當初引起激烈迴響的反對聲音？帶著這些疑問，我們分別訪問了現屆委員會主席侯傑泰教授、秘書黃潔美，以及最近兩屆的學生代表呂子健及鍾耀華。可惜，我們得來的答案，卻是令人詫異的空白，與原先期望有極大的落差。若與《報告書》聲稱的職權來檢視，語委會的表現只能說是貨不對辦。

說英語的語委會

校方介紹語委會的網頁頗為簡陋，只列出了現任委員名單及語委會職責的英文簡述，找不到任何會議議程及紀錄[1]。據黃潔美透露，語委會於2007年11月正式成立，至今（2013年10月）開了約16次會議，首兩年會議較密，後來則較疏。學生代表鍾耀華則表示，語委會大約是一年開兩次會。在組成方面，除了恆常出任的各學院代表、各語文中心[2]代表、註冊組職員；有四至五位成員由校長委任，大約兩年一任；同樣由校長委任的主席，更是每年都會重新委任，六年來已換了四位；至於學生代表，也是一年一任。因此，不少成員或許只能出席幾次會議，未摸熟語委會工作便須換人。

值得注意的是，學生代表呂子健表示，語委會的會議紀錄只有英文版本，在他出任委員期間，因有外籍教授參與會議，會議討論更是以全英語對話。侯傑泰教授對此則回應，外籍教授參與會議期間，雖然會議語言主要是英語，不過

「會議沒規定必須用英語發言」，必要時鄰座的成員也會幫忙翻譯云云。也許，這種情況不過反映了中大雙語政策的日常操作——只要有一位與會者不諳中文，會議便須轉為英語，最後實際上變成英語優先。假如說使用不擅長的教學語言，會阻礙教學成效；使用不擅長的會議語言，同樣也會窒礙溝通和表達。若從不提供常規化翻譯的做法來看，看來語委會也無意突破英語優先的困境。

不談教學語言

那麼，語委會曾經討論甚麼問題呢？侯傑泰教授介紹，近年語委會主要關注三三四改制語文課程改制，包括非本地生的語文課程。除此以外，則是改革語文教育架構，包括取消「語文精修課程」（舊時俗稱「語精」），以及將學院要求的語文課程，重組為大學基礎語文課程。無疑，這些都是與大學語文教育至關重要的問題，但怎麼沒有討論當年最受爭議的教學語言？

在筆者不斷追問下，侯黃二人略顯尷尬。侯傑泰教授回答，語委會對教學語言的問題「冇乜新vision」，所以沒有討論。黃潔美補充，校方會統計校內課程的教學語言，但只供學院內部參考，不會在語委會上傳閱；至於《報告書》的內容，她則認為「沒有爭議性」，語委會純粹遵循《報告書》的建議去做云云。換句話說，語委會沒有處理教學語言的問題，也沒有檢視和統計教學語言的使用情況，甚至沒有討論《雙語政策報告書》的內容。

由此可見，優化雙語教育委員會的工作內容，與其說是檢討及改進雙語政策，不如說是增強中英文訓練。或許，語委會的英文名稱（Senate Committee on Language Enhancement），已經恰如其份地說明了它的定位。若校友期望語委會能監察及檢討雙語政策，甚至延續處理教學語言的爭議，恐怕是痴心錯付，太傻太天真了。

消失的「保育中文」

語委會的工作不如預期，這是關心教學語言的校友一廂情願，期望過高嗎？其實，根據《雙語政策報告書》的建議，語委會的職責包括：一、統籌、檢討、改進及推廣中大的雙語教育政策；二、促進、協助及督導各有關部門執行大學的雙語教育政策；三、推動《報告書》7.12段所述的保育中文工作。[3]

可是，到了語委會正式成立，在校方網頁上列出的職權範圍，卻似乎變了模樣：一、檢討大學的雙語教育；二、檢討大學雙語教育政策的執行情況，以及協助推廣有關政策；三、檢討所有中文（普通話、廣東話、書寫中文）課程及英文課程，包括新課程的批核以及這些課程的質素及成果；四、參考雙語政策委員會的建議，推廣語文課程的成果。[4]

兩相對照，我們可以發現，雖然網頁版本保留了檢討雙語教育的字眼，但沒有如《報告書》般說明可以改進雙語政

策，而且工作重點也轉向了語文課程的檢討及推廣。最重要的是，保育中文的部份，竟然完全消失了。關於第三點，侯傑泰教授向筆者表示，保育中文不在教務會委員會的層次處理，會由其他部門負責，例如中國文化研究所。可是，為甚麼保育中文不能在語委會討論及建議，大學語文課程改革又可以呢？這筆糊塗賬也只能留待公論。

結語

六年時間過去，當年爭議已不復見於校園。從《雙語政策報告書》到優化雙語教育委員會，教學語言的問題，似乎已被巧妙轉換為語文課程的問題。學系自決依然是校方的堂皇說法，但實際操作如何，外人難以得知。其實，《報告書》曾明確建議，優化雙語教育委員會成立五年後，須全面檢討雙語教育的成效。[5]侯傑泰教授似乎不知悉這道條文，坦言語委會不曾作全面檢討，只表示三三四課程改革行之未久，目前不是檢討的好時機。筆者只能寄望，校方盡快認真檢討雙語政策及其執行情況，不要將《報告書》的建議視如裝飾。否則，不只對《報告書》建議有保留的師生校友會群起攻之，認同《報告書》的師生校友也會感覺受騙。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學辦教育，也是這麼一回事。

1 目前，校方僅為教務會的工作提供公開的「會議簡報」（中英對照），至於教務會屬下委員會，則是甚麼文件也沒有。侯傑泰教授對此表示，不公開委員會文件是中大校方的政策。在筆者追問下，他補充這是校方的慣常做法，需要維持政策一致，而且也沒有委員要求公開文件。

2 包括中國語言及文學系、英語教學單位、雅禮中國語文研習所。

3 《報告書》7.12段所述甚詳，其意甚誠，為不少批評者所稱道。茲概述如下：一、必須用英語講課的學系，可考慮開設若干中文講課科目，以促進學術的本土化；二、涉及中國文化的科目，可考慮開設若干英語講課科目，以弘揚中國文化；三、中大應支持中國研究及本地研究，同時鼓勵在其他領域以中文發表論文；四、中大應致力以中文傳播知識，包括出版期刊、編寫教材、翻譯著作；五、校方應提供資源，推行上述工作。

4 《報告書》7.12段所述甚詳，其意甚誠，為不少批評者所稱道。茲概述如下：一、必須用英語講課的學系，可考慮開設若干中文講課科目，以促進學術的本土化；二、涉及中國文化的科目，可考慮開設若干英語講課科目，以弘揚中國文化；三、中大應支持中國研究及本地研究，同時鼓勵在其他領域以中文發表論文；四、中大應致力以中文傳播知識，包括出版期刊、編寫教材、翻譯著作；五、校方應提供資源，推行上述工作。

5 「優化雙語教育委員會應於成立五年後就中大學生的語文程度及雙語教育的成效作全面檢討」見《雙語政策報告書》7.27段。



保樹立人事件

前言

校園運動的一場小勝
——「保樹立人」運動

◆ 羅奕媚

2006年2月中大學生會發出聯署聲明，指斥中大當時為發展而大興土木，大肆破壞校園生態環境，希望中大人關注並向校方施加壓力。聯署很快就獲得不少校友的回應。一班校友從聯署上得知中大將把池旁路三十多棵大樹砍掉，憤而起之，發起「保樹立人」行動。及後，一眾員生校友決定成立「校園發展監察聯盟」（下稱「聯盟」），以制衡忽視生態保育的工程部門，提倡中大員生參與規劃校園。

事件中的論爭其實有兩個層次。第一是理念層面。「聯盟」強調的有兩大點：（1）保樹不單為環保，還關乎教育理念[1]；（2）必須改善現時校園規劃決策的黑箱過程。校方對於以上的回應，則只是指出自己已堅守如斬樹會補種的原則、已有完善行政監管機制和「其實中大已經好環保」。而校方對此事所提出的解決方法，則是以操作層面為重點，拋出五個方案來「公開諮詢意見」，並欲把焦點轉移至五個方案來討論細節（見〈眾志綠——池旁路工程方案諮詢〉）。然而，「討論五個方案」並沒有回應「聯盟」理念層面的訴求，員生校友當然拒絕接受。

至於砍樹的理由，校方的對內論據為2012年三三四實行後人數大增，為確保安全而需擴闊路面，對外則從不提工程是為擴闊路面，只稱為了維修斜坡而斬樹。校友因此估計維修斜坡而斬樹看似大條道理，至於擴闊馬路則可能理據不足。無論如何，應否為擴闊馬路而斬樹，仍是事件中最大的爭論。反對保樹者大多認為在「安全」面前，「環保」就算無奈亦得靠邊站，而熊一豆的〈願那校園能容下貓和樹〉則試圖梳理這個似是而非的爭論，指出這是把大學發展置於人文傳統的對立面，掩飾大學盲目擴張的事實，「於是連續兩年，同是大刀欲揮，去歲先動搖中文授課之本今則輕率欲砍老樹為人車開路」。

結果，抗爭一個多月後，校方終於宣布撤回向地政處提出的斬樹申請，並成立「校園自然景觀美化委員會」監察校園發展處，指日後所有斬樹工程都要經委員會審批才能開工。



「保樹立人」的另一個重要之處，在於因著其積極參與者的高度重疊與理念相近，經常被認為是一連串保育運動的開端（保樹、天星、皇后與菜園村）。而本書此部分所輯錄的兩篇報導，均是節錄轉載自「香港獨立媒體網」，並由校友朱凱廸所撰寫。他是運動的其中一個帶頭級人物，在過程中不斷以調查式報導紀錄「戰況」，並用文件、數據等實證去回應官方各種說法，文宣均主要用網上媒體發佈——以上種種，在校園推動關注校政的範疇上，於當時都是全新的宣傳與動員策略，為日後各種校園運動提供了很好的示範。

到今日，縱使中大已遍山新大樓，「綠色校園」卻已成中大經常向外宣傳的口號，「保樹立人」運動之後校方所擬定的樹木保育政策，亦成為其「綠色」的重要憑證——雖然大部分保樹校友均認為事件核心是保衛人民價值而非關環保——但運動之後校方對校園環境的敏感度確是提升了不少。另外，這場運動亦喚醒了中大人對校園規劃的關注，同學在後來自發成立「中大校園民主規劃小組」，監察校園規劃，並推廣參與式規劃；而及後的擴建圖書館事件亦迅速受到校友和同學關注並成立保衛烽火台聯席。以上種種，都令人認為「保樹立人」不單是校園規劃運動的一場小勝，也是一個重要的起點。

1　朱凱廸，〈退一步海闊天空　解決池旁路行人擁擠的建議〉，《香港獨立媒體網》，2006，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1180

池旁路擴路工程「公開事件」時間表

◆ 朱凱廸

原刊於《香港獨立媒體網》〈中大保樹之校方「屎上抹胭脂」公關簡報會附錄一〉，2006年4月14日
本書編輯稍作增修。

2005年

1月6日	池旁路擴闊路面及維修斜坡工程招標結束，之後在網頁上查不到中標公司身份，以及工程涉及金額和合約內容。

2006年

2月28日	校園發展處網頁刊出工程內容，只提維修斜坡，隻字未提要擴闊路面。工程要求斬三十五棵樹，包括樹齡可能超過五十年的老樟樹，但公布中未提大部分樹是為擴闊路面而斬。
3月6日	有中大員生發現，工人在池旁路大樹上圍上危險膠帶，同時間學生會發起的〈保護山城〉聯署，後來收集到二千多個簽名。
3月8日	協理副校長許敬文在聯署壓力下，承諾池旁路工程會暫停，再諮詢中大員生。
3月9日	約三十名中大員生在池旁路舉行黃絲帶「保樹立人」行動。
3月11日	中大委託的顧問公司，正式向地政總署申請斬樹，並未提出任何不用斬樹的可能。校方被指欺騙中大員生，在承諾諮詢後繼續推進工程。協理副校長許敬文辯稱，是顧問公司私自提交申請。
3月底	中大教職員、學生及校友代表決定成立校園發展監察聯盟，以制衡忽視生態保育的工程部門，提倡中大員生參與規劃校園。
4月7日	學生會和學生報聯同校友代表，出版《保樹立人特刊》，希望中大員生關注事件。同日，校方在邵逸夫夫人樓舉行池旁路工程簡報會，提出五個方案。其中四個堅持大幅擴闊行車路面和大量斬樹，但除了幾張精心挑選的人車爭路圖片，校方並沒有提供池旁路人車流數據，以證明必須大幅擴闊行車路面。校方亦一度阻止公眾人士參與簡報會。

4月13日	沙田地政處證實，中大仍未撤回斬樹申請，亦沒有知會政府正重新諮詢中大員生，工程內容可能有變。斬樹申請仍在審批中。
4月14日	校友一個月前在池旁路漆上「保樹立人」四個大字，被物業管理處人員塗去。
4月19日	校方宣布撤回斬樹申請。
4月21日	校方向校園發展監察聯盟召集人表示決定成立斬樹審批委員會制衡校園發展處，日後所有斬樹工程都要經委員會審批才能開工。



齊來保護我們的山城（聯署）

◆ 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校園環境關注小組

原刊於《香港獨立媒體網》，2006年2月27日

中大，是山中一座城。這座城，自然風景和人文風景渾成一體，曾經孕育無數學子的心靈。因此，我們應該好好珍惜它，愛護它，讓這道美好風景能夠永續下去。很可惜，近年大學的發展，卻與此背道而馳，自然環境遭到嚴重破壞，大量傳統建築面目全非，情況令人憂心。

我們都知道，中大的美好環境，全賴一代又一代中大人的共同努力，才得以慢慢建立。比方說，第一任建築師司徒先生，極注重建築物與地形山勢間的和諧、協調；總園藝師劉雲章先生，秉承這種作風，憑其出色品味，致力保護校園的自然野趣。是故，百萬大道的樓房，跟新亞、聯合書院的風格一致，渾然天成；清水石屎的外牆，更散發著濃厚的書卷氣。校園很多地方更盡量讓植物自然生長，古樹處處，繁花叢生，自成一個生態系統。

令人憂心的，是中大美好的校園，在急劇發展和缺乏足夠的環保意識下，迅速遭到破壞。大家都見到，中大近年大興土木，工程不絕，斬大樹蓋高樓，已到觸目驚心的地步。而這些發展又往往力求宏偉和都市化，與外面地產商的庸俗品味看齊，環境保護和建築文物的保育工作，統統靠邊站。中大校園，正經歷一場又一場人為的環境災難：

1. 2003年初夏，沙士疫情剛過，大學火車站旁，幾棵鳳凰木開得特別燦爛，滿樹橙紅，引人注目，有報章記者拍了下來，放在頭版，以其旺盛生命力激勵港人。可悲的是，這棵意義非凡的大樹，在所謂「校園美化工程」下，為了興建一截令人啼笑皆非的「觀景橋」，硬生生給斬去不少根兒，現正處於瀕死邊緣。

2. 為了修葺斜坡，校方花費百萬，在何善衡工程大樓對面山坡，以水泥舖設臨時小路，讓工程車輛出入，既浪費公帑，又嚴重破壞生態環境，導致山坡面目全非，草木茂盛的原貌一去不返。

3. 崇基的小橋流水，清幽怡人，原有泥路及溪澗，洋溢山林氣息，是最多中大人喜歡行的小路。可是，校友徑的修建，將其天然風貌狠狠摧殘，不少老樹

及小路兩旁的野薑花，慘遭砍伐，換上人工種植的植物。更糟糕的是，樹蔭下的沙土小徑，加設了冰冷的金屬扶手，改建為石板路（及後又因效果不佳再鋪一次），雨水的滲透受阻，路邊大樹長得一年不如一年。總括而言，一種在市區才出現的仿郊野公園設計，硬生生嵌進了中大的自然領域，既浪費金錢，又不倫不類。

4. 中大正門附近，有一個大迴旋處，原是天然草坪，配以園藝美術，供人拍照留念多時。年前，綠草給鏟光，換上高爾夫球場的草皮，禁止踐踏。新草地看似平滑如絲，其實極難打理，幾個月便得重鋪一次，花費甚鉅。而且，外國先進社會早已開始摒棄這種人工美，中大校方有心推廣環保，為何不開風氣之先，反而倒行過來？！

5. 李達三樓的重建，砍伐不少巨樹，引起社會關注。李達三樓旁的小斜坡，本植有一大排杜鵑，早春三月，總會燦爛盛開，是中大最美麗的景致之一。早幾年卻不知何故給砍掉大半，現在更是連根拔起，令很多重返母校的校友感慨不已。中國文化研究所的擴建工程，最近也使大批樹木遭殃。據悉，崇基教學樓一段池旁路，即將有擴建工程，靠向嶺南場的斜坡上，一大片林木又將難逃厄運。對於伐樹一事，校方常常說會另覓地方補植。但這種講法不盡不實。因為，砍去的往往是大樹，補種的卻統統是幼小樹苗，一棵數十年樹齡的老木，試問如何補償？當下，李達三樓正在重建，地盤外，只見兩行楚楚可憐的幼苗，遙對龐然大物的吊機，情景荒誕，正好說明一切。而且，人樹長年相對，感情自然而生，又豈是一砍一植的邏輯能夠解釋，主事者難道對此完全不能理解？！

6. 從范克廉樓往山下走，右面斜坡，本是一大片相思樹及灌木叢，夏夜來臨，偶有螢火蟲出沒。但經過維修後，一半斜坡鋪上綠色尼龍絲，原有的自然景觀消失，只剩下疏落的相思和橫陳的水泥道。

7. 百萬大道，超然脫俗，與新亞及聯合水塔，遙相呼應，成為人文精神的象徵。中大校方，卻毫不珍惜，在大道中間興建玻璃幕牆的研究所，擾亂統一的建築風格，立下極壞先例。事實上，校方正籌建多幢同類型商廈似的大樓，漠視惡俗品味入侵，更罔顧中大的自然環境，禽鳥眾多，牠們容易因分辨不出玻璃的倒影而撞牆致死。

8. 中大準備修築貫通全校的環山徑，但有違郊野公園的做法，捨沙土而取紅磚來鋪設路面，顯示校方缺乏綠化校園的想像力，漠視這種慣見於城市的路面設計，對自然景觀和對生態環境的負面影響。

9. 中藥園外的斜坡，原本種滿樹來鞏固泥土，不足一年，給砍剩最底一排，由於沒有足夠樹木抓緊泥土，出現嚴重的水土流失，現時正進行緊急維修工程。

這些工程，本來可以避免。

10. 近年，中大出現一波又一波的裝修潮，將大部分建築物內部，重新翻新，原來比較陳舊但書卷氣濃厚的課室，千篇一律變成現代化辦公室模樣，個性模糊，文化氣息蕩然無存。最令人嘆息的，是中大的幾座圖書館，幾年之間，全變成酒店式的豪華裝潢，庸俗不堪，原來各有特色，並富學術氛圍的環境，從此不再。

無疑，隨著時代進步，某些課室的確需要加添設施，但這並不表示，原有建築的傳統和獨特風格，便應該棄之如敝屣。一個沒有傳統的大學，是不會讓人有歸屬感的。試想想，畢業的校友，每次回來中大，都發覺校園面目全非，試問如何建立對母校的感情？！

再者，部分裝修工程是否必要，實屬疑問。好像大學圖書館，重複建設頻繁，還特設酒店式旋轉大門和雲石大堂，浪費資源之餘，又不實用，使人費解。

以上種種，只是冰山一角。面對中大進一步的擴建發展，如果大家再不加保護，恐怕不出幾年，中大便會更為面目全非。不過，我們必須說清楚，我們並非反對任何形式的發展，反對大學興建校舍，我們只是要求：

1. 重新檢討現時校園環保政策及其背後的理念和原則，成立包括學生老師職員在內的，更具代表性、透明度更高，並有實質監察力的校園環境督導委員會；

2.在中大策略計劃中，把環保原則列為重要考慮，避免無節制的過度發展；

3.切實執行對環境及有歷史價值之建築物／設計的保護工作；

4.停止濫伐樹木，盡量採用合乎自然美的校園設計；

5.加強環保教育的工作。

我們呼籲，愛惜中大校園之士，密切關注中大環境的變化，若發現任何嚴重破壞環境之事，請與中大學生會聯絡，共商對策。

中大，是山中一座城，她不止是中大人的地方，也屬於地球的一部分，保護她的生態環境，是作為人類的基本責任。

要成為一所真正出類拔萃的大學，我們必須具備這種綠色視野，從我們身邊做起，好好珍惜我們這個得來不易的美好校園。

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
校園環境關注小組啟
2006年2月27日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
——「保樹立人」行動及聲明

◆ 一群中大校友

原刊於《香港獨立媒體網》，2006年3月9日

我們是一群中大校友，從中大學生會校園環境關注組的〈齊來保護我們的山城〉一文得知，近年中大校方為了所謂的「美化發展」校園工程，大興土木，砍老樹拆舊樓。而最近為了擴闊崇基池旁路，校方又以鞏固斜坡為掩飾，計劃無聲無色地砍掉三十五棵大樹。對此我們深表震驚與憤怒！

校園之美，講求歷史傳統，實而不華；大學的卓越，在於其師生堅守教育理念，對社會的責任和承擔。可是，近年校方的行政管理政策，日趨浮誇，一棟棟古樸的建築群被拆毀，當年在殖民地裡，幾間書院特立獨行，開創香港戰後高等教育的新風氣，這些建校的歷史地標亦於空間中消失；持續地斬大樹蓋高樓，與自然和諧共存的校園氣息亦煙消雲散。

歷年中大優秀的畢業生，是大學「樹人」成果，亦是大學之本，我們今天發起「保樹立人」的行動，保樹不單是為了環保，亦是為了保衛母校的歷史、傳統與自然之美。

我們呼籲中大同學、職工和校友一起行動，於三月十日早上十二點，在中大火車站廣場集合（那裡有三十五棵樹等待我們搶救！），我們會拆掉伐木的膠帶，繫上寫有自己名字的布條，向校方表明，砍伐這些老樹，不單止是破壞環境，亦是損害我們對母校的情感與認同！

我們希望透過這次行動，要求校方：

1. 保護校園老樹，各項建設與修整，不應破壞中大美好的自然及人文環境；
2. 檢討校園環境規劃和發展政策，要公開透明，諮詢同學、職工和校友；
3. 放棄好大喜功的發展心態，改以保育為首的態度，發揚建校文化傳統，愛護中大人文自然環境，締造自由開放的風氣。

一群中大校友

中大保樹之校方「屎上抹胭脂」公關簡報會（節錄）

◆ 朱凱迪

原刊於《香港獨立媒體網》，2006年4月14日

[……]

梁文道在聲援保樹立人的文章中提到：「其中一個將要倒下的樹木是株一個壯漢也圍抱不住的樟樹，另一種香港常見的植物，高大壯實，可製家具經久耐用，也可提煉樟油驅蟲。但在自然環境裡，樟樹是很受小動物歡迎的，四月開花，總有蝴蝶蜜蜂圍繞；冬天結果，就有小鳥成群採食。若遍植樟木成林，使人行其間，可隨風聞到一股醒神清香。中大附近的樟樹灘本來就是這種地方，可惜日治時期砍伐過濫，如今那株圍上了黃布條的樟該是同區的殘餘。」

我對樹木有情，卻無知。一個月的保樹行動，得到嘉道理農場職員熱情開示，真的，像兩年前學波斯文一樣開了眼界，對眼球感知的信息多了一重釋讀。搬到新居八個月了，園子裡幾株大樹，看著以為甚好，但從未想到問來歷。原來，他們也是樟樹！嘩，原來我在中大保守的樹，我的家也有！然後一切都在我腦中聯成一條對付無良斬樹黨的戰線，字典裡的釋義，我家的樟樹、中大的樟樹，以至全香港的樹都聯成一線。問屋主李太樟樹的來歷。她說三十年前搬來的時候，樹已經不小了，她覺得樹起碼有六、七十年。我吃驚，因為園裡的樟樹，樹幹只有中大池旁路的一半，如果連我家的也有六、七十年（少說也有四、五十年吧），那中大池旁路的樹齡就真的起碼達六、七十年，和梁文道根據政府出版的《賞樹手記》說的馬料水樟樹灘接軌了。故事就像偵探小說一樣引人入勝。

現在要斬這些樹的中大校方，已不是無理和無知兩個詞所能包括，他們是在無理和無知之餘，還要用公關的手段替自己化妝，猶如在屎上抹胭脂，嘔心到爆。上星期五的校方簡報會，來了許敬文協理副校長、校園發展處的林泗維總監和學生事務處的何培斌教授。校方說要在簡報會上重新提出五個池旁路工程的方案，廣告中大員生。簡報會下午四點半在邵逸夫夫人樓一個普通講室內舉行，不單止地方難找，時間安排亦令中大職工難以出席。咁仲未止，在講室門外，還有幾個五官模糊的公關女子阻礙記者和公眾人士進場。當日我「爛身爛勢、鬚根未剃」，腳踏染有咖喱汁的白

飯魚，如果不是手持一疊《保樹立人》特刊，早已被掃地出門。

林泗維在整個presentation中，曝露了一個很重大的醜相——池旁路又要斬樹、又要擴闊路面、又要整新行人路、又要修斜坡，搞九萬幾樣野，但他們真正做過study的，只有池旁路斜坡的泥土（泥土好鬆，所以要挖起再壓實）！他們要斬樹卻沒有調查樹的品種和生態價值，要擴闊路面又沒有做車流和人流的調查，連問題都未成立，他們就跳晒step問斬八十棵樹定三十五棵樹。林泗維唯一拿來證明池旁路需要斬幾十棵樹擴闊的資料，竟然是在保樹立人黃絲帶行動後才在池旁路拍的幾張類似「捉姦在床」式照片。展示的照片包括：一個懵懂的男生一邊講手機一邊「衝出」馬路，有一架校巴正駛下；幾張汽車為避行人越過中間線；巨型工程車駛過的驚人鏡頭。

許敬文在簡報會一開始時又很緊張地自爆，政府說3月11日中大正式提交了斬樹申請，其實遞交申請的是中大委託的 landscape architect。同學問中大是否知情，以及中大會否在重新諮詢員生期間撤回申請，許敬文校長都沒有直接回答。[⋯⋯]昨天打給沙田地政處的廖先生，我問中大有沒有撤回申請，他說沒有呀，一點消息都沒有，也沒有提出新方案。我說依家中大辯稱不知道 landscape architect替他們遞了斬樹的申請。他用公務員少有的輕鬆爆出三個字：「唔係啩。」[⋯⋯]

[⋯⋯]中大連問題都未搞清楚，就一口咬定自己斬三十五棵樹的擴路方案是最好，點解？因為和承建商已經簽了約，而擴闊路面是合約的主要內容，取消就要賠錢，因而至今就算無理也死要攬住擴路這一部分（請留意，五個方案中有四個堅持擴闊行車路面）？我唔知道。以一個普通人的判斷，池旁路的汽車流量和市區路面比較簡直是蚊髀同牛髀，一條交通燈都沒有的路要在居然說因為行人流量太多而要擴闊？咁仲有得拗？林泗維總監在提出擴闊路面時死硬說目前路面只有五點八米，和政府規定的七點五米有很大距離；我篤爆政府根本沒有硬性規定私家路面要擴闊至七點三米，佢就和劉遵義校長一樣穿回叫做「安全」的國王新衣。

愈說愈氣，文章就此打住。

[⋯⋯]

中大校園發展處處長林泗維先生訪問

◆ Pat

原刊於《中大學生報》，2006年4月號

常常都聽說，其實我們很難知道究竟中大的「全貌」是怎樣的。不論我們在全年的哪一個時候停下來，想看看中大的環境是甚麼樣子，都總不能成功，因為總有一些地方要不是被重重圍板隔著，就是被剷成光禿禿的山坡。這些地方有時是在崇基，有時在聯合，有時在本部，大小工程在中大似乎全年無休，但又不是太多人知究竟大興土木所謂何事。

最清楚這一切的，應該是校園發展處處長林泗維先生吧。正因為這個原因，林先生自己也說，他差不多每年也接受學生報的訪問，去年是關於李達三樓的重建計劃，今年是有關中大校園的整體規劃。

「步行校園」——從此上山落山靠電梯

林先生說，由於中大依山而建，各個上課和辦公的地方分散在山頭多個角落，他來中大的時候就有一個夢想，就是把中大校園建成一個可以以步行貫通的校園（pedestrian campus），讓師生不用動輒靠校巴才可來往火車站與山上各處。然而，下山容易上山難，既有的山勢不利步行，唯有以興建新建築物和修建步行徑解決問題，連接校園各部。在目前正在進行或最近完成的工程中符合這個用途的，包括由崇基校友園一帶直上范克廉樓及蒙民偉工程學大樓（即賤標二期），還有國際生舍堂至聯合陳震夏宿舍，而陳震夏宿舍亦將加設一部公用電梯，以分隔開陳宿宿生與其他經陳宿出入的同學。

林先生指，其實早在中大建校之初由司徒惠先生所設計的規劃圖中已有兩幢有連接校園用途的建築物（circulation tower）的構思，但因當時校方缺乏資金，所以那兩幢大樓一直沒有建成。而他也曾經向校方建議進行數項類似的工程：

一、由新建的李達三樓建一道天橋連接至聯合書院，以及一條行人隧道連接至田家炳樓地下的停車場；

二、清拆崇基松竹柏三苑後，原址改建為三幢教學樓群，利用內部的通道（可能是扶手電梯）連接何善衡夫人宿舍，計劃引導同學由此步行至蒙民偉工程學

大樓或五旬節會樓低座轉乘電梯上本部；

三、計劃中的新學生活動中心，高約六層，建於崇基眾志堂之後，以長天橋連接蒙民偉工程學大樓；

四、由雅禮賓館興建一條天橋往研究生宿舍一座，再連接校園東區（近吐露港）。

第一項工程的天橋已獲教資會撥款，勢必成事；行人隧道則不獲撥款，需由校方自行籌集資金。第二項工程的教學樓群中，其中一幢為配合大學「三三四」改制而建，但因松竹柏三苑的重建申請仍在進行中，故整項工程仍未開始。至於另外兩項工程，現時也是因為資金問題，所以無法一一實現。不過，他指現時的蒙民偉樓和五旬節會樓低座的公用電梯，也能暫時滿足這方面的需要。

林先生認為，步行校園的最大好處，在於能夠減少校巴班次，並減低校巴帶來的空氣污染問題。他估計，步行校園建成後，由火車站至大學本部的路程只需時二十分鐘。

斜坡維修——安全至上

近日引起各界關注的斬樹行動，源於校方在崇基的斜坡維修和路面擴闊工程。林先生指，在幾年前的一場大雨中，校園東部（即聯合書院附近）及 Phase 5 發生山泥傾瀉，雖無人受傷，但該處地盤的地基全遭破壞，而校方亦收到政府要求馬上進行斜坡維修的通知，為了安全起見，需展開全校性的斜坡維修工程。

根據校園發展處網頁的資料顯示，自2004年起，校園內進行的斜坡維修工程多達二十多項，分佈校園各處。而自2005年開始，工程大部份都在崇基學院範圍內進行，最近期的工程所在地為池旁路下面及鄰近火車站的斜坡，以及利黃瑤碧樓下面的斜坡，前者工程預計於今年暑假開始，年底完成，後者則在今年四至五月期間進行。林先生指，校方會在是次工程期間，一併擴闊利黃瑤碧樓下的行人路。

另一項受人注意的斜坡維修工程，為何善衡工程學大樓西面的兩幅斜坡，校方特地在該段斜坡築了一段水泥路，而這亦是該工程為人所垢病之處。然而，林先生解釋，該段斜坡由於需要大型泥頭車進出，承辦商要求由富爾敦樓近百佳的停車場開路運送，但該段路面為超級市場、大學書店及學生飯堂所在，人流極多，故最後更改於賤標一期附近開路前往。有同學批評，於工程過後，近何善衡工程學大樓一段山坡仍被圍板所





封，近月亦未見有任何工程，質疑校方胡亂破壞山坡，但林先生表示，由於該帶斜坡的工程將於暑期展開，所以不存在「亂開」的問題。

至於斜坡維修後，許多樹木遭斬去，以尼龍網覆蓋，林先生指，斜坡應以安全為大前提，是否美觀，實屬見仁見智。他又向筆者說明，校方有數位安全事務主任（safety officer，隸屬大學安全及環境事務處），專責處理校內安全事務，如早前他們曾基於安全理由，規定校內所有水池均要加上圍欄，而即將開始修築的環校步行徑，也需以磚頭鋪設，以保障穿高跟鞋步行者的安全。

工程建設——個個都係大粒佬

訪問期間，林先生多次表示，校園的各項工程，都有各界專業人士參與，通過多重審核。譬如，斜坡工程由校園岩土事務委員會（Committee on Campus Geotechnical Matters）負責統籌，委員會的第一任主席為熊翰章先生（機電工程師及發明家，現任崇基學院校董），其他成員包括林先生本人、土木工程拓展署人員及香港工程師學會代表。兩年前委員會改組，由郭志樑先生（現任崇基學院校董會主席）出任主席，土木工程拓展署人員退出，加入香港園林設計師學會秘書和路政署的園林設計師，又與嘉道理農場、中大生物系和地理及資源管理系的教授進行斜坡鞏固與綠化的研究。

而校園發展處岩土工程師黃植禧也曾表示，他們經過多年的試驗和研究，已得出一個合乎大學環境的斜坡綠化模式，顧及到斜坡的水文、地質、斜度、坐向、降雨量等因素，而每項綠化工程更是按每個斜坡的情況度身訂造。

至於全校諮詢，林先生稱困難在於，校方向教資會申請撥款的手續相當繁複——每年的九月和六月，各間院校均會向教資會分別申請兩筆款項，一為需花費一千五百萬元以上的大型建設（Capital Works），二為花費少於一千五百萬元的小型工程（Alterations, Additions & Improvement Works），例如宿舍翻新、圖書館翻新、加裝電梯等工程。校方每年均會向各學系及部門詢問是否需要申請任何工

程，收集有關申請後由小型建設委員會（Committee on Minor Works）決定。至於大型工程，經大學校園發展委員會討論後，會交由一個擁有校友及公眾人士委員的大學校園建設及發展委員會（Campus Building and Planning Committee）商議，最後由校長作出決定。如果每項工程都作全校諮詢，則會耽誤向教資會提交申請的日期。

他說校方絕對願意與同學溝通，譬如前年的大學火車站改建工程和體育館工程則各舉行了兩次諮詢會，但同學的反應非常冷淡，出席人數很少，而用家小組的學生代表出席率也不高。筆者問可否每項工程都設如火車站改建工程般的用家小組，林先生反問：「斜坡都有用家的嗎？」

然後，林先生就〈齊來保護我們的山城〉的論點逐一回應。譬如拆卸李達三樓時所砍下的數十棵樹，已被移植至國際生舍堂後面；而火車站的鳳凰木，他們在改建火車站外廣場時也花了百多萬元保護樹根絲毫不損。另外，林先生又重申，其實校方十分注重環保，如早前曾在李達三樓外的草地試設太陽能環保燈，惟因光線偏藍及強度不足而放棄。

小結——五星級的家又關你事

訪問已是一個多月之前做的了。這個多月來，這邊廂林先生在侃侃而談他的步行校園夢想，那邊廂的另一眾師生在表述一個對自然簡樸的校園的想像。兩者乍聽之下是可以相容的，但實際上卻差天共地——當整個校園都要靠電梯、天橋、高樓大廈來連接的時候，我們實在很難想像，大樹還可以從哪些角落冒出頭來，而新建的建築物如何以一柱擎天之姿，聳立在山頭的各個角落；我們對校園的記憶，又如何剩下沒有盡頭的走廊、天橋，還有每次等坐電梯都只看到裡面擠滿了人的夢魘。不過，這個時候，各個專業單位都一定會衝出來派定心丸，說每一項計劃都經過XXX委員會的設計和批核，而每個委員會的主要組成成員都是資深XX師和XX員。

對呀，按林先生的講法，所謂的「山城」，也不過是個人口味罷了。

報喜！中大設立斬樹審查委員會 池旁路老樹（可能）有救（節錄）

◆ 朱凱迪

原刊於《香港獨立媒體網》，2006年4月22日

[……]

協理副校長許敬文繼十九日凌晨通知我們，校方下令校園發展處撤回池旁路斬三十五棵樹的申請後，昨日（二十一日）又向校園發展監察聯盟三名老中青召集人表示，校方決定成立斬樹審批委員會制衡校園發展處，日後所有斬樹工程都要經委員會審批才能開工。委員會成員包括嘉道理農場代表，組織架構會先諮詢中大員生（我們絕不會同意校園發展處派代表加入，像目前審批斜坡工程的岩土委員會那樣）。許副校長承諾，所有涉及斬樹的計劃都不會開工，待委員會在一至兩個月內成立。他說，池旁路工程今個暑假開工的機會近乎零。

另外，由地資系林健枝教授主持的校園督導委員會亦已經通過，繪製中大生態地圖，標明所有有價值樹木和特別生態區的位置。許副校長表示，有關工作可能歷時兩、三年。

這些改變都是校園發展監察聯盟樂於見到的。民間自發的山城聯署和保樹立人行動在這麼短時間內能推動校方進行結構改組，實在是校政民主化的重要勝利！

在超過兩個小時的會面中，許副校長回答了很多問題，給我們一個了解大學高層想法的絕佳機會。

池旁路工程緣起與校園發展處思維分析

池旁路工程的故事說起一匹布咁長。許副校長記不清楚事件發生的確切時間，他說是校園發展處首先提出池旁路太窄，有需要擴闊，然後就請工程公司設計擴闊路面工程。他說，工程公司最初提出要斬百多棵樹，校園發展處知道沒有可能「過關」，要求修改，之後減到八十棵，再要求改，最後改到三十九（之後再成了三十五）棵。許副校長說，校園發展處認為三十五棵是可以接受的水平，怕再減會激走consultant，於是就在2月28日在網上公布，「計劃在2006年中動工，並於同年底完成」。

許副校長之後說了兩句我至今仍懷疑的話。我問：「中大和工程公司的合約中，是否列明要擴闊路面？中大是否因為不想



成功保樹後校園發展監察聯盟於文化廣場向員生發佈最新消息。

賠錢而至今仍堅持擴闊路面？」許副校長強調：「就算現在說不擴闊路面，中大亦不需要賠錢。」副校長又保證：「目前仍未確定開工的 contractor（承建商）。」

第二個說法特別難以置信。一名專做斜坡和擴闊路面的土木工程師表示，校園發展處於2月28日實牙實齒說年中會開工，沒有甚麼可能未確定承建商；而且負責設計的工程公司絕少會在施工地點畫上詳細工程標記和在樹幹上綁危險帶，那是承建商才會做的事。第一個說法比較複雜，目前正諮詢專業人士意見，稍後再解釋。

好了，聽完許副校說，現在輪到我發炮。根據校園發展處的招標紀錄，池旁路工程在2005年1月6日已經截標（Tender No. CDO2004166），計劃名稱是「Stabilization and Improvement Works at Pond Crescent and Adjacent Sloping Area」，沒有列明是「設計連工程」還是「純粹設計」。四份標書的價錢分別由一千萬港元至二千八百萬港元不等。由此向上推，即是說校園發展處最遲在2004年底已經決定要擴闊池旁路，或者再早一點，在計劃興建火車站廣場時已經決定了。（網上已經找不到火車站廣場諮詢的內容和結果。）

如果你是校園發展處總監的人，可能也會像總監林泗維一樣感到委屈。從校園發展處的角度，池旁路無論是為了配合火車站廣場（對開路面已擴闊了）的發展或者是本身太窄，擴闊路面是唯一和老早已決定的目標，之後做的一切都是為了更好和更快地完成目標。而在實踐目標的過程中，校園發展處已經千辛萬苦地（這個我倒是相信，外面的工程佬哪會珍惜中大的樹）將斬樹的數目由一百棵減至三十五棵，可謂「仁至義盡」。

但是，校園發展處可以自圓其說並不代表事情做得對。一個習以為常的程序居然推導出不合常理不合中大大部分員生期望的結果（斬三十五棵老樹），正正說明制度失效了。熊景明老師用了個很貼切的比喻：校園發展處提的工程，猶如黃綠醫生游說一個健康的人動手術（她說得很好笑，容後補上）——你有沒有毛病不重要，反正理由總能找到，給不給錢動手術才是關鍵。

池旁路工程正是先決定動手術再找病因的典型例子。校園發展處至今也不能告

訴我們，池旁路人流和車流的實質數據，現在到底是塞車還是塞人？他們從頭到尾也沒有認真了解問題（病因）出在哪裡，為甚麼？根本不需要嘛，他們根本不用對症下藥，他們要的是動手術。很恐怖的圖像呢。如果校園發展處真的關心中大的生態、尊重傳統，真的是為解決問題而設，那麼他們和校方在2006年4月7日搞的諮詢會，就應該提前起碼一年半在2004年底舉行。在舉行之前，他們還應該先調查好池旁路目前的人流、車流和斜坡生態，再向中大員生提出初步建議。

[……]

有了這樣的諮詢，知道中大員生原來那麼關注池旁路的老樹，校園發展處行事時自然會更加謹慎。現在呢？發展處先在黑箱裡決定了一定要擴闊路面，然後以片面之辭游說大學資助委員會撥款，然後花至少一千萬招標（記著，我們不知道哪間公司中標，最貴的達到二千八百萬）請工程公司設計如何擴闊路面（而不是解決人車爭路問題）。黑箱一直作業直到大家在三月初發現大樹綁上危險帶，那已經是很後很後的階段，癌症已經到了末期。但大家都沒想到山城和保樹行動那麼成功，激起中大員生大反彈，工程被迫擱置，被迫重新諮詢，甚至被迫推倒重來。嚴苛一點說，因為校方和校園發展處沒有在適當時候諮詢，至少一千萬公帑可能已經白白浪費。（因此，為了向大學資助委員會證明自己沒有浪費公帑，校方自然會想方設法推動池旁路工程，否則跳進黃河也洗不清。）還有一點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大家有沒有發現，根據許副校長的話，校園發展處從一開始就盯着擴闊池旁路路面，一句也沒有提過維修斜坡。但醞釀了差不多一年半，發展處在2月28日公布時，卻倒過來隻字不提擴闊路面，強調工程是斜坡鞏固及改善工程（英文為stability improvement works）？我很清楚將這個問題告訴許副校長，但他沒有回答的意思。要解答這個疑問和釋除上面兩個懷疑，我們必須知道2005年初中標公司的名稱和合約內容，以及校園發展處向大學資助委員會的撥款申請書。許副校長昨天沒有答應公開文件。請各位中大員生去信apvchui@cuhk. edu. hk，要求校方公開兩份文件。另外，許副校長說4月7日重新諮詢至今，只收到一兩份意見書，請大家坐言起行，馬上寫封電郵，幾隻字都好，向中大校方大聲和清晰地反對斬樹。

我在4月19日校園發展監察聯盟簡報會上，呼籲校方和校園發展處在池旁路工程上回到「不擴路不斬樹的底線」，許敬文苦口婆心地回應，「凱迪，你知道嘛，最難有共識的就是底線」。我被眼前這個死都要用公關語言包裝自己的不倒翁激到眼火爆。大佬，難道我們既能夠保護樹木又能夠解決人流擁擠的方案，不會比校方犧牲三十五棵樹的方案好嗎？校方五個所謂方案有的擴闊零點七米，有的擴闊三點六米，如此有彈性，證明校方根本沒有底線，點都得。咁樣的對手我點同你打。中大，你甚麼時候才能變得堂堂正正？

校園發展監察聯盟意見書　第一號

◆ 校園發展監察聯盟

原刊於中文大學校友關注大學發展小組網頁，2006年4月13日

許敬文教授、何培斌教授、林泗維先生：

我們是由中大學生會代表、工會代表以及一批關心校園發展的中大教師、職工和校友組成的「校園發展監察聯盟」。謝謝你們4月6日向大家詳細介紹了池旁路工程的不同方案。我們非常贊同許教授的觀點，首先必須建立信任。開誠布公的態度與溝通，是建立信任的前提。我們的目標之一便是促進師生校友和學校有關行政部門的溝通。

迄今為止，校方與師生都取得共識，認為要盡量保護池旁路地帶的生態，可以說，無論如何，當初砍掉35棵大樹的決定考慮欠周。由此，有必要審視並檢討該項工程決策的程序，這並非為追究個人和部門的責任，也不單單為保護池旁路罕有的原生態地帶，更為校園發展管理的改進；同時也有利於改善大學的管治水平。

以下問題，希望得到CDO的答覆與澄清。

1.　工程的緣起及安全因素

1.1工程最初的提案是哪一個部門作出的？

- 工程的起因是道路安全和斜坡安全，負責中大校內交通安全的部門，例如交通組和保安組，是否參與提案？（請提供該兩個部門的書面建議，或諮詢文件。）

- 是否作過使用者（步行者及駕車人士）的意見調查及交通流量調查？為何不採用（或者試行）限車速或改單行道等管理手段，而決定用土木工程來解決問題？

- 林先生展示了交通問題的照片。從路邊樹上已繫上黃布帶可見，照片均為在保樹運動之後（由CDO？）所拍。學生步入車行道，車輛壓路中線的情景，校園到處可見。這並不表示（亦不可能）將校內的路都拓寬為CDO建議的7.3米（經查證，政府並未規定校內的新修路面要拓到7.3米）。

1.2　工程從提案到請款，經過了哪些工作步驟和審批程式？

1.3　為澄清以鞏固斜坡為理由，掩蓋要擴

寬路面的實際要求的謠傳，請公開工程向政府請款的報告書（網上看到工程的名稱為「Stabilization and Improvement Works at the Pond Crescent」，並未提及拓路）。

- 在簡報會上，已有經常在傍晚行池旁路的同學指出，並不覺得有安全問題；按師生中每天6:30至8:00「繁忙時間」行走者的經驗，因為池旁路有坡度、路面窄，車輛均減速，是校內較為安全的地段（現存校園中的其他「交通黑點」，我們將在諮詢師生後提出報告）。

2. 環境及生態評估及砍樹申請

2. 1　池旁路面擴寬，是否作過環境生態評估報告，特別是樹木生態調查？如有，聯盟要求公布該環境及生態評估報告。

2. 2　斜坡維修評估經過哪些程序，校內外分別有哪些人參與？

- 按土木工程拓展署的斜坡維修手冊（http://www.cedd.gov.hk/eng/publications/manuals/manu_em1.htm），斜坡具體情況各異，不能一概而論。斜坡是否需要維修要參考很多因素。1. 4的安全系數是參考因素之一（我們將在諮詢專家後提交意見）。

2. 3　給政府地政處的砍樹申請是3月11日才遞交的，而早在3月6日清早，準備砍伐的樹上已被綁上「危險」膠帶的標誌。據許教授說，該申請是由承建商委託的園林設計公司所為。CDO知情後有沒有向政府收回申請，等待重新諮詢結果？

3. 工程招標

3. 1　按CDO網上公布的招標記錄，池旁路招標已在2005年1月6日結束，共有四間公司競投，款額分別為1)10,429,318元；2)10,829,408元；3)11,329,668元；4)28,359,930元。請問CDO是否已經和承建商簽約，何時簽約？可否公布承建商之公司名稱？

3. 2.　當學校在3月8日（或之前）決定聽取師生意見，重新考慮不同方案時，CDO是否已通知承建商？

3. 3　如果2005年初已經和承建商簽定了協議，並已決定在2006年春夏開工，因中大取消工程而令協議作廢，大學是否要賠償，賠償金額多少？

建議

- 及時向地政處撤回砍樹申請；設專門小組檢討池旁路工程的決策程序，向公眾提交改進程序建議，按新的程序重新評估該工程的必要性。

- 用半年或以上的時間試行車輛時速限制，以觀效果；如果限車速效果欠佳，半年之後試行單行道，一年以後再評估。

- 在池旁路工程檢討完成之前，尚未開工的其他擴路及斜坡工程暫時停止動工，同時公布未來兩年內有關擴路及斜坡工程提案，廣泛諮詢公眾意見，成立專門小組重新研究、評估這些計劃。

世界上無數年代悠久的校園和小城鎮，都

面臨擴路之需與保護傳承的文化及生態環境之間的抉擇。對以維護中西優秀文化傳統為使命的中文大學，答案是明顯的。相信校方與校園發展監察聯盟有共同的目標，讓我們一起為建設安全而優美的校園而努力。

校園發展監察聯盟
召集人：周漢杰、朱凱廸、熊景明
2006年4月13日

副本致：
劉遵義校長
廖柏偉校長
中大環境事務委員會主席：林健枝教授
中大管治專責小組：梁少光先生

飯氣劇場

Special：咩野樹

◆ Kongkee 江記




CAMPUS DESTRUCTION OFFICE
CAMPUS DESTRUCTION OFFICE
CDO
SCHOOL BUS
AIR
吸吸呼！
吸吸呼!!
大學道
聯合
Illustrated by Kongkee
漫畫：www.shiningsummer.com

校園發展監察聯盟就校方諮詢的聲明

◆ 校園發展監察聯盟

原刊於《香港獨立媒體網》，2006年5月5日

首先我們歡迎校方擱置池旁路工程，並進行諮詢。我們經過仔細閱讀方案，訪問有關人等及查證資料，發現工程部門提供的許多資訊並不準確，有故意誤導視聽之嫌。我們本來希望在看到更多的資料，例如工程顧問公司的報告、合同、教資會撥款申請書之後，在進一步研究後再發表意見。但諮詢限期將至，校方仍未願意交出有關資料，故僅就目前瞭解到的事實，提出以下幾點，希望得到校方切實的回應。歡迎所有中大員生批評指正。

1. 反對「五揀一」：五個方案的陳述，都是以擴闊路面為前提，令人懷疑校方因為政府已批下款項，工程（或大或小）勢在必行。校方並在此不能說明的前提下，扭曲事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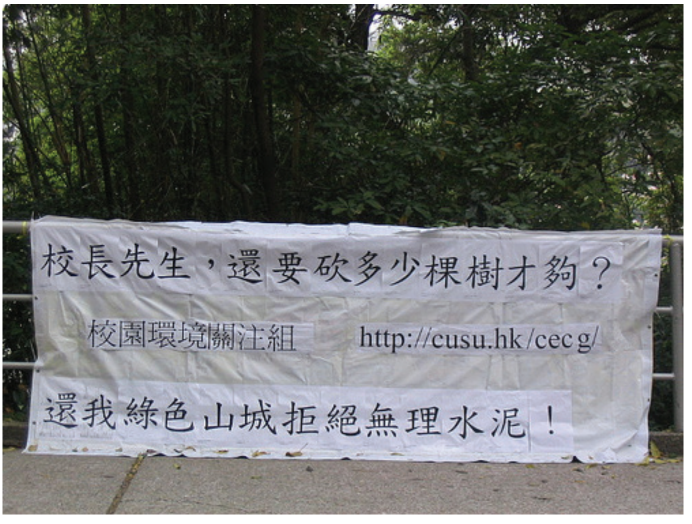
且舉一例：方案三裡引述中大建築系老師的構思說「將現時闊5.8米的雙程行車線，擴闊至7.3米，以達到現時香港建築物規例對新建私家街道的闊度標準，提高駕駛者及行人的安全」。這完全是捏造事實，建築系老師的構思從未提及擴闊行車路面，他本人亦從未被諮詢或聽聞任何「仔細可行性研究」！

其他扭曲誤導見〈眾志綠山城——池旁路工程方案眉批〉。

2. 要求成立獨立委員會：池旁路工程，無論從提出的理據、諮詢、決策、審批、執行和監督各個環節，均出現嚴重問題。譬如，工程於2005年1月6日完成投標，本來計劃在2006年年中動工，但校園發展處卻到2006年3月11日，在「護山城」及「保樹立人」行動展開，校方答應擱置工程後，才向沙田地政處申請斬樹。我們要求成立一個獨立委員會，徹查當中的問題，以免日後出現同類事件。

3. 延長諮詢期：在獨立調查報告完成前，停止所有斜坡和斬樹工程，繼續進行諮詢。我們很高興知悉，校方將研究現行制度存在的不足，加以改進。但池旁路生態對中大員生非常重要，必須避免因現時的錯誤付上不能彌補的代價。

4. 制訂校園總體規劃：長遠計，必須參照世界一流大學的經驗，制訂校園總體



規劃；制訂歷史文化、環境保育原則；制訂未來校園工程和交通安排指引，實施行人優先制。

校園環境監察聯盟在過去兩個月來，不斷要求校方和工程部門公開池旁路工程合約資料、環境評估、交通人流評估報告和持份部門（如交通組、保案組）的諮詢報告。可是，直到現在，工程部門對這些資料是否存在，會否公開，均不予回應。

聯盟更發現，校園目前幾個主要斜坡工程的承建商，提供「一條龍服務」，包攬顧問、向政府提交工程提案和實行工程等工作於一身。顧問的責任應該是公平地判斷工程的必要性和影響，但在「一條龍服務」下，這項至關重要的工作卻交由實行工程的公司負責，結果不問可知。校方有必要交代目前的斜坡工程是否按這種「All in One Package」的方式運作？中大的工程部門在其中究竟充當甚麼角色？

若我們不檢討校園發展和工程的運作，所謂的諮詢只會淪為門面的公關騷，而類似池旁路的爭議一定會陸續出現！

願那校園能容下貓和樹

◆ 熊一豆

原刊於《明報》，2006年3月18日

今天讀到一則花邊小新聞：「嶺大之寶『小虎』傷了　學生兩天籌款2000」（《明報》，2006年3月14日）。「小虎」是坐鎮嶺大的其中一隻野貓。到訪嶺大，從廣場拾級而上，三、五隻貓兒悠躺路中或臥睡花叢，是等閒景觀，也是急促步履與繃緊精神的分、逗號。但此等閒之情景，在這個高度規管的城市空間，卻得來不易，絕非等閒。

印象中，好些大專院校都是驅狗趕貓的，即使那些院校是傍山而建、與大自然的邊界欲斷難斷。驅貓還是共處，直指的是校園風光下的文化底蘊，也從中反照孕育出何等樣人。

從嶺大生救貓，想到中大人護樹。中大連續兩年，逢此春際，均遭受看似不足道而實際影響深遠的風波。中大人，繼去年「哭中大」後（2005年1月底，中大學生發起名為「哭中大」的公開聯署信，目的為捍衛中大以中文授課的傳統），今年又為老樹而泣。

本月初，中大校方因道路工程欲砍掉崇基池旁路一段約三十多棵大樹。那些樹，該為第一代崇基人植下的老樹，見證了中大變遷逾五十個年頭，而今成了中大發展的障礙，非讓路不可。逾二千名中大學生、教職員、校友聯署反對，於是一場砍樹護樹爭議由是而生。

可是，當爭議被表述出來時，卻被約化為「安全」與「環保」對立的二擇一命題：背後潛藏的文化爭議，隱而不現。但根據中大校園環境關注組（cusu.hk/cecg/）提供的資料，修築安全斜坡不過是幌子，工程主要目的是擴建路面。原因是目前大部分教學、夜間的課程，都集中遷移到崇基，人多了車多了，路就不夠寬了。盛載歷史的大樹，在諮詢從缺、其他方案欠奉的情況下，成為廣收生、爭資源、不斷擴建政策下的犧牲品。

而命題的另一端，「環保」二字，同樣不盡不實。在香港，環保二字的定義經常流於偏狹，除了把人的思想囿於藍廢紙、啡膠樽，就是唯綠色為好了。於是，把大樹拔起移種別處，或砍樹後有規劃地覆鋪草坪、在別處補種新樹等

行徑，仍能穩穩當當過「綠色環保」一關。所以，重點不是環保，而是對傳統、文化的敬惜，對人文素養的珍視。

「安全」與「環保」以外的人文因素

大學教育，又豈只課堂內單純的知識傳授，一隅樹蔭下的夏讀，漫步山徑的沉思，是更廣義的課堂。環境，向來就不能從教育育人的環節抽脫出來。教育，除了知性的輸出與接收，更不可忽略對身邊人事草木的感知關懷。由鳥語鶯音陪伴走過小橋流水的心靈，相信更能得見屠宰健康家禽之荒謬與冷酷。而盛載了歷史厚度的一草一木、一桌一椅，除了是過往一代代中大人的記憶、情感所繫，亦是那個廣義課堂的深厚累積。所以，草率砍樹，不只是對環境的冷漠，更反映出其教育藍圖裡，人文因素考量的從缺。

然而過往幾年，中大大興土木之頻、拆舊建新之狠勁，絕不遜於鬧市商業地皮。一幢幢高聳建築拔地而起，門面都金光閃閃起來，連草坪、過道，也都落入管理的範疇，處處顯露出規劃的痕迹。在此聲勢浩大的硬件發展中，中大的人文氣質漸為一種重區隔的空間管理所替。就整體外觀而言，中大從過往因地就勢、與大自然謙和共處的建築形態，逐步變身為雄踞山頭的霸姿。至於內在空間使用，僅以Snack Bar為例，加了個玻璃罩，內裡冷氣的確透心涼，但也自此與外間區隔開來。以往的空間是流動的，餐桌、泳池、梯級、過道、有雀鳥飛過的天空，連成一氣，自由鬆動。加了個罩之後，儘管玻璃透明，但內外其實已是截然不同的空間，連帶其使用規限。

所以，把「安全」與「環保」這兩個似是而非的爭持面揭開來，是把大學發展再次置於人文傳統的對立面。而此發展藍圖，是以經濟效益為指標，以盲目追求國際化為依歸。於是連續兩年，同是大刀欲揮，去歲先動搖中文授課此一立校之本，今則輕率欲砍老樹為人車開路。看不到自身根基之獨特及可貴，反而視之為變身國際化之羈絆，非去之而後快，不能不嘆喟中大的悲哀。

更可嘆是，當零丁幾名校友自組「保樹立人」行動，在池旁路地上書此四個大字，卻只落得被校方及一些同學，斥為「破壞公物」，不能容忍。校友對校園、對樹木的關顧之情，竟被塗鴉之「罪名」遠遠蓋過。那四個不容於法的「保樹立人」大字，躺在地上，路人字照踩路照過，比照著數十棵大樹將被終止生命的合法指令，只能教人不勝唏噓。

愛樹的人都難免掉眼淚，兼發泄與許敬文副校長面談後的感受

◆ 朱凱迪

原刊於中文大學校友關注大學發展小組網頁，2006年5月23日

愛樹這個事情嘛，多數像忘年戀。你知道樹的時候，通常他已經是一把年紀，喜歡摸他粗糙的樹幹紋多於新長的嫩葉。而在我們這個時代，能陪伴我們到老的，又有幾株？很佩服那個港大的詹志勇，每次記者訪問都是帶他到大屠殺的現場，他愈認識樹就要面對愈多大屠殺。而他還能維持著學者的木訥，我真的會流下淚來。

如今四、五十歲身處高位的中大舊生，我要向你們詰問：你們年輕時經歷過美善的事，曾經坐在草地上聽差不多死光的學人的教誨、曾經名副其實地吐露過夜話、曾經親手將樹苗種在好土裡。現在大學交到你們的手裡，學生交到你們的手裡，你們一邊罵這一代的大學生惡俗犬儒膚淺沒有研究精神，另一邊卻自己騙自己，說要將「（中文）大學發展成為中國和區內的傑出學府，以至東亞的國際大學的首選……中大致力成為亞洲甚至全世界的最佳學府之一。不過，要達到這個卓越水平，必須釐清目標，集中力量。故此，目標是在未來十年有更多卓越學科領域躋身亞洲最佳之列……」你們自己享受過只有二、三千名學生的中大的好，知道這樣規模的大學令你們有更緊密的師生和同學關係，現在你們卻說要擴展、擴展、再擴展，最好能跟科大合併，變成超級大學（最好八萬是外地學生）。這樣你們就有藉口推說「咁多人，我見都未見得晒」，然後就用你們那些猶如檢定工廠貨品的標準來量度你們口中的「親愛的同學」，我恐怕十年後的中大學生畢業前都要由機械人來檢定他們符不符合ISO1234567。

現在一個個進來中大的學生，你們真的還／能當他們是一個個活潑的生命嗎？你們說「本地人口統計數據並不樂觀；隨著適齡大學生人口萎縮，中大應有能力面對這些壓力，而競爭力較弱的院校則要面對更大挑戰……」我有沒有看錯？適齡大學生人口萎縮，在你們眼中居然成了壓力，你們好像將學生人數變成了營業額增長率，增長得慢一點就已經手心冒汗，如果增長率係零就幾乎要跳樓自殺了。「競爭力較弱的院校則要面對更大的挑戰」，我好久沒聽過更涼薄的話。



我知道關於「學口」（餵食知識）增長這點你們是坦白承認的。你們說「兩個三年計劃之後，大學學制將恢復為四年，學生完成中六課程則入大學。四年制固然是難逢的機遇……」我最初還天真地以為，這個所謂「難逢的機遇」，是因為學生可以多過一年大學生活。但原來，「難逢的機遇」是指中大可以突然間多三千名學生（簡直是令人驚喜的非經常性收益），因此可以拿更多的資源擴張，搞第五、六、七、八間書院，直到永永遠遠。對於校園發展處和跟他們合作愉快的發展商／承建商，工程就更加應接不暇，高樓大廈起到2046都未起完了。（校園發展處手頭上的工程多到「做唔切」，這是我從超過一名教職員口中聽到的）

我要再重複一次，你們自己明明享受過中大豐富的空間帶來的自由，為甚麼現在要欺騙下一代，令他們不自覺地認同你們那套中大必須不斷擴展、學生必須不斷增加才有前途的邏輯？這樣的發展前途，和香港地產商心目中的前途，究竟有甚麼分別？

趁吐露港還未填平，讓我把所有的偏見都吐露出來吧。你們應該挺羨慕科大。在那邊，民主牆是空白的，學生活動大部分是中學式的興趣小組，同學在小巴上談論得最多的是「這科攞唔到A-、今個學期入不到dean's list」，沒有不滿，沒有跳出來攔著校長座駕的學生和校友，有一個整體劃一經過規劃的校園，外判的清潔工人，還有比中大更多的天生金色頭髮的男女在走動，贏得一個又一個研究獎項，MBA的世界排名又比中大高。真是比夢想還美啊，一班apolitical的學生，一個apolitical的校園。

所以我必須踢爆你們。你們口口聲聲說「中大的獨有特色是雙語和雙文化環境，對中國文化有深厚的感情，堅信社會進步不單只是有賴由科技和商業推動的經濟發展，而人文科學、創造性藝術和社會科學的心靈啟迪同樣重要」（將藝術和社會科學的政治戰鬥力抹去，變成軟弱無力的「心靈啟迪」，這還不是說漏了嘴？）；但同時間，你們對文學院和社會科學院部分不聽話的學系多番壓榨、削資合併。新老師大部分都是工作前景極不穩定的合約制，生殺任由高層話事，令本來可以活躍於校政、激發同學政治意識的老師，都變得敢怒不敢言——就算還敢出聲，都被愈來愈多的教務工作弄至動彈不得。就以保樹立人行動來計，多少老師在削資和失業的威脅下，淪為（是「淪為」）匿名消息人士？許敬文副校長說，那部分源於中國人不愛出頭的文化，還難為他要循循善

誘地請職工將意見說出來。

我承認，配合著香港的大趨勢（你們說「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的《香港高等教育報告書》（2002年3月）所訂定的連串目標，與中文大學的使命和願景不謀而合」，啊！），你們是佔盡上風的——中大的學生愈來愈多，民主牆的大字報愈來愈少，不少同學對著我們幾個「蝸居」的保樹校友展露出陰沉的麻木，以ISO代替學術傳承和師友關係。（遲啲畢業同學要填，以五分為滿分，你認為中大的師生關係有多少分呢？老師到時就更像賣笑了。）但是，哈哈哈，當你們口裡說承傳中大的道統，實際上卻拉著新一代忘記過去忘記理念走那發展大路的時候，中大的「珍重」精神仍然會像紅花會一樣縈繞不止，在各個暗處擴散。以我為例，我在中大時沒有參與過校政、沒有寫大字報、沒有在烽火台上發過言，但中大精神還是不知不覺地像癌細胞一樣潛伏在體內，而且還始料不及地在畢業七年後的今天才發病。因此，I′m sorry，你們沒有機會像朱經武一樣舒服，沒有機會。

備註：

- 他們說的話，全部引述自《中大策略計劃》（2006年2月1日）。（http://www.cuhk.edu.hk/chinese/documents/aboutus/cuhk-strategic-plan.pdf）
- 還未提到中大日後將會視國內為主要的學生市場，十三億人喎，0.1%適齡客人來中大都發達啦。（嘩，這模擬的口脗和港商真像。）

情色版事件



從校園掀起的文化戰爭

◆ 杜振豪[1]

背景

要談情色版事件，不得不談中大學生報的革新計劃。時維2006年下半年，幾位新舊學生報編輯，眼看當時中大學生報編委會士氣低迷，校園影響力弱，日漸脫離群眾，遂決定厲行改革。改革計劃大刀闊斧，包括增聘全職編輯、增加發行量、改為月刊出版。至於內容方面，除了維持舊有的校園版和社會版，增設了特約專欄、文藝版、體育版、情色版。籌組計劃的編輯野心勃勃，一方面希望增加出版密度，擴大社會影響力，一方面希望在題材上吸引更多群眾，介入更多不同議題。《中大學生報》情色版，便是在這個背景下誕生。

事件經過

從2006年12月號開始，《中大學生報》情色版出版了五期[2]，一直相安無事。直至2007年5月7日，《星島日報》、《東方日報》、《明報》[3]忽然接獲投訴，大篇幅報導情色版，東方日報標明為「馮子釗爆料」。同日，署名王達威的評論文章[4]，恰好也在《星島日報》大力抨擊中大學生報辦情色版。其後，馮子釗及王達威的背景被網民揭發，分別為播道會恩泉堂傳道人及宣道會真道堂成員。事前中大代表會或中大學生報均沒有收到任何投訴，因此，這件事的性質，可說甫開始便不是校園內的爭議。

報導刊出當天，中大校方發言人即表示「校方要求學生具有高尚的品格和道德操守」，「絕不容許學生以不雅及色情的方式出版刊物」，並且「已成立調查委員會了解事件」[5]。翌日，各大媒體廣泛報導事件，輿論焦點紛紛落在「亂倫」及「人獸交」的問題。

5月10日，教務會學生紀律委員會主席馬麗莊，繞過既有程序，發出警告信予學生報編輯，明令禁止出版[6]。警告信指出，各期情色版「確實載有不雅內容，超出社會可接受的道德底線，令人不安。本委員會認為有關刊物影響其他中大同學的利益，並損害校譽。本委員會將盡快再舉行會議[……]，考慮處分方式。」署理教務長吳樹培也於同日致函學生報編輯，表示「《中大學生報》是次行為純屬出版委員會之舉，全體成員必須承擔責任[……]本人謹此向《中大學生報》出版委員會各成員給予嚴重警

告，敦促同學們必須立即停止出版載有不雅及粗鄙內容的刊物，或分派該等刊物。大學亦將禁止該等刊物在校園內發佈。」[7]

接下來的半個月，可說風起雲湧。不同團體及人士紛紛發表聯署聲明，分別支持或批評學生報。曾發表聲明支持或傾向同情學生報的團體，包括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大學師生監察無良企業行動、自治八樓、中大校友關注組、中大員工總會、中大校園電台、前中大學生會幹事及學生報編輯、香港專上學生聯會、香港基督徒學生運動。與此同時，校內各系學生也分別發出聯署公開信聲援，包括文化及宗教研究學生、經濟系學生、政政系學生、哲學系學生、社會學系學生、社工系學生。除此以外，數十位來自本地、台灣、外地的學者，更發起「守護我們的學生，守護我們的學術自由」的聯署聲明，聲援中大學生報。

至於批評學生報的聲音，則主要來自傳媒及宗教團體。期間曾有五十三名中大學生聯署發起「回水大行動」。除此以外，則要數署名「一群關心中大的中大同學、校友，和社會人士」的匿名團體，他們在網上發起〈勇於認錯，重新改過——請《中大學生報》編委迷途知返〉聲明，得逾三千學生校友及公眾人士聯署。5月16日，更有人以「一群真正弱勢的香港市民、以及中大舊生」的名義，在《星島日報》刊登全版廣告的公開信，聲稱「是沒有組織、被視為『沉默』的香港市民」，表示「反對《中大學生報》低級猥褻，並文過飾非，以言論自由混淆公眾視聽。」

情色版風波引起社會廣泛討論，輿論最初全面聲討學生報編輯，後來則慢慢轉向批評校方做法。其後，當《中大學生報》及轉載情色版的《明報》，相繼被淫審處被評為二級不雅後，更引來大批網民不滿，集體投訴《聖經》內容不雅，最終影視處接獲超過2000宗投訴[8]。《聖經》的投訴自然不獲影視處受理，至於《中大學生報》與《明報》的評級，後來交由高等法院作司法覆核，並在翌年勝訴，揭露了淫審制度的程序問題[9]。

總括來說，情色版事件甫開始便不是校園內部的小風波，而是有心人以情色版為切入點，在社會上發起的輿論戰。傳媒以「亂倫」和「人獸交」為報導焦點，成功吸引公眾的注視。豈料，其後矛頭卻轉向質疑淫審機制和宗教霸權，並最終發展為民間社會不同道德價值的角力，儼然成為一場「文化戰爭」[10]。

文章選輯

情色版事件全城關注，引來極多評論文章。論範圍之廣，討論之深，實難在短短數十頁羅列。篇幅所限，難免有遺珠之憾。我們無意按輿論比例反映當時的坊間討論，也不打算糾纏於中大學生報的對錯，而是希望選取在觀點上具代表性的評論，為此次事件帶來的對話和爭辯留下紀錄，供後人參考。

聲明及事件紀錄

作為事件的核心及批評對象，我們揀選了三期情色版文本，包括備受爭議的問卷調查回應，供讀者與其他評論文章對照閱讀。其次，則是三篇聲明以及一篇事件紀錄，前者涵蓋了當年中大學生報編輯對事件的回應及核心論述，後者則是新近完成的事件紀錄，用以交代中大學生報覆核淫審處評級的經過，以及最終高等法院的判決及其法律理據。

師生校友迴響

此外，我們選擇了幾位師生校友的文章，討論範圍主要圍繞情色版的手法、學生報的論述、校方的處理方式。鄭巧玲的文章是事件中相對早期的評論，作者撇開了傳媒窮追猛打的道德問題，嘗試將事件定性為某種「傳播技術」的失誤。鄭認為情色版的問卷調查回應，「敍述『偷窺』的過程」，於是變成「單純的色情描寫」，結果不符合希望反思色情的編輯目標。鄭巧玲的觀點，可說是坊間某種「眼高手低」論的代表。鄭建議編輯應該將問卷調查的回應，視為性學研究的案例，「討論人們獲得性知識的渠道以及其影響」。

相對於要求性學研究討論的鄭巧玲，校友王邦華則引用傅柯的理論，指出性話語在不同歷史階段有不同的展現，牽涉各種歷史原因及權力操作。現代社會長期貶低主觀的性經驗描寫，同時將具有客觀權威的性學知識視為談性的圭臬，其實只是性論述的規訓結果。作者強調性學知識有相當高的解釋力，但不是性的全部；主觀性經驗能豐富我們對性的想像，也能引起更多思考。

黃慧貞的文章則明確指出，所謂「眼高手低」的說法，恐怕不全然是指向手法問題，而是同時指向內容問題。作者綜合各方批評，得出一個總結：「大學生談性是可以的，只要他們嚴肅地談、有『品味』地談、在一定的框框內談、避免觸及社會公眾對性的忌諱。」換句話說，公眾可以接受嚴肅地討論亂倫，但以一問一答的方式向讀者提問亂倫的欲望，公眾卻是無法接受了。黃引用佛洛依德及利維史托的理論，指出這種禁忌其實正源自欲望的壓抑。中大學生報的「失誤」，其實在於嘗試反抗這種壓抑的潛規則。那就像「國王的裸體」，有些秘密大家都知道，但就是不能公開說。

蔡子強的文章透過追憶高錕的往事，呼籲校方對學生報編輯盡量寬容。這篇文章於當時傳播甚廣，可說有助促成輿論轉向質疑校方做法。文章得到廣傳不無原因，一來是相對於當時校長劉遵義的乾綱獨斷，高錕的確擁有校長該有的胸襟和風度；二來是文章已假定了學生報編輯犯錯，只是呼籲校方包容，而且將問題轉移為師生校友對中大的認同。可惜，作者於通篇文章不斷強調在上位者受到的委屈和侮辱，以及高錕對異議者的忍讓，卻完全抹去了當年學生抗議的理據，甚至連不懲罰抗議學生也說成為包容學生的証明，由是這種論調便徹底成為一種站在上位者角度的憐憫。簡

言之，蔡的觀點其實就是，校方應該對學生寬容，但與學生有沒有道理無關，純粹是因為校方應該展現出上位者的風度，容忍學生的稜角和反叛，因為他們二三十年後也可能成為鄭海泉、何安達、劉細良等社會名流。

馬嶽的文章以世代論為框架，並以五六十歲的掌權人為身位，反思主流社會標準不一的偽善。雖然以「後物質主義」vs「經濟發展」的邏輯來理解「跨代的價值斷裂」，很可能造成不必要的假對立——天星皇后事件的意義，並非旨在守護甚麼集體回憶，或純粹以歷史文化抗拒「經濟發展」，更是指向這種「經濟發展」為誰服務的問題。

不過，作者銳利地指出了一個問題，就是「批評者從來沒有在共同的價值基礎下，和他們公開辯論哪個是適合的道德和品味的界線」，只是「從自己價值觀出發，先肯定了大學生有錯，但年少無知應該寬大處理」。也許，這便是對蔡子強文章的最佳回應。

曾瑞明是前中大學生報編輯，立場上同情情色版的設立，也反對坊間的泛道德批評[11]，但卻對中大學生報編輯的回應論述，提出了在芸芸論者中最辛辣的批評。文章首先指出，使用市井語言不等於不會排拒基層，問題的關鍵其實在更實際的物質條件差距。大學生不可能在階級與階級之間變來變去，所以不應太有信心說要代某階級發聲[12]。其次，作者指出了「尊重多元」的空洞，學生報的聲明有時主張價值主觀主義，有時高舉多元有普遍價值，論述內含矛盾。此外，他也點出了所謂「解放遭這論述壓迫的弱勢者」，不符《國王的新衣》中「誠實小子」的形象，質疑學生報編輯表面「扮無知」但實際上「自大」。

社會批評及爭議

最後，我們也選取了數篇文章，嘗試涵蓋因情色版事件而起，並延伸向教育、宗教、性文化層面的社會爭論焦點。梁文道透過介紹外國經驗，肯定大學容許出版情色刊物的自由。文章指出美國大學學生辦的情色刊物，分量和尺度猶有過之，校方卻「絕不輕言審查，更不動用甚麼紀律審裁的機制」。梁文道認為大學應該開放包容，與主張設限劃禁的何漢權截然不同，讀者不妨對照參考。

郭鴻標認為，學生報編輯辦情色版「有明確的目標，就是要衝擊傳統道德價值」。作者又形容，這種思潮乃是「當代性別及文化研究在自由主義和後現代主義思想帶動底下，進行對社會主流價值的顛覆」，亦即「搖動傳統家庭婚姻價值」。安徒的文章則認為，情色版事件標誌香港的「文化戰爭」踏入關鍵時刻。這場「文化戰爭」，乃是倣效美國文化政治，以「宗教vs世俗」的對抗圖式而發動的模擬戰事。作者指出，在這場風波中，「衛道聖戰者騎劫了傳媒，而傳媒又騎劫了大學」，學生報編輯則成為了「聖戰祭禮中的犧牲羔羊」。可是，作者同時指出，民粹主義邏輯是一把雙面刃，隨時會遭受反撲。本地基督

教團體的投訴行動，其後引來大批網民反過來集體投訴聖經，或可視為其中一個事例。

林奕華細讀五期情色版，在坊間芸芸評論中實屬絕無僅有。他在各期情色版中讀到「文章背後的抑壓，以及從字裡行間滲透出來的焦慮、苦悶、不安」，並指出輿論沒興趣閱讀上述圖象，而只抓住所謂亂倫人獸交的問題不放，「其實是一種『看不見』的『看見』」。作者補充，情色版之所以被評為「眼高手低」，其實是「學生的嚴肅手法被捉錯用神」，評論者完全忽略了情色版的另一層功能，乃是「同學藉著書寫與性有關的文字來尋找自己」。林奕華舉例說明，〈滿足〉及〈做／愛總是拉着痛苦一二三四五〉正是「女性在性方面自覺和自主的『自白書』」。作者繼而批評，「隨便用『鼓吹淫穢』來否定自我探索」，其實也是一種逆向幻覺，即「看見地看不見」。

其後

《中大學生報》與《明報》就淫審處評級的司法覆核，終於在2008年10月獲得勝訴。高等法院判決淫審處行政失當，相關的不雅評級須予撤銷。至於中大校方的紀律程序，則早於2008年3月便由新組成的裁決小組，宣佈不予追究，個案結束。 然而，校方於2007年5月10日發出的警告信，始終未有收回，也不曾對學生報編輯致以任何歉意。

風波過去後，中大學生報一直繼續出版情色版。2009年4月，一篇〈情到濃時，不如開房〉的文章，介紹開房需注意的細節，又再引起媒體關注。不過，社會反應遠遠沒有2007年哄動。七年過去，要總結情色版事件的意義，依然非常困難。無論如何，事件引起了關於性言談的豐富討論，殊為罕見，它在一定程度上拉闊了本地院校的性言談空間，也為性言談的爭辯留下了寶貴的討論資源。或許，這也算是達到了設立情色版的部份目的吧。

---

1 筆者為第34屆及35屆中大學生報編輯，至於牽涉情色版事件的中大學生報編輯，則分別屬於第36屆「雜草」內閣及第37屆「拾遺」內閣。

2 五期當中，2006年12月號、2007年1月號、2007年2月號、2007年3月號均由「雜草」內閣負責出版，只有2007年4月號為「拾遺」內閣負責出版。其後，2007年2月號及3月號，被淫審處評為二級不雅。

3 《明報》題為〈中大學生報露骨談性〉，《東方日報》題為〈中大學生報淪淫賤報〉，《星島日報》更是特別關照，共有三篇報導，包括〈教育界震驚校方稱嚴正處理《中大學生報》炮製「情色版」〉、〈只求情色歡愉易墮失責陷阱〉、〈未接正式投訴 學生會不介入〉。

4 王達威，〈《中大學生報》「情色」版令人震驚〉，《星島日報》，2007年5月7日。

5 〈影視處接《情色版》投訴〉，《星島日報》，2007年5月8日。

6 詳見本部份文章：中大學生報，〈堅決反對校方不義裁決聲明〉。

7 在輿論轉向批評校方做法後，署理教務長吳樹培隨即於5月18日致函學生報編輯，表示5月10日的信件並非「處分通知書」，目的只是要「敦促」同學，不可出版不雅刊物。6月4日，教務會學生紀律委員會也以秘書余蕙卿的名義，表示「5月10日舉行的初步會議並非正式聆訊，沒有作出正式裁決或對任何同學作出處分」，並指「在審裁處的司法程序尚未完結前，委員會暫停有關的紀律程序。校方反應隨輿論起舞，前倨而後恭，從中可見一斑。

8 至於針對《中大學生報》情色版的投訴，則為逾300宗。

9 詳見本部份文章：吳嘉倫，〈情色版事件之法庭篇〉。

10 詳見本部份文章：安徒，〈文化戰爭與道德聖戰〉。

11 可參見：曾瑞明，〈冷言冷語論情色（上）〉，《香港獨立媒體網》，2007年5月20日。本書限於篇幅，未有輯錄。

12 使用市井語言，不代表不會排拒基層；但排斥市井語言，的確是區分階級，並且合理化統治階級優越地位的文化生產方式。關於學生報編輯對階級藩籬的自覺，筆者建議可參看本部份輯錄的〈太子戲院食屎食著豆，或相反〉。〈太〉文作者不諱言抱持獵奇心態進場，並且注意到自己「意圖營造以便自我感覺超然的距離」，這種心態「細想起來就使人手足無措，唯有以論述的慾望掩蓋」。學生報編輯不時使用市井語言，除了拒絕附和區分階級的文化優越論，或許也是為了掩蓋這種「令人手足無措」的階級差距。

13 這種「看見地看不見」，不只出現在泛道德批評的文章，甚至出現在熟悉女性主義與性別研究、有文化研究背景的論者。例如，2007年5月15日《明報》刊登的朱振威、陳英凱〈被迫害妄想的性解放先鋒？〉，作者便批評〈滿足〉一文只是為父權價值觀背書，指〈滿足〉的作者被父權意識「內化而不自知」，結果是「再一次複製及鞏固僵化的單元思想」。這些論者完全沒有看到〈滿足〉作者提出的女性情欲自主問題——是否能以性幻想補償現實的不滿——更沒有留意到學生報編輯在同版的〈stephy信箱〉中，早已處理了幻想被性虐待的情節是否有違女性情欲自主的問題。

14 據媒體報導，裁決小組認為，第37屆總編輯曾昭偉只負責出版2007年4月號，淫審處已評定4月號為既非淫穢亦非不雅的一級內容，故投訴並不成立；至於第36屆總編輯唐世豪，則因其他原因已經退學，校方已無權執行任何紀律程序，故此個案亦結束。



情色版事件時序表



2006年12月6日	中大學生報出版第一期情色版
2007年2月6日	中大學生報出版第三期情色版，包含情色版問卷
2007年3月6日	中大學生報出版出版第四期情色版，包含情色版問卷及讀者回應
2007年5月7日	《星島》、《東方》、《明報》報導情色版，《東方》註明為馮子釗爆料，同日王達威另文於《星島》炮轟
2007年5月7日	中大發表聲明，表示要求學生有高尚品格和道德操守，已成立調查委員會跟進
2007年5月8日	幾乎所有媒體均以大篇幅報導，部份以亂倫人獸交作標題；同日王達威另文刊於《明報》
2007年5月8日	媒體報導指，影視處接7宗投訴，稍後將會送檢
2007年5月8日	中大學生報出版第一份號外及「無懼污名，重尋真性」聲明
2007年5月9日	媒體以中大學生報拒認錯，繼續大篇幅報導；評論文章開始愈來愈多
2007年5月9日	中大學生報300份號外被棄置於回收箱
2007年5月9日	中大學生報出版第二份號外及發起「衝破禁忌 重建道德」聯署聲明
2007年5月10日	媒體報導53名中大學生聯署，要求回水和道歉
2007年5月10日	「性，我們如何表述」論壇，於中大烽火台舉行
2007年5月10日	論壇末段，署理教務長吳樹培發信予編輯「嚴重警告」，教務會學生紀律委員會表示「考慮處分」
2007年5月10日	中大學生報發表「堅決反對校方不義裁決聲明」
2007年5月11日	國際特赦香港分會發聲明支持中大學生報
2007年5月11日	大學師生監察無良企業行動發聲明支持中大學生報



2007年5月12日	「言論空間的底線？多元與尊重」論壇，於旺角西洋菜街舉行
2007年5月13日	自治八樓、學界聯署、中大校友關注組、中大員工總會、政政系同學、文宗系同學等各自發聲明支持中大學生報
2007年5月13日	《明報》〈星期日生活〉諧擬情色問卷
2007年5月14日	新亞學生會發表聲明，呼籲校方停止干預中大學生報出版
2007年5月15日	學聯發表聲明支持中大學生報
2007年5月15日	淫審處裁定2月、3月號和網上版為二級不雅，影視處至今接152宗投訴
2007年5月16日	《星島》刊登全版廣告公開信批評學生報，署名為「一群真正弱勢的香港市民、以及中大舊生」
2007年5月16日	基督徒學生運動發聲明支持中大學生報
2007年5月16日	淫審處裁定中大學生報不雅後，影視處兩日內收到1,400百宗聖經不雅投訴
2007年5月17日	中大學生報編輯與副校長鄭振耀會面，校方指警告信只是勸籲，並表示不會資助上訴
2007年5月18日	中大學生報向審裁處申請覆核
2007年5月22日	《明報》〈星期日生活〉送檢後，被裁定為二級不雅
2007年5月25日	中大學生報出版五月號，部份媒體評為「收歛」
2008年3月6日	媒體報導，中大為學生報情色版事件，在教務會學生紀律委員會下成立新的裁決小組
2008年3月13日	媒體報導，中大宣佈裁決小組決定，不予追究學生報情色版事件，個案結束
2008年10月21日	學生報與明報就淫審處評級的司法覆核，獲高等法院判決勝訴

中大學生報，情色：

太子戲院食屎食著豆，或相反

文：弟

早兩日出開旺角，行程之間有兩個鐘空檔，唔想行街之後買，未有胃口食野，討厭坐低飲一杯十幾廿蚊o既瑣碎以及自戀，結果走左去太子戲院睇戲。太子戲院係得一個放映院，四十蚊張飛全日任睇個種，播鹹片。映院是標準的設置，四周漆黑，一排一排的座椅到映院盡頭是銀幕，比UA細院的還要大，旁邊一個出口，上面一個男女廁符號的燈箱。

入到去已經是中場，在全日不停播放的情況下平日睇戲對開場前入場睇到完片尾字幕的要求當然無謂；但更實際的是，入去是中場的話，意味著三四個字之後又是開場。原以為可以看到些本地製作，但一齣之後第二齣，播的都是日本片，準確點說是十至廿年前的日本片；畫質不提，角色的造形裝扮與戲院外時空的脫軌實在使人難以投入。有趣的是播的片都經過本地的後期製作：剪接再加上配音，護士與病人搞埋的一場戲變成掃黃探長被黑幫大佬設天仙局陷害，並且其中黑幫大佬一角全片並無出鏡全部由對白交待，交待新角色及劇情的同時畫面繼續是護士玩具自娛，戲都唔駛補。看見如此的經營當然可大嘆世界難撈，但在粗糙的邊緣探頭出來的娛人娛己卻叫人同感暢快。

睇戲之餘四圍目及，憑銀幕的光分辨院內觀眾多數係中年打上的鄉親父老；各人散佈放映院並無毗連，放映中座椅壓出依呀響聲間斷可聞而不時有觀眾離座如廁，其中因果關係自然心知肚明；但反觀影片的質素，功能上也是一百蚊四隻好得多多聲，令人疑惑點解有人會俾四十蚊入場。最就手的原因可以是社會結構的分析：老年人正如兒童一樣在現代家庭的論述之下都是無性慾的不完整個體，而在相對上能自主消費又不諳高科技電腦DVD機的條件下，去戲院睇鹹片自為方便之選；但可能其實並沒有特別的原因：在這千呎上下的黑暗內所進行的，與院外大街窄巷上，高樓大廈裏的並無二樣；大家都幻覺著主體，實際上是和其他的所有人共同經歷著並被呼召入其中；或許會有各自的淫穢想像，但都只是令人納悶的重複；一場完結緊接下場開始，今日播完聽日繼續。城市就繼續發展。

這也許是在我意想之外符合我原意的，我亦無謂否認是抱著獵奇的心態進場；又當意圖營造以使自我感覺超然的距離因為片爛不需用力經已獲得而後倒戈相向，這種嘲諷其時不覺，細想起來就使人手足無措，惟有以論述的慾望掩蓋。

Stephy信箱

問：我無意中發現我的男朋友的電腦中有一些用籐條打女孩子屁股的影片。在這之前我和他關係很親密，因為他對我真的很好。只是我在那次以後對他產生了一種很不安的感覺，覺得他很變態。其實他算不算變態，到底我應不應該因為這件事和他分手？

Stephy：他是不是變態，我想還是言之過早，因為這要看你男朋友喜歡的到底是希望侵犯一個不想被傷害的人，還是只希望通過角色扮演及虛擬場景能獲得某種特定的快感。前者可能需要較小心地處理，後者則是正常不過的事，就像每個人都會喜歡吃不同的食物一樣。不過，他是不是變態，對你應作一個怎樣的決定可能並不重要。我想你現在需要做的是坐下來好好地和他談一談，了解一下他的慾望是不是真的像你想像般可怕。否則，你心裡的結永遠也不會解開，甚至會因為不了解而不斷想像一些可怕的事情出來，令自己辛苦又解決不了問題。

當然，你和他談了也未必代表和他的問題便就此解決。在我認識的朋友中，有一些和他的伴侶坦白地談論了自己的慾望，其伴侶後來也決定試一試，結果亦愛上了那一種性玩意，結果雙方經常結伴出席相關組織之活動；有一些則不喜歡其伴侶的喜好，但並不介意，讓他/她和自己的同好一起進行其喜愛的活動；當然也有一些人完全接受不了而選擇分手。因

此，實際結果是沒有人知道的，但開心見誠的談，總勝過自己胡思亂想吧！

e-mail:
stephy.desire@yahoo.com.hk



淫穢繪本 － 鄧萃芹

非性非非性：我們的巴士在哪裡？

文：Dion Dublin 大波蓮

《Short Bus》既導演John Cameron Mitchell 係接受Bizarre Magazine訪問時講過：「睇一個人點樣做愛就好似睇一個人既掌紋，你可以從中睇到佢係一個點樣既人。」所以佢成日被人問點解你拍《Short Bus》果時唔可以將D性場面拍得無咁露骨。佢就會話：「得，我拍《搖滾樂與怒》時都可以唔要哂入面d歌既。但係點解我要咁樣做？無論我用音樂、用笑話定係用性，都係反映左我地複雜既生活入面其中一個面向*'3f。」佢認為，如果性割成一個生活存在既議題黎處理既話法無左，我地個社會會健康得多。

細心諗下，我地個社會就係咁樣，所有人都不停咁性性性性性。口口聲聲道德道德既見到任何佢以為會勾起人地性慾既野都要抽出黎禁禁禁禁，仲要鍥而不捨咁周圍*'3f佢要捉既獵物，毅力可能比處心積慮要裝人去廁所既人仲恐怖；口中真愛真愛既人就可能周圍炫耀只會同________（可以填上老公，真正愛既男朋友，或者任何男性既名字）做愛，証明自己做既每次愛都幾咁偉大幾咁巴閉。不過佢地講性既方法，要將性講到同身體器官同感官愉悅無關，似乎佢地唔記得左自己做愛果陣陰道會濕，陽具就會扯旗同濕。成日講只有真愛先想做，不如問問自己睇愛情電影果陣會唔會濕。

Sorry，係講緊性器官，唔係對眼，除非你用眼水黎潤滑。當然有d人可以堅持我做愛係為左生育，爽唔爽都咬緊牙關一副上刑場既姿態，來個「風蕭蕭兮易水寒，唔濕都要去上床」，但係呢個做女性既可能仲得，做男仔唔扯旗就上？可能要打針同食藥喎。

當然，要唔認自己身體做過d咩都好易，將佢變成自己生活中既一段空白咪得囉！空白，即係唔係唔存在，但係自己鍾意填咩咪填咩囉。最好仲將佢變成一舊唔諗唔理唔聽唔講既野，繼續做愛又唔知亦唔肯去知自己點解想做幾時想做想點樣做，人地問起就好似d未學過又周圍呃神騙鬼幫人睇掌既人咁，唔識仲要抬起個頭扁起個咀，固作神秘咁講句：「天機不可洩漏！」。

當然這個空白大家唔填其他人就會爭住填，咸濕佬們會爭住想像同描述呢段空白黎手淫，懼性者就會爭住將所有關事同唔關事既野都擺入去一齊打壓，於是唔關事既人都要衝出黎解釋出黎表個態，話自己同呢樣無關同果樣無關。真愛派既話自己唔係隨便既人，Vanilla Sex既愛好者就話自己唔會做埋d變態既野。同做愛有關無關既野都渣埋一住講，唔怪得之有d人係同性戀既辯論係都要捉住肛交黎講，SM又一定係同性有關，係呢個論述混亂既情況下誤中副車姐，不過人地大條道理喎，Sorry 都唔會講聲姐。

不過，我地最可憐既，唔係呢個亂咁填野既情況，而係我地係填空白既論述，得翻《便利》果隻既獵奇式既泛道德，無論我地用貶義既「賤」，定係懶中性既「激」，講緊既都係：呢樣野同自己無關，或者最少同平時既自己無關。其實，我最想睇到既係，一套香港既《Short Bus》。

____

《Short Bus》於十月係美國上畫，係香港會唔會上，或者出DVD就唔知。

中大學生報，情色，

滿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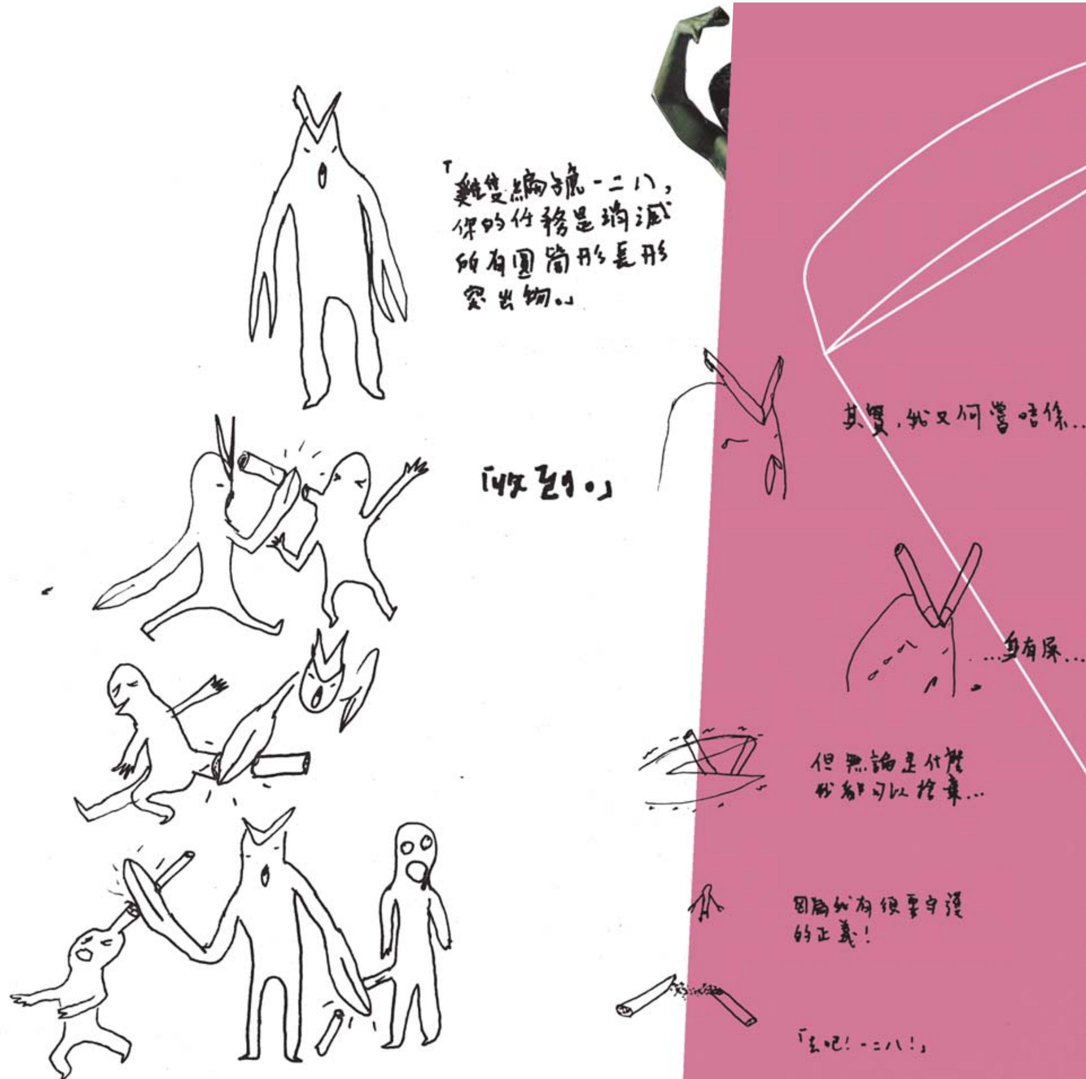
AGS

已經是淩晨兩時了，身邊的男人已經呼呼大睡，還發出了輕微的鼻鼾聲……

類似的情況已發生了很多次，身邊的這個男人，人是好得沒話說的，就是在床上沒有半點情趣，每次做愛總是戰戰兢兢的輕摸的我的乳房一會便進來，好像大力一點我的身體便會碎了似的，至於陰蒂更是踫也沒有踫過。至於做愛的部分，則更加不值一提。每次也只是撲上來以傳教士式來回的抽插一輪，射了便當完了事，倒頭便睡。我常常想，這男人是否以為自己在賽跑，只要一直的向前跑呀跑的，一衝線便做完了要做的事。

想到這裡實在忍不住輕嘆了一口氣。望到家中露台的欄杆，我又忍不住在幻想了。這幾晚我也有這樣的幻想，其實我渴望的是被他綁在欄杆上，强行脫去了衣服，然後貪婪地吻遍我全身上每一個部位，耳珠、頸項、乳房、腳尖……直至全身上下的每一吋肌膚都被他那暖暖的咀唇滋潤過。而被赤身綁在露台上，聽著街上的嘈雜的人聲、車聲，既害怕被人觀看到那赤裸的胴體、那貪歡的表情，又希望他繼續貪戀我的身體，一刻也不願停下來。那種既害羞也依依不捨的矛盾心情，總令我感到無比的興奮。

想到這裡，我感到自己的下體已經濕透了，忍不住開始自慰。我實在不得不承認，按著自己幻想自慰，比和身邊這個我深愛的男人做愛滿足得多。只是這時候需要强忍著不能呻吟出來，免得吵醒了他。只是到了高潮的時候，即使不叫出來，也有緊緊抱著他的衝動，身子也忍不住顫抖起來。這一晚不知怎的，他好像沒有平日睡得那樣熟，竟然醒了過來。他望著我，一臉關心地問：「怎麼了？做惡夢了嗎？」「沒什麼，」我輕吻了他的胸膛一下，再抱著他，在他耳邊輕聲地說：「我愛你。」他望著我笑了一笑，用手摟著我的肩膀，閉上了眼便又再睡了。



Stephy 信箱

問：我已有好幾年自慰經驗，也喜歡透過性幻想一些SM情節來增加快感，而且每次都是代入一個被虐者的角色。我也知道這只是幻想，但還是有一點點令我不安，就是作為女性，竟然喜歡幻想被男性性虐待，甚至強姦。再者，難道女人天生就註定要做被虐者嗎？

Stephy：女人當然不是天生註定要做被虐者。就是現實生活中，也有不少男人喜歡找會施虐的性工作者，自己則做被虐者，包括那些工作上常常可指揮下屬做這做那的。而且也會有女性樂於在SM中作施虐者的角色。你有「女人天生註定要做被虐者」的想法，該是因為在一般接觸到的色情刊物／電影／影碟中，都只會有男性虐待女性為主題，而不會是女性虐待男性；或是新聞中每每都是男性非禮／強姦女性，造成的假象好像只有男性會有性慾，或者男性的性慾比女性強得多，而這些Stephy我絕不同意。誰說女性不可能有比男性更強的性慾？事實上，就是如此這般的假象，在現實生活中壓抑著女性的情慾探索空間！

其實你用不著為喜歡在性幻想中代入被虐者的角色而感到不安，因為性幻想和現實根本是兩回事。自慰是一個讓自己暫且拋開生活煩惱瑣事、放鬆自己的好機會，自慰時有甚麼性幻想，只要令你覺得享受便可以了，用不著去想是否政治正確。若然你有興趣，在輕鬆的心情下，也不妨嘗試在性幻想中幻想一下自己是個施虐者，看看會否有另類的快感，如從控制大局或是觀賞者中得來的快感；你也可以嘗試想像自己是一個男性去SM；或是想像和女性SM做愛（當然也不一定要有SM的情節）。反正自慰中的性幻想就是容許你幻想出千變萬化的可能性。若然這些性幻想你自覺不太令你享受，也不要緊，那便繼續在自慰中好好享受幻想自己是被虐者為你帶來的性快感吧！

情色版意見問卷回應

前回提要：二月號情色版問卷調查推出後，本報收到幾位同學回應，茲抽取當中五位的答案公佈。

答1= 某某yr 2 同學?
答2= 另一某某yr2 同學?
答3= 再另一個yr2 同學?
答4= 畢業左一排無業遊民?
答5= 應該都係中大同學

一：你唔覺得做愛好悶既咩？
答1：都有d單調
答2：有時都會，於是會想搵新野試。
答3：唔覺
答4 ：都係，我同以前有個男朋友做左四五年之後就覺得好悶。悶到喊！無錯係悶到「喊」！有時對方需要，咁點都做下，做完會自己偷偷地喊，後來直情係做做下喊…跟住佢先話唔想做就唔好做喇（頗溫柔地）！當時只會覺得係好似唔想做但又點都要迫住做下既問題或者因為自己性冷感有問題所以喊，後來諗諗下，其實都可能係因為太悶，做黎做去都係咁，有時好公式化，連錫嘴都無，直情係知道晒下一步佢會點…最慘係我想試下呢樣果樣，但佢唔肯，佢唔係唔理我感受，只不過佢以為好似玩雜耍咁樣我就會興奮…。同埋，其實日日食coffee con，就算果度算係中大都幾好食既地方，但始終日日如是，又無機會可以interactive d，又或者係自己傻喇，點解要覺得好食先食呢？人食野都係為左飽肚即，唔應該咁多要求？
答5：仲未覺

二：你唔覺得做愛好煩咩？最煩係d乜野？
答1：唔知wo，係話個過程好煩嗎？都好簡單wo
答2：一時時啦。最煩就係兩個人對做愛的喜好會唔同，要就到兩個都覺得ok有時真係好難同好煩。所以有時覺得多幾個性既partner 好似都幾好，咁要物色自己覺得會岩一齊做的partners（仲要對方又想）好明顯又超煩。
答3：覺， 搵地方
答4：煩！根據14年做愛經驗，覺得做愛真係好煩，煩到有時會以後都唔想做，或者諗下點樣令自己減低性慾。有時因為無地方但又互相挑起左d感覺，如果對方會介意其他人知道的話，唔敢去到邊做到邊的話，真係好煩；有時因為對方興焓焓，自己卻無咩mood，就好煩；有時用套真係好乾但係唔用又驚自己有bb ，差既套令到做愛真係好煩；有時又會諗做咩要做即，做咩一定要做愛即，真係諗到好煩；有時我經到，對方覺得係好「污穢」唔敢做，但原來我經到會興奮d，性慾高d ，無得做好煩；有時同時有幾個愛人／伴侶，同呢個做時，又諗起另一個，或者覺得對唔住其他幾個伴侶，真係煩到爆；
答5 ：要搵位做，又要避孕

下題再補充）；咁呀！有時會話比對方知 （即朋友 + 佢既男／女朋友），但一半時間都唔會講出來…有太多野…太多問題處理唔到，就唔講，或者大家「詐唔知」，但其實心中是希望可以盡量坦白大家傾…。
答5：諗下未算，一定唔會做

八：定係實現左幻想，咁你又點樣處理？
答1：有左，就無計la，可以試多幾次，我想煩gei情度都係一樣
答2：xxx
答3：um …繼續偷情囉
答4：試過「偷偷地」（其實偷偷地既意思：當時比較無人知，但中途或之後點都有其他人知道…！）一齊過既有幾個，而幾個既情況又好唔同：有一個跟她做過一次，她應該沒有告訴她男朋友，做完我們仍是朋友般+很互相關心…；有一個是他有告訴他女朋友，跟住我同佢+佢女朋友都有傾過，後來發現似乎我不介入她他的關係比較好點…；有一個是很後來他跟女朋友分手後，告訴了她，咁我跟她就已無甚來往，跟他就間中仍有些幻想…；有一個是他應該一直沒有告訴他的女朋友，咁經過一年+半載之後，我又覺得她他應該是最合身，而我又頂唔順自己的妒嫉+不可公開要偷偷摸摸中間果d 唔開心既感覺，一年過了一年，仍是時有逃避，仍是「朋友」同志…（但其實我有點攪錯左個問題，我其實答緊既係我同自己d 朋友攪上左，而唔係朋友既男或女朋友…不過好難分，因為大部份兩者都是我朋友…或者認識的…！問題就係問題有問題，或者我對朋友／死黨的定義不太是一般的朋友…我現在的生活圈子多是「同志」…跟那種「朋友」是不同吧！）
答5：做左先算，邊諗得咁多

九：你自慰／打飛機時會諗住邊個？
答1：無對象
答2：同我做過ge又有（好似易代入d），亂咁幻想一個人又有，好疏的親戚又有。
答3：唔定架
答4：無咩諗住邊個，以前細細個開始自慰係因為係屋企唔出得街好悶，覺得自慰好似好玩，唔會諗到其他人；之後就因為訓唔著，自慰左就好好訓都唔洗話諗邊個；有時就因為太得閒係屋企無咩做就會睇四仔，睇睇下就會想自慰，又係無咩諗邊個；跟住有時同partner做愛既時候佢幫我自慰，或者齊齊自慰，又係唔洗諗住邊個，望住對方會好熱情。
答5：無ga，都係諗下d鍾意ge 人，不過更多係睇下四隻果d

十：你最想同咩動物做愛？
答1：諗唔到
答2：都係最想同人做愛。

三：你會唔會幻想過同阿爸阿媽兄弟姐妹做愛？（無論細個或而家都得！）
答1：無wo~
答2：阿爸阿媽就冇，係試過自己係房自慰時弟弟也在家，有一瞬間都諗過同佢做的話會點呢？不過只係一瞬間閃過，冇真係幻想個過程，可能覺得諗同佢做好煩，懶得再諗。
答3：冇喎又真係
答4 ：無試過呀！似乎係因為覺得佢地身體不太吸引我。不過會想像爸媽做愛會係點。有幻想過同其他親戚做，而後來又真係同一個親戚做過，當時感覺，對方都只不過係我喜歡的人，係唔係親戚有咩分別，但後來比部份親人知道左少少野（應該唔知我地做過愛，但知道我地有路），比佢地拆散左。點解要拆散我地呢？到底所謂亂倫是什麼問題？痴線…架！
答5：咁又真係未諗過

四：你有冇裝過佢地沖涼、換衫、自慰、做愛？
答1：無
答2：裝就冇，係細個小學到夜晚訓教聽到阿爸阿媽在上格碌架床做，不過都係一次禁大把。那時聽到D呻吟聲都覺得幾恐怖。
答3：唔覺得有野好裝
答4 ：細細個一家三口住係同一房間，成晚訓唔著，我係上格床，係咁想係個床板度鑽個「0」望下佢地係下面做咩，個頭想穿過床既鐵欄望落，差d出唔返黎，點知發現佢地加左布簾…失敗左，亦攪到我細細個開始失眠。另外，我媽媽成日係我面前換衫，有時佢去廁所又唔刪門，開始時覺得好尷尬，後來我覺得佢咁做真係好聰明。
答5 ：有呀，不過都係無意，因為真係對佢地無幻想，不過聽到佢地做好似好快完咁

五：在街上什麼人（或動物／東西）最能挑起你的慾望？
答1：都係女人lo~
答2：在街上好似好難有人會無端挑起我慾望WOR，有時 d 三級電影海報都會。
答3：庸脂俗粉的年輕女人
答4：有d胸又唔太大+個樣又係我鍾意果d既男或者女。試過一兩次覺得對方好吸引，但好快壓住自己唔好亂諗，所以其實唔記得係幾時對方係咩人。…呀！唔係呀！我記得喇！我有時見到樓下d 姐姐仔會好開心！（可能因為我自己胸好平，見到d姐姐仔通常有多d 胸又好性感咁，會好開心，有時怕醜唔敢望佢。）當時無明顯覺得自己係被佢挑起慾望，而家諗諗下好似係…有時發「綺夢」會見到附近一個好靚好吸引既姐姐仔，可能係唔好意思去幫襯佢，怕佢唔習慣服務女仔…
答5：果d 好似有少少肉地， 個樣好似好wet 咁又有少少殘， 真係好想攪佢地，會幻想o係街上無啦啦搭上，跟住食快餐

六：你有冇幻想同朋友既男朋友或女朋友做過愛？
答1：有
答2：冇BOR。
答3：間唔中啦
答4：有喇！以前有喇！…似乎好多個（其實唔知點為之多）…近五年既大概有10以內，近一年試過諗過既有一個男性朋友既女朋友+ 一個女性朋友既男朋友！ （不過其實我好少朋友架！）
答5：有ga，仲係要對方主動果隻

七：如果有，你點樣處理你同你死黨同佢男或女朋友既幻想？
答1：無處理過（即係想下就算，費事搞多野去重組大家gei關係
答2：xxx
答3：要處理？
答4：五年前就似乎好少敢去認真咁諗過或者幻想過，通常一出現就會「打底個幻想」！好快打底佢！咁就唔洗通理同死黨同佢男／女朋友既關係，又唔洗處理同「自己同自己」既關係！…近五年既做法就：試過諗過下，諗諗下就唔諗（或者唔記得），幾個月前諗過一個朋友的女朋友，沒有告訴對方，間中仍有點xyz ，所以有時會保持距離，以免自己把持唔住…呀麻煩；試過諗到好辛苦，諗諗諗諗諗…諗左一年半載諗到忍唔住就模糊之間開始左…（刪去一萬字，

答3：女人
答4：自小接觸得最多既動物係「人」，無咩同其他動物有相處，無咩特別想攪既。呀！有一次我陪朋友去大陸騎馬場，我唔敢騎，一個人呆框框咁周圍行，突然見到隻馬——我望住佢佢又望住我，咁我見到佢「勃起」… 話！痴線！好大！一d一d咁勃起…勃左好耐先勃晒 ，然後佢對住我e起棚牙，佢個樣好奇怪，係真係e 起棚牙，仲好多牙屎…後來（即唔知幾時）諗諗下，見到佢見到我起頭，我都有d 心動（好耐之後諗返起既時候後悔我當時無對返佢笑）…
答5：咁污糟，費事攪到周身病

十一：你覺得一次過同幾多男幾多女做愛係最好 （optimal／最理想）？
答1：一個囉，咁多都搞唔到，仲煩la，睇住都食唔到
答2：似乎都係兩個人做愛最易處理，雖然雙數的人做到咁上下轉partner都會幾好玩。
答3：冇認真研究喎，2個女人o 卦。人多就好煩
答4：我諗太多人一齊做會太忙又太刺激，同埋如果唔係咁熟就會有d 唔好意思（不過熟都可能會有d尷尬），三個又唔得因為可能有時會有人無野做…唔！我諗四人個arm arm好！男女數目就無咩所謂，最緊要大家都想同對方做。
答5：一皇二后大格鬥都幾好，不過如果可以2男3女會仲正，玩下夾擊

十二：你最想係中大邊度做愛？
答1：有適合gei地方咩，唔覺
答2：可以睇到吐露港景色又唔會有人望住的地方，大家有冇好介紹？
答3：對地方冇咩fetish總之室內有床o既私人空間咪得
答4：我係中大好多度地方都做過，無咩新地方好吸引好想再去，有去過既就…唔…都係無咩特別好吸引。如果有$都係去賓館好玩d，因為可以多d時間慢慢諗下睇下點做又可以傾下計又可以一齊食野做下食下又可以一齊沖涼…
答5：一路都想偷偷地走入lecture theatre攪，d 位又舒服，仲要攪到污糟晒果隻，等人唔知乜事坐上去

十三：你覺唔覺得宿舍唔俾男女過夜係歧視異性戀？
答1：唔覺係歧視，不過保守都爆，不如搞間隔音版房la~
答2：認同呀，最好中大有埋時租賓館啦。
答3：少許啦，雖然明知佢地其實係當同性戀唔存在
答4：我覺得可能都唔係歧視異性戀既問題（因為佢其實無想像或同意其他性取向或任何性行為），同埋其實係「無視」及另一層歧視「同性戀」，佢係假設左只有男女一齊先會做愛，男男女女就唔得……不過都係好事（相對於現時社會上仍對同性戀的歧視，只打驚蓄蛇，同性朋友可以玩得放便d）！可能成個問題係= 學校「咩都要管」，同埋學校完全係「無理性」既表現。無理性既意思係一。 覺得學生上到大學都唔應該做愛 二。 覺得用宿規就可以自欺欺人，推行到偽道德規範。大學只係識得咩都管…想d學生變成個個都只係咁咁咁！但唔好傻喇！打蛇可能令到件事刺激d！
答5：都唔覺，不過真係好似幾無謂，好特登做到好有道德咁

十四：有冇因為性生活問題（又唔講出來）而影響愛情？
答1：無，未有心情去處理這個問題
答2：未試過唔講出來而影響愛情，但性生活的conflict其實講左出來都有可能影響感情，不過其實乜conflict都有可能ga la。
答3：有講架，咪一樣係分手
答4：有呀！不過以前都唔會講出來，點講得出口即，唔通話我地做得唔開心呀？可唔可以做得開心d呀？做得唔開心就分手喇！通常會用其他借口，自欺欺人咁。不過，我又覺得呢個問題有d問題，性生活同愛情係分開的嗎？愛情的內容是什麼？性生活的內容是什麼？成個問卷d問題都有d問題…而且又太複雜，搵人笨！
答5：li 方面經驗唔係太多

無懼污名　重尋真性

◆ 中大學生報

原刊於《中大學生報》號外，2007年5月8日

《中大學生報》於去年12月增設情色版，近日遭輿論斥為「淫穢」，與坊間報章風月版混為一談。對於此番誤會，本報深感意外。38年來，本報一直以針貶時弊，改革社會為己任，關注世道的篇章至今未嘗稍歇。創設情色版的用意，在於批判現今社會單線、扭曲的情慾想像，營造開闊討論性與慾望的空間，與本報傳統一脈相承。

拒絕將性污名化

本報對情色版嘗試加入多元的性想像，乃在抗拒現今香港社會論述性的單元。情色版之成立，旨在打破一元性論述，解放遭這論述壓迫的弱勢者。

本報四月號刊登同志指點異性戀者房事的書評即為一例，展現不同性傾向人士之間決非只有壓迫與屈從，卻有平等的交流溝通。備受爭議的情色問卷亦非刻意鼓吹某種性行為——如所謂的「亂倫」和「人獸交」——而讓讀者如實反映他們的性想像，藉此反思一元性論述。若說鼓勵同學發表意見等如「鼓吹」「淫亂」，實無異於將性傾向歧視條例立法等同於「鼓吹」同性戀、加劇愛滋病、打擊出生率等等。此皆以禁忌之名，無限上綱。

情色版強調每個人的慾望都需要被尊重，用之與「新亞桑拿」、風月版等等以販賣及標榜物化「身體」相提並論，恰恰就是社會對性論述膚淺一元之明證。若本報存心賣弄色情，譁眾取寵，何不刊登裸女艷照直接挑起讀者遐想？

反對權威與淫穢共生

有論者指責本報不以艱深學術談性，不以權威人士回覆讀者來信，彷彿不詳加解釋就無權威性。然而輿論何曾要求傳媒講飲講食之際，須經過專家學者剖析？食色性也，選擇性索求解釋，為的不是求真，只是維持禁忌。

現今社會充斥著各種色情資訊，大學和師長卻對性三緘其口，是極為不健康的狀況。正因不能循正常的渠道獲得有關性的資訊，自由討論，才讓商業化的色情資訊有機可乘，把我們社會對於性的看法極度扭曲、渲染，變成單一的淫穢想像。如此種種，使我們的社會對性只有兩極化的論述。若非把性視為洪水猛

獸，只以生理學或醫學的角度作「性教育」，完全不討論性在我們日常生活中的位置，便是把性理解為淫穢不堪的事物，男男女女都只能藏頭露尾，偷偷地竊取快感。

批判階級歧視

我們不反對學術性的談性，亦有這個能力，但這種經過消毒的象牙塔口吻究竟排拒了甚麼社群？基層人士有多少能以這種語言表達自己性的經驗？不少人視大學為與市井隔絕的神聖廟堂，本報堅決反對這種偏見。1968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故意興建體育館隔開校園和哈林區，校內學生群起抗議這個將大學和貧窮黑人分開的舉動。拿學位、賺錢、搵食，然後俯瞰黎民，不應是大學生的目標。大學的意義必需建基於與群眾同行，這亦是《中大學生報》的理念。

「性是亦只是男人對女人的淫慾發洩」、「大學生是天之驕子」都是本報亟欲鼓勵同學打破的成見。指出國王沒穿衣的，唯有不拘謹害羞的誠實小子，讓同學感於由衷說出親身經驗和想像，才是求真相、問為甚麼的第一步，我們希望透過《中大學生報》的空間鼓吹知道、面對、分享、溝通和尊重。

《中大學生報》出版委員會謹啟
2007年5月8日



堅決反對校方不義裁決聲明

◆ 中大學生報

原刊於《中大學生報》號外，2007年5月10日

2007年5月10日，香港中文大學教務會署理教務長向《中大學生報》全體出版委員發出共12封警告信。信件內容指《中大學生報》內容不雅及粗鄙，作出嚴重警告，要求本報停止出版及分發校方認為不雅及粗鄙的《中大學生報》（並沒指明為已出版或將出版之刊物），本報對此極為憤怒，認為校方有以下九大不義：

一）教務會學生紀律委員會在通知編輯將成立裁決小組後，於不足48小時後進行聆訊，未有給予學生合理的抗辯時間。

二）本報編輯曾對紀律委員會及裁決小組的程序提出疑問，校方未曾提出回應或解釋，損害本報編輯及同學知情權。

三）本報編輯對裁決小組的組成曾提出質疑，校方在未回應有關質疑或替換成員便繼續聆訊，未有保障同學應有的權益。

四）裁決小組並未明確指出《中大學生報》出版載有不雅及粗鄙內容的期數及內容，對本報提出空泛而沒有根據的指控。

五）委員會在淫褻物品審裁處尚未對《中大學生報》作出裁定前，便妄下結論指本報情色版「內容不雅」，「超出社會道德底線」。

六）《中大學生報》以認真嚴肅態度辦報，批判社會文化，委員會強指編輯違反學則19.1條：「行為有損校譽或本校利益」。

七）紀律委員會無理地以「不雅、粗鄙」為由，禁制編輯出版及分發該等刊物，無異於強迫《中大學生報》停刊。

八）學則上和法律上均沒有關於「粗鄙」此一概念的控罪，以此為由禁制出版先例一開，校方日後將可無理禁制任何被校方單方面指控為「粗鄙」的校園刊物出版。

九）校方及教務會藉紀律程序及懲處威脅《中大學生報》編輯，禁止刊物在校園派發，妨礙編輯自主，嚴重侵犯學生民主自治及言論自由。

本報強烈譴責以上行為，並在此要求校方立即收回裁決結果，嚴正審查有關紀律程序的公正性。

中大學生報出版委員會全體成員

2007年5月10日

衝破禁忌　重建道德
要求影視處判決中大學生報無罪聯署聲明

中大學生報等

原刊於《中大學生報》號外，2007年5月9日

從前有一個人沉船遇難，漂流到獨眼國。該國居民看見這人生有雙目，為之訝然，將他關在籠裡觀賞。幾經寒暑，他開始懷疑自己有兩隻眼睛是否不正常，於是伸指刺瞎其中一隻，甚至找尋其他擁有兩隻眼的人來刺瞎其中一隻，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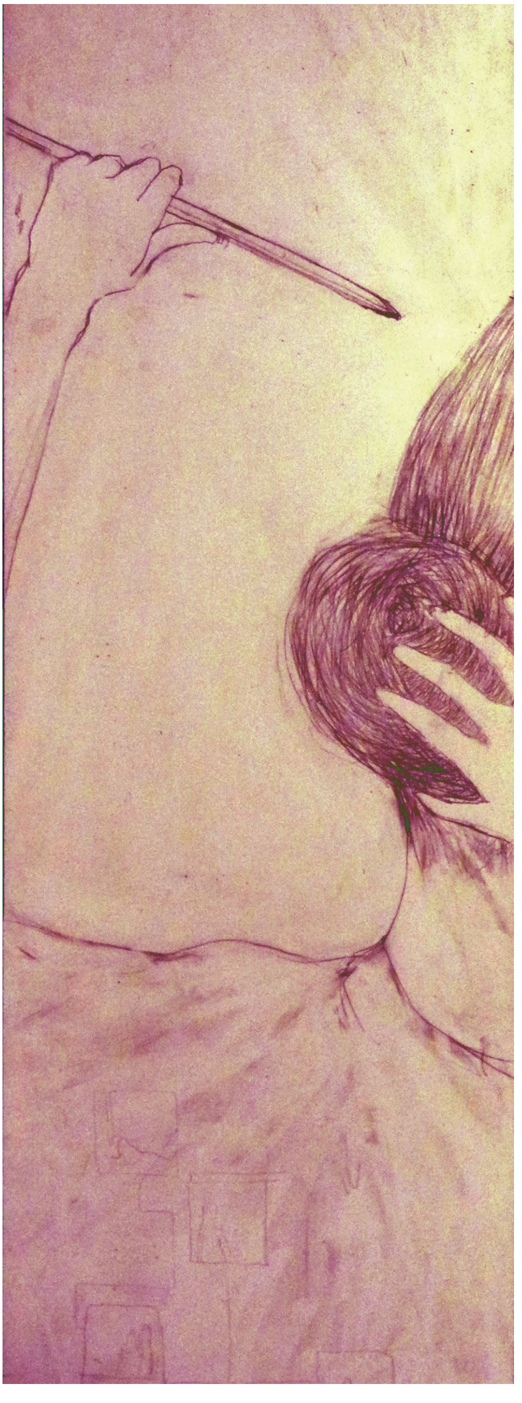
有兩隻眼睛是否禁忌？自毀一目是否道德？都不是。獨眼國故事主角不是甚麼聖人君子，他在道德上是軟弱的……不道德之處，在於他放棄思考，盲目視禁忌為合理，以偽作真，非愚即誣。

不道德的審查

追求真相，不滿足於虛偽苟安，這是大學應有的理念，也是《中大學生報》堅持的道德原則。在社會版揭破高地價政策謀殺文化剝削基層，在校園版直指校方「國際化」政策短視近利，皆出於這個道德原則，在情色版質問禁忌的合理基礎何在，亦屬同理。如今，影視及娛樂事務處卻準備將這份對真相的道德堅持定性為「不雅」或「淫褻」，以港幣四十萬元罰款和一年監禁，刺瞎廣大市民的眼睛。回顧以往淫褻及不雅物品審裁處裁定之二級不雅物品，例子是刊登劉嘉玲裸照的《東週刊》，試問只是嘗試將不同性議題引入社會討論，究竟有多不雅或淫褻以致需要被裁定為不雅物品並罰款監禁？

香港的公共審查機構不辨黑白，早有前科。英國女雕塑家伊莉沙伯．弗林克的「新人」銅像即於12年前被裁定為不雅，不得公開展覽。這種荒謬審查近年有越演越烈之勢，而且極具政治指向，香港電台長壽節目《鏗鏘集》的一輯「同志．戀人」，就在今年遭受警告，理由是節目未同場展現反對同性戀的觀點，所以「不持平」。但在另一邊廂，收到逾百宗投訴的《心繫家國》愛國宣傳片卻從未被當局警告過要加入支聯會觀點以免「不持平」。箇中的雙重標準，在在顯示公共審查機構沒有扮演道德代言人的資格，然而淫褻及不雅物品審裁處在不具公信力的情況下閉門會議，卻又擁有判決物品是否不雅的權力，輕率地以他們訂下的禁忌為社會道德標準，這才是蔑視道德。

更甚者，審裁尚未開展，淫褻及不雅物



品審裁員協會主席葉興國竟已在報上公開就事件表達意見，形容該報的有關言論過火及很大機會被評為二級不雅物品，如此先判後証，違反司法公正，請各界盡速徹查。

不道德的禁忌

堅守禁忌不是道德，恰好相反，禁忌往往是不道德的根源。

宣揚異教被火刑燒死，婚前性行為被拉去浸豬籠，犯了禁忌意味著可以用肆無忌憚的殘酷手段對待。換言之，維持禁忌就是踐踏道德的免死金牌。性工作者被嫖客搶劫，又遭警方集體露天拘留不准穿衣，諸如此類的例子正正基於「你們只是下賤妓女」的心態。

本報雖觸及禁忌，然而其目的在於讓性論述更加多元化，讓性小眾的聲音不至於不問情由地被湮沒和妖魔化，況且，情色版問的問題雖然敏感，然而發問並不代表鼓吹，只是像口述史般敍述性事，藉著追問禁忌來達到了解和交流，如欲捍衛道德，呼召公眾反思禁忌實屬必要。《中大學生報》化不可說之事為可說，正是為了勸阻世人藉禁忌之名為所欲為。

《中大學生報》被傳媒渲染為「淫穢」之後，輿論群情洶湧，不擇手段將之妖魔化，甚至作出種種惡毒的侵犯。整整一百份學生報被拆封然後棄置溝渠浸泡霉爛，足足三百份澄清聲明遭神秘人埋葬於廢紙回收箱，女編輯受到冒稱大學教授之徒電話性騷擾。情況就如之前榆林書店丟棄同志組織的《她們的女情印記》小冊子，廣播事務管理局打壓《鏗鏘集》，凡此種種，盡屬敗德甚至違法（包括性騷擾與刑事毀壞）之舉，亦反映了人們對性禁忌的白色恐怖。

不道德的傳媒

既要呼召公眾反思日常禁忌，《中大學生報》的性／別論述自然不同流俗，譬如會關注性別和權力問題，就提及性題材的戲劇寫劇評及評述女權運動等，傳媒卻紛紛將情色版比附為諂媚流俗、譁眾取寵的「風月版」，無異是對學生報情色版之徹底誤解。及後，學生報發表聲明回應傳媒的無理指控，意欲就如何表述性跟傳媒加以討論，可是指罵學生報未能嚴肅討論性題材的傳媒，卻沒有參與和延續討論以求追尋真相，可謂文責不負。

「不可作假見證陷害人」乃十誡之一，追尋真相本來就是不分文化、種族、宗教的共同道德，為追尋真相而追問禁忌更是文明累積的基石，大學的存在是此中鐵證：不追問封建體制就沒有資本主義，也就沒有今天的商學院；不追問教廷權威就沒有科學發展，也就沒有今天的理學院；不追問種種文化典範社會規範就沒有人文學科，也就沒有今天的文學院和社會科學院。

《中大學生報》被判有罪的後遺症

1. 全港大專院校勢將面臨「性道德祭旗」—— 繼2007年4月香港城市大學商務書店被星島日報獨家指責售賣教導性愛姿勢的書籍，書店方面受壓有機會不被續約；2007年5月星島日報及明報以《中大學生報》為箭靶。若《中大學生報》淪陷，全港大專院校將出現言禁之風。

2. 民間團體的言論、出版及論述自由，將受嚴厲監視——《中大學生報》事件，與民間團體日後言論、出版及論述自由，可謂休戚與共。猶記得2000年政府蠢蠢欲動，企圖收緊《淫褻及不雅物品條例》，但由於當時婦女界、同志界、藝術家能夠團結，力抗創作與言禁之風，最後迫使政府擱置違反言論及出版自由此舉。

3. 今日是報社，明日是主流媒體—— 港府於2006年及2007年，多次借懲罰主流傳媒的淫褻報導，重提收緊法例。若今次《中大學生報》成為炮灰，港府將可輕易借刀殺人，傳媒於今日所作的「泛道德輿論」，日後將要變成一把「自我閹割」的利刃。

學生報以求真為德的精神一以貫之，情色版風波擾攘，恰好說明了當下的審查、禁忌和傳媒道德淪亡。

為了捍衛追求真相的道德，為了守護討論禁忌的權利，我們嚴正要求影視處判決《中大學生報》無罪，而且不屬淫褻或不雅物品。

睜開雙眼，拒絕盲目跪拜一時一地的禁忌，社會方能尊重多元論述，重建道德，邁向文明。

2007年5月10日

情色版事件之法庭篇

◆ 吳嘉倫（第36屆中大學生報編輯）

2007年5月《中大學生報》情色版因被數家報館的讀者投訴惹起了一場不大不小的風波。事件當中影視處把數期《中大學生報》送往淫褻物品審裁處（下稱「淫審處」）評定，編委在5月15日被影視處通知，二月號、三月號及相應的網上版被淫審處暫定評級為第II類（不雅）物品。事件自此牽涉了法律程序，並成為後來淫審制度改革的契機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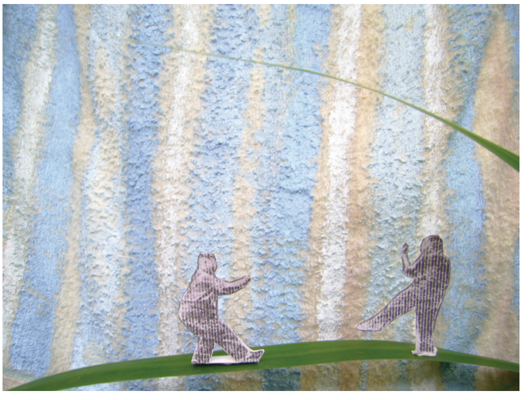
淫審處根據《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CAP 390，以下簡稱「條例」）成立，由一名主審裁判官及審裁委員組成。審裁委員由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委任，一般市民都可以申請，官方聲稱代表了社會各階層的道德標準。淫審處可把物品評為第I類（既非淫褻亦非不雅）、第II類（不雅）或第III類（淫褻）。條例為第II類物品制訂了發佈限制，第III類物品則不可發佈。

中大學生報以第36屆總編輯唐世豪為代表，在5月19日就暫定評級提出覆核要求，淫審處於是在7月6日展開全面聆訊程序。其時代表中大學生報的大律師沈士文指出，淫審處在5月15日公佈的暫定評級並沒有指明兩份刊物屬不雅的部分，並不符合條例第14條3(c)「須指出讓物品屬淫褻或不雅的部分」的要求。主審裁判官認為評級是否有效的問題應交由高等法院處理，於是指示中大學生報提出司法覆核，並把聆訊押後。

司法覆核的案件被交到高等法院，與《明報》副刊〈星期日生活〉的案件一同在翌年10月21日審理[1]。高院法官林文瀚在判詞中指出淫審處的評級有法律後果，故淫審處需遵守條例規定的方法進行決策，評級方為有效。此外，雖然法例並未要求審裁處公佈評級的理由，但不代表評級的決策本身不需要理由。

林官指出淫審處在評定《中大學生報》和《明報》〈星期日生活〉時，假定被送審的必定是一件物品，但實際上兩案中被評定的卻是多篇文章、圖片等的組合。林官指出不同的文章和圖片有截然不同的整體效果和目的，不能混為一談。故此，林官質疑淫審處沒有按照條例第10條的要求，考慮物品的「整體上的顯著效果」和物品「是否具有真正的目的」。此外，在評定《中大學生報》







二月號和三月號的整本刊物的評級時，淫審處亦違反了條例要求「須指出讓物品屬淫褻或不雅的部分」的規定。因此，法庭決定撤銷淫審處在兩案中定下的不雅評級。

在法庭糾纏了17個月，案件以高等法院判定淫審處的行政失當作結。這對中大學生報的編輯們來說雖然是個小勝利，但最終也沒有得出兩期情色版是否不雅的結論。這次事件卻反映了現行淫審制度的諸多問題，尤其是「淫褻」和「不雅」定義含混，以及評定制度和程序不透明。及後，政府在公眾壓力下於2008年10月及2012年4月兩度就改革條例進行公眾諮詢，不少民間團體都對上述問題提出不同的質疑[2]。當局亦在諮詢報告中直言公眾就這兩點未有共識。今後條例將如何改革，我們仍需拭目以待。

1 案件編號為HCAL96/2007 HCAL101/2007

2 可參考：《反查禁── 2008及2012年《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修訂》，《香港獨立媒體網》，http://www.inmediahk.net/anti-censorship.

無關道德

◆ 鄭巧玲（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講師）

原刊於《明報》，2007年5月8日

看了報章對《中大學生報》情色版的報道，大嚇一跳。當然，我對本港某些報紙動不動就把少數大學生的負面／幼稚行為上綱上線為「大學校園道德風氣敗壞至令人咋舌地步」（《東方日報》語）已經習以為常。嚇我一大跳的也不是那些和風月版如出一轍的情色內容，因為，香港有些所謂的大報（就銷量而言）每天就充斥着那些東西來吸引讀者的眼球。

嚇我一跳的是《中大學生報》編採人員的目的和結果之間的巨大落差。反映了他們在思維方面的片面、單面和表面。雖然很多人根據情色版的內容來推斷《中大學生報》的編採人員可能用意不良，如有心嘩眾取寵或鼓吹某種性風氣，但是，《中大學生報》副總編輯劉明蕙已經申明，他們的本意只是「希望去除大學校園『去性化』的傳統觀念，讓學生更加公開地討論性」。

片面、單面、表面

可以說，這個目的是明確的，正確的。性或任何社會禁忌，都是可以，而且應該公開嚴肅地討論。因為，不說，不等於不存在。說了，可以增進了解。而大學生更應該有這樣的機會來探討，反思一些所謂的敏感話題。大學方面，其實也在朝着這個方向努力。我這學期在中大教一門關於「性、媒介與暴力」的課，修讀的同學也是抱着相似的目的來上課的。

但是，如果《中大學生報》的目的正確而且良好，撇除有些偽善的泛道德譴責，為甚麼出來的效果還是引起那麼多人的反感呢？《中大學生報》的思維錯誤在於把深入、複雜的議題片面化、單面化和表面化。比如說，最多人討伐的其中一個問卷的題目是問讀者「有否『裝』過阿爸阿媽兄弟姊妹做愛？」，然後刊登了一名學生回應，曾偷看父母進行性愛的過程。其實，這種題目和答案，在性學研究裡面也曾經有過。但是，性學研究的重點不會是敍述「偷窺」的過程，而是討論人們獲得性知識的渠道以及其影響。這樣的題目和答案，如果《中大學生報》的同學，能夠把它作為香港性教育的缺乏而色情文化氾濫的社會情況下的一個案例，然後再做多方面的深入探討，其實完全可以

成為一個富有反思價值的例子。可惜的是，到了《中大學生報》同學的手裡，就變成了單純的色情描寫。而更可惜的是，本來他們是想要反思，而不是要色情。

道德論遮掩了問題本質

有些評論認為情色版的內容太露骨，敗壞了大學生和大學的名譽。我認為，這樣的「道德論」遮掩了問題的本質。

假如說，《中大學生報》本意就是要出版色情內容，那麼，我們就可以圍繞他們的意圖而展開道德辯論。但是，如果我們承認他們的本意是想要公開討論性，是要反思僵化的色情論述對大學生帶來的束縛，而結果他們恰恰就只能重複色情的話語，只能把反色情的本意做成販色情的內容，那麼，我們就可以發現，他們的錯誤，不（僅僅）是道德的錯誤，而是思維的錯誤。而這個思維的錯誤，和對這個錯誤的錯誤批判，其實更加令人憂心。因為犯錯的一方，要麼容易因為評論對他們的道德論斷，而把自己放到道德殉難者的位置，而錯失了反省的機會。要麼就是想破了頭也找不到問題的根源。如果他們找不到問題的癥結，又怎能期望他們改進呢？



學生報，你的描寫怎麼這麼低俗下流？

◆ 王邦華

原刊於《香港獨立媒體網》，2007年5月18日

近日中大學生報設置情色版被大眾傳媒廣泛報導後，引來不少道德指責。批評者中，或許不乏有人看到一兩個敏感字詞便急急搶佔道德高地指點一番、然後自我感覺良好地大嘆大學生浪費社會資源、一蟹不如一蟹，我們不必費心於此類捕風捉影的抽水式觀點，而且此類人想必數目不多，大部份批評者應是了解事情全貌後仍然不敢苛同於學生報對情色版的處理手法。粗略觀之，除了那些見到問卷幾個字詞便上綱上線大呼「鼓吹亂倫」、「鼓吹人獸交」的無聊批評外，對學生報的批評可分為兩大類。其一為批評學生報的文章缺乏學術性、不知何以值得討論，和一般風月版沒有分別；其二則是認為學生報把個人性經驗露骨地描寫出來是低俗、下流、賣弄色情。前者預設了只有學術性的性學文章才有刊登的必要，後者則表現出對描寫性經驗的鄙視。

有趣的是，學生報所受到的兩方批評，卻正好印證了學生報在5月8日的聲明中，對香港社會性論述兩極化的觀察：「若非把性視為洪水猛獸，只以生理學或醫學的角度作「性教育」，便是把性理解為淫穢不堪的事物，男男女女都只能藏頭露尾，偷偷地竊取快感。」也就是說，如果要在香港的公共空間討論性話題，若不是抛出一大堆學術性名詞、邀請幾個學術權威說三道四一番，便得承受「淫穢」、「低俗」的指責（有趣的是，對於這些非學術而又關乎性的題材，例如名人的私生活、走光描述等，我們都是一方面嚴詞指責，一方面卻是抱著獵奇式心態觀賞，這大概就是「偷偷地竊取快感」）。這兩極化的現象，其實都是指向同一方向，就是性這個概念在香港社會只能作為一個疏離的客體（object）去給我們觀察，要正確地談論性只能是討論性的客觀知識（即生理學、醫學等知識），而有關性的主觀經驗則是「低俗」、「不能登大雅之堂」，我們只能默存心中繼續以學術語言討論性議題——儘管我們知道大家心中都有想這些東西。

然而，為甚麼對主觀性經驗的描寫一定是下流而地位低於學術語言呢？傅柯（Michel Foucault）在其名著《性史》（History of Sexuality）中曾考察不同時代的性論述，結果得出一個有趣的結論——主觀性經驗的地位高低和當時權力網絡（power network）有密切關係。在古

希臘時期，討論性很少會觸及禁忌，人們都可以公開談論性的話題。因為當時科學尚未發達，沒有人能自居性知識的權威，人人都有詮釋性經驗的權力。對希臘人來說，性是主體自由的重要體現，多元的性經驗正好代表每人運用自己的自由選擇不同的路，最後各自達到一種和諧、美的狀態。性具有濃厚的主觀色彩，是「一種態度的風格化和一種生存美學」，此時對性採取一種一視同仁的客觀描述反而不常見。可是情況到了十七世紀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便大大不同了，用傅柯的話語來說，就是「權力網絡改變了」，有一批人掌握了大量有關身體及性行為的資訊，這批人開始成為性方面的專家，用普羅大眾聽不懂的術語詮釋性經驗，界定何謂正常及不正常，並宣稱這些性學知識具有客觀普及性。傅柯認為，由十七世紀維多利亞時代開始，在公眾空間詮釋性經驗的權力向一小部分「專家」集中起來，權力上的傾斜導致這些客觀知識、學術語言在有關性議題的公共討論上取得主導權，幫助社會去規訓「誤入歧途」者重新服從主流的性論述（例如同性戀是不正常、異性戀才是正常）。相比起百家爭鳴、主觀色彩濃厚的古希臘性論述，現代的性距離我們愈來愈遠，我們除了運用疏遠的學術語言公開談性外，就只能偷偷摸摸地和好友交換主觀性經驗。詮釋上的權力傾斜，導致公共空間的性論述出現奇怪的兩極對立——權威的客觀知識vs沒有討論價值的主觀經驗。

回看今天的香港社會，和傅柯筆下的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相比可謂有過之而無不及：對描述性主觀經驗的小說及情色信箱嗤之以鼻，而對學術權威及專家意見卻是趨之若騖（別忘記其中一個批評中大學生報的意見就是該報的情色信箱缺乏學術權威意見）。然而，如果我們仔細想想，便應明白兩者與其說是一高一低，倒不如說是互補不足。我們的社會長期貶低主觀的性經驗描述，是因為它缺乏客觀性，不是人人都會接受，因此我們便會覺得一篇性交時的心理獨白比一篇研究性交時的心理的學術論文低俗。固然客觀、科學化的性學知識有相當高的解釋力（explanatory power），可是，性學知識其實只反映了性的其中一部分，我們每人都是不同的個體，每人都有不同的性偏好（sexual preference），只以一套論述概括全部人的經驗並加以判斷只會以偏概全。有些人喜歡陰道性交，有些人喜歡肛交，如果後者做足安全措施而又雙方同意，又有甚麼問題呢？為甚麼前者是一定是「正常」的性行為而後者一定是「不正常」呢？讓專家的權威論述在詮釋性經驗上一家獨大，只會令我們漠視了不同個體在性經驗上的差別。主觀經驗的重要，正正是因為我們每人都是獨立的個體，擁有屬於我們自己的性經驗。而透過分享這些主觀性經驗，我們可以明白性生活的多姿多彩，決不能單單以一套科學化的性論述去窮盡。再者，在公共空間分享主觀性經驗，也能夠豐富我們對性的想像，有助我們體諒那些性經驗異於我們的小眾。在公共空間討論主觀性經驗，與其說是世風日下，倒不如說是幫助我們認識性原來除了硬梆梆的學術語言外還有另一面風景。

如果從這個角度看中大學生報情色版的文章，則他們非但不是低俗，甚至正正是在幫助中大學生去理解其他較少提出的性經驗，打破專家們對詮釋性經驗的壟斷，而令詮釋的權力回歸到大眾手裡，各自說出自己的見解。儘管不少主流媒體的風月版都有主觀性經驗的描寫，但立場千篇一律，絕大多數都是以男性本位看女性，或是視陰道性交為性行為的中心，角度沉悶而缺乏新意。而如果我們細讀學生報情色版的幾篇文章，〈滿足〉一文正是從女性角度出發看性交及自慰，而也有幾篇文章是探討性行為的其他可能性，並鼓勵讀者不應受單一性論述所束縛，而應視乎體質尋找一條屬於自己的路。若然我們放下學術／高尚 vs 主觀經驗／低俗的二元對立，了解到其實兩者都只是了解到性的其中一面，則我們不難發現，學生報的情色版與其說是低俗下流、缺乏學術觀點，倒不如說是從另一觀點切入性的討論，並讓我們了解不同種類的性經驗，而這些多元的主觀經驗，正好和客觀、科學化的性學知識互相補足。唯有了解不同的性經驗，我們才能了解性學知識的不足，而找出一條屬於自己的道路；唯有了解不同的性經驗，我們才不會被正常／不正常的區別限制了目光，而能夠從多角度反思那些被視為異類的性行為的合理性。

我非常同意幾天前明報社論的其中一句話：「學生報負責人宜放開胸懷，聆聽意見，接受批評。社會是互動的，盲目的我行我素本身就是一個錯誤。」學生報固然應該聆聽社會意見，但批評學生報的諸君亦應開放心懷反思，是否只有學術性文章才有討論必要？在公共空間討論主觀性經驗是否一定是低俗下流？我們一直以為「正常」的性經驗背後是否隱藏著的各種歷史原因及權力操作？讓各種性經驗論述在公共空間百家爭鳴難道不是有助我們更全面了解性嗎？公共討論此一迴避已久的議題，了解到性經驗的各種可能性，方能在互相衝突的立場上取得共識。如果只以黨八股式的道德謾罵指責學生報，或是運用權力強迫對方屈服，抹殺性經驗的多元可能性，不但無助我們深思此議題，亦只會顯得批評者的淺薄及暴力。



國王的裸體

黃慧貞

原刊於《明報》，2007年5月17日

引起軒然大波的是本年2月和3月號《中大學生報》，以及其關鍵的兩個主要問卷提問。經過傳媒的反復循環再造，變成學生報一再被指摘為不雅及淫褻的罪證。眾多的指摘大致可分成兩方面：其一是報刊「情色版」問卷所提及的內容，其二是編輯的「眼高手低」，即他們的本意良好，手法卻極待商榷。我且從這兩點說起。

先說多數人詬病的手法。

新增的「情色版」，不論是情色故事、答問信箱、性議題專書的介紹或討論，其採用的文筆大多以生活化、流行俚語和一定程度上零碎、斷續和跳躍的文字篇章，十足新一代網上文字的作風。雖然我在課堂上講述過不少色／性理論，與同學分析過不少關乎情色的影視及文學作品，對於《中大學生報》上的情色文字頗有格格不入之感。不過這情形其實也不單出現在「情色版」，就我閱讀其他如「社會版」的文字和報道時也有同感。我似乎失落於尋找一些慣讀的議論文章，一些能就某一議題旁徵博引、論據精闢、曉諭家國民族大義的文章。究竟《中大學生報》「情色版」出事是手法的問題？是一個年輕人創意的問題？還是新舊兩代溝通模式相悖的問題？我為自己斷症為「代溝障礙」，情況正如我對很多流行網上創作大惑不解一樣。

內容問題與手法問題

另一個手法的爭議是關乎亂倫等的問卷提問。

綜觀各方面的批評，似乎大家都在肯定大學生談性是可以的，只要他們嚴肅地談、有「品味」地談、在一定的框框內談、避免觸及社會公眾對性的忌諱。現在《中大學生報》編委除了錯在觸犯性忌諱外，更錯在他們談得「輕佻」、談得「低俗」，直接冒犯了社會上眾多家長，引起大眾不安。性忌諱如亂倫當然可以嚴肅的討論。問題是：亂倫的欲望是否可以被提問？答問題的朋友又是否可以坦白？如此就亂倫的議題「一問一答」是否就是「輕佻」、「低品味」和「超越底線」？看來《中大學生報》出事的到底是內容還是提問的手法似乎不容易說得清楚。

向來在主流價值中，性慾——不單以生育為中心的性——就不宜在公眾領域宣之於口，任何以「正常」伴侶以外作為性慾對象的幻想，更屬「能做不能講」的範圍。

不過，就亂倫題目來說，佛洛依德採用了依底柏斯神話，加上對部族圖騰崇拜研究的吸收，發展了一套「弒父戀母」的心理分析學說，對解釋社會文化發展和人類心理分析的影響至為深遠。他學說最精彩的地方，是論說「性壓抑」如何一方面成就今日的西方文明，一方面也構成人類沒完沒了的夢魘，既充斥也豐富了我們的想像和創作。按他的理論，亂倫的欲望不單只存在於我們的社會文化中，更埋藏於每個人的潛意識深處。

亂倫的壓抑當然深具社會意義。利維史托認為它的禁制發揮了部族向外結盟的作用。在宗法社會中，不論同宗同姓還是異宗異姓通婚，都在不同處境中發揮着維護宗族承傳和其中所牽涉的利益的作用。近代的醫學再為近親通婚的問題提出了科學遺傳的理據，加入了一個現代理性的基礎。從社會組織來說，亂倫更潛在着一個權力操縱的問題。今日核心家庭成員之間的關愛和肉慾必須嚴格分開的做法，有效地壓止親屬間濫用權力剝削弱小的可能。一個文化及社會禁忌的產生既有它一定的歷史條件和基礎，它之未受廣泛挑戰自然是因為它具有在特定歷史時空產生的作用。也就是說，對於今日現代社會大多數人來說，亂倫的禁忌是「必然的」，甚至不容挑戰的。從這個意義來說，《中大學生報》編委說他們是「國王新衣」故事中的小孩是對的，因為他們斗膽對一個大家都噤若寒蟬的話題發問。

對於《中大學生報》的編輯們，假如大家同意他們的動機是良好的，假如我們也同意亂倫等性問題是可以成為公共討論的議題，現在只是表達方式的爭論，大眾喜歡不喜歡的問題，那學生肯定會從事件中學習、汲取教訓。不過，作為教育工作者、傳媒工作者或社會大眾的我們，有沒有想過可以從事件中汲取些甚麼教訓呢？下一次再有少不更事的少年人出來說實話的時候，我們是否又要鞭撻她不夠老練、用詞不當，或以踰越界線來打發她呢？我們要守着國王裸體的秘密到幾時呢？

愛在漫天風雨時——再評中大學生報事件

◆ 蔡子強（中大政治及行政學系高級講師）

原刊於《明報》，2007年5月15日

如果要我說出自己最敬佩的大學校長，或許有人會覺得我不識時務，因為我心目中的人選，不是一位會為大學掙得很多捐款，也不曉得誇耀自己把大學建設成世界「第幾大」的人，但他卻有著教我更加心悅誠服的胸懷——那是中大前校長高錕教授。

記得1993年，中大30周年校慶，舉辦了盛大的「開放日」來慶祝。但碰巧那時，也是六四事件後，香港學運最「激」的幾年，學生組織最恨歌舞昇平，於是便執意要與校方對著幹。

高錕校長的故事

在開放日那天，中大喜氣洋洋，冠蓋雲集，正當高錕校長要致辭時，冷不防被激進的學生衝上主禮台，在眾多嘉賓、家長、同學、校友的眾目睽睽之下，誓要搶走校長手中的「咪」，以表達另類聲音，結果令台上亂作一團，擾攘達數分鐘之久，令人覺得中大丟盡面子。他們又把抗議的單張放在吹脹的避孕袋內，向現場人士派發，極盡挑釁之能事。

事後，當校長步下禮台時，《中大學生報》的記者第一時間衝前採訪，詢問校方會否懲罰學生，怎料校長卻一臉詫異的說：

「懲罰？我為甚麼要懲罰學生？」

那位學生記者頓時為之語塞，頗覺自己就像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我記得幾年後，有一晚與老師關信基教授促膝談心，提起這件往事，他才透露，事後差不多各方都排山倒海的要求紀律處分該等學生，但卻有3人由始至終堅持反對，最後才能頂住了壓力。3人中的其中一位，原來就是當事人，本來該是最受屈辱、最應意憤難平的高錕校長。

老師的訓勉

至於另一位，就是當日身為學生輔導長的關老師。我記得老師當時是如此跟我講的：

「大學校園，本來就該是引發思潮、帶動社會前進的地方，如果我們的步伐和

界線，都與外面社會的一模一樣，那又豈能起到帶動的作用呢？」

我完全能夠想像，當日身為輔導長的老師，會為此受盡多少壓力，受盡多少委屈，但當他道出那一番說話時，就是那麼一臉淡然，就像一切本當如此，像高錕校長當日一樣。

老師的學養，做學生的限於資質，學不上皮毛；但老師所講過的做人道理，做學生的，卻一直未敢或忘。

但可惜當年中大的學生組織，卻不領情，因為校長接受北京委任為「港事顧問」，而一直對抗到底。例如出版學生報，大字標題刊出「港事顧問粉飾太平，中大校長一事無成」等辛辣、侮辱性字眼，令不少教授為之側目。但高錕校長本人卻一直以平常心待之，甚至每年從個人戶口中拿出兩萬元，捐助有財政困難的學生組織中人；又每年都親筆撰寫書信，多謝學生組織對大學的貢獻；更幫助學生排難解紛，在一場教授與學生可能因教學評核而對簿公堂的官司中，為學生順利調解。

而另外一些更加偏激的中大學生，更加出版一系列以粗口諧音作為名稱的「小報」，刊登一些不雅、性器官的照片，尺度遠比今天的大膽，但當時校方也只是循循善誘，屢加勸喻，卻始終沒有紀律處分。

「法國思想之父」伏爾泰（Voltarie）曾經講過：「雖然我並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我會至死也捍衛你說出那個觀點的權利。」從當年的中大校園，我完全能領會到這句說話的境界，也就是這些點滴和積累，令我們那一輩的學運反叛分子，至今仍十分熱愛中大。

「昨非」與「今是」

近日《中大學生報》的情色版，惹起軒然大波，都說同學偏離了社會標準，公眾不能接受。但社會標準，又真的應是學生運動及校園討論的極限嗎？

我記得80年代初「香港前途談判」，中大同學冒著天下之大不韙，提出香港應該脫離港英殖民管治，民主回歸祖國。當時在這個醉生夢死的殖民社會，這是何等的離經叛道，與所謂的「主流社會標準」，差距又豈能以道里計，公眾也是絕不接受，甚至更罵同學為「共諜」、「死左仔」。更有聲音說這些中大同學畢業後公司將永不錄用，甚至催促中大應予以警誡。但20年後，事實證明，究竟又是誰對誰錯呢？

今天中大視為顯赫校友的鄭海泉先生，70年代曾是因為在街上張貼「保釣」海報而被抓過的學運分子。朋友王慧麟曾到倫敦翻閱業已解封的殖民地機密檔案，才發現原來竟然有着這位「鄭大班」的黑材料，他被形容為「extreme radical student」，視之為麻煩搞事分子。

我相信當日也曾經有不少聲音，批評過這些同學影響校譽，損害中大學生形

象。但幾十年後，一笑便已風雲過，鄭海泉已成了匯豐「大班」，當日搞學運的何安達，那個曾經拿著水槍在宿舍「知行樓」周圍射，憤世嫉俗、玩世不恭的「死飛仔」劉細良，卻已成了行政長官曾蔭權的左右手。學生年代的稜角，本來就是理應如此。

那是一張倔強而非猥瑣的臉

上周四，我有透過電視直播收看學生報編委會的自辯論壇，在一張又一張同學的臉上，我看到的是一臉的倔強和純真，而不是淫褻猥瑣。雖然過去言語間，或許他們有頂撞過個別老師，但我相信他們都是真誠的。

我相信，如果有一天同學願意反省，又或者歉疚的話，原因一定不是因為校方處分了他們，而是我們這些作為老師的，曾經以極大的耐心和誠意，來看待他們所做過的事；如果好多年後，學生仍會惦記著我們的，多半不會是因為我們教授過他們甚麼具體知識，而是我們曾經以身作則，教導他們如何處世做人。

周六回到校園，得知政政系的同學，在考試季節，大家都在捱更抵夜的時候，還是奮力「開夜車」，趕出了一份聯署聲明，並邀請我加入聯署。這群同學本來不是直接牽涉在內，但都能如此見



義勇為，做老師的常常鼓勵學生要有judgment，要有initiative，如今還夫復何求，即使再有些甚麼，也只是枝葉，於是立即簽名。

為甚麼我們這樣愛中大

事件中，我一直只是個旁觀者，只是在旁邊說些風涼說話，我知道真正要負責的中大老師和同事，卻處身熱廚房，壓力都很大。

在民粹主義肆虐的今天，傳媒會動輒不問情由，指摘我們「包庇」學生，把整間大學的校譽也「擺上檯」。我完全體會到校方調查委員會做決定時的難處，而大學輔導長何培斌教授，早前接受記者訪問時亦透露，有需要時，他個人願意為學生提供法律支援，並以「有理想、有看法、有堅持」來形容學生報的委員。但我只想補充多一句，能對學生寬容的，希望都能盡量寬容。

現在差不多每一間大學，都說鼓勵學生獨立思考、批判思維，但當學生的看法與我們一模一樣時，哪用大家多作lip service；相反，正正是當學生的看法與我們南轅北轍，與我們不同的時候，校方仍能表現出尊重和包容，才真正最能體現出我們對獨立思考和批判思維的真誠，才最彌足珍貴。

我們都愛自己的學生，但當學生飛黃騰達，名成利就時，我們的愛充其量只是錦上添花；相反，正正是當漫天風雨，壓力鋪天蓋地，學生茫然無助時，我們的愛，我們所表現出的承擔，才是學生最需要的。

我們那一輩都十分愛中大，因為那是一個曾經容許我們犯錯、容許我們跌倒，以及容許我們跌倒後重新站起來的地方。我真切的希望，很多年後，我們的師弟、師妹、學生，也能夠有幸因著同樣的原因，愛著同一間中大。

天星・皇后・情色

◆ 馬嶽

原刊於《明報》，2007年5月23日

自天星以來，我一直在想這運動和香港的民主發展、社會運動和公民社會的關係。從學術角度這不難解釋。英高客（R. Inglehart）等早指出，當先進資本主義社會踏入後工業社會，年輕一代開始愈認同後物質主義（post-materialism）。隨著年輕一代在富裕中成長，傳統的「麵包與牛油」議題的吸引力逐漸減退，有關生活素質（quality of life）的議題如環保、兩性、文化保育等愈受重視，令社會運動呈現新貌。

放在香港的實際環境，現今香港的年輕一代成長於較富裕的環境，對「搵食」和安定繁榮的重視，遠不及以難民身分來港的一代，但特區政府用的偏偏是「發展主義」的語言，將經濟發展視為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政策的最高價值。於是每次保育運動都是一次意識形態抗爭。保育者反對的是那種「發展至上」的意識形態，於是反填海後有天星、天星後有皇后、皇后後必然有其他地標。特區政府一直沒能力說服保育者，為甚麼疏導交通一定比集體回憶重要，在一輪「雞同鴨講」不得要領下，只能訴諸建制的所謂程序理性，或索性出動推土機了。皇后的營幕未拆，發生了中大的學生報情色版事件。我看到了跨代的價值斷裂。主流社會批評中大學生的人，至今都未能正面面對（可能是無力面對）一項事實：學生報的同學（可能也包括支持他們的同學）覺得自己沒有錯，或至少主流社會沒資格說他們錯。

對不少同學而言，情色版的內容比每天報章的風月版、坊間很多小說，甚至網上俯拾皆是的相類內容，是小巫見大巫。如果這些都可以出版，學生報一不牟利，二不是為了嘩眾取寵，而是真心誠意為了討論問題，為甚麼不可以？有人會說他們品味不高，有人會不同意他們的道德價值，但這都應該在言論自由的前提下，由社會和校園公開討論。如果有人非議部分內容的道德和品味水平便要禁止出版，我相信現在每天報攤不剩多少報刊了。

現在很多主流社會的論斷都從自己價值觀出發，先肯定了大學生有錯，但「年少無知應該寬大處理」。這包括兩個主流民主派政黨發言人，令我頓然明白為



甚麼很多大學生投票給長毛，因為只有社民連才屬於他們的政治光譜。另一種普遍論調是：「既然有人批評，認句錯不就沒事了嗎？」殊不知這只是成年人在資本主義社會或官僚架構中學會的生存之道，根本沒有解決價值衝突的問題。

家長們赤裸裸的權力

他們都聽不見這群大學生在問：為甚麼你們的道德標準和品味就是對，我們的就是錯？當大學生以公開論壇嘗試認真討論這問題時，卻被抹黑為「向公眾下戰書」。批評者從來沒有在共同的價值基礎下，和他們公開辯論（或者是沒能力辯論）哪個是適合的道德和品味的界線，最後說服不了年輕人，便只能用建制權力批鬥、「評級」或要紀律處分。這和特區政府說服不了天星的抗爭者，便兼夜出動推土機沒有兩樣。年輕人看到的不是道德的規範，而是家長們赤裸裸的權力。

我們的主流社會，這個五六十歲的人掌權的社會，負責教育的高官隨意說rape，電視台選美司儀每年公然說意淫笑話性騷擾參賽者，批評情色版的報章的傳媒集團自己出版色情含量高很多的周刊。然後有一天主流社會突然「食了酸梅乾就變超人」，要求大學生要比他們有高得多的道德水平和品味。這正等於我們社會街頭巷尾粗口橫飛，但卻容不下《秋天的童話》的兩句粗話。這不是偽善是甚麼？

有罪的人在扔石，眼中有杉的人在挑他人眼中的刺。主流傳媒的道德審判、審裁處、中大的紀律聆訊，和天星的推土機沒有兩樣，都只是五六十歲的當權者不能用理性說服時，出動的建制權力。就像小孩子問了一個家長覺得不應該問的問題時，家長一耳光摑過去說「不准問！」對《聖經》和莎士比亞的投訴，只是年輕人對偽善的建制權力的微弱反抗。香港的跨代價值斷裂，將隨著天星、皇后、情色，愈來愈闊。

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歸根究柢只是我們的，因為我們擁有權力。

冷言冷語論情色（中）

◆ 曾瑞明（第31屆中大學生報總編輯）

原刊於《香港獨立媒體網》，2007年5月31日

學生報有一優良傳統習慣，叫「過文」。「過文」，意即幾十位莊員圍在一起，就某篇即將刊登在學生報刊物的文章，一字一句地討論，找尋當中的問題，思考可能的批評，然後修改，然後再討論，直到大家滿意為止。這過程的精神，我認為可稱是「民主的寫作」。它把作者的無上權威，擁有最終決定權的定律打破。當然，作者的創意、文風、也會盡量予以包容保留，成功與否牽涉莊員之間的了解、識見和包容。不過，每篇文章理論上是個人和團體意志的結合。這是健康的，它避免獨斷、輕率，還培養了我們對他人意見的尊重。

這訓練，令離開學生報多年的我至今仍會願意花時間字斟句酌。學生報就情色版事件發表的〈無懼污名　重尋真性〉，我的確看到問題，找到矛盾。我希望學生報的朋友，可以繼續思考，繼續修正，實踐學生報的傳統：「民主的寫作」。

「想像」的基層

學生報的編輯們說：「我們不反對學術性的談性，亦有這個能力，但這種經過消毒的象牙塔口胳究竟排拒了甚麼社群？基層人士有多少能以這種語言表達自己性的經驗？不少人視大學為與市井隔絕的神聖廟堂，本報堅決反對種偏見。」我們的觀感是，這群大學生似乎可以在兩種觀點瀟灑游移，像超人蜘蛛俠變身那樣。

他們既可以做大學生，寫論文、講英文，引經據典，談文論藝；也可以「扮演」基層，用基層的語言，說粗口，談談情說說性。但，到底誰是基層？「基層」到底是怎樣的——他們的收入是怎樣的？知識水平是怎樣的？嗜好是怎樣的？他們的語言習慣是怎樣的？他們的性口味是怎樣的？我絕不敢說了解說知道，因這不能單靠想像——這全都是事實問題，需要大量社會科學的研究，也需要你真的接觸基層，與他們同喜同悲，才能與他們呼吸同一口的空氣。要是如此困難，學生報的編輯為何如此有信心去代某階級發聲？記著，使用市井語言不等於你變身成市井，你關心的問題，你引用的東西，完全反映你的口味和觀點，這未嘗不是一種「排拒」。而且，我不認為「經過消毒的象牙塔口

胳」是「排拒」了某種社群的關鍵，關鍵在於二字：階級。哪個基層會有興趣去找一份大學生的刊物，去研究一下有關性慾的東西？我不敢說沒有，但很想知道那人是誰。中大學生報的派發點有沒有深入基層出沒的地方，比如觀塘裕民坊，深水埗鴨寮街等等？

「上山下鄉」，為就了讓知識份子能跨越階級的藩籬，但是否成功大家心裡有數：在中國導演王小帥的《青紅》中，知識份子因著革命的熱情去到中國西部的甘肅工作。後來，變得老是喊著「我們是上海來的」，「我們是上海人」，「要回上海去」。甘肅，對於這批知識份子來說，就只是一個錯誤，與他們想像的完全兩樣——那裡沒有他們喜愛的精緻文化，沒有他們喜愛的高級娛樂。知識份子與工農兵歡歡樂樂走在一起的畫面，純屬主觀意願。

我不是說我們不應該關心基層，我認為這是每個知識份子的責任，每個處於安樂當中的人的責任。我只是要指出，別太一廂情願的以為，你可以在階級與階級之間變來變去，走來走去。

「關祖認社」那些日子，我們喜歡「想像」中國，「想像」社會，很火紅。今天，我們透過「想像」基層，來為自己建立一個道德高地。但是，基層透過閱讀他們的報紙，比如方向報和月亮報，卻對這群招納基層的編輯嗤之以鼻。

「多元」迷思

學生報編輯說：「本報對情色版嘗試加入多元的性想像，乃在抗拒現今香港社會論述性的單元。情色版之成立，旨在打破一元性論述，解放遭這論述壓迫的弱勢者。」何謂「一元性論述」，語焉不詳。大概是指社會把性的議題限制了，因此，學生報的編輯們，要談亂倫，人獸交等等，學生報因此要如實反映大家對這些課題的看法，鼓勵同學發表意見。「一元」也可能是指社會把「性是亦只是男人對女人的淫慾發泄」等等既定和主流的觀點。多元總好過一元，似乎是學生報的預設立場。但是，如果社會把性的議題限制是對的，社會把性看作「是亦只是男人對女人的淫慾發泄。」也是對的，哪「一元」有甚麼問題呢？如果有問題，也只因為這樣是錯的。

學生報也顯然認為這是錯誤的，他們作了價值判斷（雖然這是沒甚麼爭議性的價值判斷）。但對於一些較有爭議性的議題，他們卻開始企圖擺脫價值判斷，想做到客觀中立，最後卻只能任人詮釋他們的一字一句。亂倫，人獸交等等究竟有沒有錯，是否有問題，學生報不曾表示意見，只表示要尊重多元。但，我們為甚麼要尊重多元呢？是因為「多」有無上價值，還是因為「元」本身值得捍衛？如果有人說法西斯主義要尊重，是因為民主自由太單元，而我們的世界恰恰要鼓勵多元。你會說這是胡說八道。但為何這是胡說八道？因為我們覺得法西斯主義是錯誤的。所以，

不會為了「多」而去保留這種主義。因此，鼓勵多元必定預設要保留的東西有一種價值，而非邪惡而非無聊而非不道德的。那麼，到底亂倫，人獸交，多性戀，濫交有沒有問題呢？學生報不需要提供終極答案，但起碼要不畏懼，表達意見——而不是左閃右避，以「多元論述」來含糊其詞。

學生報也聲言要「尊重慾望」，表面看來甚為偉大。但其實這論調不堪一擊。難道我們也要尊重強姦犯、殺人者的慾望嗎？問題仍是在於該慾望是否有價值，是否值得捍衛。除非學生報認同所有有關性的慾望皆十分特別，都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但這點嚴重偏離我們的常識，需要加以證實。

學生報時而走進價值主觀主義（value subjectivism），時而高舉多元有普遍價值（universal value），十分奇怪，非常矛盾。要麼是頭腦混亂，要麼只是狡辯。不過，在這個號稱「後現代」的年頭，我們見慣不怪。

探究者與解放者

學生報在聲明還來了點革命語言：「解放遭這論述壓迫的弱勢者。」這豈是「不拘謹害羞的誠實小子」該說的話呀？差點以為火紅年代的冤魂降臨了。解放他人，暗示了解放者知道何謂真實，知道何謂真理，因此知道弱勢者被甚麼蒙騙，知道弱勢者受著甚麼枷鎖——這與誠實小子作為探究者的角色相差甚遠。誠實小子未必知道真理在哪裡，但他願意打破禁忌，開誠佈公。他不介意語調平和，有時戲謔，為的是不要煞有介事，不要鼓勵成見，而是輕輕鬆鬆，方便大眾思考。

答案，他相信是在大眾那裡（甚至在將來的人那裡），而非自己成竹在握。

《重尋真性》是一句草率的標題，它透露了學生報的編輯們其實早已知道何謂「真性」。但他不說出來，反而扮作一無所知。以「cheap cheap吔」的口吻和大家開開心心做問卷調查，讓你們談談不明所以的性經驗，然後讓學生報做我們的精神導師——這其實還是大學生的自大。一種變種的、扮小人扮無知其實心裡覺得自己十分有料十分勁的心理。正如我在前文所說，學生報起初用意頗佳，本來大可以角色扮演遊戲一場，跳離大學生一本正經要去解放社會改革社會的刻板形象自大心理——但在聲明裡卻變成高不可攀，卻又那麼可笑的樣子。可見，社會對大學生的模塑仍是牢不可破，而這個形象也卻是大學生最厲害的武器：當遇到襲擊時便會拿來對付別人，教訓別人指責別人只是蒙蔽者。大學生學生團體總是這樣不知不覺，就會重蹈覆轍，走上我們這些前人也以為曾經擺脫，但其實也是同一條的舊路。

學習哈佛

◆ 梁文道

原刊於《明報》，2007年5月17日

轟動一時的哈佛情色刊物*HBomb*，最近終於失去了它的正式學生組織地位。不是因為它的內容太色情，也不是它太冒犯社會禁忌，而是它的編輯隊伍太不成氣候。想當年這份刊物草創之時，曾是全美國傳媒的熱門話題之一，大家都想看看哈佛學生搞「色情」可以搞到甚麼地步，而哈佛校方的容忍程度又可以有多大。

除了很不草根甚至有點專業的討論之外，*H Bomb* 還有許多小說、散文與詩，談的全都是性。當然啦，外人最關心的還是那些性感照片，因為大部分的模特兒都是哈佛的學生，他們不只奉獻自己的身體形象，還暢快談論性經驗。

這到底是不是本「鹹書」（porn）呢？*H Bomb* 的網頁如此回答：「這要由你來決定了，我們認為它不是……假如你還沒有成熟到能夠區分好玩的裸體照與色情的地步，你大概不該閱讀 *H Bomb*。」但是藝術和色情又該怎樣區分？「你開玩笑嗎？藝術和色情的差異是種主觀的區別，它完全依賴個人的文化價值。與其設定它自己的議程，*H Bomb* 鼓勵持不同意見投稿者之間的討論。」

這是學生的看法，哈佛校方又做了甚麼來回應外間的議論呢？幾乎甚麼也沒有。起初他們也很關心「哈佛學生搞鹹書」的傳聞，但後來校方的「學院生活委員會」還是讓*H Bomb* 登記註冊，取得「正式哈佛學生刊物」的地位，而且完全沒有審查，也不干預編採。此外，哈佛大學的學生會也贊助了*H Bomb* 一筆。

不過，3年來 *H Bomb* 才出過兩期，現在就已經陷入停滯的狀態了。由於根本符合不了至少要有兩名職員和年度預算計劃的規定，所以哈佛學院助理院長（Assistant Dean of the College） Paul J. McLoughlin II 只好告訴記者，剩下一名職員的 H Bomb儘管可以自行出版，但不能再擁有正式刊物的地位。他說：「或許每個人都想看這本雜誌，但沒人願意辦好它。」

相比之下，耶魯的學生就爭氣得多了。他們的年度「性愛周」（sex week）固然愈辦愈生猛，他們的性雜誌也健健康

康地活了下來。最近一期還有篇非常詳盡的長文，條分縷析地把女陰分成18部分逐步解釋，教導大家怎樣恰當地刺激它們，好使伴侶獲得莫大的快感。為免本日《明報》也有被列作二級淫褻及不雅刊物的風險，就請恕我不再引述翻譯了。

如果各位讀者有興趣的話，請隨便上網查索，在傳統的長春藤盟校和牛劍之外，國際級名校學生辦的「情色」刊物和網站簡直多不勝數，其中更不乏學生會資助且校方認可的例子。請拿它們和最近惹起爭議的《中大學生報》比一比，假如我是陶傑的話，我一定會說這就是真正世界級與第三世界「亞洲國際城市」的分別了。

但是說了這麼多哈佛與耶魯的故事，目的當然不只是為了突顯開放與保守的分別，更不是要諷刺近年好些教育界高人言必稱哈佛的習性，而是要指出在處理相近課題時的不同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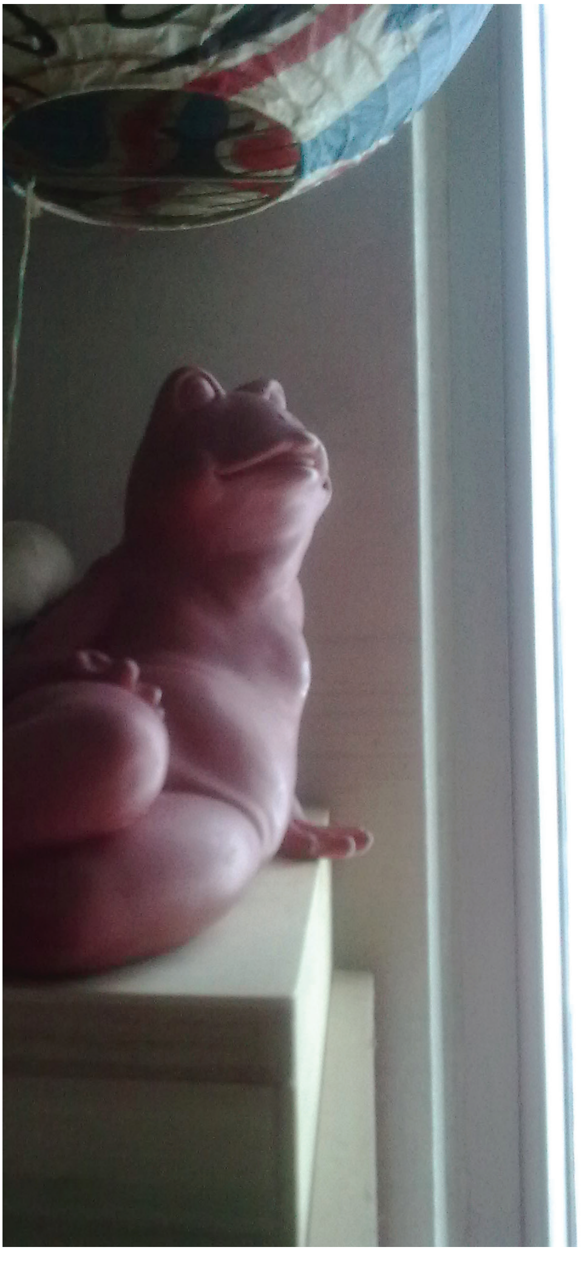
首先，我們看見了哈佛校方緊守本分，絕不輕言審查，更不動用甚麼紀律審裁的機制，而是按章辦事。假如 *H Bomb* 想要在校內發放，想要獲得校內各種組織各類人等的資助和廣告，它就要經過「學院生活委員會」的審核。這個委員會不審核未來刊物的內容，它看的是主辦者在組織和預算等形式問題上是否符合規定。雖然哈佛大學也「關切」學生出版色情刊物的傳聞，但是他們很小心地避開了由內容審查引伸的言論自由問題。正如 *H Bomb* 的網頁所言，色情是很難客觀定義的，校方強行介入只會徒增煩惱。

比起香港中文大學處理此次學生報情色版的手法，其中高下之別實在是太巨大了。最令人難以理解的是遇到了社會爭議，中大校方不去發揮學府自由開放而嚴肅的本色，既不是把事件直接交給學生自己解決；也不是退而求其次，召開研討座談或公聽會，讓各方暢所欲言自由辯論；卻是先行假設學生「犯事」，一步就跳到了紀律審議的機制，更在閉門且被告缺席的情況下判定了學生有罪。縱使校方後來表示願意在法律上援助學生，他們那種為求迅速對付外界壓力和傳媒審查，忘卻大學根本的心態已經暴露無遺。這次事件當然是一場公關危機，但大學怎麼可以在面對它的時候不顧大學的身分呢？

其次我們再看學生方面的問題。無論是哈佛還是耶魯，他們的情色刊物在分量和質量上都比《中大學生報》的情色版重得多；但細閱之後，你會發現它們的編輯充分考慮到了讀者，很用心地在傳達自己的想法。反觀《中大學生報》的溝通技巧就太嫩了。

《中大學生報》的出版委員會在5月8日發出的公開信裡聲明：「我們不反對學術性的談性，亦有這個能力，但這種經過消毒的象牙塔口吻究竟排拒了甚麼社群？基層人士有多少能以這種語言表達自己性的經驗？」我非常認同有些引

起爭議的話題和觸及社會禁忌的體驗經過學術語言的包裝之後，會變得乾乾淨淨，甚至令大眾難以理解。但是《中大學生報》的主要讀者就是大學生，難道他們都是不能使用學術語言的「基層人士」嗎？其實編輯們根本用不著引經據典，也不必找專家解說，他們照樣可以使用淺白的語言去刺激大家思考。就以成為焦點的那份問卷裡的兩條問題為例，與其只是去問讀者最想和哪一種動物做愛，何不簡單地多補幾句，問大家「贊不贊成人獸交」，「理由又是甚麼」。這都是很多哲學課堂上會讓大家思考討論的問題，也不見得有多學術多專業，不是嗎？



《中大學生報》的出版委員會雖然在上述公開信中表達了「加入多元的性想像」和「打破一元性的論述，解放遭這論述壓迫的弱勢者」的意願。不過很可惜，他們既沒有掌握清楚讀者的背景，也沒有找到更有效的表達方式。

回應《中大學生報》的歪理

郭鴻標（香港建道神學院副教授、神學系系主任及神學碩士課程主任）

原刊於《時代論壇》第1032期，2007年6月10日

傳統道德扭曲性慾的歪理

《中大學生報》出版委員會在《明報》2007年5月10日A28版發表文章，表示加入「情色版」的目的是「批判現今社會單線、扭曲的情慾想像，營造開闊討論性的空間……。本報對情色版嘗試加入多元的性想像，乃在抗拒現今香港社會論述性的單元。情色版之成立，旨在打破一元性論述，解放遭這論述壓迫的弱勢者。」

明顯地，《中大學生報》編輯們並非中立地看亂倫與人獸交的課題，而是已經同意這種行為，並透過問卷讓讀者「如實反映他們的性想像，藉此反思一元性論述。」若果讀者從來不會如此想像，又不會覺得被傳統道德規範壓抑，也要學習去想像。這樣的做法不是鼓吹又是甚麼呢？這種先入為主要衝擊傳統道德價值的行為，並非像一些為學生開脫者所形容的——無知。學生們有明確的目標，就是要衝擊傳統道德價值。

《中大學生報》編輯們認為問卷中關於亂倫及人獸交的問題沒有指向性，不屬於鼓吹行為。不過提問這個問題背後的意識形態卻徹頭徹尾是假定社會主流價值壓抑人內在的性慾。問題是縱使大部分大學生沒有這種想法，也要對他們進行性解放。

面對學生的衝擊，我們亦要反問為甚麼社會要接納亂倫及人獸交的性論述呢？為甚麼高學言論自由可以沒有道德底線呢？筆者認為更深層的問題是：當代性別及文化研究在自由主義和後現代主義思想帶動底下，進行對社會主流價值的顛覆。

對自由主義性別及文化研究的批判

筆者認為當代性別及文化研究標榜小眾文化，追求另類；在學術層面來說是創新，但是在社會卻帶來負面的衝擊。作為性別及文化研究學者，應該深思對學生及對社會的影響。

究竟現時性別及文化研究的前設是否將愛與性慾分割呢？若果性別及文化研究只談性慾，漠視愛與家庭責任，將會陷入自我中心和縱慾的地步。若果學生受自由主義性別及文化研究理論的影響，假設人心底有「弒父戀母」情意結及與

動物性交的慾望，然後以各種途徑獲得數據支持人以理性壓抑性慾是一種枷鎖，無形中是鼓吹亂倫及人獸交。

自由主義的性別及文化研究鼓吹放縱性慾，《中大學生報》出版委員會認為「情色版強調每個人的慾望都需要被尊重」。從言論自由的角度來說，每個人都有權以個人的身分發表這樣的言論；不過以《中大學生報》的名義發表這樣的言論是否公器私用，就值得商榷。筆者反問為甚麼其他中大學生不能反對這種性觀點呢？為甚麼中大校方不能反對這種思想在《中大學生報》出現呢？若果沒有一種外在的規範，如何平衡每個人的性交的慾望。例如陳先生雖然已婚，但是覺得黃太太十分吸引，要追求她和與她性交。若果陳太太和黃先生都這樣，其他人亦是這樣的話，社會上婚姻及家庭的穩定性必然被動搖。

若果一個18歲的青年有權投票選舉，表示青年人有獨立思考和負責任的能力，我們要小心這種高舉「重尋真性」的理由，衝擊道德標準及挑戰社會建制的行為。我們投放大量資源培養大學生，我們懷著教育理想推動博雅教育，促進中西文化交流，究竟我們是否要像哈佛大學容許色情雜誌出版，才能算得上超英趕美呢？筆者曾經撰文〈對自由主義性哲學的反駁〉（第1011期），指出搖動傳統家庭婚姻價值的是自由主義性哲學，這種思想引伸的性別及文化研究同樣是顛覆主流價值觀為己任。作為基督徒學者應該敢於發言，在學術界表明基督徒的身分和立場。

甚麼是大學生的社會良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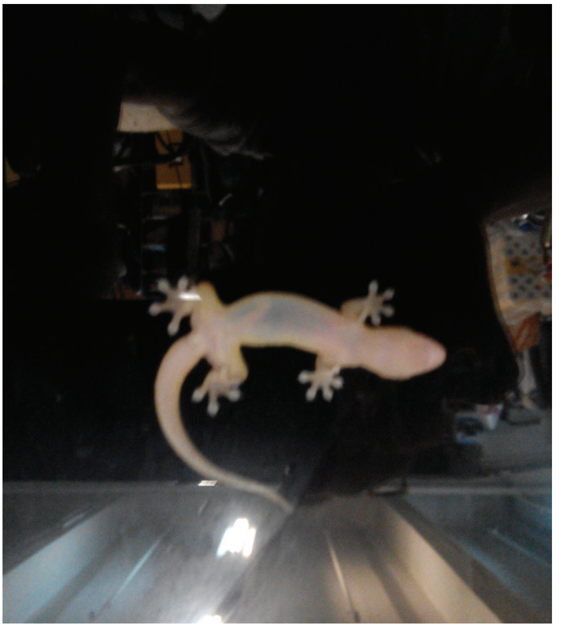
《中大學生報》出版委員會認為「一直以針貶時弊，改革社會為己任……」一位學運前輩形容學生是孩子，以前的大學生談國家大事；現在的大學生則談性。雖然這番說話令人覺得現時某些大學生不像樣之外；他仍以父親的心腸反對打壓學生。值得反思的問題是：究竟甚麼是打壓？中大發警告信給學生就等於剝奪言論自由嗎？

《中大學生報》出版委員會以求真為理由，並判定「社會對於性的看法極度扭曲、渲染，變成單一的淫穢想像。」這樣的言論根本沒有任何地方表達對亂倫及人獸交的批判反思；只有一個前設就是「讓同學感於由衷說出親身經驗和想像，才是求真相、問為甚麼的第一步……」《中大學生報》出版委員會鼓勵尊重有亂倫及人獸交經驗的人，認為這是多元社會中人應有的權利。不過筆者質疑推動這種縱慾的思想是否大學生的社會良心的表現？究竟縱慾對社會道德規範帶來多少衝擊，破壞多少家庭幸福呢？

《中大學生報》出版委員會提出「不能循正常的渠道獲得有關性的資訊……」其實香港是一個資訊流通甚廣的地方，豈可能會得不到有關性的資訊呢？若果所講有關性的資訊是指由衷說出親身亂倫與人獸交經驗和想像的話，當然在一個尊重家庭及婚姻制度的社會，必然有

很多反對聲音，令銳意推動縱慾的人覺得得不到他們所要求的性資訊。

筆者覺得學生們的性觀點錯誤，只有縱慾和衝擊道德底線的想法。學生們亦缺乏自我反省能力，只堅持自己的觀點，毫無悔意。反過來指摘校方不愛惜學生，實在令人失望。若果推動縱慾思想就是社會良心的話，這將會是香港高等教育的悲劇！



文化戰爭與道德聖戰

◆ 安徒

原刊於《明報》，2007年5月20日

《中大學生報》情色版的風波，發展至最近有人集體向影視處投訴，認為《聖經》亦應被評審為不雅刊物。爭論的激烈，遠超一般人當初想像之外，亦象徵性地說明了，一場不宣而戰的香港本地「文化戰爭」（Culture War），已踏入一個重要的關鍵時刻。

「文化戰爭」這個詞，原本來自卑斯麥時期德意志帝國與天主教教廷的對抗，後來意大利馬克思主義者葛蘭西，亦認為無產階級如要取得勝利，關鍵在乎打破原來統治階層的文化霸權，更要在傳媒、教育、群眾組織上，贏取一場文化戰爭。

九十年代，美國學者James D. Hunter以「文化戰爭」為名著述一本書，分析美國在新保守主義急速冒升的時代，文化政治上不同力量之間，重新結盟整合和相互對抗的情況。他將這場對抗名為「正統派」和「進步主義者」之爭，也有人把這場對抗，形容為「世俗進步主義」和「傳統主義」之間的對抗。對立雙方分別在墮胎、槍械管制、同性戀、刊物及影視品審查、毒品、性教育、死刑、獨用英語教學、及一系列種族、移民權利問題上拉開戰幔。

東施效顰打一場子虛烏有的戰爭

美國是一個以基督教為主流信仰體系的國家，有著它本身錯綜複雜的宗教歷史，自己獨特的傳媒生態、知識傳統和校園政治。文化戰爭的出現，反映著美國社會的獨特問題。香港也有著本身獨特的文化處境和思想淵源，本來就沒有一種合適的土壤和必要，發動一場模擬美國「宗教和世俗」對抗的文化戰爭。然而，因為香港某些人和美國教會的利益和信念上的連繫，在這幾年來，竟也有人想東施效顰，以對抗邪惡的「聖戰」心態，在本地也發動這一場子虛烏有的模擬戰事。在這些試圖自美國橫向移植他們的「宗教vs世俗」對抗圖式中，他們以「世俗」為敵，杜撰一個名為「世俗化霸權」的東西，並把自己幻想為受逼害的「宗教人士」，被世俗世界逼迫他們放棄他們的「宗教生活」。

他們為了構作一幅聖戰圖像，自然要以樹敵的修辭策略，為自己打造一個敵人，這

些幻想出來的敵人，名為「極端自由主義者」。他們的罪名是在公共領域「去基督教化」、鼓吹墮胎和把同性戀變成人權，他們甚至設想，當今世界的孩子們是被「極端自由主義者」們逼著灌輸了「同性戀意識形態」。所以，他們要起來反抗，抵抗世俗主義者的侵襲。

不過，這種美國右翼福音派基督徒的香港代理人，為了證明香港社會也存在這種所謂「世俗化霸權」，以向本地輸入道德聖戰的實踐，卻為他們的環球戰略，作了本色化（本地化）的改造。按照他們的理論，大眾傳媒原都是令社會道德沉淪的罪魁禍首，但他們並不像美國那邊，滿足於在自己的教會刊物，教會禮拜的宣道場合，宣揚他們的反世俗，反大眾傳媒的論調。他們反而積極利用大眾傳媒，配合傳媒的譁眾取寵操作，不斷製造社會道德議題，不斷喧染道德恐慌。過去一兩年來，除了例如反對立法保護同性戀不受歧視的主戰場外，這股道德聖戰衛士超強的製造議題的能力，早已鑽了不少空子，使社會大眾疲於奔命。

正如一些學者曾經計算，過去一兩年間，香港發生與性問題有關的道德爭議，可說無月無之。問題並不是甚麼社會風氣突然急速變壞，而是香港的既有社會體制，在這段短時間內，被這些熱中於挑起「文化戰爭」的衛道之士騎劫。最明顯的莫過於《秋天的童話》這種聲譽本已甚高的陳年電影，都會被「翻炒」指控，頭頂破壞青少年道德心智的罪名。

如果說，包括電影導演、報紙編輯、大學生們在內的「極端自由主義者」，在他們眼中都是在衝擊和瓦解著社會的道德底線，那他們持續不斷、譁眾取寵式的誘發香港的道德歇斯底里反應，也可以被視為不斷在測試香港公民社會、公民文化和基本權利的底線。香港人曾引以自豪的公民文化，又是否經得起考驗呢？

正如任何宗教都不應被還原為一些所謂基本教義的簡單原則，而要對應具體歷史的脈絡，宗教方不會成為獨斷偏執的禍源，一個成熟的現代公民社會，也不能避免社會道德爭議，因為公民社會正是為反對陳腐的道德和宗教獨斷而建立。公民社會之為公民社會，正在於它具備包容差異、促進溝通、不斷反思的機制，在爭議中為社會謀取共識，而不是以隨意的公權力、單一的長官意志、獨斷的教條和民粹式的多數壓力，強行為社會訂定道德準則。

傳媒和大學本來就是現代公民社會中公共領域的兩大支柱，讓反思、溝通和探索可以以持續、合理的方式進行。但是，正如德國大哲哈巴馬斯（Habermas）所指，理想的公共領域已隨商品化邏輯的侵進而陷入衰退、扭曲的危機。

民粹式的傳媒運作，公關（PR）化的政治、品牌機器式的治理大學理念，正是

上述這種公共領域衰微的表徵。而《中大學生報》事件所揭示的，正是近年香港遭不斷削弱的公民社會和公共領域危機的一場小爆發。

無意中挑動中大數代「集體回憶」

不斷追逐聳動新聞的大眾傳媒，只顧建立公關形象而忘卻教育本義、大學應有角色的大學當局，造就了《中大學生報》事件中衛道聖戰者騎劫了傳媒，而傳媒又騎劫了大學的一場鬧劇。

不過，道德聖戰者以為可以以幾個中大小子作為聖戰祭禮中的犧牲羔羊，卻沒料到中大當局的過度反應，卻造就機會使被宰殺的一方作出強力反彈。原因在於，他們沒有真正了解香港的思想傳統，香港的文化地貌，他們更不了解中大。

在美國，文化戰爭往往以校園為主戰場，各派在大學為了課程、收生、聘任等問題，持久爭戰，反復辯論。香港的大學校園，卻沒有這種讓多元文化相互角力的學院環境和傳統。然而大學（特別是中大）卻積累了香港最強的進步主義傳統，最持久的反叛精神，學生報更是最具開放、前衛、實驗精神的象徵。

道德聖戰者意圖走進校園高舉道德大纛，卻無意中挑動了跨越數代整個中大社群的「集體回憶」，觸動了中大人承繼中國五四運動，思想無禁區的精神，反封建、反禮教約束的警覺系統，對個性自由、表達自由的價值執著。連日來，新新舊舊的中大人，相互奔走，連繫聯署，以致爭相辯論，都是爭取修復被原教旨獨斷思維所踐踏破壞的前衛探索、理性反思的傳統，捍衛大學繼續作為公共領域，使理性辯論與反思，可以無畏無懼地進行的空間。

中大人的這種「集體回憶」，正好就是香港過去數代年輕人，反對冷戰年代黨國操控的制式教育，抵制殖民地的愚民教育，所積累而來的自由主義精神財富。從保護這份現代中國青年，珍貴的自由主義精神遺產的角度看，中大人是受得起考驗的。

對於公共領域的「沉淪」，香港版本的道德聖戰者的反應，其實是徹頭徹尾的犬儒主義（cynical）：他們對之一方面進行空洞的批判，一方面卻又利用這種傳媒的民粹主義式操作，以千倍放大鏡去揭示大學生的道德醜聞。

然而，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傳媒引導的輿論，可以在數日之內，翻雲覆雨。這些聖戰者們不明白，譁眾取寵的傳媒運作，所依循的是民粹主義邏輯，它是一把雙面利刃：它的核心原則是「反精英主義」。所以，它可以無限放大性醜聞，以詆譭「精英」大學生的形象，也可以急速放大大學當局的笨拙反應，以令庶民享受揶揄更大的大學精英體制所帶來的快感。箇中雖然弔詭，但並無甚麼精神分裂，可笑的只是有人「搬起了石頭打自己的腳」。

在中國數百年綱常禮教、黨國道德禁制的歷史，和在道德偽善充斥的現實陰影下，香港的可貴，正在於這裡那怕是半吊子的自由主義俗世活命空間。這是地上的公

義，也是精神的救贖。香港人的社會道德前提和底線，正建基在如何維護這個空間，而非如何建立一個克己復禮的清教烏托邦。

任何教育工作者都應知道，道德能力的培養，在乎聆聽與關懷，不在乎行使權力的淫威。香港的基督信仰者，有身體力行，致力普世價值的實現，有孜孜不倦，致力傳揚福音。香港人希望聽見的是仁愛、寬恕和正義的福音，卻非那種喋喋不休，焦灼、虛怯卻又無能的道德聖戰的喊叫。救救孩子！哈利路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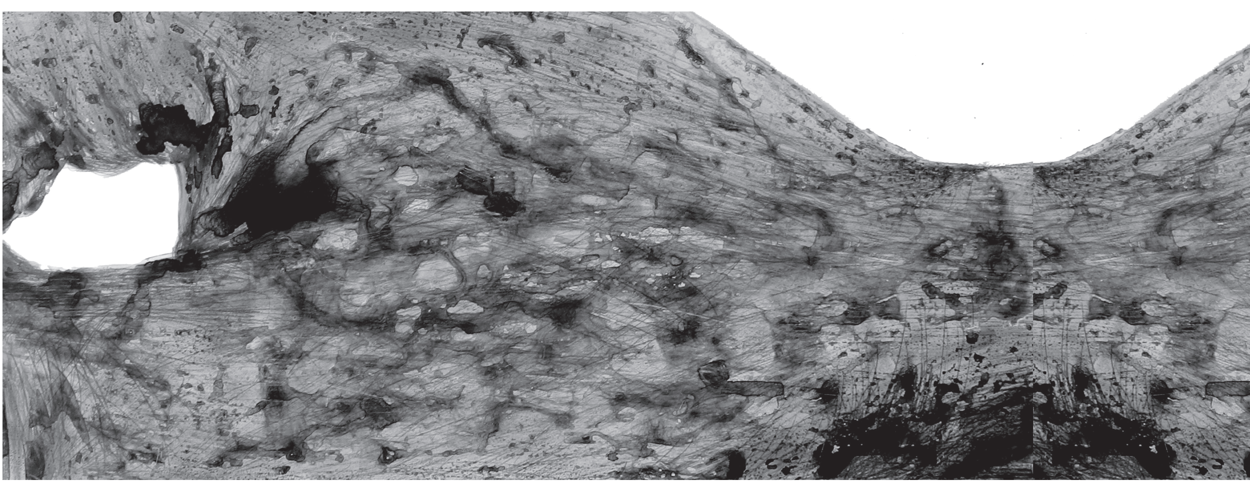
We Don't Want to Talk About It

◆ 林奕華

原刊於《信報財經新聞》，2007年5月14日

讀罷一共五期的《中大學生報》情色版，我並沒有覺得它「淫穢」；相反，我只有強烈感受到隱藏在一篇篇文章背後的抑壓，以及從字裡行間滲透出來的焦慮、苦悶、不安——總有急不及待想問的問題，想從別人口中聽到的答案，逼切地去闡釋、澄清、介紹與性有關的資訊和知識，渴望透過書寫讓感受和（性）經驗被更多人知道、明白。表面上是探索「情色」，我認為，這五期刊物的「潛文本」才應該是大眾的關心所在：這社會的「大學生」（年輕人）為何享受不到性所帶來的快樂，卻要因得不到想得到的性，備受肉體與精神的折磨？

單從版面設計與視覺安排來看，每期情色版均有著統一風格：如果不是廁所牆壁上的塗鴉，就是被切割的圖片。不要說型男索女的裸露照片欠奉，就是線條簡單的插畫公仔，也大部分是「無性別（器）」，或只有下半身（腳）。上半身不是完全沒有，只是大多數以象徵代替，例如頸部以上不是頭，卻是四方框框內只有一張紅色大嘴。還有戴上「防毒面具」的頭顱，蹲着大便和抽煙的屁股，伸出青蛙似的舌頭的「怪物」，把眼耳口鼻（痛苦地）擠成一團的猩猩……唯一出現「真人」的一次，是在《自慰》一書的書評下有張戴眼鏡的男性照片，相中人低著頭垂著眼，十分切



合旁邊的標題「也沉思」，卻與另一行「既尋樂」相去甚遠：對喝慣香港文化奶汁長大的人來說，整個版面活脫脫就是「書獃子」（電車男）的生活命題與寫照。

看不見的看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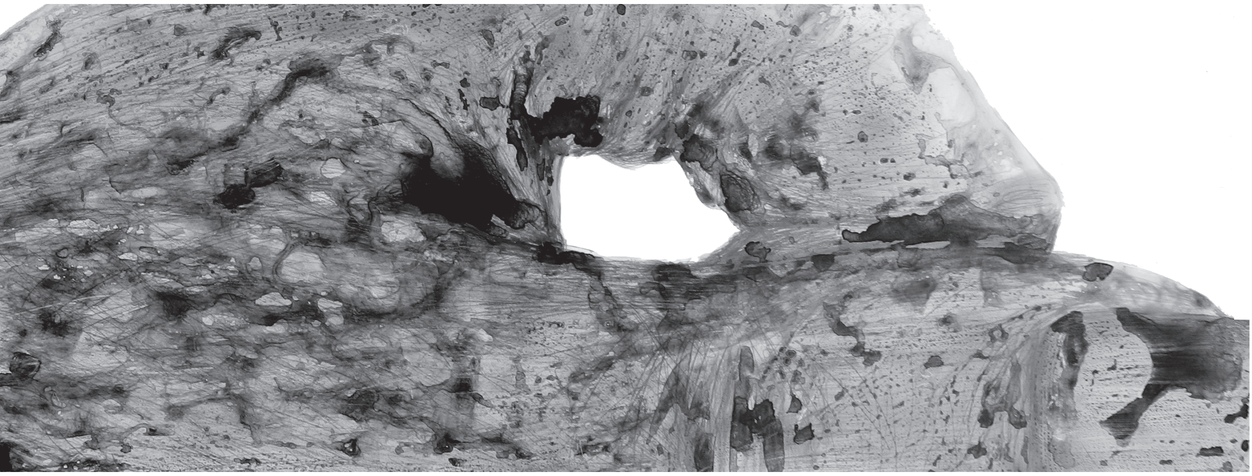
但是輿論似乎沒有興趣閱讀上述圖象，而只是抓住內文的文字不放。各大媒體引用最多的例子是「有否『裝』過阿爸阿媽兄弟姊妹做愛？」、「最想同咩動物造愛？」若你問我，抽取這兩則問題其實是一種「看不見」的「看見」——在總共十條問題的調查問卷內，除了被認為是「嘩眾取寵」的該兩題，其餘八題均是圍繞「做愛是否好悶／好煩」與「怎樣才能挑起（性）幻想」的主題。有此上文下理，「偷窺至親做愛」與「想同咩動物做愛」的出現便不是為了「引人犯罪」，而是有意喚起讀者對性幻想的「幻想」，然而編輯用心良苦（包括聲明「要答詳細啲」），看不過眼者卻斷章取義，一場校園風暴與社會風波便像滔天大浪般翻起。

本來，社會大眾可以藉《中大學生報》情色版的種種內容來關懷「是甚麼令年青人在性面前有這許多挫敗感？」，但是指責和指控的態度明顯更有助大多數人掩飾一些甚麼，於是「感到痛心、可惜」，「怒斥學生無知、教育水平太低」屬於條件反射式的反應鋪天蓋地而至，以至真正的問題才露出頭來旋即被打壓下去。

「性」，從來不是獨立於人格和心理以外的行為。「性」，本來就是反映「我是誰」的鏡子。《中大學生報》情色版之會被部分教育界人士評為「眼高手低」，想必是學生的嚴肅手法被捉錯用神：大家真的以為「性」的意義永遠兩極：淫穢與神聖，所以忽略了情色版的另一層功能：同學藉着書寫與性有關的文字來尋找自己。

看見地看不見

那麼，是甚麼讓二十出頭的年輕人對自己感到迷惑、惶恐？情色版內的文章統統有線索可尋。最鮮明的例子是對女



性在性方面自覺和自主的「自白書」。2007年一、二月號分別有〈滿足〉和〈做／愛總是拉著痛苦一二三四五〉兩篇由女性執筆的文章。不約而同，文中都是女性對於做愛不應只是為了滿足男方的體會。若把兩篇文章的「意義」放在學生報的讀者群來考慮，不難想像確是可以令不知如何與異性就性需要提出要求的同學得到啟發：不論是羞於啟齒還是誤會可以奉旨，〈做／愛總是拉著痛苦一二三四五〉表述了女方有權主動、有權拒絕、有權不為不成功的「性」感到內疚；〈滿足〉則以散文方式道出不美滿的性不一定帶來不滿足的愛，如果性幻想能夠補償現實的缺陷。

若說因有描寫露骨之嫌便等同報章的「風月版」，那真不知道是刻意貶低上述兩篇文章，抑或太抬高了（一般的）「風月版」（雖然「風月版」也出過不少水平極高的情色文學家）——〈做／愛總是拉著痛苦一二三四五〉全文沒有落下一個標點符號，用最老土的比喻，它是「藝術電影」多於三仔四仔。因為內容以外，作者也追求在形式上有創意，甚至詩意（意境）。

隨便用「鼓吹淫穢」來否定自我探索，有可能是由於「看見地看不見」，怪不得會對於他人的痛／苦視而不見。「自己總是想像他是愛他他他或她我在陷害他同時一再令自己痛苦不已直到他又一次說他是多麼的被我吸引着他我才又不相信卻安心起來這是妒忌心或是不信任或者是虐待狂或者以為想存在」——類似矛盾，誰敢說只有該段文字的作者才有？這些矛盾被放在「性」的範疇內呈現——「越做越『乾』（？）因為已做了三次（如何計算？）或者是自己以為不想做突然越『乾』仍插入是痛／痛／我小聲地叫好痛呀他問要停嗎你那麼痛我說痛得很興奮繼續吧」——為何不會是、不能是把作為「女大學生」對於性的愛彼為難的呈現？對於自己身體又熟悉又陌生的感受的誠意分享？

窘態曝了光

我不是說《中大學生報》情色版的每篇文章都是驚世之作。現實沒有那麼誇張——偏偏卻是對現實有著抗拒心理的人愛把平凡不過的事情以誇張的方式放大來逃避現實——逃避那有著無數慾望卻因害怕別人眼光而不得不假裝無求的自己；逃避那因為畏首畏尾而面目逐漸模糊的自己，以至逃避一個城市必須面對的大哉問：是甚麼造成我們對「性」有著如此嚴重的焦慮，而當一群大學生對這現象作出反應，甚至反抗時，便令我們的窘態曝了光？

與其說要他們道歉認錯，為甚麼我們不先反問在議論這件事時，竟會如此missing the whole point？



烽火台事件

前言

校園民主之難——烽火台事件

◆ 陳秉鳳

事隔五年，本部圖書館新翼早已竣工，烽火台亦所謂「回復原貌」。當年的烽火台事件，在此刻回看，仍然相當有紀錄價值，在筆者看來，主要在於異議者勇於直面權力架構，並嘗試以兩種不同方法去實踐反對學校一方的校園民主想像。

先講時點。烽火台是自2006年「齊來保護我們的山城」聯署及保樹立人事件後，另一次備受矚目的校園發展規劃事件，再一次揭露校方先斬後奏（甚至不奏）、獨行獨斷的發展模式。在宏觀社會環境下，中大面對政府展望的高等教育擴張，以及學制三改四的壓力，近十年不斷研究擴展大學校園、增加建築物的可能性；而在大學行政架構之中，劉遵義在2004年上任校長一職後，多番推動好大喜功的政策，包括「國際化」事件、瘋狂增建新書院、院長改行委任制、教務會改組取消學生代表等等，贏得「破壞王」的稱號[1]。劉在任的五年間，惡行不勝枚舉，而烽火台事件，就是他在任最後一年所發生之事，亦是中大校方為應付三三四改制的建築潮的第一波工程。

整個事件歷時不長，由2008年11月中旬媒體報導揭發烽火台將會被清拆及暫時移離該處開始，至翌年二月中大學生會、中大學生報及「烽煙四起聯席」[2]，發表有關圖書館及校園公共設施興建的問卷調查報告為終。

烽火台事件的來龍去脈

事件過程及雙方論點清晰，校方堅稱會一磚一瓦保留烽火台及雕塑《仲門》在一年後重建（見〈圖書館擴建迎四年制烽火台保留不損半分〉）。然而反對清拆烽火台的師生校友，則認為劉遵義在任內多行不義，不能信任；圖書館新翼興建的計劃及過程，亦沒有經過充份諮詢，是黑箱作業的過程。（見〈中大學生會反對拆卸烽火台聲明〉）當時作為圖書館諮詢小組委員之一的李浩暉同學質疑，學生會亦有代表於小組內，不可能在媒體報導後才得知事件，他認為遷移一年為可接受方案，各方應理性討論，不應採取過份激烈行為，同學並應多循制度內渠道發表意見，才是對中大人有利的做法。（見〈中大人，請一起運用理性吧！——就烽火台將被移開一事作補充〉）

朱凱迪於獨立媒體網撰文，寫〈我所知的拆烽火台計劃來龍去脈〉，頗有回應到李同學的論點，包括為何有學生會同學擔任小組委員，仍無法事先得知拆烽火台的安排，校方的詭辯以及似有還無的諮詢（2007年開始進行的校園發展計劃諮詢，並不包括在2012年前需要興建的幾座新大樓，包括圖書館新翼）。所謂的理性討論，在雙方所獲資訊有嚴重差距、掌權一方沒有意願聽取意見的情況下，不可能發生。若反對一方不加強行動力度，根本無法迫使校方正視問題。現行的諮詢架構和模式若然有效，斷不會鬧出如此軒然大波。

略見成果的抗爭，不了了之的校園調查

文初所謂兩種民主實踐的方法，是指事件初期的抗議及後期的校園調查。初時，反對一方採取較為傳統的方法，包括聯署聲明（該聲明在三日內已有3,600人聯署）、在校長見同學會面上質詢校方、舉辦公開論壇、出席校方簡介會要求校方公開資訊，及後亦在畢業禮時，在《仲門》雕塑上，以膠樽設藝術裝置示威。同時中大學生報亦出版特刊進一步討論事件，獨立媒體網及其他主流媒體的跟進報導，亦製造了龐大的輿論壓力，迫使校方作出讓步。2009年2月5日，校方發出聲明宣佈新的建造方案，以「U型」設計避開烽火台，使圖書館地庫工程進行期間，烽火台不需遷移。

在校方宣佈新方案前，反對拆卸烽火台的朋友，做了兩次大規模的校內調查。事後回看，這兩個調查仍甚具意義。兩次合共訪問了超過1,500位同學，嘗試真正聆聽及收集校內不同學生對校園設施的意見。劉遵義曾說如果要做諮詢，到2016年圖書館都不能建成，又說傳統上是不會諮詢，事實上卻是不為也，非不能也。調查結果清楚反映，校方在建設圖書館一事上諮詢完全不合格，大部份同學認為校園設施不必全放在本部，逸夫書院的同學更長年面對沒有圖書館及其他設施不足的問題，這些問題在新書院建成後，只會愈來愈嚴重。（見〈成功保衛烽火台　繼續要求落實逸夫圖書館及公開資料〉及兩個調查報告節錄）

反方嘗試透過校園調查，擴闊議題深度，讓事件不只停留在烽火台的去留問題，更應迫使校方改變現行做法，公開與校園發展有關資訊，並充份諮詢持份者的意見。可惜的是，校方選擇單方面更新方案，避開爭議性最大的烽火台，其實當中的決策也是同樣不民主。然而，對很多人來說，這已是校方一大讓步，亦讓運動迅速冷卻下來。反方並未能把握機會，把問題由單一事件推展至政策倡議，在發佈調查結果後，亦未能以行動跟進要求校方回應調查反映的問題。在烽火台的標誌效果無法繼續使用的情況之下，反方要面對的，其實是那個對民主決策冷漠的校園，魄力之不足，改變眾人的「日常」之困難，使事件雖然取得小勝，但未能收割更大的成果。

念念不忘，必有迴響

整個事件雖留有遺憾，但另一點彌足珍貴的，是烽火台面臨清拆時，不同年代的校友紛紛講述他們對烽火台的記憶，

論証烽火台在中文大學以至香港歷史中的重要位置。它見證了歷代中大人對社會公義的承擔，亦是中大人邁向校園民主以至社會運動的起點——「烽火台」之名，亦是因此而起。（見〈反拆烽火台300人出席論壇——大學輔導長何培斌：「我泥聽意見。」〉及〈烽火台上起烽火〉）

事隔數年，校園內新建築林立，雖然當時能保得烽火台不遷不拆，卻未能改動中大對校園規劃的政策和制度，實在可惜。現在不時也會聽聞新建築的設計和使用規則不合理的消息，但師生的不滿，往往會被以「發展」為名的洪流淹沒。重讀歷史的重要性正正在此，若不夠堅持，無論是日常生活、校園民主或社會公義，都會被當權者操控，我們自當反思，能否讓烽火台的烽火，繼續點燃下去。

1　見2008年12月，中大學生報出版，《破壞王劉遵義特刊》

2　「烽煙四起聯席」為當時反對拆烽火台的核心學生與校友組成的臨時組織，當中亦包括時任學生會幹事及中大學生報編輯。



得悉中大要拆卸烽火台後，同學於范克廉樓外掛上大型直幡。

圖書館擴建迎四年制　烽火台保留不損半分

◆ 程伯中（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

原為當時程伯中寄全中大的公開信

各位校董、校友、同學、同事：

近日有傳言指大學為擴建圖書館，將拆毀中大地標烽火台。我特撰此信向大家解釋，這種說法是完全沒有根據的。校長亦曾在不同場合一再表明，不能對圖書館前的大學廣場有任何改動，烽火台這個見證本校歷史的重要地標，在工程完成後必須原址重置，回復舊觀，一寸都不能少。

在圖書館擴建工程進行期間，大學廣場部分需要封閉一段時間，以利工程進行。廣場是大學舉行畢業禮的場地之一，為免影響典禮舉行，預計廣場會在2009年畢業禮後暫時封閉，為期不超過一年；一俟圖書館擴建工程完成即會重開，大家原來熟悉的事物，如烽火台、惠園、「灌叢圖案」等都會在原址還原，與今天所見無異。

恢復大學四年學制，師生校友們期盼已久。大學圖書館擴建，是為2012年恢復本科四年制作準備的重要項目。因為到時大學將額外增加三千名本科生，現有圖書館將不敷應用，極需擴大。原來的圖書館擴建方案，提議在原圖書館之側興建一座多層的新翼，樓高將超逾田家炳樓。由於這和周遭景物極不協調，還會影響沿林蔭大道延伸之中軸線，對景觀造成無可彌補的破壞，因此遭這項目的專責建設委員會否決。

其後提出的新方案把擴建部分建於地底，與圖書館地庫相連。這個方案雖然在技術上更困難，成本更高，但建設委員會認為更為可取，因為它既能增加圖書館面積，又能保存四周乃至整個校園本部在視覺上和建築物之間的協調一致。

由擴建圖書館地庫方案提出開始，校長就已強調，不能對大學廣場有任何改動，而廣場上包括烽火台在內的結構和建築，必須妥為保存，並在工程完成後原址重置，不改外觀。建設委員會亦向建築顧問公司和有師生代表在內的圖書館使用者小組，說明上述立場。建築顧問公司將會為烽火台和惠園等部件編號標籤，並拍照存檔，以便日後重置。

擴建圖書館的工程有必要及時完成，大

學廣場、烽火台及其代表的中大理念和獨特的歷史，亦一定要原原本本保留給未來的中大人。我衷心希望大家能理解和支持，讓大家在不久將來一方面目睹圖書館完成擴建，服務未來的師生；另一方面看到大家熟悉的烽火台、惠園和「灌叢圖案」，一如往昔佇立校園。

2008年11月20日

烽火台雕塑《門》為二人對打之姿勢



中大學生會反對拆卸烽火台聲明

◆ 中大學生會

烽火台的意義一點也不少，這個地方不僅是一個讓學生流連談天、辦辯論比賽、遊客拍照留念的地方，她的可貴，更在於非物質的象徵性。學制四改三、六四，學生從中大乘車到集會現場，大學社會參與，都由這裡開始；高錕校長任港事顧問、金耀基校長殺系，以至近年的反23條，都在烽火台烙下了印記。這是中大最重要的標記，她培養了每代中大人。

所以烽火台對中大人來說是重要的。今日，校方卻以其黑箱作業的作風、不盡不實的說詞、和毫不顯出迫切性的理由，對我們的烽火台及其廣場動手，將其拆卸。我們對此感到憤怒，並強烈抗議。我們要求校方立即擱置拆卸烽火台的計劃。

中大校方拆卸烽火台的決定，由頭到尾都是黑箱作業。學生、校友甚至教職員，竟然都是在傳媒揭發後才知悉整個計劃。校長更稱「這些工程傳統上不公開諮詢教職員和學生」，並且因為工程已經批出，不準備再作任何諮詢，一意孤行。中大的象徵，竟可在無諮詢持分者的情況下，輕言拆卸。是可忍，孰不可忍？

更有甚者，中大校方一意孤行之餘，說詞卻不盡不實。校方在回答同學的提問時，稱已經諮詢了大學圖書館讀者小組的學生代表，卻遭即時揭穿這次工程根本沒有在該小組諮詢過。如此前言不對後語，說詞不盡不實，他們承諾烽火台將在拆卸一年後原址重置，又如何可以取信於我們中大人？

事實上，要紓解新增學生對圖書館造成的壓力，我們可以有更多的選擇。例如，逸夫書院多年來都爭取建立圖書館；如果只是為了令同學有更多地方學習，可以在中大其他地方加建夜讀室。可見，在烽火台下擴建，根本不是唯一的選擇，甚至不是最好的選擇。

對中大人而言，烽火台不只是一個建築，而是一個屬於我們中大人的空間。我們要守護的，不只是雕塑，不只是地台，更是整個廣場、整個空間、整個屬於我們生活的印記和記憶。烽火台和整個廣場所代表的，其實就是中大之所以

為中大的氣象、之所以為中大的價值。

因此，我們要求校方：

1. 立即擱置拆卸烽火台的計劃
2. 遵守承諾，公開圖書館擴建計劃的所有相關資料，包括會議紀錄及圖則
3. 為擴建圖書館事宜重新諮詢同學及各持分者

發起團體

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www.cusu.hk）

2008年11月20日

2008年畢業禮前，示威同學準備將收集得來的數百膠樽繫於《門》上。



中大人，請一起運用理性吧！
——就烽火台將被移開一事作補充

◆ 李浩暉（政治及行政學系四年級、「圖書館使用者小組」崇基學生代表）

原文為當時他寄往一個中大電郵群組的電郵

本人完全明白為何《蘋果日報》可以為了發行量在11月17日寫出一些如「中大擬拆烽火台學生憤怒」等誤導失實的新聞標題。但筆者十分困惑，作為中大的一份子，為何我們沒有嘗試找出真相，卻是一味地批評？為何我們就完全相信報紙的一面之詞？

雖然，本人與很多關心中大前途的同學和朋友一樣，不大喜歡劉遵義之流，而且他在回答同學的問題時也常常令人誤會。然而，在圖書館擴建這件事中，其實情況並不是如此壞的。

首先要交代一些背景。本人作為「圖書館使用者小組」（Library User Group，LUG）崇基學生代表之一，在半年多前（4月份）的會議上便已經得知大學有關部門希望在2012年三三四學制實行時擴建本部圖書館。（令筆者大惑不解的是，當時中大學生會的代表 Mr. Ng Ming Kei, Stephen 也有出席，為何中大學生會在〈反對拆卸烽火台聲明〉中卻強調「（校方）由頭到尾都是黑箱作業。學生、校友甚至教職員，竟然都是在傳媒揭發後才知悉整個計劃」？）

當時除了本人之外，其他的學生代表也十分關注地下工程對烽火台的影響。不過，那位校方代表 Associate Pro-Vice Chancellor, Professor Michael Hui 強調烽火台附近的廣場除了在施工時間外，將在圖書館擴建後「大部份」保持原貌。「大部份」的原因是由於他希望改造廣場地面，引入更多天然光到將來的地下圖書館。在學生反對改造烽火台令可用空間減少下，他說會再考慮。不過，現在既然劉遵義說了烽火台廣場「保證全部保留，一寸都不會少」，筆者想那無聊的天然光計劃應該已被取消吧。

另外，根據那位校方代表所言，大學擴建圖書館的建築費用是由大學資助委員會（UGC）而來的。而且，大學圖書館館長Dr. Storey也告訴我們，香港政府那些官員認為圖書館只有愈來愈大的份，因此就擴建圖書館一事上表現得十分抗拒，這次的擴建很有可能是中大的最後一次。出於財政原因，很多的書將漸漸由書本變成電子書以節省空間的使用。

那是香港各院校整體的趨勢。

雖然本人很鄙視那些政府官員目光短淺，也不認同圖書館將來漸趨電子化的方向，但是由以上的資料可見，擴建一事，所牽涉的人、制度、錢等等也不少，中大方面為了讓新學制進來的新生也費了不少時間及心思。對於為何最後選擇了在地下擴建，也有其合理性。同學隨便問一句「為甚麼不做另外的決定」很容易，要了解為何如此決定卻是很難的。而且，在校方主動提出保留烽火台原貌的承諾下，我們的同學到底在反對甚麼呢？叫停了工程，對中大將來而言又是否有好處？

對於擴建圖書館是否應該諮詢，那答案是肯定的。實際上，校方也有作一些小圈子的諮詢（圖書館使用者小組為一例）。不過，從劉遵義說「如果諮詢學生便2016年也建不成圖書館」一語可見，他心中認為學生的意見沒有用，學生參與只會礙事云云，那當然不是作為校長的他應有的態度。而且，擴建圖書館一事影響眾多同學使用的烽火台，利用一個小型而且不超過30分鐘的小圈子諮詢便以為充分掌握了同學的意見的話，那不但令人發笑，也讓人認為校方的所謂諮詢只是虛有其表而無實質意義。

不過，作為學生及校友盲目地批評他，沒有提出更廣泛諮詢學生意見的重要性，也是不可取。筆者了解近年劉遵義的行為實在令人難以跟他溝通，不過，學生及校友與校方長期地作街頭式的互相攻擊及不信任，那可不是整個中大之福。現在可見的，不論校方或同學，都是單一非黑即白的抗爭，所缺乏的正是理性討論的空間。我們需要有激進的時候，但也要懂得理性地解決問題。單一地採取這種方式表達訴求，只會令將來的中大人受害。



現在的中大跟四年前的已經很不同。繼「保樹立人」事件及「天星及皇后碼頭」事件之後，各大行政機關對環境保育及保留有共同回憶的建築物皆有所警覺。他們開始了解不考慮這兩種因素的後果是可以很大的。按理而言，行政機關方面不會如以往一般置民意於不顧。不過，信他們的話不如信制度。現在我們需要的，是一套能有效把廣大學生意見帶進行政機關的制度，每當有重大的改變，必須諮詢學生，讓學生的聲音可以被反映。那制度不但要有，而且要廣泛地讓同學知道。另一方面，同學也應盡作為中大人的責任，多為我們的中大出一份意見，讓不同的意見，可以在一個本來很小圈子的諮詢制度中，加入更多的民意代表性。正如現代的代議政制一樣。

老實說，中大有一套制度（完善與否則另作別論）讓中大的同學參與並向校方提供意見。然而，那些諮詢席位卻是常常出缺。如果中大的同學可以更主動地利用那制度監察校方，並向其他同學指出校方的問題，那我們自己學校的消息還需要第三者告訴我們嗎？

就本部圖書館擴建一事上，有很多東西也是可以大家討論的，例如施工期是否真的只有一年？我們如何確保劉遵義遵守承諾，一年之後一切依舊？又例如擴建的圖書館內的設施應該增加甚麼？這些都是值得討論的問題。希望大家不要再作不必要的推測，重新用理性考慮圖書館擴建一事。

時有同學於百萬大道以不同方式表達訴求。



我所知的拆烽火台計劃來龍去脈

◆ 朱凱迪

原刊於《香港獨立媒體網》，2008年11月20日

上星期六，與中文大學校友c同遊大埔墟，臨別前他說收到消息，中文大學校方打算擴建本部大學圖書館，圖書館對開的烽火台將要拆卸，移放別處，待工程完成後重組。

兩日後的星期一，《蘋果日報》率先披露了消息，同日劉遵義繼續弄出其癟三嘴臉說，今次圖書館的擴建上「做唔到公開諮詢」，如果諮詢的話，圖書館就「2016年都做唔到」，而這種事傳統上是不會公開諮詢。他又說，學生代表在圖書館小組會議上亦沒有表示異議。

這篇民間報道主要處理的，是按我有限的資訊，向各位說明拆烽火台事件的由來。至於烽火台的歷史、公共地標的意義和民主規劃程序等議題，相信陸續會有文章述及。

◆◆◆

劉遵義說關於樓宇拆建事宜「傳統上不會公開諮詢」，確是這樣，遠的不說，近的幻彩實驗樓、拆李達三建西部教學大樓、將各圖書館內部改頭換面都沒有公開諮詢。中大員生到2006年初忍無可忍，紛紛響應中大學生會的護山城聯署和之後的保樹立人運動，敲響了民主規劃校園的鐘聲。同年年中，中大宣布乘大學學制三改四之便增加本科生人數三千人，並計劃設立多間新書院，又向學生會幹事會透露將開展校園發展計劃，學生會代表要求加入即將成立的督導委員會，被拒絕，理由是計劃涉及很多中大機密。

2007年秋天，校方向中大員生及公眾高調宣佈，因應學制三改四推出校園發展計劃諮詢。計劃先定下大學擴張的指標，包括將全校建築物樓面面積在十五年內增加三百萬平方呎，大學人口由目前一萬七千人增至三萬人（根據 Aedas Ltd./ Edward Cullinan Architects, UK 在簡報會提供的資料），再由四間指定的建築師樓提出設計方案。當時有中大教授在報刊撰文為校方喝采，肯定校園發展計劃諮詢；我和一些中大員生則認為討論應擴闊至中大未來應有的規模，不能說三萬人就三萬人。

在這一輪諮詢期間，獲邀的建築師已指出中大將有多個計劃於三改四學制實行

前完成的工程，包括拆崇基松竹柏苑起教學樓、酒店、崇基牟路思宜圖書館旁的學生活動中心、西部教學大樓、以及圖書館擴建。中大員生一直有一個印象：既然校方指校園發展計劃是為應付三改四大變而提出，那麼在2007年之後為三改四而興建的項目，都應該納入諮詢和討論的範圍內，而我亦一直持着這樣的理解參與諮詢。

又過了幾個月，中大校園發展計劃督導委員會選了 Aedas Ltd./ Edward Cullinan Architects, UK 的龍騰吐露設計（重點是在科學館以東興建大量教學樓，將百萬大道一直「延伸」至吐露港）。2008年4月，該建築師樓在中大舉行員生參與工作坊，直至那日我們才知道，原來2007年開始的校園發展計劃諮詢是不包括目標於2012年或以前起好的新建設。即是唔使傾也冇得傾。

校友eg9515在工作坊後寫了一篇民間報道，茲引述如下：

「在簡介環節時，顧問公司介紹了2012年前中大已落實及計劃中的建築，並表示此工作坊主要是籌劃2012至2021年的校園規劃。有與會者即時發問，為何校園規劃的計劃不包括2012之前？顧問公司說，從來都是如此。這便奇怪了，由去年9月中大公佈四間顧問公司的設計的簡介會到今年3月的校長會見同學活動這六個月時間裡，校方的高層人員從未說過校園規劃的諮詢不包括2012年之前的計劃。每次校方人員介紹校園規劃時，總是以『2012年我們多了多少多少本科生』為開場白，當師生及校友要求參與時，校方總叫他們待至4月由顧問公司舉行的工作坊及諮詢活動。這不難給予他們合理的期待，能夠參與未來十多年的規劃，而不是參與未來十多年當中某幾年的規劃。

那麼這個『校園發展計劃』（Campus Master Plan）還諮詢甚麼？當大家發現原本校方已計劃好校園西區的綜合教學大樓、鄰近大學站的教學酒店和教學大樓、衛星遙感地面接收站、5所新書院包括2,400個宿位、崇基學院神學樓旁的新聖堂、近火車站的綜合教學大樓、39區的綜合研究實驗室大樓、大學圖書館新翼及崇基圖書館旁的學生文娛中心等建築物，對於校園的擴展及分區已下草圖時，持份者還有甚麼置喙之餘地？當顧問公司在工作坊上向參與者提問『你認為中大缺少甚麼設施？』『你認為甚麼地方最適合興建宿舍？』『中大應新增甚麼教研設施？』等等，參與者確實感到自己的意見很被尊重。但其實校方已規劃好2012年前的所有東西，參與者在工作坊上的討論，永遠都不會進入真正的議程。所謂的諮詢，只是一場極度接近真實的虛擬遊戲，真正的『校園發展計劃』已經在別處進行中。」

eg9515這篇立此存照式報道給我們一個重要參考，簡單說，中大校方在2007年至2008年夏天搞的校園發展計劃大龍鳳諮詢，一切簡介會模型論壇問卷和工作坊，都只是為「別處進行中」的真正的

校園發展計劃做掩護。涉及拆走烽火台的大學圖書館擴建工程正是其中之一，而跟校園發展計劃諮詢的大型和公開相反，這項工程的決策場地是由校董郭炳聯任主席的校園計劃及建設委員會，此會閉門進行，會議紀錄亦不公開，黑箱中的黑箱，而蚊型且毫無權力的「圖書館使用者小組」則是中大學生唯一有機會得聞該計劃的地方——劉遵義現在居然想將不諮詢的責任賴在小組的學生代表頭上。

◆◆◆

劉遵義確實無賴到極點，想以知會「圖書館使用者小組」代替公開資訊和公開諮詢中大員生，想將拆走烽火台的決定賴在「圖書館使用者小組」學生代表頭上。比這個更無賴的是，「圖書館使用者小組」的學生代表自2007年10月起多次在會議上要求校方公開諮詢，只是出席的中大高層當作耳邊風。

證據如下：

據上屆（2007至2008年度）「圖書館使用者小組」新亞學生代表 Tam Wing Yin 提供的三份「圖書館使用者小組」會議紀錄顯示，中大圖書館館長Dr. Colin Storey於2007年6月7日會議的「其他事項時段」內提出圖書館新翼計劃：New Library Building Extension Dr.Storey reported that the UGC had approved an extension of Library Building at the car park area next to the University Library. Although it was a very early stage, he was putting forward the needs of the Library for the new building for University management's consideration.

到了2007年10月5日的會議，中大圖書館館長 Dr. Colin Storey 再報告圖書館新翼事宜：New Library Building Extension Dr. Storey noted that the New Library Building Extension would be finished in 2012 and was now under tendering process. Miss Cheung asked the Building Committee to consult students before making the final decision.　這位要求校園計劃及建設委員會諮詢學生的 Miss Cheung 是中大學生會代表 Miss Cheung Man Wai。

到了2007年12月19日的會議，中大圖書館館長 Dr. Colin Storey 再報告：

New Library Building Extension（Re: LUG20/5/3） Dr. Storey informed members that Mr. David Lim, Director of Campus Development, will join a future LUG meeting to brief members about the planning of the new library building extension. Dr. Storey explained that the planning was still at a very early stage, neither a final design plan nor an architect had been chosen.

Miss Cheung asked whether the University would collect public opinion regarding the design of the new library building extension. Dr. Storey would convey any thoughts regarding the design to the

architect. Miss Cheung 再次詢問校方會否徵詢公眾意見，館長 Dr. Colin Storey對接收意見態度正面，但並沒有答應公開諮詢。

2007年12月19日後，「圖書館使用者小組」的學生代表換屆。我以電話訪問了其中一名學生代表 Stephen。

Stephen表示，他出席了新一屆「圖書館使用者小組」於2008年4月18日舉行的首次會議及2008年10月18日的第二次會議。他表示，由於要上堂，錯過了第一次會議的部分內容，當他進去會議室時，協理副校長許敬文正在透過powerpoint介紹大學圖書館新翼的情況。Stephen表示，關於計劃的詳情「當時是知啲唔知啲」，「講法是有話會拆烽火台」，校方代表（不知道是許敬文還是校園發展處的林泗維）說圖書館新翼包括兩部分，一部分建於大學圖書館右側，「但為了保存景觀，唔會起太高，起四五層就算，剩下的樓面面積（據副校長程伯中表示，總樓面為一萬平方公尺，即約十萬平方尺）就可以放入地底。」校方代表說，該地底新翼將成為 information common，廿四小時開放。至於大學圖書館右側的新翼，地下和地底兩層將有停車位。

我問Stephen會不會同意這次會議只是知會他們，他說有這樣的感覺，也覺得校方「想要一啲意見」。他表示，當日他和其他成員都有詢問許敬文會否有公開諮詢，「佢一直講話會有，但又唔係100%肯定」。

一個月後，「圖書館使用者小組」向Stephen 發出第一次會議 draft minutes，裏面有三點值得留意。一）提到如何處置烽火台：The square might be closed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period, but the outlook of the square should remain the same afte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asement.（Stephen在電話裏向我讀出會議紀錄內容）請讀者留意，這裏用的是might，不是will，即是校方並沒有令小組成員確認烽火台將會（will）被拆走。二）draft minutes 裏並沒有提及小組成員要求公眾諮詢，亦沒有提及許敬文的正面回應。三）由於計劃改變了，項目需要教育資助委員會和立法會財委會再次批准，目標時間是2008年10月。計劃目標於2012年完成。

這份 draft minutes 在2008年10月9日再傳給小組成員，並於10月17日第二次會議上通過。

Stephen說，在第二次會議上，主持會議的中大圖書館館長 Dr. Colin Storey沒有再提出新的詳情，只表示曾經有七個建築公司向大學提出初步設計，當中一家已獲選，並於11月15日與圖書館成員會面。Stephen 再次在會上要求校方就計劃諮詢中大員生，Dr. Colin Storey 回應說會向許敬文反映。據Stephen 說，這些內容都有寫在會議紀錄裡。

簡單總結，劉遵義在2008年11月18日聲稱「學生代表在圖書館小組會議上亦沒有表示異議」，是再一次說謊。學生代表的意見白紙黑字寫在會議紀錄上，只是劉遵義視而不見。還有一點我認為必須糾正劉遵義，他說如果諮詢的話，圖書館就「2016年都做唔到」，這種專制者慣用的口胳，不是顯示其心虛，就是自打嘴巴。中大校方連偉大的、關乎未來十五年發展的「校園發展計劃」諮詢都能如期以一年完成，怎麼就不能讓中大員生討論圖書館新翼的必要性、圖書館空間的運用和分配、圖書館新翼的設計呢？

事情被披露後短短幾天，我便聽到有關圖書館空間分配的幾種意見，包括十萬平方尺的面積應該分配一些給逸夫書院、大學圖書館可以全面更換摺疊式書架以省地方、聯合圖書館的多媒體資料可放上網，恢復藏書功能等。中大近二萬員生每天使用圖書館，肯定能提出非常有建設性的意見，劉遵義一邊侮辱中大員生，一邊扼殺中大員生參與營造更優良空間的機會，只反映了其無能。

這種無賴，不配被稱為校長。



同學製作「膠樽怪獸」。膠樽戲指劉遵義，拆卸烽火台破壞中大。

反拆烽火台300人出席論壇
——大學輔導長何培斌：「我泥聽意見。（我唔會回應）」

◆ eg9515

原刊於《香港獨立媒體網》，2008年11月26日

上星期傳媒踢爆中大校方將會拆卸烽火台，在去週的「校長會見同學」上，師生校友已不斷就此追問。事後學生會與其他員生校友成立保衛烽火台聯席「烽煙四起」，並於今日（25號）舉行論壇，希望校方交代事件，亦讓各中大人公開討論。校方一直未對「烽煙四起」的邀請作回應，並於期間發出兩封公開信。一直拖到昨日，除大學校長以不在港為由缺席外，其餘四位大學副校長均以要在戶內以powerpoint present，在戶外舉行無法present為由拒絕出席。延至今日中午，大學輔導長何培斌又突然應允出席[1]。是日論壇於下午四時至六時舉行，聽足全場的中大人至少有300餘。校方代表何培斌以「來這裡聆聽」為由，對大部份嘉賓及台下的問題置若罔聞。台下數次響起要求劉遵義下台的呼聲，中文大學的高層，是否還認為以公關手段治校便足以蒙混過去？

大學輔導長：「我泥聽意見。」

何培斌首先發言，他說每年出席畢業典禮時感受好深，他說不少重要的事都在烽火台舉行，他說今年他參加了汶川地震燭光集會，他強調大學廣場將「原封不動」，他希望今日能「聽意見」。當然，聽唔聽到及轉唔轉達這兩件事情上都沒有保證。

學生會會長：從未諮詢

次發言為中大學生會會長林嘉嘉。她表示她於11月17日得知事件後，幹事會立即發出一份聲明，至今已有超過2,500名師生校友聯署聲明，而facebook一個由校友自發組成的群組亦有4,700人參加。在圖書館擴建事件上，林嘉嘉指在今年四月圖書館使用者小組會議，副校長許敬文曾以powerpoint present計劃一次，學生代表要求諮詢，許亦予以答應。但本月卻從傳媒處發現當時所說的「初步計劃」已經拍板。林嘉嘉強調該小組並非諮詢機構，校方不可以已經諮詢為辭。她說目前手上沒有足夠資料，暫時只能做到舉行論壇，公開讓中大人參加、發表意見，但卻不能知道校方會否聽、能否影響到校方的決定。

朱凱迪：中大讓一小步食你一大步

第三位嘉賓朱凱迪發言，他說烽火台近年已經好少人使用，但劉遵義上台後機會已經愈來愈多。中大做事作風封



「烽火台不容拆走！」論壇上，校友朱凱迪發言。

閉，不肯給予師生參與的權利。如果董建華是「曲線救港」，劉校長則是「曲線救中大」。朱凱迪提出三點，第一，校方的手段有明顯的規律。最近劉校長的公開信滿有熱情，可是這當中是有一個改變的過程。今日，校方表示建築委員會著手與員生校友會面。但是不過四日前，副校長程伯中只表示「衷心希望大家了解同支持」，沒有表示會安排會面。再兩日之前，劉遵義說「做唔到公開諮詢，如果唔係2016都做唔成。」中大高層的態度隨形勢而善變，從根本上就無法讓大家信服。

第二點是關於烽火台的保留問題，從來不是現在所說的「一磚一瓦」的保留。今年四月圖書館小組上，烽火台下的地庫是打算設有skylight area，即是有透明光射進地底的設計，位置在近行政樓的草叢，與公開信承諾的「與今天所見無異」是有重大的變化。至今校方仍拒絕公開圖則甚至一個powerpoint，這便是黑箱作業的可悲狀態。

他提出關於校園發展的整體問題。他指校方在「濕碎的位置上讓步，在重大事情上則繼續」。濕碎的事情如2006年保樹立人、2007年重新發展應林堂，都是在中大人反對下讓步。在今次事件上，所謂的圖書館新增10,000平方米，應該放於甚麼地方，在聯合、新亞，還是逸夫，這些都是十分正經，都是大家都會關注的問題。更大的問題是學制三改四的問題上，中大人從來都沒有選擇權，結果增加了三千人口成為所有事的前提。中大一眾師生校友，從來對於更重大的問題沒有置喙的餘地。

他建議組成圖書館小組作出研究，究竟校園需要甚麼設施？同學的需求是甚麼？是圖書館還是溫習的空間？又例如可否加強wifi、延長課室開放的時間？這些都能令納稅人的金錢更加得到善用。

陳家洛：烽火台乃中大、香港及中國的民主重要一點

陳家洛教授於1990年畢業於聯合政政系。他在校的1986-1987年間，曾多次就校政民主化、增設民選校董等在烽火台舉行活動，他感嘆於20年後一切依舊。在八十年代中後期，活動轉向香港民主化，包括邀請草委、諮委出席討論如基本法等問題。而八九六四時，烽火台舉行過無數集會、預備會議和論壇。1988年的四改三罷課亦在烽火台進行。他說在這裡他可以感受到中大的命脈精神。他對於校方以室外無法播放powerpoint的理由感到莫名奇妙，笑

言不知校方是無power定無point。他要求大家不要小看烽火台，要好好珍惜，「千祈唔好放棄」。

黃毓民：支持學生

黃毓民是新任中大校董，他說他常來中大出席論壇、high table及傳教等活動，對於這個地方十分喜愛。在1994年亦曾與曾鈺成在烽火台辯論臨時立法會的問題。他說在立法會財委會工務小組上會對於中大的這項工程詳加留意，希望能改善校方的做事手法。

嘉賓發言後進入台下環節。發言者眾多，筆者不怕冗長，盡量採錄，因為每一則發言，都是一份感情。因為輔導長說「聽意見」，所以很多問題他都沒有作出一句回應。

杜校友：詢問校方何時將資料公開、如何進行決策的過程，而往後還有沒有甚麼重要的工程。何培斌指，他明日將與學生領袖見面，下周二及五則舉行「討論及分享會」，「會一直改改到大家都滿意」。台上會長及報社總編輯立即表示未收到邀請，台下一職員高聲表示，剛才「book唔到場，依家book到」，會盡快約。（17:30左右校方發出電郵，邀請「學生領袖」翌日18:30出席會議）

詩都有得吟：「總恨遵義能蔽日，烽火不見使人愁」

一位政政系一年級劉同學將李白的詩句「總為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改為「總恨遵義能蔽日，烽火不見使人愁」。他說將烽火台封閉，是等於封閉了公共討論空間。他表示如果政府於下年度推出廿三條立法，他們是否可以到大學行政樓門口討論？他與一班政政系同學將禮物送予校方，是一個印有「膠遵義務回收計劃」標示的紙箱，他說希望一人一樽，表達對劉遵義的不滿。何培斌接受禮物，連聲「多謝多謝」。

校友莊耀洸質問指，是否有必要在地底興建圖書館？他又指，在教院事件時，劉遵義在研訊中說了17次不記得，令人質疑其誠信。劉遵義又常常以異於常人理解的用語，以今年劉校長新春家書為例，他說「中大一棵樹都不能少」，但原來劉理解為斬一棵種一棵。以烽火台為例，校長說不拆的意思是「拆左起番」。他希望校方能有一個完善的機制，讓員生及校友參與。

一位同學：表示不明白校方為何那麼不願意諮詢。他說個人而言好想con劉遵義。與會者爆起嘩然。

陳家洛說他在浸會大學授課，地方不足。校方開始研究沒有牆的圖書館，即是電子化，這亦是歐盟廿七國目前的工作目標。

畢業十年英文系校友說，畢業多年回到中大的感覺，就像孤魂，面對不少不熟悉的建築物如「七彩樓」她不明白中大「承傳」甚麼，是否就是承傳「不諮詢的傳統」？她強調烽火台及大學廣場一

帶是一個整體的公共空間，不能讓校方再加以破壞，例如在「門」下面加設一個如地鐵的出入口，進入傳說中的圖書館新翼。

政政系一年級女同學指在上星期的文化廣場活動，劉遵義校長在短時間之內，就在圖書電子化及興建圖書館上自相矛盾。她批評校方從保樹立人的事件起，就一直無改善機制。再另一位政政系一年級男同學指，校方不是在校園發展計劃上有諮詢公眾？朱凱迪回應指，中大的校園發展諮詢是一場假諮詢，「昆你」。在2007年時，校方說會一起諮詢，大家都期待可以參與由2007起開始的計劃，誰知參與後才發現，校方只讓你就2012至2021年的校園發展規劃提供意見。

逸夫同學：我地要圖書館！

政政系同學拿破崙帶備橫額到場，他說逸夫沒有圖書館，同學都沒有地方讀書溫下書，他將橫額放於台前抗議。

員工總會吳曉真指，大家實在很難再相信劉遵義，例如烽火台石磚在兩年前已經全部更換。原李達三樓的校園西教學大樓，亦於原圖則作出不少修改，亦將原本的「景禧園」拆走。

周校友：劉遵義要閹割中大

1975年畢業的周校友發言，他畢業已33年。他說遵義會議具有劃時代意義，中大遵義時代一樣。劉遵義上任後，不斷破壞美麗的環境。他對於今日同學的表現十分感動，見到同學的自由思辯與獨立思考，這正是大學所希望培養的人。周校友說，劉遵義根本是打算在精神上閹割中大，就如新書院及教學語言事件。他將書院權力收歸中央，又將主要教學語言淡化，現在更要將中大的「祠堂」拆毀。他要求這位騎呢校長落台，參與者鼓掌呼應。1979年畢業的繆熾宏校友指，劉遵義的任期至2010年6月底結束，大家不應該再讓他續任，以保護中大的人文精神。

李維怡：請堅守中大的反抗精神

李維怡校友從「門」說起中大的反抗精神。她說烽火台上的雕像是台灣藝術家朱銘的太極系列作品之一，名叫「門」，是兩個人在打交。「門」座落大學正門及百萬大道中間，意為知行合一。「太極」是相反的東西互相融合，衝突與和諧本來是同一件事，以位置來說，「門」的二人對招，卻開出了通往知識大門（雕像正後方圖書館）的空間，正好說明，衝突與和諧，是一個互動的循環，歷史也因而發展。可惜號稱以中國研究見長的中大的校方高層卻好像不懂得似的。李維怡說，「門」所象徵的反抗精神也是中大的傳統，就近年的例子而言，中大是第一間能成功成立基層關注組的院校，中大的同學不單止爭取上層民主，亦關心最弱勢的社群如校內的勞工。中大泳池旁的小賣店，亦是校內老師同學向學校爭取的成果，以同基層群體一起實驗另類經濟，這是中大的創舉。近年各民間團

體在尋求支持及聯署時，如果要找院校一定會找中大學生會，他們對於其他大學學生會沒有信心，不肯定他們會簽、會聽。在情色版事件上，中大學生報亦能引起社會討論。她經常要到不同的院校，對於其他院校的學生報，她以失望、可惜形容，內容都是十分溫柔、吃喝玩樂，只有中大學生報堅持討論社會事務、硬淨。她說中大其中一個傳統就是夠膽去討論當權者或他其大部份人不認同的事，她呼籲同學師生持守這種反抗傳統。

四年級同學發言，指何培斌作為建築系教授，應該在制度中發聲，而不是沉默、不作回應，有失學者風範。他又要求作為校董的黃毓民跟進。另一位校友小西表示，本身認同感唔多，但多謝劉遵義，每年均提醒他中大有難。小西說，中大建築一向是鼓勵人與地發生關係，而非近年的盲目擴建。

一位同學上台，要求大家靜一靜，感受烽火台的環境，他說這是重要的言論空間及公共空間，高問與會者「保護呢度好唔好？」台下以「好」回應。

在論壇結束前，會長提出三個要求，包括擱置目前的工程、交出所有文件及舉行完全無前設的諮詢，限期為本星期前。幹事會列印出聯署名單，將之貼於大學行政樓，讓沒有出席的劉遵義仔細看看。

小結

如上文所言，校方面對強大的壓力，仍然一心以公關手段、政治化妝應對。校方先以明日26日約見「學生領袖」，包括中大學生會三莊及四間書院的學生會，抱著的無非是收買「高等華人買辦」的殖民管治殘風。下星期二及五舉行的所謂「諮詢」，更安上了「分享會」的名目，地點為可以播放powerpoint的蒙民偉樓。下周已是考試週，能知道的同學有多少？「分享」完之後校方會聽到多少，大家都知道——這不過又是另一場偽諮詢的鬧劇。各位姑且靜待校方於本星期五，會否對學生會的要求作出回覆，或是一意孤行，堅持將圖書館新翼上馬。

1 其他獲邀但未出席的嘉賓包括中大校董陳克勤、中大校董張宇人、立法會議員梁美芬

論壇有三百人出席，討論一直至晚上仍未結束。





站在豐厚歷史的前端

◆ 陳秉鳳

原刊於《守衛烽火台特刊》，2008年12月

直正進入報社接近一年，可是在這段時間，一直都沒有好好去讀一次中大的歷史。應該是說，選中大的時候，除了喜歡學系親切的氛圍，就是喜歡中大的樹，還有讓人走到氣喘的斜路。一直想督促自己起碼要把《中大四十年》讀完一次，每次一翻開《中大四十年》都近乎驚慌失措，到底是怎樣的心力才能編得完這上下冊兩本書。面對著一天天要過的日子，有時候覺得歷史對我來說是太遙遠而沒有實際幫助。

這次的烽火台事件卻有令我經歷了一次歷史的感覺，在各報章上不同年份畢業，現在正就職不同行業的人都透過論壇版或副刊專欄等去重寫自己對烽火台的記憶或是他們心中烽火台的意義，有些重申烽火台不只是一個台、一道門；有些或會批評學生的做法過於激烈，心繫中大這片山頭的人比想像中多。或許這和以前會在烽火台出現的思辯大會同屬一類。

在保護烽火台的同時必須先知道這個地方的過去，除了已經發黃的學生報以外，還有活生生的人，念茲在茲提著他們經歷過的事，反四改三、與各屆校長周旋、聲援國內民運人士，七幾年畢業的校友拿著咪講述自己的經歷，更重要的是他們不是抱著「當年也曾激情過」的緬懷心態隔岸觀火，而是一次一次在大小事務上挺身而出指責走錯方向的校方，亦有校友在烽火台論壇上重提大學的理念及大學生應有的人文關懷，他們的在場及支援正正是告訴校方和同學「大學生應該關心社會」不是陳腔濫調，而是一股必須得到承繼和壯大的力量，而烽火台就是地面上一個實體的象徵，在必要時聚集力量。

假若校方和我們對烽火台和大學教育的理解沒有如此大的落差，就會在動我們的烽火台前先問我們，而不是讓一班對於大學教育有著如此熱誠的人成為無主孤魂。論壇上有位同學說得好，假若再來一次廿三條立法，我們要去哪裡聚集和討論？冬日晝短，員工總會代表來到發言時天已黑齊，我們卻看不見同樣應該已經下班的校長們像她一樣趕來。校方時常推說，工程進行時間長，三年大學都未必能見到一座建築物由開始到建成，但他們似乎忘記了很多雙眼睛隨



時在看著大學到底想要培育些甚麼樣的人。我時時在想，假若做校長的主要工作是關心學生的成長並時時緊記辦中文大學時的原意，那麼更多當日在場的校友，比劉遵義更適合做一校之長。

作為中文大學民選學生代表的一員，我慢慢才發現歷史賦與這個職位多重的意義，身邊包圍著多少高大的身軀。校方多次用行政手段或多或少磨滅中大人應有的特質，把傳統化成宣傳單張上一兩句的口號，而不去正視提出理據要求改變的中大人，讓大學慢慢成為一座充滿各式各樣新派建築物的死城。面對著本不該對立的雙方，憤怒和感動同時存在，抗爭不會停止，希望校方立即改變所謂「傳統」的黑箱作業，展開溝通，重新思考甚麼才是中文大學的真正需要。

烽火歷史小輯

原刊於《守衛烽火台特刊》，2008年12月
本書編輯稍作增修。

1978年2月	2,600多名師生於百萬大道及煲底參與「師生團結反對中大四改三」群眾大會
1981年3月	千多人參與爭取醫學院六年制集會
1986年10月	諮委政制模式評議座談會於烽火台進行
1987年1月	同學自發舉辦集會，表達對1987年1月內「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之不滿
1987年3月	記協主席黃國華及立法會議員黃宏發出席公安法論壇，300多人出席
1987年12月3日	「門」開幕
1988年2月	「從港大女性事件看傳媒的處理手法」論壇
1989年5月4日	八九民運爆發初期、五四運動七十周年，中大同學於烽火台集合出發示威
1989年5月28日	全球百萬人遊行，中大於烽火台聚集了數百人出發
1990年3月	「千瘡百孔——剖析中大醫療問題」討論會
1992年3月	「第N宗事件」交代會
1992年3月	同學公開討論鄧醫生的醫德、醫術和校方報告書
1993年	中大開放日，大學四改三，校方唱好不唱衰，同學於高錕致詞時拉橫額走進台前，並以揚聲器高叫口號示威
1993年3月	高錕出任港事顧問，學生會表示強烈反對，校長公開交待會有近千名同學出席

1993年8月	為抗議中國工運朋友韓東方被拒入境，學生會於藝墟發起簽名運動，拉橫額叫口號並收集簽名
1994年11月	烽火台上擺龍門陣，嘉賓黃毓民、李鵬飛、曾鈺成、李柱銘於台上大談政治人物應具之操守
1995年	第三屆亞洲民眾戲劇節，同學於師資會抗議校方沒收小報，抬著「言論自由棺材」、身穿喪服遊行示威，並在行政樓前停棺、撒紙錢及宣讀祭文
1997年	國殤之柱擺放於烽火台上
1999年	六四十周年，一眾中大學生、校友、教職員等於烽火台、百萬大道參與「六四．今天．我們」燭光晚會
2003年	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出席有關《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的論壇，有同學為她送上「精忠報國」的錦旗
2003年	2003年底大學削資，中大提出減薪方案，基層員工減薪的幅度比較高級的員工高，員工集合力量反對「肥上瘦下」，數百員工於烽火台集會
2007年5月	中大學生報情色版事件「爆發」後數天，學生報隨即於烽火台舉辦論壇，校方並沒有代表應邀出席，而在論壇中途，校方發出警告信予當屆編輯
2012年9月	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發動的「大專生領頭罷課要求撤回國教科」集會，超過8,000名大專生、老師及市民參加，要求政府撤回國民教育科

烽火台上起烽火（節錄）

◆ 鄭依依

原刊於《明報》，2008年11月22日

原文編按：中文大學學生會發出之反對拆遷烽火台聲明一天內蒐集得逾千師生校友及社會人士的簽署，3天內更有逾3,600人加入「反對拆毀中大烽火台」網上facebook群組。中大副校長程伯中在公開信說「烽火台工程完成後原址重置」，即使千金之諾，拆遷仍是拆遷。

不少具影響力的社會人士均「出身」自烽火台，且聽他們有何話說。

盧思騁：非常離譜

1995年於中大畢業於政治與行政系，現為綠色和平項目總監的盧思騁，以「非常離譜」形容中大校方指要騰出空間擴建大學圖書館，擬拆遷烽火台，這個他曾反對黑箱遴選校長李國章、高錕被委任港事顧問等事件的戰場：「1993或1994年中大開放日，我們曾在這裏同場抗議。當時大學剛四改三不久，開放日作為宣傳，只唱好不唱衰，掩埋內部問題不作討論，我們於是反對這種虛假的中大形象。」盧思騁並曾在烽火台播放性別議題或同志電影。這裏是「學生參與校園民主的起點，是鍛煉學生的木人巷，社會運動分子舉行成人禮的地方」。

陳健民：象徵「艱苦奮進」

現為中大社會學系副教授陳健民難忘80年代這個黃昏，落日景色，烽火台上，大學圖書館門下，群燕飛舞。

當時，大學定議決將醫學院六年改五年，學生認為是大學校制四改三前奏曲，群起反對，罷課聚集烽火台。見校長馬臨開完教務會議出來，卻不理會示威的學生，學生進一步失望，將校長逼回烽火台對質。

「當晚，我與吳志森、黃洪即回宿舍，起草抗議書，質問校長罔顧學生意見。」他還記得當年有學生在烽火台對着聯合書院的斜坡上掛着巨型校徽，當確知大學改制的消息，即為校徽披以黑紗。

「我從來不曾喜歡讀書，自從進了中大之後。」因為1978年中大曾堅拒四改三，校園獨特精神使就讀社會學系的陳健民，深感與填鴨式中學教育大有不同，至1983年畢業，都積極於學運，並出任第十一屆學生會幹事，如今又回校任教。近年中大校園大興土木，但讓他牽繫的仍是本部、新亞書院早年簡約的

清水建築，唯其象徵他與校友心中中大的艱苦奮進精神。

吳志森：由烽火台至烽煙節目

「若大學時期不曾在烽火台上講過話，我覺得簡直不像大學生。」1982年畢業於生物系的港台烽煙節目主持吳志森，當年醫學院改制事件發生時，是新亞書院學生會幹事，當烽火台對外的斜坡上巨型校徽蓋上黑紗，象徵中大精神死亡時，他倒已領略為不義發聲的道理。

畢業後任職記者，仍經常回圖書館查資料，黃昏日落，帶着一身倦意步出圖書館，坐在烽火台望群燕回巢的奇觀，這成了他學運以外難忘的悠閒一幕。

鄧小樺：校方觸犯禁忌

對於烽火台與其上的雕塑《門》，文化人鄧小樺先來一番文化的講解：校園傳說穿過《門》者不可畢業，是中大學生的忌諱，如今校方擬或搬遷，鄧小樺笑稱為「觸犯禁忌」。

「《門》的原意是兩人正在對打，我將之詮釋為學術的切磋、砥礪。而事實上，烽火台亦是聚眾針鋒相對、透過辯論磨練大學生尖銳批判力的地方。」她印象最深刻的一幕，是1997、1998年時任《中大學生報》編委，李國章定期在烽火台與同學會面。「有次，他原一直以官僚的答腔暢順地應付學生，直到有學生問及他就職典禮時被喝倒彩，他即時掩飾不住怒氣而發作。」2001年畢業於中文系的鄧小樺，記得當年校園氣氛因政治問題，乏人上莊，但此役仍是大學生挑戰權威的有力明證，至今深刻記憶此珍貴的回憶。

梁文道：葛蘭硬撼葛蘭西

常舉行激烈辯論的烽火台，對文化人梁文道而言，是溫情的。

1994年哲學系畢業之前，梁文道有段日子常到大學圖書館讀書，至晚上閉館方打道回宿舍，這時他都會遇上他那流浪的好友——大狗小黑。小黑常在百萬大道遊蕩，夏日白天的晌午便跳到圖書館旁的羅馬噴泉游游水。梁文道從圖書館出來後會跟小黑在烽火台上作個伴，坐坐片刻，小黑在乘涼，梁文道則抽抽煙，直到夜幕低垂時小黑才送梁走一段歸家的路程。

而作為許多學生組織上莊前舉行諮詢儀式的地點，嚴肅的烽火台，在梁文道來說又帶有頑皮的顛覆。

「那時我們很看不起搞學生運動的同學，覺得他們不學無術，無理論基礎點搞運動呀？於是想組莊競選學生會。當時學術界流行葛蘭西（共產主義思想家），我們則打算在烽火台搞葛蘭（50、60年代華語片女星）研討會，當時老鬼知道恐懼得很，走來問我們到底想幹甚麼。我們本來競選的意圖只有一個，便是一上莊便解散學生會。不過玩嘢的學生哪有甚麼耐性？學生會成員要跨學院跨系別，太麻煩了，最終當然組莊不成。」

莊耀洸：六四師生曾同心

律師莊耀洸1991年畢業於中大政治與行政系，曾擔任第19屆中大學生會外務副會長，曾爬梳整理香港學運歷史成書，烽火台上的經歷，年月日記憶清晰，特別1989年北京民運裏中大學生的參與。

「先是5月4日，那是五四運動70周年，當時北京已有學生衝出校園示威，中大亦有學生在京聲援；在港學生則同步在早上8時半從烽火台出發，無綫電視還用直升機跟蹤報道。那時正值考試期間，在中大出發時有50多人，但考完試後陸續有學生加入，經過大埔、花墟，浸會、城市、理工學生漸漸加入，到中環時已有學生3,000、市民2,000多人。」「5月20日晚，趙紫陽慰問學生後，廣場上的絕食變作靜坐，但除即李鵬宣佈戒嚴。當晚我們在宿舍召集同學去示威，在烽火台上我問是否要寫出綱領，當時仍未有一半人要求李鵬下台。那時正掛三號風球，學校已放暑假，只有高年級的留校。我們400多人從大埔道出發，其中有不少內地學生，許多的士義載，去到新華社已經凌晨4時，日間還轉掛八號風球。」「28日全球百萬人遊行，中大學生亦在烽火台聚集了數百人出發。」這是中大師生校友極其同心的一年。莊耀洸又記得，1993年，學生會在烽火台舉行論壇，送校長高錕紙造傳聲筒，諷其出任港事顧問，充當政權傳聲筒。「此後，校方高層與學生愈不信任了。」莊耀洸低聲說。

周思中：同學們的填充

香港獨立媒體（inmediahk.net）編輯周思中2002年畢業於政政系，笑說在校的幾年風平浪靜，對於烽火台的最深刻記憶，倒是離校之後的《中大學生報》情色版論壇。

「烽火台好似隻會將人攬過嚟的手，一個鼓勵聚集的地方。本部的佈局的原意應是寄寓並成就師生交流切磋，因而往後的任何改動不能單純基於學生人數、圖書館面積的計量，而是要與中大的傳統對話。中大建校總設計師司徒惠在中大藍圖所指的交流切磋，歷屆中大同學以學運和社運的方式填充、演繹了他的期許——雖然，誰又知道司徒惠心目中的交流是否如此？但這不正是有趣的地方嗎？」

所以，既然有此政治功能的自行填充，也能預想到政治功能以外的演繹：「這裏人來人往，同學、師生可以彼此接觸、溝通，即使不是搞學運的學生，平日夜晚也可能在這裏發癲、玩，並不只是有它政治的功能，也有non-functional的意義。」

致劉校長的話：
明月清風本無事——談朱銘的《門》及其他

◆ 梁寶山

原刊於《明報》，2008年11月21日

回覆友人問候，我道很好，就是盡量不去展覽、不寫藝評、不談藝術，生活就過得愜意。因為前衛易得，安靜難求。可惜的是就連好端端的舊作，在這城還是無法立錐。我說的當然是香港中文大學校園裏，朱銘的《門》。何況在城市的喧鬧之間，到底是煞有介事的作品，還是無聲勝有聲的藝術才更前衛？

唯有借舊憶舊，在此與大家分享早前到台北金山鄉朱銘美術館的回憶。

半個素人藝術家朱銘，原名朱川泰，1938年還是日治時代，生於苗栗通宵。通宵是個臨海的小鎮、朱家家境清貧，朱川泰是家裏第十一個孩子，只能念到國小畢業。與藝術搭上緣分，是因為15歲那年鎮上的慈惠宮翻新，便跟隨當地的雕刻師李金川學藝。只有國小程度的朱銘，可以說是半個素人藝術家，後來竟能在國立藝術學院教學，與同樣是木匠出身的齊白石一樣傳奇。廟飾雖是民俗工藝，但要成為出色的工匠也殊不容易。除了雕工，李金川還著朱川泰學繪圖，為日後的藝術發展打好基礎。朱川泰20歲出師自立門戶，在北部鄉鎮開設木雕工廠，本來一帆風順，惜1960年代初不善經營而結業。正因為這個打擊，朱川泰才立志不做生意工藝人，而轉向更高層次的藝術探索。觀乎這個階段的嘗試，仍以小件居多，例如曾參與全省美展的佳作《玩沙的女孩》，工藝精湛準繩，寫實能力極強，雖不脫匠氣，然女孩低頭、不着艷色的造型，別具文藝味道。而這名低頭的女孩，正是新婚妻子陳富美女士。

朱川泰的人生轉捩點，在1968年拜學院出身、比他年長12年的楊英風（1926-1997）為師。楊英風先後求學於日本東京美術學校（現國立東京藝術大學）、北平輔仁大學美術系、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藝術系等，又曾遊學意大利，以其線條流暢、造型抽象的中國傳統文化主題不鏽鋼雕塑最為著名。楊氏與香港藝壇亦甚有淵源（作品曾於1962年現代文學美術協會的國際藝術沙龍中獲獎，多次來港展出，現灣仔瑞安中心大堂亦擺放了其作品《一帆風順》）。

朱川泰投師門下，除了得名「朱銘」以外，最重要的得着就是「丟」——拋

棄學成所得。這對身懷絕技的雕刻師來說，是很大的心理挑戰。經過8年時間，朱銘又再「出師」。1976年，在歷史博物館舉行個展，趕上了鄉土文藝大潮（同期成名的還有素人藝術家洪通），結果一鳴驚人。例如以牛和牽牛人為題的《同心協力》，拋棄精雕細琢，轉以大刀闊斧來表現牛車動勢，粗獷的線條配合不修邊幅的斧鑿痕迹，為立體造型增添素描效果，質樸之餘又喻意深長。參觀當日，導賞員還特意解析這件作品的創作動機——鄉間以牛車載貨，然牛主人不但不體恤牛隻之苦，往往還重加鞭策，皮開肉爛之餘，牛隻不勝負荷之慘，把屎便也迫出來。不忍之情，朱銘於是強調人與牛協力同心。

70年代台灣的鄉土之風，吹不到急促城市化的香港（當然還因為張頌仁還未代理朱銘作品）。朱銘最為香港人所熟悉的，正是這次漩渦中心的《太極》系列，而放於中大的《門》為最注目之作。基本的雕塑常識：雕是去除物料部分以得成造型的減法；塑是加添、模塑物料以得成造型的加法，木雕塑基本上就是以減法操作，不同於可以反覆修改的泥塑，創作必須即時得心應手。甚至可以說，木雕予人的原始感，一半源自作者施之於木頭上的力量，一半則來自於木頭本身的實在感。觀乎我知道的木刻雕塑家，張義、王克平、唐景森，甚至仍時有鑿木的張氏徒弟何兆基、林嵐；唐氏徒弟馮力仁，都有寧拙勿巧、順其自然的共通點。而從年初逝世的唐景森、今年72歲的張義，甚至我鄉居劈柴阿婆的身上，都能見到那種強韌的生命力，是日夕與木頭為伍的功夫。朱銘四十上下，為了應付雕刻的體力需要，便遵楊英風吩咐學習太極。太極順理成章成為創作題材，朱銘亦從鄉土進入更深遠的文化傳統，並走向國際。

大象無形

鄉土系列中的斧鑿刀痕，在《太極》系列（原名「功夫」）更顯出神入化，抽象與物質的緊密結合，活脫脫就是一幅立體寫意畫。太極講求內在動勢，尚意不尚形。從看得見的套路到難以辨認的動勢，朱銘刀下的《太極》逐漸化繁為簡，他的說法是：「不單是刻這一招或那一招，而是走到這一招到下一招之間的演變。」（這與關良的戲曲人物不取亮相一刻而取動勢異曲同工）

我第一次遇上《太極》，其實不在中大而在演藝學院，當時只覺得那些放在台座上的人仔「好型」。其後在中大6年，每日與它擦身而過；埋身深究，可能不到5次——然而，這不正正就是它的好處嗎——門之為門，在其虛空。它就是靜靜地待在那兒，龐大的身形（monumental scale），大到你沒有為意它是一件作品，而更像自然的一部分。它維繫起整個空間，見證着學子走向上天下地、走向知識、走向世界，是圖書館與百萬大道的中介，亦即知行合一的中介。驟眼看來的木色雕塑，其實脫胎自寶麗龍（即發泡膠），經翻模鑄銅，以擺脫材質限制。

所以作品遠則與山色相襯、近則可膠粒質感。二人對打，正前右方的一人蹬腳，背後看來剛成「人」字形；左方對手以雲手擋開，二人手腳之間僅有一線之差。錯折的刀痕加強動勢與速度，千鈞一髮，對打變成是此消彼長的能量流動。立在中大的這件《門》，並不是整個系列中最抽象的作品。在朱銘美術館「太極園」草坪上的《太極拱門》，有如中大這一件的快鏡重溫，肢體已不可辨，二人已連成一體。在日照之下，陰陽分明地點綴着整個山頭，它要刻劃的，已不是區區的銅、木或者寶麗龍，而是天地之間的虛空。

在朱銘開展《太極》系列的同時，亦在探索另一組主題──《人間》。雖然都以雕鑿為主，但人間系列卻色彩繽紛，着重表現個體意態，組合起來，還滿有故事性。例如《人間》園區中央的《傘》，十多個西裝友在雨中行行企企，神態各異。園區佈置，每一角都顯出藝術家的精心規劃，每一件作品都被安放在最合適的地方，許些還透露着老人家靜看眾生的幽默感。例如安放在本館門外的《排隊》，是一列風雨不改的遊客，指手劃腳、探頭張望；還有放在魚池中央的白天鵝、樹上的假文雀。

2006年曾在時代廣場展出的最新人間系列，以肯肯舞娘為主題，對比起之前的《太極》系列雖顯艷俗，惟令我想起張義說過的一句話：「唔鹹濕唔係藝術家。」如果性是推動生命循環的原始本能，七十歲老爺爺的返老還童，情有可原。

藝術景點因加得減

我的中大時代見證着吐露港大幅填海，山明水秀雖然不再，惟是一草一木、一椅一桌、能打開的窗戶、可拾級而上的班房，仍舊實用簡樸。其後增添的許些藝術景點，不是閃閃生輝、迫入眼簾，就是與校院生活各不相干。最無厘頭的要數新亞孔子像，創校先賢錢穆先生、唐君毅先生不見蹤影，卻捨近取遠地招來先秦鬼影，在水塔下畫蛇添足。唯一能發揮中大地理優點的只有天人合一池，既容人靜默沉思、山盟海誓，也成為留影景點，好讓學子各奔前程之後回顧憑欄。說也奇怪，中大草創，開山植林，種的是台灣相思；見證學生運動風起雲湧的也是台灣藝術家的作品。明月清風本無事，我們的政協、于右任的外孫校長又何來拿石頭砸自己腳趾？

成功保衛烽火台
繼續要求落實逸夫圖書館及公開資料

中大學生會、中大學生報、「烽煙四起」聯席

原文為三組織寄予中大全體學生之電郵

去年十一月，有報章揭發中大校方私下決定於烽火台地底興建圖書館新翼，計劃把烽火台及雕塑臨時拆走。事件引來中大員生及校友群起反對，二千多人聯署幹事會的「保衛烽火台」聲明，學生報亦透過出版特刊及製作展板，協助中大各持份者了解來龍去脈。校方抵不住中大員生的強大壓力，不斷改變立場，直至日前提出圖書館新翼地庫採取「U形設計」，避免拆卸烽火台。雖然校方在聲明中仍試圖以公關修辭掩飾其決策的疏漏，但中大員生都清楚明白，所有的讓步都是我們齊心爭取回來的。

烽火台不動分毫，只是中大員生成功爭取到的第一步，更根本的問題尚待解決。校方在策劃興建圖書館新翼的事情上，既不專業，又不民主。中大因三改四而獲教育資助委員會增撥約六萬平方呎圖書館樓面，差不多是目前整個圖書館系統樓面面積總和的三分一。面對這樣的大變動，中大校方多年來都沒有把握機會為各圖書館的分工進行堅實的規劃研究，與校內的知識群體共同籌劃未來應走的方向，更沒有就新圖書館樓面的分配全面徵詢中大員生，卻倉卒地決定將六萬平方呎樓面全部用來興建大學本部圖書館新翼。

問卷調查：

支持更加平均地分配圖書館面積

為了彌補校方獨斷的缺漏，「烽煙四起」聯席先後做了兩次問卷調查，了解同學的想法。第一個調查於去年十二月在逸夫書院進行，結果顯示，超過百分之九十三的逸夫同學認為，中大校方應將部分新圖書館樓面用於興建逸夫圖書館，以紓緩多年來逸夫書院學習設施嚴重不足的問題。至於在農曆新年前完成的全校調查則訪問了約一千名各書院的同學，當中約百分之七十四支持逸夫同學的要求，不少同學亦認為，將新增圖書館樓面全部置於本部並非最好的選擇。兩次問卷表達的信息非常清楚——中大同學並不認同校方閉門造車的決定。如果大家有權選擇，大家會希望新增圖書館樓面以更平均的方式分配，包括詳加考慮逸夫建圖書館——在目前的校園規劃中，逸夫在2021年前，都沒有圖書館的設施——政府因三改四增撥資源，無疑是逸夫的最後機會。

望校方正視同學的想法

「U形設計」的提出，說明校方完全有能力回應中大員生的要求。我們希望校方本着開放的態度，首先停止在烽火台進行的勘探工程，並正視同學對新圖書館樓面分配的想法。「烽煙四起」聯席各成員相信，本著更嚴格的研究和更民主的程序規劃出來的新圖書館系統，將會更符合中大的長遠發展，也會更受各中大員生和校友歡迎。

中大學生會
中大學生報
烽煙四起聯席
2009年2月17日

反拆烽火台同學於百萬大道設展板，貼上聲明、報導、烽火台歷史等資料，讓更多師生校友知道。



93%支持建逸夫圖書館
——逸夫同學設施需求調查報告（節錄）

◆ 中大學生報、「烽煙四起」聯席

原刊於《中大學生報》，2009年1月號

調查方法：

由同學及校友組成的調查工作隊，於平日晚上到宿舍進行面對面的問卷調查，對象為逸夫書院的同學。成功取得回覆的問卷數量共有649份。

摘要：

86%的同學認為逸夫在圖書館設施方面是不足夠的

同學亦普遍認為自修室、健身設施及課室設施不足

半數同學認為宿舍設施不足[1]

超過60%的同學不知道將來逸夫加上兩間新書院後會共有5,000人口

96%同學贊成校方應增撥資源予逸夫書院

74%同學不知道根據目前的規劃建議，在2021年前逸夫都不會有圖書館

80%同學不知道校方獲政府批得的圖書館用地可以分配在逸夫書院

93%同學贊成將部份批得樓面分配予逸夫興建圖書館

63%的同學認為可在逸夫設社區圖書館，25%認為可設專科圖書館

---

1 現有資源及設施不足：問卷中的問題一及二，均反映到同學普遍認為書院設施不足。在宿舍方面，國楙樓宿舍雖然剛於過去一年完成裝修，惟滿意度仍只有約一半。有逸夫同學反映如電腦室設施經常故障、國宿的電腦室與自修室合而為一等問題。書院方面，同學認為應設有圖書館，亦應增加課室、自修室等。部份同學亦認為需增加校巴服務。

唔係咩都要質礨係本部
——中大圖書館擴建計劃問卷調查報告（節錄）

◆ 中大學生報、「烽煙四起」聯席

原刊於《中大學生報》，2009年2月號

調查方法：

由同學及校友組成的調查工作隊，於平日中午在本部附近進行問卷調查，對象為中大圖書館的所有使用者。成功問卷數量為955份，拒絕個案227個。

結果分析：中大同學撐逸夫圖書館！

十二月的調查中，我們訪問了三百幾位逸夫宿生，他們的意見說明了逸夫同學要求興建圖書館，而且是要求現在有，不是二十年後有。今次我們放眼中大，請全中大的同學來為逸夫同學的要求評評理，答案是令人鼓舞的：74%的中大同學支持逸夫圖書館的想法。這不單證明中大同學並非獨善其身的自私鬼，更能令大家確認：逸夫興建圖書館的要求情理兼備，三改四是絕無僅有的契機。

不一定要在本部：平均分配的規劃想像

其實逸夫圖書館只是其中一個相當有民意支持的非官方提案。問及同學覺得六萬尺的圖書館面積可以怎麼用，同學對我們提供的六個選擇的意見相當平均。把面積用在擴建現有大學圖書館的三個選擇，分別有323、333、276位同學支持；把面積用在本部以外的三個選擇，亦有279、294、329位同學支持。即：近半同學希望能在書院享用圖書館及相應設施。

再者，在更直接的一個問題中，55%同學都不認同把圖書館的空間全部集中在中央本部興建。面對人口壓力，同學的想法顯然不是想進一步把設施集中本部，而是希望大學能更好地利用書院的空間、各種可以進一步善用的本部以外的空間。

你知我唔知：諮詢不足

超過六成的同學不知道政府批出的圖書館地積的前因後果，也有相當同學不知道以後逸夫附近的新書院計劃。就調查結果可見，即使校方不斷說自己如何「尊重」持份者的意見，但同學普遍對大學的校園發展所知不多，亦不能將之與討論烽火台的風波、圖書館擴建扣連。

大學圖書館：善用而非擴展

儘管同學主要認為大學圖書館不足的地方是電腦不足（518人）、小組討論空間不足（415人）、自修空間不足（285人），但56%的同學卻都認為現時的大

學圖書館的樓面面積已經足夠。可見同學認為大學圖書館需要的，不是增加地方，而是更好地利用現在面積。至少把本部圖書館擴張不是唯一的選擇。

大學應分配更多資源予逸夫書院

在問及對逸夫書院的觀感時，70%同學認為逸夫書院設施不足，78%同學認為大學應增撥資源予逸夫。可見覺得逸夫書院不足的不單是逸夫同學，逸夫書院設施不足也不被視為單單書院的個別問題。書院設施不足，同學唯有更頻繁地往返本部與書院，增加本部的人流壓力。



民主女神像事件



從對峙到凋零
——記民主女神像事件

◆ 陳嘉銘

2010年5月29日，支聯會在時代廣場豎立新民主女神像和浮雕紀念六四受難者，被在場保安阻止。食環署人員到場，指有關展出無申領娛樂牌照，不能在公眾場所舉行，要求清場。隨後警察到場將民女像和雕塑沒收，同時拘捕支聯會多人。後來中大學生會表示接收民女像，但中大校方則以「政治中立」為由，拒絕它在中大展覽。此為民主女神像事件的起始點。

過於政治化的「政治中立」

校方的言論和做法，無疑引起軒然大波。中大學生會隨即召開記者會，表示一定會將民女像運入中大。絕大部份中大人和香港市民也無法接受校方的說法，覺得它只是掩飾校方保守政治立場的幌子。當時，很多中大的團體和人士也發表聲明譴責校方，當中包括中大員工總會、不少中大學系的系會、當時的校董會成員及校友評議會常委。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地獄之火將留給面對道德危機時仍宣稱中立的人——聲討中大校方禁止擺放民主女神聯署聲明〉，有30個中大組織聯署及網上1,500多人聯署。結果，在6月4日的晚上，逾2,000名市民到中大護送民女像，並將它置放在火車站對出的大學廣場。

事實上，在民女像進駐中大後的一段時間，民間的聲音仍幾乎是一面倒指責校方。在公共領域的討論，其中一個主軸就是回應中大校方「政治中立」一說。當時有不少中大人都撰寫文章，討論大學應該抱持甚麼理想、大學能否或應否政治中立，以及中大忘掉價值思考的結構性因由。（見〈「當仁不讓於師」之「哭中大」〉、〈如果中文大學真的政治中立，則……〉及〈大學價值崩壞的制度根源〉）

民女像引發的空間政治

及後，事件的氣氛稍為緩和，校園內便出現了一些相對具爭議性的討論。其中本應是最重要但卻被事件蓋過的，就莫過於是有關民女像設計的思考：究竟新民女像是否理想的藝術雕像？新民女像與八九六四時的有何不同？這些差異又會如何影響群眾的觀感？這些甚少人問津的問題，正好由何慶基教授的〈要擺民主女神，但不是這個〉一文大膽地提出。

另外，校園公共空間及幹事會的處理手法亦是中大人甚為著緊的議題。因為當時校方雖然同意民女像置放於中大，但卻認為它應該搬去由幹事會管理的文化廣場（即本部范克廉樓外的空間）。校方提出的理由是，他們早已有意重新規劃大學廣場，所以民女像的存在只會阻礙規劃[1]。但對校方做法稍為有認識的人，都不難看到這個藉口是要收窄大學原本已少之又少的公共空間。（見〈民主規劃只限於學生自治區？〉）到最後，校方沒有將民女像搬到文廣，但至今仍沒有白紙黑字批准幹事會將它永久放在火車站前廣場。除此之外，校方亦沒有為民女像做鞏固工程，於是校友關注組就自發為工程費用（約2萬元）籌款[2]。

至於崇基學院對幹事會的做法亦同樣感到不滿，但理由卻有別於大學中央。崇基院方認為，民女像擺放的位置屬書院管轄範圍，因而指幹事會的申請是霸王硬上弓，「話擺就擺」，完全無商量餘地[3]。另一邊廂，崇基學生會則表明，若果公投後大部份同學的意願是把民女像放回火車站對開的空地，他們會欣然接受[4]。

與此同時，在這次民女像事件中，有其他中大同學不同意學生會不民主的處理手法，於是發表了一篇名為〈以民主為名，行專制之實〉的聲明，有近140位中大同學聯署。發起人認為，幹事會必須就永久擺放民主女神像事宜召開諮詢會。此外，幹事會亦須兌現該年六月提出的承諾，就民主女神像事宜進行全民投票。這份聲明，不啻是反映幹事會跟部份同學意見之間的拉扯。然而，筆者認為有民意授權的幹事會的政綱早已列明「平反六四」，擺放民女像實屬正當不過。再者，民女像事件事出突然，幹事會亦難以在短短數天詢問同學擺放民女像的位置以及是否永久擺放。為了回應同學的疑惑，幹事會在該年十月就寫了〈重拾中大使命，推動校園民主：為永久安置新民主女神像建言〉，解釋民女像永久落戶中大及擺放在大學廣場的原因，並承諾要以全民投票來決定神像的最終安排。

實踐校園民主之難

但是幹事會至今仍沒有啟動公投，只在翌年的十月及十一月走訪全校，召開八次中期諮詢會。據第41屆（2011-2012）代表會主席鄭智浩憶述，沒有舉行公投的原因有三點。一是代表會在公投的投票形式和選項等問題未能達成共識。此外，幹事會認為同學的意見紛雜，當中有關民女像擺放地點上有不同的意見，難以在一次公投中處理。最後，幹事會亦擔心若果公投議案複雜和宣傳時間太短（當時距離三莊投票只有約兩星期時間），宣傳公投亦有難度。不過，筆者認為這些說法實在難以自圓其說，因為幹事會早已承諾要啟動公投，而且公投方案只是技術性問題——例如幹事會是可以分別進行兩次公投：一次是永久落戶，另一次是擺放的位置。

公投最終不了了之，其實跟校園的政治冷感氣氛不無關係。事實上，有關公投的實際操作是在民女進駐中大後一年才

開始商討，而且參與諮詢會的同學寥寥無幾，這種政治冷感的氣氛令幹事會擔心投票率會低落。但說到底，幹事會魄力不足，才令他們不堅持推動公投，違反當初的承諾。

1 球奇，〈民女最新動向　文廣狂想曲〉，《中大學生報》2011年1月號。

2 楊曉楓，〈中大擬6月底鞏固女神像〉，《明報》，2010年6月22日。

3 〈沈祖堯返港急為事件降溫　聲言永久擺放須再申請〉，《蘋果日報》，2010年6月5日。

4 甲子年，〈第六十屆崇基學生會上場〉，《中大學生報》2011年3月號。

中大堅守政治中立的原則

原刊於中大傳訊及公共關系處網頁，2010年6月2日

致校董、同事、同學、校友：

香港中文大學收到中大學生會會長5月29日來函，申請將「新民主女神像」及相關展品放置於中大校園內。大學輔導長與學生會會長密切聯繫，了解申請的實際情況。

中大向來尊重言論自由，有責任維護所有大學成員享有表達不同見解和持有不同立場的自由。大學的行政與計劃委員會以不記名方式投票，一致決定重申大學必須堅守政治中立的原則。如有行動或活動反映政治立場，而對大學政治中立的原則有損者，大學不應涉及。鑑於上述的原則，行政與計劃委員會不能接受學生會會長5月29日來函所提出的申請。但大學了解到學生會正探討舉行相關活動，特委派大學輔導長與學生會會長繼續聯繫溝通。

2010年6月2日

當年一致否決新民主女神像及相關展品放置於中大校園內的，是中大的行政與計劃委員會（AAPC）。

我們僅此列出該委員會的成員名單，立此存照：

劉遵義教授、華雲生教授、楊綱凱教授、鄭振耀教授、程伯中教授、許敬文教授、黃乃正教授、梁元生教授、馮國培教授、沈祖堯教授、黃永成教授、熊秉真教授、黃德尊教授、李子建教授、汪正平教授、Prof. Mike McConville**、霍泰輝教授、伍灼耀教授、李少南教授、梁少光先生、吳樹培先生、陳鎮榮先生、吳基培教授。**

中大學生會記招
籲市民師生明晚護民主女神像進校

◆ Vicky

原刊於《香港獨立媒體網》，2010年6月3日

6月1日，中大學生會幹事會向校方提交在大學火車站旁長期擺放「新民主女神像」的〈知會書〉。6月2日，大學輔導長吳基培向幹事會表示神像可放於文化廣場。同日晚上，校方以電郵方式發出公開信，以「行政與計劃委員會以不記名方式投票（當中包括現任校長劉遵義及候任校長沈祖堯）一致決定重申大學必須堅守政治中立的原則」為由，表示「不能接受」該項「申請」。

學生會旋即於今日召開記者會。與會團體包括中大學生會幹事會、中大學生報、中大校園電台、新亞學生會、逸夫學生會、中大員工總會會長、校董會成員、中大校友關注組、劉遵義施政監察、學聯以及校友梁文道。

與會者主要針對中大以「政治中立」來矇混視聽，認為校方沒有自稱「中立」的資格——校長劉遵義出任全國政協委員，又曾頒授榮譽學位予董建華、唐英年等的政要，這是怎樣的「中立」？對此，校友梁文道直斥中大校方以此作藉口乃「低智力」的表現，曲解「政治中立」的含意——阻止神像於校園擺放根本就是一政治判斷。所有稍有理智的人都會知道其不合邏輯之處，希望學生跟校友以此為戒，與校方劃清界線。

中大員工總會會長吳曉真形容全體同工得知此事時「嚇到震」。她指劉遵義不能以集體決定來迴避責任。她認為廿一位行政會的同工內必有有良心者，劉在任期快將完結之時，仍要陷行政會的同事於不義，實在無法饒恕。另外，她在較早前接到媒體電話，被問及關於送神像進校時會否發生衝突的問題，她認為問題重心是誰造成衝突，而不是衝突本身。她要求校方別再難為保安組員工，他們根本就不忍心執行與學生有衝突的任務。

校友關注組周錫輝認為校方的做法是中國的悲哀，他欣賞師弟妹的行動，認為他們是不願做淹沒歷史真相的幫兇，並表示會全力支持。同時，他對於近來於香港發生的打壓越發頻密，言論的空間收窄感到悲痛，並認為如不反抗，長此下去，社會上就只剩沒有思想的人。

記招過後，有同學自發用油漆於圍板上

寫上「假中立、真打壓」，並用白油漆填滿烽火台的石階。發起人陳玉峰同學解釋，平時我們都覺得白色就是「白紙一張」，是純粹的，但當其覆蓋面積大時，也與其他顏色同樣顯眼。「白色都係顏色」，校方的「政治中立」同樣是政治表現。

學生會的立場非常堅定，並以「女神起錨」為口號，要求校方就拒絕讓新民主女神神像進校之事，向全校師生，甚或全港市民道歉。而神像定必會如期送到大學火車站旁作長期展示。邀請所有中大同學、校友以及市民，一同護送新民主女神神像到中大。

民主女神像進駐中大當晚，有近二千人護送。



地獄之火將留給面對道德危機時仍宣稱中立的人
——聲討中大校方禁止擺放民主女神聯署聲明

◆ 中大學生會、中大學生報、劉遵義施政監察

原刊於Gopetition聯署網站

中大校方於6月2日發出公開信，以「大學必須堅守政治中立原則」的理由，拒絕中大學生會將「新民主女神像」及相關展品擺放於中大校園，我們對此非常憤怒！

擺放雕塑才是彰顯言論自由

據校方的公開信內容，校方拒絕學生會的申請，是因為中大「有責任維護所有大學成員享有表達不同見解和持有不同立場的自由」。面對這種解釋，有基本智力的人都會懂得反問：擺放民主女神於中大校園，為何無端會限制了大學成員的表達自由？莫非僅僅一座有政治取態的雕塑，竟有法力阻止大學師生繼續討論六四的問題？十分明顯，雕塑不會窒礙討論，而且能激起討論。真正限制大學成員表達自由的，不是雕塑，而是校方的禁令。

眾所周知，六四是政治敏感的議題，大陸官方嚴厲封殺，不能公開談論，也無法見容於內地天羅地網的資訊封鎖。近年香港入境處多番拒絕民運人士來港，近日食環署與警方更以違反娛樂牌照條例為由，在時代廣場沒收新民主女神像，並拘捕一眾支聯會成員。這種情況說明，政府為收緊展示六四作品的空間，已到了堆砌罪名的地步。不容於政權的異見和表達方式，才是中大最需要，也最有責任維護的表達自由。這座雕塑如可擺放於中大，恰恰正能彰顯中大的言論自由和無畏於權貴的獨立精神。

政治中立邏輯混亂雙重標準

校方的公開信又指，「大學必須堅守政治中立的原則」。如果這種「政治中立」，指的是大學不應因為特定政治傾向，排斥某些教學和研究，限制某些言論的表達自由，我們當然絕對贊成。不過校方的說法卻是指，異見聲音的表達會限制其他人的自由，因此應該禁止。言論自由的價值，本來便在於維護異見聲音的表達。今天中大高層卻顛倒是非，為了維護他們口中的「言論自由」，竟然反過來要打壓異見。

其實所謂政治中立，也是一種政治立場。劉遵義上任校長以來，先後頒贈榮譽博士予劣跡斑斑的董建華和唐英年；劉遵義本人也被大陸官方委任為全國政

協，繼而走入特區政府的經濟機遇委員會，甚至當上行政會議成員。一邊歌功頌德，一邊遇上政權不喜的議題，便以中立為由絕口不提。這種雙重標準說明了中大校方的政治立場，其實就是以大陸官方的立場馬首是瞻。

「和諧」中大還有多遠？

為了迎合大陸官方的政治立場，中大高層已不惜揭破最後一層面紗，以邏輯混亂無人信服的說詞，禁止中大校園擺放新民主女神。更令人擔心的是，校方公開信還指，「如有行動或活動反映政治立場，而對大學政治中立的原則有損者，大學不應涉及」。若此例一開，以後一切「反映政治立場」的活動，中大校方皆有藉口阻止舉行。此舉不單嚴重限制學生自主，不單徹底葬送了中大的精神和氣象，更勢必連學術自由這條基本底線也一同拋棄。「和諧」的中大，距離我們還有多遠？

《神曲》的作者，意大利詩人但丁曾說，「地獄裡最熾熱的地方，是留給那些在出現重大道德危機時，仍要保持中立的人」。這句話不只適用於以劉遵義為首的中大高層，也適用於所有關心中大，擁護大學自主、言論自由和真理的人。中大高層倒行逆施，背棄大學堅持言論自由的基本道義，辜負六四死難者和在囚者為追求民主的犧牲。在這關頭，我們已再沒有沉默的理由。中大已容不下一張安靜的書桌！

我們要求：

一、中大行政與計劃委員會整體成員立即公開道歉；

二、中大學生會可以決定擺放六四雕塑的時間和場地，校方不得阻撓；

三、舉行公開論壇，交代中大校方所謂「政治中立」的原則，並表明對六四事件的立場。

發起人：
中大學生會
中大學生報
劉遵義施政監察

強烈譴責中大行政及規劃委員會越權不允許中大學生會提請在校內放置新民主女神像

◆ 陸耀文（香港中文大學校董會成員）

原刊於Facebook page「陸耀文：香港中文大學校董 — 中大校友評議會常務委員」

香港中文大學傳訊及公共關係處昨晚（6月2日）深夜11時32分向包括大學校董、大學教職員、中大同學及校友等全體大學持分者發出公開信，闡述大學行政及規劃委員會「必須堅守政治中立的原則」，因此「不能接受」中大學生會提請把新民主女神像及相關展品置於中大校園內的立場；而本人作為中大校董會成員，也是直至電郵發出後，才得悉校方有關決定。

根據《香港中大大學條例》規程13，行政及規劃委員會是大學校董會的屬下委員會，其職權包括：（a）協助校長執行其職責；（b）提出香港中文大學發展計劃；（c）協助校長審核與統籌香港中文大學經常及資本開支的年度預算及補充預算，然後轉交大學校董會的財務委員會；（d）在助教級及更高職級或職級與此等職級同等的教務人員及行政人員的聘任作出之前，對該等聘任進行審核或建議作出該等聘任；（e）處理大學校董會提交該委員會處理的其他事宜。

因此，行政及規劃委員會並非大學的管治機構（參照《香港中文大學條例》第7（a）及（b）條），而法例並沒有賦予該委員會訂立任何關乎大學政策立場或校令的權力；所以，該委員在沒有得到大學校董會交予處理或確認下，以「堅守政治中立的原則」拒絕中大學生會的相關提請，並不在存在法律依據，也有僭越大學校董會權力之嫌。本人對於行政及規劃委員會倉卒的決定深感不滿，其處理草率應予以強烈譴責，並將去信大學校董會主席，要求在下次校董會會議上討論事件。

至於校方提出「如有行動或活動反映政治立場，而對大學政治中立的原則有損者，大學不應涉及」的說法，查過去前任校長高錕教授回歸前曾獲委任為「港事顧問」、現任校長劉遵義教授去年獲委任為國務院智庫「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的執行副理事長，又大學過去亦向卸任的政治人物，包括李光耀及董建華，在位的政治人物，包括曾蔭權及唐英年等，頒授榮譽學位，凡此種種，正好說明校方對中大學生會及新民主女神像在校內放置，抱有偏見及雙重標準。

正當港府拒絕新民主女神像創作人陳維明入境之際，中大又作出「不能接受」新民主女神像在中大放置的決定，實在惹人聯想校方為免惹起港府及內地不滿，甘願放棄表達自由的原則，令校方在公開信中所謂「向來尊重言論自由」的說法頓成空談。因此本人十分質疑校方主管人員此種害怕觸碰政治取向的思維，又如何能夠為探討中的「中大深圳校園」爭取內地承諾和保證尊重表達及學術自由？

本人公開呼籲各位校友、大學教職員和同學們，齊心捍衛我們校園的言論、表達及學術自由，維護大學的教育理念和核心價值。

香港中文大學校董會成員

陸耀文

2010年6月3日

中大同學在圍板上用油漆寫上「假中立真打壓」六字，以回應校方以政治中立之名拒絕學生會在校園擺放民主女神像。



「當仁不讓於師」之「哭中大」

安徒

原刊於《明報》，2010年6月6日

又要下筆批評中大，難免尷尬，畢竟還是母校。但是這所「母校」近來的所作所為，已經令我等中大人感到非常陌生。為了拒絕學生在校園擺放一具雕像而搬出「政治中立」四個大字，如此理屈辭窮地回應，這所大學亦可謂接近自拆招牌的絕路。

高教領導人有辱斯文

可哀者，不是因為它被批評的諂媚權勢，而是它展露出這一批「高教領導人」的思想是何其混亂，已到達有辱斯文的地步。

大學之為大學的最高原則是學術自由、思想自由。

而思想自由的前提正正是容納各種不同的政治、文化、宗教等主張自由表達，互相理性辯論，溝通差異，以追求真理和共識。所以，思想自由的前提正好是鼓勵師生提出不同政治主張，勇於表達，而非迴避爭論，沒有態度。

新亞書院是中大的創校組成書院，它的校訓出自儒家思想的「誠明」。而儒家經典《中庸》對誠的解釋是：「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對政治、世局、社會沒有立場態度者，又如何能做到擇善而固執？

事實上，孔孟之道最討厭的其中一類人就是鄉愿。鄉愿指沒有是非觀念，事事刻意討好他人者。鄉愿永遠裝出老實的模樣，事事折中調和，沒有甚麼主見，只會維維諾諾附和別人。孔子對鄉愿深惡痛絕，說：「鄉愿，德之賊也。」孟子也說：「閹然媚於世也者，是鄉愿也。」

中文大學不高舉思想自由的大旗，不以促進學生表達政治見解，提供方便與機會發展成熟政治判斷能力為務，而口口聲聲以政治中立為尚，是否說明它今日已成為一所鄉愿大學？

退一萬步來說，如果說學生展示一具雕像，就要審查其是否有違政治中立，它也自身首先破壞了政治中立原則，因為決定何者才符合政治中立、政治中立的標準為何以至由誰去制定執行這些標準，都必然是政治判斷。中大校方公



然宣示自己以政治角度考慮學生申請，但所依據的卻是沒有經大學社群公開辯論而達成的所謂「中立」／「不中立」的準則，這表明了中大當局恰好不是在實踐政治中立，而是政治性地行使一己的政治判斷。那問題就不是「政治不政治」，而是一種違反大學是理性開放，宏揚思想自由，尋求真理共識之地的「壞的政治」。

雕像館藉口低能

不過，更荒唐的竟是消息指有校方高層認為，此例一開，中大就不能拒絕毛澤東、蔣介石、鄧小平等的雕像擺放，這會使中大成為一所雕像館。有網上的評論直斥這是低能，筆者也想不出理由不同意。因為，這是一種近年香港親建制的保守派不斷重複的滑坡歪理的最拙劣運用。而且，如果中大要忠於自己這套說法，那始作俑者應該是樹立唐君毅像的人，因為唐君毅生前毫不掩飾其反共立場，死後遺作也處處流露他的反共思想。當下中大校園內，親中商賈，愛國權貴的塑像、身影、名號卻也是四處可見，那為了貫徹政治中立，不左不右，為防各式政治立場的象徵物氾濫校園，那是否要來一場全校政治大審查，洗底以示政治中立？還是只許校方招徠權貴放火，不許學生良知點燈？

其實，今日中大校園早已是多元政治立場的象徵並存的地方，如果你在新亞尋得反共孔學偉人的痕迹，在崇基飯堂外的草地一角，你也會發覺那裡默默樹立著左翼理想主義年代的一塊勞動光榮碑。兩者象徵的政治立場和思想各異，但同時是各自時代的印證，歷史的印證，承載著各自當年熱烘烘的真實政治。它們出現的時代都有各種政治見解的交鋒爭辯，那些正是中大本身所積聚的文化遺產，也是中大人自豪的一部分。

可是，在甚麼時候你會想像，我們會進入一個年代，在沒有交鋒爭辯，沒有是非標準的鋪陳闡述下，一頂「政治不中立」的帽子竟然從天而降。這難道不是要毀掉中大幾十年來在人文、文化領域所累積的聲譽和家當？

我要問，這是一個甚麼年代？

筆者所認識和受教的中文大學，是由殖民地時代一批有著憂患意識、文化理想和民族精神的學者，努力向殖民當局，爭取宏揚民族文化使命而創立的。中大的誕生，本來就是一種政治產物。憂患和苦難的意識，貫通崇基與新亞，和各各在顛沛流離中避秦居港的學者學人。

而今日日益邁向勞斯萊斯化的中文大學，卻是一所恭逢盛世來臨，在盛世榮耀中翻波逐浪，卻忘掉了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的知識分子責任的盛世大學。

事實上，今次在中大校園所樹立的民主女神像，與其說是紀念六四屠殺廿一周年的標誌，不如說是翻開了新的一重意義，紀念中大永恒不滅的一種道高於師的抗議精神。這種精神在《新亞校刊》第八期內由唐君毅先生如此闡述：

「同學們固然當尊敬施教的先生，但是尊師必與道相連。道即是理想，師之尊，在其有道，能引導同學向道。故道尤高於師。而一切師友同到道的面前，便立於同一地位，當負同等責任，每人皆可以當仁不讓。只有在大家能重道而又能當仁不讓時，師友之關係以大公之道為媒介而聯絡，而後彼此之感情亦才有堅固的基礎，才可以長久。」

上述這段引文其實是再引自三十九年前新亞一位同學劉美美給當時新亞書院校長及師長的公開信。《中國學生周報》頭版報道，標題〈劉美美哭新亞〉，內容訴說學生深受新亞儒家教導，心深仰慕新亞人人歌頌的「新亞精神」，要同學同擔民族命運，民族前途。但在當時風起雲湧的保釣運動前後，新亞的師長們卻明哲保身，寂然不動，光讓學生被捕被毆，校方卻保持沉默。連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運動，申請用校內「誠明堂」作為公開論壇場所都不批准。於是，在一片「新亞精神已死！」的批判聲中，劉美美發公開信與師長與校方對質。一時之間，〈哭新亞〉一文震動學壇，傳為佳話。

大學之不朽中大人的可愛

事實上，民主女神像生於北京學生運動，針對的是強權專制政府，但廿一年後女神像在香港落戶中大的事件，卻同時是針對一貫都有明哲保身的鄉愿傳統，並日益向靠攏權勢方向滑動的大學校方。

「吾愛吾師，吾猶愛真理。」——中大人守持大學精神，代代不滅。二千人護送女神，再次編上一章。

將來在永久安放的女神像旁，如能同時在刻石誌上唐君毅以上道高於師的訓誨，及〈哭新亞〉的事蹟，那麼，這所大學四五十年來在苦難與盛世之間的跌宕與嘲弄，也不致全遭荒廢為散失的家當。

這是大學之不朽，也是中大人的可愛。

如果中文大學真的政治中立，則……

曾瑞明（中大哲學系2005年碩士畢業，第31屆中大學生報總編輯）

原刊於《明報》，2010年6月22日

在自由主義傳統中，政治中立的可貴之處，在於國家對社會中不同信仰和不同種族的人一視同仁，並尊重人們不同的生活方式。政治離不開價值，關乎眾人之事。政治中立實不過是價值中立的一種，背後假設了沒有唯一的善，多元是社會的實然，也是應然。最近我的母校香港中文大學竟也訴諸「政治中立」，企圖以此否決學生會置放民主女神像的申請。不少論者早已指出，這個論證犯了自我推翻的謬誤。拆穿西洋鏡後，也許我們還應再問：大學有可能政治中立嗎？不作政治判斷的大學是好的大學嗎？只有直面這些問題，我們才能明白大學究竟所為何事。

當代著名哲學家泰勒（Charles Taylor）在《中立在大學》（*Neutrality in the University*）一文指出，大學的中立，無論是政治或價值上的中立，都與她的「召喚」（vocation）形象相衝突。和自由主義所理解的國家不同，大學不是以容許各種生活並存為她的使命；相反，她是以創造生活，或者維護價值而存在的社群。這是大學的召喚，它是大學自主地決定的，而不是為了服務任何政權和商業機構。

妄談中立鞏固不平等

由此觀之，中文大學的校訓「博文約禮」，其實源於儒家的教育理想，本身已承載了一套特定的價值。這個理想有一定排他性，未必與信奉基督教或伊斯蘭教的交換生的理念一致，但這卻不應引來不夠中立的指控，一如我們不會要求教會或者某學派嚴守中立一樣。而「香港中文大學」中的「中文」，據中大首任校長李卓敏所言：「可以意指由中文作為主要授課語言（相對於以英語為主要授課語言的香港大學），也可以意指一個有深厚的中國文化背景的大學。」如果中文大學真的要中立，看來還得放棄以中文為命名，容許操各種語言，背負不同文化的學生，都能在此平等地學習。但這既不可能，也不可取。中文大學之所以可貴，並非因其中立，而在於其文化承擔和對當時殖民社會的批判。這本身就是一種政治立場，並因此吸引不少學子前來。可惜，中大現今的教學語言，美其名為中英並用，看似各取所需，實質是靠向英語強權世界。在本身傾斜的世界妄談中立，在欺侮的巨人和小童之間袖手旁觀，本身就是鞏固不平等。這是不應中立而中立的必然結果。

低俗相對主義禍害

有論者認為，如果大學容許民主女神像置於中大，其他政治人物的雕像如毛鄧蔣像勢將空群而至，中大豈不成了雕像館？這問題問錯了。問題應是如果中大是雕像館（中大本身其實已有不少雕像），為甚麼不可以放民主女神？是因為藝術理由，還是政治理由？中大不敢說出真實理由，卻自以為聰明，用「政治中立」這種後設語言（meta-language）含糊其詞。這種問法另一怪裡怪氣之處，是它把民主女神像和毛鄧蔣像平列，從而營造不同的政治理念都是價值相同的類比（analogy）。但這個類比適當嗎？民主女神代表的理想，與毛鄧蔣代表的極權暴力，真是沒有分別，難分高低？這是低俗相對主義（vulgar relativism）的禍害，無是無非。難道大學只需依附於政權之下，不理它是民主還是極權，有奶便是娘？

中大大概已喪失了其精神，連甚麼是與自己相配的也選不到和不敢選。我從沒聽說過，一間藝術館如果選了一件展品，就必須放置所有展品以示尊重言論自由，卻知道選了甚麼展品，會影響該館的品位和素質。言論自由的落實，不是要藝術館不加篩選，而是要有更多不同風格和追求的藝術館，並容納更多不同類型的藝術品。如果中大敢選毛鄧蔣像以迎接新世紀，歡迎，但請先改名為「中國人民大學」，不要再以甚麼中大精神蒙騙青年入讀。

傳統價值視而不見

要中立的其實不是中文大學，而是現今政權。政權有沒有容許異見？有沒有容許差異？有沒有容許主流經濟價值以外的人文精神？如果有的話，我想中大會少一點壓力，活出多點真我。

一旦面對與自己辦學理念及召喚相違的政權時，可以怎辦？一曰對抗，此為悲壯；二曰瓦解，此為成仁；三曰離去，此為黯然。錢穆先生取三。如今中大當權者選擇的，是搜尋更多公關語言，或者參與政協靠攏政權，卻對中大獨有的傳統價值視而不見，並任其埋葬在簇新的教學樓下。



大學價值崩壞的制度根源

◆ 李敏剛（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三年級）

原刊於《明報》，2010年6月22日

民主女神像進入中大當晚我全程在場。還記得集會開始不久，便有人打著「反對劉遵義」的大白布進場，但我不同意將所有問題推給劉校長。我認為，問題不僅出在某個人身上，也不僅出在中大，而出在整個高等教育體制。

從6月2日晚收到校方的聲明始，我看著事態一直發展，覺得校方的想法可能很簡單：他們從來不打算論證甚麼，他們只想解決問題。中大一方面要在內地大展拳腳，一方面很清楚香港人的六四情意結，民主女神像簡直是政治上的燙手山芋。所以，校方的目的，是政治拆彈，而非執著於甚麼教育理念。

政治中立過於政治

由此想下去，校方的聲明其實很聰明。「政治中立」和「學術自由」是概念模糊卻易受大眾支持的修辭。實情似乎亦是如此：幾乎沒有人質疑大學應否政治中立和學術自由，儘管沒有人知道今天香港的大學是不是真的很中立和很自由。簡短的聲明跳過論證，如意算盤是少說少錯，料不到是原來連「政治中立」都過於政治，一和六四相碰，反彈可以那麼大。所以，痛心疾首之餘，我們要追問的是：為甚麼大學會由這樣的團隊來管治？他們為甚麼會有這樣一套邏輯思維？這得由香港的大專教育體制談起。

高等教育界一般認同1999年是香港大專教育體制的分水嶺。自該年梁錦松執掌教資會開始，政府對大學的撥款引入一系列企業式管理機制，如運用資源競爭機制、強調資源優化運用、成本回收、設立明確和量化的指標和表現獎懲等。按教資會的表述，改革的目標，一方面回應當時社會的「滅赤」要求，另一方面希望大學教育的資源調配可以更靈活，更快回應社會需要。這些管理原則在其後的撥款中一直沿用，各種制度也相應建立起來，從而根本地影響了大學發展。

管理層變身CEO

這種管理思路表面看來不錯，但「社會需要」、「效率」、「優化」等都是頗為空洞的概念，到底它們具體所指為何，以及如何及是否真的有助於提升大學教育質量，並沒有嚴謹論證。因此，

要理解高等教育改革的利弊，我們需要回到香港社會的具體脈絡。我們認為，這些概念背後，基本上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市場競爭邏輯，認為只有透過引入企業管理和市場競爭，大學才會進步，才能提升國際排名，才可以培養出「理想」的大學生。

教資會完全接受了這樣一套論述，並將之強加到大學身上，美其名曰「改革」。「社會需要」於是化約為專替資本主義訓練其最需要的人才，「效率」等同大學企業化和權力集中，「優化」則變成削減資源的美麗包裝。於是，種種品質管理和評審委員會紛紛成立，以資源分配為餌，迫使大學展開各種競爭，滿足層出不窮的「優質教育」指標。在此大勢下，大學管理層變身CEO，最重要是懂得和教資會及政府官員打交道，在既有遊戲規則下爭奪得最多資源。工具理性支配一切，至於大學應有的價值和使命，早就消失於這些CEO視野之中。

企業化浪潮中淪陷

企業管理的文化制度應用到大學後，教育生態隨即發生根本轉變，大學老師被種種評審和行政工作弄得疲於奔命，花在教學的時間愈來愈少，更談不上有心力和勇氣抗衡不合理的制度。何況在這樣的大氣候下，也很難生產出甚麼有力量的對抗論述。於是，我們見到整個大專教育，充斥的不再是人文價值話語，而是商業市場話語。大學的學術尊嚴和批判意識在不知不覺間被掏空，大學管理層失去思考真正教育問題的能力。說得難聽點，早在女神像入來之前，中大已淪陷於企業化浪潮之中。

有了以上背景，我們應可見到，批評中大高層沒有風骨和良知固然沒錯，但如果不將整件事放回高等教育十年來的巨大轉變和社會上對教育市場化盲目膜拜的語境中，我們看不到問題的真正根源。如果這次不是大學硬碰六四，我們不知已有多久沒人談過中文大學的傳統、理念和使命。現在所謂大學的成就，說來說去，也就是收生成績、畢業生薪酬、國際排名和籌款數目。如果不信，讀讀那些校長家書和大學通訊就一目了然。今天的大學管理層，除了整天忙於爭權爭資源爭排名，甚麼時候和我們這些學生說過，大學其實肩負了追求真理、批判社會和促進人類文明進步的責任？

忘記最基本的責任

民主女神像代表了對六四死難者的哀思以及對建設民主中國的追求，卻被拒諸大學門外，實在是對大學使命的重大傷害。但這不是個別事件，而是反映了整個香港高等教育市場化後出現的扭曲異化和迷失。一葉知秋，今天的大學忘記了自己最基本的責任。中大的抗爭只是起點。從這裡出發，我們應該開始認真反思、批判和改變現在腐朽的大學教育體制。這才是我們的自救之道。

恐懼的政治
——香港中文大學對待「新民主女神像」

◆ 龔立人（中大崇基學院神學院副教授）

原刊於《明報》，2010年6月8日

對於香港中文大學（以下簡稱中大）以政治中立原則為由拒絕同學申請在校內擺放「新民主女神像」及相關展品一事，我寧願中大以沒有空間或「新民主女神像」欠缺中國特色為理由拒絕同學申請，因為後者理由還可接受。當然，中大清楚知道我所列舉的理由是可討論的，所以，它寧願以一個眾人都不信的理由——政治中立——拒絕學生申請。

數年前，我在崇基學院周會跟同學說，「大學是一處有夢想的地方，也是培養同學有夢想的社群。不但如此，大學也是支持你們實現夢想的後勤基地。」我沒有具體描述夢想的內容，因為我相信同學們有視野、品格和能力追求生命的美善。這正如崇基學院校訓——「止於至善」。當日周會上，有同學問，「若大學已不再有夢想時，我們同學可以如何？」我很直接回應他：「若真有這一天，請同學們為你們的師弟妹勇敢地指出大學的錯誤，因為中大是你們的。」想不到，今天同學需要站出來。

雖然中大的運作需要由一些專業人士管理，但同學、校友和教職員等等全都是中大的持份者。我們眾人有份參與建設中大。我們尊重這些專業人士的管理，但這不等於他們的決定是好的決定，不但因為人是罪人，更因為權力使人腐化。我對好的理解很簡單，好就是容許人有夢想、培養人發展夢想和支持人實現夢想。若政治中立原則是中大立場的話，中大需要向我們說明，它以拒絕在校內擺放「新民主女神像」為維護的政治中立如何容許、培養和支持同學和教職員的夢想。可惜的是，中大的公開聲明沒有陳述理據。

擺放「新民主女神像」的意含

我不需猜測中大的理由，反而我想說出在校內擺放「新民主女神像」的意含。第一，「新民主女神像」與六四民運事件分不開。「新民主女神像」不純是一個對民主和自由的客觀訴求，反而「新民主女神像」提醒我們，有人仍因六四一事有家歸不得、被監控和入獄、不能公開悼念失去的親人等等。此刻，我們意識到個人的夢想不能沒有對他者（離世和仍在的受難者）的回憶，也不能沒有對他者的承擔。我們不能只向前看，而不向後望。不是因為我們有太多牽

掛，而是因為我們不能遺棄受苦者。同學們沒有興趣要衝擊校方，更無意要令校方難堪，但同學們只想對歷史有責任和承擔。這是夢想的基礎。

第二，「新民主女神像」代表對社會一個願景，就是每個人都可以自由地生活，追求人生的真善美。中大有它的校訓——博文約禮，而「新民主女神像」所意含的民主、自由和正義等等沒有違反中大精神。更重要，它是由同學主動提出擺放「新民主女神像」，並以同學可理解的方法表達出博文約禮的精神。我找不出理由要反對同學的訴求，反而我為他們鼓掌，因為他們真的長大了。

第三，「新民主女神像」絕對代表一個政治立場，因為她代表受害者和弱者的面容。受害者和弱者沒有權力，只有真相。他們的故事與面容正揭露有權者的暴力。更重要，他們也揭露虛偽的政治中立。

雖然中大最後暫時讓「新民主女神像」在校內擺放，但它的態度已顯出它的恐懼政治。一方面，它恐懼破壞它自己製造出來的政治中立；另一方面，它恐懼跟同學和教職員就此事公開討論。所以，中大的讓步是基於恐懼多於真誠的悔改。

護送民主女神像的中大人，手持不同標語橫額，圍站火車站外廣場。



要擺民主女神，但不是這個

何慶基（資深策展人及藝評人，中大文化管理碩士課程主任）

原刊於《明報》，2010年10月16日

中大擺放民主女神一事，又再引起討論。沒錯，民主女神要擺，但不是這個。因為這民主女神像，是件拙劣雕塑，無論從藝術或政治藝術角度來看，均屬低水平之作，不應作為悼念民運的持久標記。

政府沒收雕塑，加上中大校方拒絕擺放，惹來強烈反響，令這女神像突然變身成反禁制的符號。怒火遮蓋了觀察，沒有人從雕塑的製作造型能否表達民運精神的角度，來評核雕塑人陳維明這作品。本文比較八九民運時的原有民主女神像和中大的新民主女神像，以顯示這新雕像不合格的原因。這裡得強調，民主女神是政治作品，有別於一般追求美感、個人抒情或表達獨特創意的藝術。雖然也須從造型、表現手法等方面入手，但最終的量尺，是看作品能否有效地表達民運的神髓和獲取所希望得到的效果。

上升的標記

政治藝術的基本功能，是激動情感和提升士氣，進而引發行動。原女神像於5月30日豎立於天安門廣場，正值兵臨城下、人心離散，民運進入低潮之際。學生製作巨型雕塑，希望透過建立符號標記，表達理想和期盼，振奮士氣。





原女神像高十米，以石膏為主要材料。四天內製作如斯巨大雕塑十分艱難，製作方法簡約，除頭手等主要部分製作較精緻外，身體衣服均有大刀速削的簡約效果，刪去細節卻不粗疏，反而帶出迫切和豪邁的感覺。女神像身軀不成比例的拉長，牽動向上提升的動感，引伸出政治作品所需的積極正面感覺，像是向群眾說，無論多艱巨，仍毅然向上。

新女神像用玻璃纖維造成，表面質感較複雜和較多細節，古銅色感覺較堅密但色

調也較深沉。女神身軀也略拉長，但身形較肥大而下中上圍的變化較大，減弱了提升感。原女神像的身體基本上是筆直的，沒有新女神那麼多衣服摺紋拖緩上升，最大的「阻力」來自新女神像底部的裙腳，它如膠漿倒地般無限向外緩慢擴散，裙腳延伸成為雕塑底座，出來的效果如不是下沉，至少上升力度亦大減。新女神身體其他部分，如右手衣袖像濕了水般下墮，進一步減弱那向上動感。

站立的動感

製造這如倒放花朵的「座」，有技術上的原因，為了加強底部重量，令雕塑穩定下來。惟此「腳底加闊」方法實太懶惰，因雕塑是中空的，加上玻璃纖維重量不大，只要在雕塑底部內藏較重物料，或在底部設不起眼的螺絲位以固定於雕塑座上，便毋須攤開底部。原女神像其實只是一邊身軀直向上升，底部另一邊其實也略為外延，效果卻自然而富動感，因為她不像新女神像般呆悶地各邊等量外延，不平衡的外延反而加強動感。不平衡效果是由原女神像的站立方式造成，她站立時身體重量集中在右腳上，左膝微向前伸，身體略呈S形，這是較接近一般人自然站立的方法，藝術史上當古希臘雕塑出現這名為contrapposto 的站立法時，被視為留意到人類自然站立方法的一大進步。反觀新女神像雙腳重量均等的直立，這生硬的站立，通常只有在緊張狀態或排隊操練時才出現。

新女神像臀部後伸，胸口前挺，只有前凸後凸的橫向效果感覺，作者對女神的胸和臀的重視，實令人不明所以。原女神像雖為「女神」，實頗中性，有民主無性別分野之感。新女神像身材較凹凸分明，當然女性身軀可以是重要符號，德拉克洛瓦（Delacroix）名作《自由領導人民》，作為民主自由開導先鋒的是女性，畫中女主角露出乳房作為孕育的象徵。新女神像亦重視胸口，卻無此效果，因為製作實太馬虎，猶如兩個椰殼倒模擠上胸前。當右手高舉火把時，因拉力關係右邊的乳房應略向上提而且較扁平，現在這兩椰殼乳房均衡平擺，只顯得作者對身體結構欠認知、或製作時有點粗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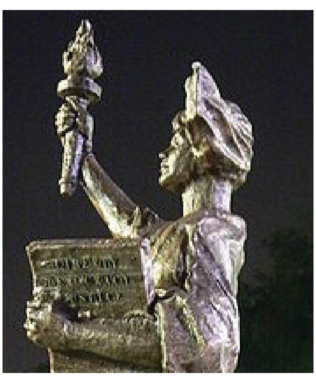


失敗的製作

原女神像昂然站立，雙手緊握火把前望。雕塑沒展示敵人，卻以大風作比擬。挺立巨風前昂然無懼，抖擻直立卻仍保留contrapposto 站立的自若。雕塑不能鑿出風來，只靠頭髮橫飛以暗示，以襯托風吹雨打不畏懼的堅毅。反而新女神像的頭髮卻奇怪地向上勾，像是風吹從下而上，但卻又與火把上火光所展示的風勢路向迥異，側面看更見女神頭髮向前回飄，像是有風從後邊來。錯亂風勢，令雕塑失卻那對著衝的寓意。新女

神像裡，雜亂多向的風只是用來製造眼前美感效果的工具，層次顯然不同。筆者不否定形式運用的重要性，但作為主要是表達對歷史、政治反思的作品，應知道甚麼是表達的重點。

火把是女神像另一重要符號，標誌着熱誠和生生不息的力量。原女神像的火其實相當細弱，未能帶出熊熊烈火的氣勢，這可能和技術局限有關，因為火把熊熊放大隨風伸延，以石膏製作有容易碎爛的危險，令這核心符號中途遇上破損。但以玻璃纖維製作新女神像，應沒這技術問題，但其火把像是大堆錯亂糾纏的肥手指，完全展現不了火把的意義，而拿在右手上的火把竟然向後傾斜，連這重要的火把都不能筆直地舉起來！





新女神像和原女神最大不同之處，是她如美國自由神像般手持類似憲章的東西，上面寫上「自由、民主、公義」等核心價值。最令人反感的是，那是用英文寫成，作者的解釋謂這代表普世價值。但英文就是代表「普世」嗎？即使在西方，也會選用較遠古的拉丁文，如是追溯民主女神／自由女神的傳統，也可用法文，因為自由女神形象源自法國大革命。問題是，這是件帶來香港、主要給中國人看，述說一段中國人的歷史和傷痛經驗，以振奮人心帶出希望的雕塑，何解要英文？不過最近再觀看作品，不知何故那堆英文字已不復見。但女神手拿空白書本，仍有點荒謬。

重塑女神像

身體有肉無骨、比例錯亂、頸部上粗下幼地與身體不銜接、女神手指腫脹，明顯是對人體肌骨結構欠認知，還有衣服未能展現內裡的身軀等等多籮籮的形式技巧問題尚且不談，單從表達政治信息上新雕像已相當不濟。陳維明為六四造像的心意和努力值得尊重，維護表達自由的權力我們亦應堅持，但永久裝置一件水平不足的民運標誌便得認真再三考慮。

八九民運、民主女神是莊嚴肅穆的題目，女神像包含無盡血與淚、理想和期盼，絕對不許兒戲！和港大的國殤之柱一樣，新民主女神像不是卓越的藝術品或政治藝術品，它的意義只是因為曾經被人家禁制展出，作為短暫的抗爭符號尚可接納，但裝置為持久紀念民運精神的符號則極不妥當。

中大應擺放民主女神像，但不是這個。為何要覓不合格的新猷而棄原作？乾脆把原有的民主女神像複製，安置在中大校園，帶回那段歷史、延伸那股理想和熱情，也提醒我們不要忘記那深且痛的哀傷。

民主規劃只限於學生自治區？

◆ 秦晞輝（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二年級生）

原刊於《香港獨立媒體網》，2010年10月6日

我想不少中大同學應該像我一樣，曾經期待劉去沈來，校園會有一番新政。短短數月過去，沈校長的確展現了他的親民作風，毫無架子，與同學在校園一起觀看世界盃，似乎願意站在同學角度施政。但我懷疑，這種「樂也融融」的施政方針，會否只是一種家長式的與民同樂？而學生權利和行政強權之間的矛盾，又能否通過表面的和諧就可以解決？

上月，校方要求將現時置放在港鐵火車站對出草地的民主女神像搬遷，希望擺放在大學本部的「文化廣場」。學生會對此做法表示反對，原因是文化廣場空間不足，而接近火車站的位置亦方便廣大市民接觸。

這只是學生會的意願嗎？我想不是，因為「文廣」實在不方便由火車站前往，而神像亦會失去如今這最注目的位置。相反，校方若單以方便管理和安全問題為由，亦不見充分：第一，如今擺放位置真的這麼難以「管理」嗎？學生會曾在該處舉辦不同類型的討論會，亦有邀請城市論壇來做節目，吸引者眾，學生會同學有覺得該處「難以管理」嗎？第二，就算真的如此難以管理，校方難道不能為一些更重要的文化效果而放棄一點行政效率的思維嗎？所以論方便，與其說校方的想法是為了方便學生會，不如說是為了方便校方規管學生的參與範圍。這個文化廣場，是全中大唯一所謂「學生自治」的地方，場地由學生會安排。而在校方眼中，學生參與規劃的空間，原來只僅僅限於這個小得可憐的地方。這不正如家長不允許小孩走出客廳一樣，只容許小孩設計自己的玩具箱嗎？

我不敢說自己能代表中大同學，如果要知道廣大同學的意願，就需要進行公投。但有人可能會覺得，這一件芝麻綠豆的小事，為甚麼要這樣勞師動眾呢？我也確實覺得這是一件無聊事，但正如港人要用一次又一次的遊行要求政府保障言論自由一樣，對許多民主國家的公民來說，這正如爭取呼吸一樣是件無聊事，因為他們的政府早已保障這些基本權利，但目下香港的大專同學，又有沒有參與校園規劃的空間呢？

民主女神像的矗立，畢竟將民主和校園連結在一起。在集權的國家，參與就是挑戰權威。而在成熟的民主社會，當權者才會把參與當成一種常識。相比議會中的民主，社區參與是在一個相對小的範圍內，做直接的民主決策。大學校園無疑是一個適合培養這種決策的空間，如果連知識人社群都沒有參與規劃的空間，香港又如何「循序漸進」地實行民主呢？換言之，如果沈校長希望中大能夠培育這個地方未來的主人，又怎可能抱有這種高層決議的心態，不想想如何開拓學生的參與權？對此，我還是抱著期待的，我仍然期望校方會交待他們的規劃理念，讓我們在平等的平台上，共同作出決策。而不是每到最後狀況，才聚集群眾到烽火台上義憤填膺。



以民主為名，行專制之實
—— 反對中大學生會獨行獨斷聯署聲明

歷屆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幹事會（下稱「中大學生會」或「學生會」）都相信大學生必須承擔社會責任，並以延續中大作為學運基地傳統為傲，一直致力於社會運動，自命學生運動先鋒。

然而，不少同學的反對聲卻從不間斷。有同學表示，中大學生會雖著力推動社運，卻鮮有與同學接觸。即使面對一些重大的事件，亦少有收集同學意見才推行，而只獨斷獨行，漠視同學意見。例如學生會曾於2008年畢業典禮上就校方頒授榮譽博士予董建華一事抗議，影響畢業禮進行，即從未讓同學知道。

近日學生會自行放置民主女神像一事亦如然。據悉學生會曾於5月29日向校方申請擺放民主女神像，惟至今（6月10日）卻仍未就決定擺放民主女神像一事正式知會同學，事前更未就有關事件向同學作意向投票。惟於事件中卻製造出一個有全體中大學生支持的假象，然而，事實上這個想法只是學生會理所當然的想像，完全忽略同學的真實意見。

5月29日食環署沒收民主女神，當日學生會即向校方申請擺放。我們雖不知兩件事是否有關連，惟擺放民主女神有著重大意義，無論如何，應先諮詢或起碼知會同學才作行動，而非獨行獨斷，視同學如無物。學生會方面雖聲明會在九月方進行全民投票，惟現時女神已入主中大，其投票意義及坊間反應自與未入主時已經有所不同。

亦有論者表示，學生會經全民投票選出，由全體本科生授權，擺放女神是符合政綱，無需再諮詢同學意見。若然如此，豈非世界所有國家的公投法都可被廢除？若然如此，學生會九月的全民投票又是為何？這是不合理的駁斥。既然學生會認為擺放女神有其重要性，要作公民投票，那麼為何事前卻選擇先入主、後投票？先斬後奏，絕不是民主的體現。

波蘭女革命家盧森堡曾說：「所謂工人階級決不是一個7人或12人組成的執行委員會，而是有覺悟的群眾本身。」因此我們也可以說，所謂「學生運動的實

踐」，也並不是十數名學生的內閣所能代表的，而必須由有所覺悟的大多數群眾所承認，才是真正的「實踐」。

我們反對學生會以民主為名，行專制之實。脅全校五份之一民意，胡作非為，甚至無視同學意願，與坊間民眾迫使校方就範。學生會應代表同學立場、反映同學意見，絕非借民意之名，脫離群眾，自行其事！學生會於學運立場上脫離群眾，已非一年半載之事，如果到今日仍不發聲，日後自當後患無窮！

在此，我們提出以下五項要求：

1. 日後幹事會作重大決定時，必須事先知會同學。如有足夠時間，應先諮詢同學意見；
2. 必須就永久擺放民主女神像事宜召開諮詢會，讓全校同學參與；
3. 九月時必須實踐承諾就民主女神像事宜推出全民投票，並尊重投票結果。投票必須設置有代表性門檻；
4. 使用中國民運基金作女神像維修支出，避免使用學生會會費。或在全民投票上加上維修項目投票；
5. 公開決定擺放民主女神的會議紀錄，並就「決定擺放」一事來龍去脈向同學作出交代。

我們懇請各支持以上要求以及反對學生會獨斷獨行作風的同學，聯署支持。收集簽名後，我們將提呈中大學生會代表會，要求跟進，並希望幹事會能作出回應及覺醒。

此致

全體中文大學同學

中文大學學生會代表會

中文大學學生會幹事會

副本呈送

中文大學學生會學生報編輯委員會

中文大學學生會校園電台編輯委員會

發起人（年份以2010-2011新學年為準）

歐陽梓鋒（2010年新亞英文）

田方澤（2010年新亞社會）

林靄廷（2010年聯合中文）

鮑銘康（2010年新亞社會）

施琦峰（2010年逸夫社會）

蘇瀚堯（2010年新亞風管，研究院／1）

施德安（2010年逸夫社會，研究院／1）

馮逸韜（2010年新亞數學）

劉浩然（2010年新亞化學）

林芷欣（新亞政政／3）

羅偉立（新亞社會／3）

簡懿娟（新亞社會／4）

池衍昌（崇基社會／3）

許智恩（新亞藝術／3）

羅家興（新亞社會／2）

重拾中大使命，推動校園民主：為永久安置新民主女神像建言

◆ 第40屆中大學生會幹事會

原刊於「中大新民主女神像文摘」網誌，2010年10月31日

一．引言

中大開學已經一個多月了。新民主女神像仍然風雨不改，穩如泰山的矗立在火車站廣場。每逢周日，路經的遊客、同胞總會到神像前瞻仰幾番；在今年的預科生資訊日（俗稱「info day」），不少中學生和家長在神像前留影，足見神像已成為中文大學一個新的地標。最近，更有同學自發在神像前奉上「祝賀劉曉波榮獲今屆諾貝爾和平獎」的花匾，更加肯定了新民主女神像把中大與神洲大地一脈相連的意義。

接下來，我們要面對的，是神像永久落戶中大的爭議。我們認為，新民主女神像和中文大學的歷史已不可分；永久落戶中大，既彰顯中大創校先賢精神，也體現中文大學對國家歷史和社會的承擔。而透過協商民主以至舉行全民公投決定神像去留，亦能實踐校園民主。

二．為何新民主女神像應永久落戶中大？

讓我們首先回顧兩段歷史。

第一段是中大創校的歷史。中文大學建校的成員書院（如新亞書院），前身都是當年內地的教育機構，因政治環境等問題才由中國內地避走至植根香港。而中文大學之成立，是為了成立一所「中國人的大學」，其「中文」二字，不只是一所使用「中文」的大學，更是一所傳承「中國人文精神」的大學，同時抗衡殖民地政府在香港「去根化」的教育。所以，中文大學在創校一刻起，已背負了一段政治歷史背景[1]。誠如一位校友在報章撰文說：

「筆者所認識和受教的中文大學，是由殖民地時代一批有憂患意識、文化理想和民族精神的學者，努力向殖民當局，爭取宏揚民族文化使命而創立的。中大的誕生，本來就是一種政治產物。憂患和苦難的意識，貫通崇基與新亞，和在顛沛流離中避秦居港的學者學人。」[2]

我們看到，中大本身除了是一個生產知識的高等教育機構，更背負著傳承中國人文精神的使命。這個使命，可以體現在「宏揚國學、關社認祖、崇尚自由、不畏權貴、開拓新知」[3]等範疇。中文大學，就是有社會關懷和歷史承擔的「人文中大」。從中大學生在七十年代積極

參與保衛釣魚台運動、八十年代提倡民主回歸、聲援八九民運，堅持平反六四便可見一斑。

第二段歷史是八九六四。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的大學生在悼念胡耀邦的同時，向中共政府提出反腐敗、反貪污、實踐民主、自由的訴求。除了學生，當時的工人、市民亦紛紛加入這場運動。在香港，市民積極參與遊行和「民主歌聲獻中華」等集會聲援北京學運，也為駐守天安門廣場的學生提供資源援助。當時的中大學生，也在校內舉辦集會，甚至到新華社聲援北京學生。然而，這場愛國民主運動換來的，是無情的血腥鎮壓。至今，流亡海外的民運人士仍不得回國、內地的公民政治權利仍備受打壓。劉曉波老師獲諾貝爾獎，不少內地學者因公開或私下支持劉氏紛紛被捕和軟禁[4]，便可見今日中國，仍在中共白色恐怖的籠罩之下。

以上兩段歷史和在中大永久放置新民主女神像有何干係？此中關鍵，在於新民主女神像，能成為中大一直傳承的使命的標記。這使命概括來說，就是對國家的關懷、對歷史的承擔。

今日的中文大學，和本港其他大學一樣，正急速異化為教育工廠，著眼於「做生意」、「鬥排名」、「搶資源」。所謂國際化淪為英語化、校方以國際生的多寡和國際排名為發展指標；為了與港大以至世界級大學齊名，就只顧爭奪資源，滿腦子裡都是預算、程式、報告。學校高層營役於數字、為向教資會「交數」而絞盡腦汁，對人文教育和中大傳統反而冷漠寡情，成為了一所「官僚中大」[5]。對於國家、社會的關懷，僅流於讚揚神州七號升空、舉辦零八奧運；面對一黨專政、八九民運和零八憲章等等公共爭議，就執行鴕鳥政策，以「政治中立」敷衍了事，蒙混過關。昔日的中大創校精神在他們眼中，正是黃鶴遠去，無須復還。

新民主女神像矗立中大，就是要提醒我們，中大精神，有著深厚的一份對國家、對民族的人文責任。關懷中華民族，關注中國政治，毫無疑問是中大創校精神的一部分。女神像象徵的「民主」、「自由」、「公義」，亦與大學本身追求言論自由、公民平權的精神一脈相承。女神像更時刻警惕我們，要延續五四運動和八九民運以來大學生對國家民族的承擔。二十多年來，六四尚未平反，中共不肯認錯，倖存者和死難者家屬則仍活在政治壓迫之中。當六四真相在整個中國大地漸漸被淹沒，當整個社會都因恐懼而對六四噤若寒蟬之時，中文大學難道不應力挽狂攔，秉承使命，藉著矗立女神像，讓更多人受其感召，堅持平反六四，直至中共終肯承認歷史過錯嗎？

而且，中文大學的歷史，和八九民運的歷史已密不可分；而兩段歷史的交織，造就了今日民主女神像得以矗立在校園。八九六四，中大學生聲援北京學生、抗議中共屠城，是中文大學關懷國

運的實踐；二十一年後，二千人聚集中大，抗議校方向中共獻媚、見證一個備受政權打壓、象徵平反六四的新民主女神像落戶校園，亦是繼承了這份情懷和風骨。新民主女神像重塑了當年在北京的「民主女神像」，盛載著八九六四的歷史、六四二十一周年的漂泊歷史，以及「中大人」在今年六四晚上的記憶。她已為中大歷史寫下一頁。如果新民主女神像能夠永久矗立中大，見證歷史，也是中大創校精神的象徵。

一個偉大的民族，不是講求外在發展的成就，而是擁有面對過往歷史傷口的勇氣，以史為鑒；同樣，中文大學要成為卓越超凡的學府，不在國際排名，也不在科研建設，而在於對自己的使命和歷史有一份承擔。

我們作為中大人、中國人，更應繼往開來，為香港以至國家的政治發展負責。這責任的確重大，這責任的確難以輕言擔當。但難道我們甘於擔任旁觀者？我們相信，對於傳承中大創校精神，我們責無旁貸；對於延續中大傳統、延續八九民運的歷史，我們是「任重而道遠」的一群[6]。

三．為何新民主女神像應擺放在火車站廣場?

或許有人會說，既然校方已允許神像永久落戶，何不聽從校方，將民主女神像放在文化廣場？接下來要處理的，還不只是技術層面的事情？

但我們認為，神像擺放在哪，亦是價值的考慮。神像擺放在一個對公眾開放的位置抑或一個公眾難以接觸的地方，足以反映我們如何看待女神像的精神和價值。新民主女神像追求民主自由，承擔「六四」歷史傷口的精神價值，既傳承中大創校精神，大學當局亦應弘揚於世。新民主女神像的意義，不應只局限在中大，而應發揚於全港，甚至於南下的國內同胞。大學火車站匯聚出入中大的師生，並連結來訪的香港市民和內地同胞，正是最好選擇。

校方至今只建議神像擺放於文化廣場，漠視了女神像擺放原址的意義。校方意欲從火車站移走女神本身就是一個價值決定，披上所謂技術的外衣。事實上是在避免爭議，逃避中大人應有的責任。與其說校方是出於管理考慮，不如說是出於對政治承擔的恐懼：校方現時不願女神像放在一個當眼的位置，和校方當初拒絕女神像的心態如出一轍。中大校方，懼怕背上「六四」的政治風險，懼怕得罪中共政權。對校方來說，神像萬不能放在他們眼中「高調而敏感」的火車站。校方懼怕承認神像背後的價值，更遑論肩負起民族使命了。遙想當年六四，前校長高錕刊登聯署廣告厲聲遣責中共政權[7]；今日中大，校方連大大方方放置一個象徵普世價值和歷史傷口的雕像也勇氣欠奉，這難道還是我們的「人文中大」嗎[8]？

我們認為，新民主女神像應擺放在火車站，以彰顯中大敢於承擔六四一後中國

現代史的悲劇，承認民主、自由、公義等普世價值，決心肩負中大創校使命。這亦是一所大學處於今日社會腐敗，民族危亡之秋所應堅守的良知和責任。

四．為何要以全民投票來決定神像的最終安排？

我們對新民主女神像落戶的期望，也需要得到同學的認同和授權；如果校方願意和學生合辦一個屬於中大人的全民投票，不單體現校園民主，也能夠作香港社會一個民主參與的示範。我們認為，舉行全民投票的原因，有以下三點：

第一個原因，是全民投票能夠實現中大人平等的民主參與。放諸民主國家，不同的政策總對不同的持份者有所影響，也總有不同的意見和立場。儘管在政策爭論中，學者有學者的見解、政府有政府的立場、市民有市民的意見，但在公投面前，各方持份者回復到平等自由的公民本質，人人票值平等，不因其社會地位或身份所左右。在此去除偏見的狀態下進行公投，才能體現一個公平公正的社會。

回到校園。校方時常提出，新民主女神像是否永久落戶，要照顧不同持份者的意見，不能單以公投決定，實在令人難以理解。首先，將中大人劃分成不同持份者如「學生」、「老師」、「校友」，本身就是一個分化的過程，而此過程也只由校方單方面決定，根本就是一套「類功能組別」的邏輯。其次，即使要照顧不同持份者的意見，校方至今仍未公佈如何收集意見，所謂「諮詢」的機制和時間表也沒有，顯示校方沒有誠意去解決問題，突顯了校方理由的空洞。而且，儘管不同持份者會出現意見分歧，我們也總要有一個最終決策的方法。而此最終權力（Final Authority）孰誰？是校長一人？是校方一面？還是在校的全體「中大人」？當我們以全民投票作為最終決策，我們投票時就只有一個身份，就是「中大人」。全民投票就是一個去除等級、職業分野的決策機制，讓每一個中大人都可以平等地參與直接民主。

第二個原因，是全民公投能夠推進校園民主化。一種反對公投的論調指，以公投作為決定民主女神像去留的方法，會產生滑坡效應，令學校未來無論事無大小均以公投決定，令學校無法管治。但放諸世上各民主國家及組織，此種論調實在是一天大笑話。首先，擁有公投制度的國家，均不會事無大小由公投決定。當決策關乎修改憲法和重大政治舉措時，擁有公投制度的政府才會以公投作為一個決策機制，體現「主權在民」。全民投票的結果能夠約束政府，變相增加政府的認受性和正當性。即使放在中大學生會，每當要修改會章，也需要由全民投票的結果來決定，學生會也必須遵行。

進一步而言，為何一般擁有公投制度的政府，均不會事無大小公投？究其原因，乃在於此種政府本身就是透過民主選舉產生的，本身已經具有相當合法

性。回到學生會的層次，學生會幹事會由會章訂定的民主機制產生，加上受代表會監察制衡，其組織本身就具有充分代表性和合法性；相反，中大校長並非由民主程序產生，中大人亦無任何機制對中大校方的權力予以制衡，可見中大校方本身就是一個缺乏民主授權的官僚組織。如果校方願意與學生共同就新民主女神像的落戶進行公投，不單能提高中大校方管治的認受性，也能夠成為一個難能可貴的經驗，深化中大的校園民主實踐。

第三個原因，我們透過全民投票，能夠提高「中大人」在校園以至社會的權利意識，包括參與公共討論和最終決策的權利。現時中大學生會幹事會主張將新民主女神像永久放置在火車站，中大校方則要求將之放置在文化廣場。既然雙方立場明晰，我們應該透過公開的平台互相辯論雙方理據，由大眾參與討論，而非進行只有雙方密談的黑箱政治。每一位中大人在公開討論中，都有平等參與的權利，此亦是一個重要的公眾教育，即透過條分理析，對議題有深度的理解和討論，最後才以投票決定，以保障公投結果的質素。而透過全民投票，每一位中大人也可透過行使自己的權力去共同決定。不論結果如何，在直接民主的過程中，我們能夠行使自己的政治權利，更讓我們進一步意識到，香港社會也應保障每人的平等政治權利。如果這次全民投票能夠成事，不單是一個有質素的民主教育，更為繼五區公投後，香港直接民主發展的先聲。中大就能真正成為一所貢獻社會、連結社會的大學。

五・展望

新民主女神像事件引發出來的種種爭論，絕非我們所能預計。爭論的關鍵，並非是學生會和校方單純的對立，也非單純的程序技術問題；此中牽涉的，是對中文大學精神價值的理解與傳承，以及對國家民族歷史的承擔和責任。對關乎國家歷史和未來發展的大是大非，實在要據理力爭。

時至今日，最令我們失望的，是校方連出來面對公眾，公開討論的勇氣也欠奉。要面對公眾，面對六四死難者的，不應只是我們尊敬的沈校長，也應包括當時一同決策，否決女神像進入中大的一眾行政與計劃委員會（AAPC）成員[9]。我們誠懇希望校方能夠向公眾公開當時拒絕女神像進入中大的原因，清楚說明反對將女神像放置在火車站的理據，出席日後的公開辯論，並回應能否和學生一同舉辦公投。

在現代社會，天下非一人之天下，而是天下人之天下；同樣，中大非一人之中大，而是中大人之中大。我們寄望中大人能夠延續中大創校先賢的理念、承擔八九民運對國家的關懷，為香港以至中國的民主發展出力，成就中大學生會會歌所言：

「我們的神聖工作是拓荒，承擔著整個民族的光輝！」

1　石傲枝，〈中文大學無資格說中立〉，《星島日報》，2010年6月13日。

2　安徒，〈「當仁不讓於師」之「哭中大」〉，《明報》，2010年6月6日。

3　馬傑偉、李立峰、朱順慈，〈毋忘六四，毋忘人文中大——兼論作為價值禮儀的悼念活動〉，《明報》，2010年6月7日。

4　據2010年10月22日的《聯合報》報導，聲援劉曉波的北京電影學院教授崔衛平被公安帶走，原因是大陸公安懷疑她透露劉曉波相關訊息給捷克駐北京大使。凡此以言入罪者，在內地多不勝數。

5　馬傑偉、李立峰、朱順慈，〈毋忘六四，毋忘人文中大——兼論作為價值禮儀的悼念活動〉，《明報》，2010年6月7日。

6　周保松，〈中文大學，請您學會講道理〉，《明報》，2010年6月21日。

7　當中包括仍在任的大學秘書長梁少光。

8　一次在崇基新宿的校長夜話中，有同學問如果公投結果是在火車站擺放，校方會怎樣？校長說，視乎情況而定。若果校方覺得火車站或文廣都無所謂的話，為何不直接順應公投結果？

9　包括前任校長：劉遵義；現任校長：沈祖堯；常務副校長：華雲生；副校長：楊綱凱、鄭振耀、程伯中、許敬文、黃乃正；協理副校長：徐揚生、馮通；書院院長：梁元生、馮國培、莫理斯、辛世文、劉允怡；學院院長：黃永成、熊秉真、黃德尊、李子建，汪正平、Mike McConville、霍泰輝、伍灼耀、李少南；其他高級管理人員：梁少光、吳樹培、陳鎮榮、吳基培。



民主女神像事件時序表

2010年5月29日	支聯會在時代廣場豎立新民主女神像和浮雕，食環署指展覽沒有申領娛樂牌照，要求清場。隨後警察到場將之沒收，並拘捕數名支聯會成員。
2010年5月29日	幹事會向校方提交申請書，要求在大學站對出的空間長期擺放民主女神像和浮雕。
2010年6月2日	校方以電郵方式發出公開信，以堅守政治中立為由，否決幹事會的申請。
2010年6月2日	中大員工總會發表〈強烈譴責校方政治效忠，呼籲中大同工明晚出席六四晚會〉聲明。
2010年6月3日	幹事會召開記者會，譴責校方的做法。
2010年6月3日	幹事會、中大學生報及劉遵義施政監察，發起〈地獄之火將留給面對道德危機時仍宣稱中立的人——聲討中大校方禁止擺放民主女神聯署聲明〉，有30個中大組織及1,500多人聯署。
2010年6月3日	中大校董陸耀文發表聲明，譴責中大行政及規劃委員會越權。
2010年6月4日	哲學系發表聲明，發起人皆為該系的教職員。
2010年6月4日	逾2,000名市民及中大人護送民女像入中大。
2010年6月5日	沈祖堯希望幹事會可以將民女像由大學站對出的空間移去本部文化廣場。

2010年6月9日	十幾名中大學生發表〈以民主為名，行專制之實〉的聲明，批評幹事會沒有諮詢同學就申請將民女像放在中大，是脫離群眾。
2010年10月16日	中大文化管理碩士課程主任何慶基發表〈要擺民主女神，但不是這個〉。
2010年10月31日	幹事會發表〈重拾中大使命，推動校園民主：為永久安置新民主女神像建言〉，解釋民女像落戶中大的原因及其後安排。
2011年1月30日	中大學生會代表會召開會議，討論有關民主女神像去留的公投議案。幹事會和代表會因技術理由放棄推行公投，不了了之。
2011年5月15日	由校友關注組贊助的民女修葺工程竣工。幹事會、支聯會及校友關注組為新民主女神像的新基座舉行揭幕儀式，並同時悼念已故校友關注組成員周錫輝先生。
2011年10月至11月	幹事會走訪全校，召開八次中期諮詢會，收集同學對民主女神像擺放位置的意見。最後幹事會沒有啟動公投，而民主女神像依舊坐落於大學站對出的空間。



自民主女神像進駐中大後，大學站前的廣場就成了集會、論壇的重要場地。